

中國抗日戰爭紀實叢書

睡獅怒醒

槍响卢沟桥

王宗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KANGRI ZHANZHENG JISHI

CONGSH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序 章

蒋介石上了庐山。

那里是避暑的好去处，每年的酷夏他差不多都要到山上绿荫笼罩着的那座专为自己修的别墅里去清凉、逍遥。工作嘛，除非必须要他过目过手的大事、急事外，其它的一律委托他人去处理。

今年这个夏天例外。蒋介石上庐山有满腹的心事，更确切他说，是忧虑、恐慌、还有些许的不安全感……

在别墅里的藤椅上落座后，他喝了一口水，使不知为什么变得干渴的嗓子湿润了些，然后对随从人员做出了上山后的第一个指示：

“华北大地上的日军活动情况要及时报告给我，记住，不得延误！”

说此话时他很严厉，脸上像下了一层霜。之后，他转身对夫人宋美龄说：

“你一定很累了，到寝室先去休息，我要处理些事情。”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秘书，递上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他接过戴上眼镜，细细地看起来……

这是 1937 年 7 月初，距卢沟桥响起抗日枪声的那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当然，这时蒋介石不可能知道会有个让他震惊的“7 月 7 日”，但是，此时此刻的他心神不定，魂飞魄散倒是千真万确的。要不，他此次上庐山为什么没有避暑的心情，连他的爱妻都有点受他的冷落呢？

看完电报，他把陈布雷唤来，嘱咐说：

“天很闷，我的胸部直发烧，看来这回不像干打雷不下雨的样子，日军要来真格的了。你给我拟个稿子，适当的时候我会讲话的。”

……

延安。宝塔矗立在晴朗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挺拔、壮观。几朵白飘带似的云彩静静地停留在塔巅，装点着这座众人心中圣洁的宝塔。

毛泽东坐在窑洞临窗下的木椅上，静静地坐着。他准备给蒋介石写信。

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那时蒋介石似乎有了点闲暇，可以腾出手来了，他想到要解决西北的问题，教训教训那个地方的红军。蒋介石曾多次表示过自己的心愿，要吃掉这支队伍，绝对不允许它存在。也就是在这时候，他说过一句他认为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的话：“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奸臣。”西北地区的红军太让他恼火了，甚至可以说像眼中钉一样使他无法容忍其存在。于是，便有了在甘肃境内黄河以东的地方展开的一场消灭红军和红军反击消灭的激烈战斗。蒋介石不惜血本地调集 260 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包围红军。红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竭尽全力去反击。围剿与反围剿拉锯似的进行着，双方均有重大伤亡。但是，最终国民党输了，共产党赢了。胡宗南的七十八师整个被歼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萌城堡战斗和山城堡战斗。

蒋介石承受的打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完全是他自己讨来的苦果，怨不得别人。

毛泽东没有因为又一次打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之梦而忘记了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比欢庆胜利更重要的是要联蒋抗日，是讨伐日寇。这是当前的大局。大局不能丢。

就是从这时候起，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或起草的文件中，对于过去的有些口号有了修改，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条道走到天黑是不行的。例如，他把过去一直叫得很响的“反蒋抗日”的口号逐步改成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反蒋、逼蒋、联蒋，提法变了，效果也必然会不一样。人心思抗日，中国必须抗日。

现在，毛泽东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这是在山城堡战斗大捷之后写的一封信，是非写不可的一封信。他要给蒋介石谈谈山城堡战斗，谈谈势在必行的、无法推卸的抗日大业。也许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给蒋介石写信，又是触及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情，毛泽东非常慎重。

毛泽东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阴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反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经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宪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 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

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派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今昔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定，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

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即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停候明教。

刹笔。

毛泽东又从头至尾将信细阅一遍，个别字句小有改动。这封诞生在延安窑洞的信就这样完成了。

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回信。

只能这样的理解或者猜测：一、他太忙，很可能无暇琢磨毛泽东来信中的深层含意；二、毛泽东信中的话刺准了他的隐痛，使他含恨于心，却无勇气反驳。

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会忘记他读罢毛泽东的信之后的那个动作和那句话：将信推向桌子的一角，对秘书说：“收起来！”秘书还等待着下一句话，比如说“回信”，或者说“研究研究”。可是，他没这样说，许久，才吐出两个字：“存档！”

就在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那封信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二将军在临潼扣住了蒋介石。

蒋介石被他的部属抓起来了，了得！它不仅仅涉及到国民党的前途、命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抗日事业也会因为这着棋走得不妥而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天不能塌，地不能陷，抗日大局一定要化解这块冰坨。在中共的多方艰苦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释放了蒋介石。

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蒋介石满口答应。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社会各界宣布：“只要我蒋某人存在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

人们希望蒋介石这个千金之诺出自肺腑。

1936年12月2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不到半个月，蒋介石就这次事变的问题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

蒋在训词中进行了“自责”，但是，更多的是他对张、杨的训戒。

12月25日下午3时20分，蒋与宋美龄一起乘飞机从两安起程，4点半到达洛阳。

次日上午10时许，蒋氏夫妇乘飞机离开洛阳，12时20分安全抵达南京。

午后，蒋介石召集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合会议，详细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表示想辞去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长之意——自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要变成事实不会那么容易的。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当天一直是马不停蹄的工作。

傍晚，他在军事委员长官邸通过秘书长陈布雷发表谈话，向国人表明此刻他的心迹。谈话如下：

“我因飞机颠簸，非常疲乏。我对这次西安事变的态度，一如在西安对张、杨两氏之训话。现在只有等待中央的决定。我作为统帅，对于

发生这次事变，深感责任重大。幸好得到政府妥善处理，全国军政当局的负责精神，使国家安定，未掀起波动，我深表感谢。在这次事件中，内外同胞的热烈同情和友邦朝野以及世界舆论一致表示同情，使本人不胜感激。”

当夜，蒋住所的灯光彻夜不灭，来来往往的人一直不断……

1937年1月1日，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当所有的法律手续办完后，蒋介石表现了自己应有的“高尚风度”，他发布“特赦令”，取消判决，宣布张学良无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久久不语，脸上全然是一种木然的表情。

不知他在思考什么。不过最后他轻淡地笑了……

1937年这个初夏，蒋介石在庐山时的心情很复杂。他渴盼和平的愿望当然还没有冷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手榴弹架在他的脖子上逼着他让出华北乃至中国的大片土地，他不得不哀叹一声：路断了，我必须回去另辟蹊径。

蒋介石的心火烧火烤一般。庐山的夏天原来也有不凉爽的时候。他唤陈布雷到身边，陈布雷来了，恭候他的指示。他却不知该说什么，一挥挥手，又让陈退去。

总 序

张 震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50年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人们的记忆又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威武悲壮的年代。我们这些经历过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更是抚今思昔，心潮难平，壮心不已。

半个世纪以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正义战争。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推动和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算起，实际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与寄赖国际联盟调停，而我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正式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动员全国军民保卫自己的国家。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在如此漫长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改写了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记录，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一页，而且是揭开反法西斯战争序幕的光荣一页。在日、德、意法西斯势力崛起，世界和平受到空前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中国人民最先举起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无疑起到了鼓舞作用和先导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长期吸引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要国家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在战略上掩护并支持了苏、美、英等盟国，配合了欧洲战场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为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尊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巨大的牺牲，有三千五百多万军民负伤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同5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不仅早已站起来了，而且正朝着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使中国跻身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之列的宏伟目标前进。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国家怎么发展，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要用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树立振兴中华、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图大业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抗日救亡”、“不作亡国奴”的共同心声，曾经把

千千万万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结成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气吞山河的伟大斗争。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存自立、奋发进取、兴盛发达的永恒的历史主旋律。

在现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象征。离开了社会主义，也就离开了今天中国的最大实际，也就谈不上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失去了灵魂。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要体现整个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利益、愿望和追求。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搞好爱国奉献教育，就是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有理想、有道德，讲文明、守纪律，以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己任，殚精竭虑，牺牲奉献。这都是爱国主义在今天的具体体现。

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同过去的胜利包括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回顾过去的奋斗和胜利，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牢记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可以指导和鼓舞我们更加坚定崇高的理想，更加奋发图强地走向光辉的未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从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就及时提出了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华南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人后方，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敌后抗日军民坚持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扫荡”、“清乡”，战胜了敌人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主体，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日战争积累的丰富的人民战争经验，是人民军队反对侵略战争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作战条件的变化，人民战争的具体样式当然也会发生变化，不可也不能固定于一个模式。但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会具有广泛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游击队等等人民武装力量，之所以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辉煌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这段历史再一次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建军的一条根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并卓见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经验

和优良传统，对于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对于维护和平、夺取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人民先是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从而开创了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新纪元。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人民又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不仅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人民将再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伟大腾飞。回顾过去，我们应该感到光荣；展望未来，我们更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军指战员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睡狮怒醒枪响卢沟桥

第一章

日军铁蹄踏进了长城·日寇侵华的特许证“三个卖国协定”·何应钦劝于学忠辞职·马厩里有个骷髅似的老者·殷汝耕用日本酒祝贺喜日·宋哲元的对策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田代皖一郎的浑话·冯玉祥提议给刺杀汪精卫的孙凤鸣铸铜像·一个精彩的谜：日军赠给 29 军一个营的三八式野山炮·一匹战马闯进日本军营·对峙在丰台正阳街上·让出丰台镇的那晚宋哲元一夜未眠·备濞朝阳门·中南海的超级宴会·7 月 6 日一场大雨浇了卢沟桥。

—

在这座人造的山脊上，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读出两个字：长城。

长城，现在成了国人值得骄傲的历史风景线，当初筑造它的人付出的血汗已被岁月的风雨吸干，孟姜女的哭声也被飞来飞去的鸟雀衔得无踪无影。

长城，深远而含蓄地屹立在苍茫遥远的荒野，创造了光荣而骄傲的业绩，也经历了难以启齿的屈辱。它总是高昂着头，对于中华大地经受的光荣和屈辱，它都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人。

日本鬼子将中国民众的鲜血溅在古老的长城上。

那是本世纪 30 年代初，日本强盗在东北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起伪满洲国后，吆喝起骑兵队紧靠着长城的北侧，挥耍着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耀武扬威地杀向中国内地。这些矮个头的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贪婪的呓语：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他们幻想侵吞长城，还有长城以南的大片中国的国土。

办法只有一个：凭空制造事端。这一天，山海关日本铁路守备队兵营内冷不丁地爆响了两枚手榴弹。虽然威力不算大，也没伤人，却把日军的“仇恨”给炸起来了。硝烟还没散去，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战前动员，要求他的队伍对投掷手榴弹的中国军队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随之，他们就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

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其实，两枚手榴弹就是落合甚九郎指派他的部下投掷的。他们在演戏。

有了这个借口，日军于第二天、第三天，便发疯似的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山海关，向长城推进。很快，热河省失陷……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

29 军的士兵们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愤怒的弹片裹着硝烟、尘土，拧成巨大的气浪，把日本兵冲击得连滚带爬。

长城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御过残暴的匈奴和历代侵略者的冒犯。当然，也有过失败，那也是悲壮的故事。

数千名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乌鸦呱呱地叫着，啄尸。

击败了日军像只怒狗，它们全线出击，反扑。

1933年3月10日这一天，绝对应该把它雕刻在长城的最显眼处。国耻也是一口警钟，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它：这一天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长城。

这块国土上的悲伤太多，也许这一次是不可遏制的悲伤。

山海关和嘉峪关古楼上的结着锈痕的风铃同时摇响，铃声悠悠远去，又慢慢归来。几分凄凉，几分无奈。

庄稼人用皱皱的手指抚摸着犁杖上的弹洞，眼里喷着火，心里滴着血。

长城不可能是日军的行军终点。

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蓟县、唐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他们要使华北门户洞开，渗透和分裂华北——当年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这块总面积为10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头8300多万的地盘，在日本军阀眼中无疑是一块不寻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

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二

士兵和民众在浴血抗敌，有人却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湿了蝥蛄翅膀的时候，田野的庄稼苗枯萎瘫在地里。

《塘沽协定》签订了；

《何梅协定》签订了；

《秦土协定》签订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远鄙弃那些弯曲着脊梁在协定书上摁下手印的臭名。

今天，每个炎黄子孙回忆起国人中滋生的那些跪着求生的罪孽时，心中堵满无法形容无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须如实曝光。

国耻也是教科书。

《塘沽协定》规定：（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一线；（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面对之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队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这样的条件许诺吸血成癖的强盗的人，还有半点中国人的骨气吗？刽子手正用刺刀搅杀着中国同胞的五脏六腑，拿着中国版图作抵押的人，为什么就不想想中国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冻。却要说成日晒。连做人的起码良心都没有了。

历史老人拍摄下了当时在塘沽谈判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开门揖

盗的镜头——

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晃动着那颗圆圆的小脑袋仰视着天空，无视中国代表的存在。他不落座，一只脚踏着凳子，首先抛出早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们务必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你们的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要回答我们。”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一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他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归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了，伤不着对方，自己也不会太丢脸。

冈村宁次不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十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无路可退了，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是东三省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被日寇打开了。这样，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三

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这两个人“土洋结合”孕育出了《秦土协定》。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个协定的出现是因为中方执行《塘沽协定》

不利而得到的“惩罚”。可是，驳不倒的事实是：真正应该受惩罚的是肆意践踏中华神圣国土的强盗。

谁来守卫国土？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第 29 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秦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的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说起秦君，恐怕还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这就是：他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鹗军中，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他轮流依附着自己的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实在不易。当然，秦君之主要长处是才思敏捷，富于谋略，是个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要不宋哲元出任 29 军军长后为什么要请他来当参谋长，以后又提升为副军长呢？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他 1883 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里，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进入培养高级军官的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的骨干。1913 年他以参谋的身分任本部部员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 30 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

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恶魔一样的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恶活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幕后活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

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

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军长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参与了策划；

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著，深得主子的赞赏。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接二连三地被提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真正的红得发紫。

1945 年 9 月 13 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 年 5 月 3 日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 年 11 月 12 日被判处绞刑，12 月 23 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面目》一文中，维妙维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藉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的本质。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台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恶棍再次行凶作恶的机会到了。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

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

这个协定是由“张北事件”引出来的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嘎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后，于6日将四个日本军人释放。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唯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泡制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的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

土肥原两脚一并，向司令官许诺：“是，没问题。”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原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答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软硬兼施的放风吹进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调开我，甚至处分我，宋某绝对服从；如果是日本要罢免我，宋某坚决抗议。”

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委员长是否听到，无从查实。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来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去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土协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那天，秦、土两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条款比南次郎

的“要领”还要苛刻，秦德纯婉转驳斥，试图拒绝。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上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最终秦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签定了《秦土协定》。其内容为：（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员免职；（二）撤消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在《战前华北风云录》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联合’的无线收发报室通知我说，由北平分社拍来了重要电报，内容为土肥原少将陪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及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拜访了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要求宋哲元第29军全部撤出长城线以北的察哈尔省，秦德纯当即口头承认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面要求签订正式协定，秦德纯说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请求延期几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这便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结果，邻接‘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地区‘安泰’了。相反，在中国国内，从5月末开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因此，抗日风潮顿时高涨起来，舆论严厉谴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的罪责。汪兆铭也许是过于劳累，老毛病胆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诺尔医院。”

汪兆铭即汪精卫。

《秦土协定》签字不久，秦德纯被正式任命为察省主席，接着又调任北平市市长。

《秦土协定》生效后，29军部分移驻河北。

在东三省、热河省被日寇占领以后，现在，察哈尔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这个贪得无厌的太阳帝国满足了吗？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吞整个中国。

自然他们非常明白，肥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渗透、掠夺，分而治之，以达到整体占有。下一个目标：夺取平津、河北，乃至华北实现“自治”。

四

一朵被风吹散了的云，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与《秦土协定》同时出笼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签的《何梅协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实现其罪恶目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帝国的魔爪下。

《何梅协定》的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活动。

有个扣子需要解开：日寇为什么要把51军赶出河北省却让29军从

察哈尔省移驻河北呢？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早年他随冯玉祥参加了反蒋的中原战争。日军认为，宋哲元这样的国民党将领是有利用价值的。

在这里，还需要把“驻屯军”这个概念给读者作一解释。

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随时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肆意地镇压中国人民，这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它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所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何梅协定》上。

与日军签署了协定的人自然是要执行协定所展示的各个条款。他们做人的心迹很坦率：既然已经付出了灵魂的许诺，为什么还要久久的不肯起步？

日方限死的心须兑现的日期，中方一点也不敢含糊。此刻，“协定”已经由于巴巴的条款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像了，你瞧——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羊拉屎一般，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是那微微吹来的风把它刮得七倒八歪，不堪一击。51军没有打败仗，可是却比打了败仗还要懒散，还显得没有章法。队伍缓缓地离开天津，又缓缓地路过保定，再缓缓地向西安移去。那里肯定不是避风港，但这支善战的队伍却要窝在那里去。带队的首领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他骑的那匹战马一颠一颠，使他的身躯一晃一晃地颤动着，军座的威严没倒，你不觉得他是在撤退，而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去。于学忠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起初，日寇通过亲日派对他进行拉拢，他根本不吃鬼子的那一套，后来，日寇又指使暴徒三次谋刺他，也均未得逞。

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限令国民党政府必须为之。开始，何应钦劝于学忠说：“孝候兄，国家眼下到这个样子，让人心焦。你一向是忠公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出于全局考虑，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于学忠非常反感耳畔有这种嗡嗡声，他故作没听懂，反问：“让我辞职？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都辞？容我考虑考虑吧！”何应钦也只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走了。不过，隔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紧催，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老兄，现在的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于学忠的口气比刚才更硬了，他问：“让我辞职是中央提出的还是日方提出的？我们还是不是中国的官吏？日本人说怎么办我们就不说二话跟着怎么办，将来还会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困难？也

许是这样，可是不管有多么难，总该讲理。我们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干。中央有权，免我的职、撤我的职，我都服从。可是，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的职你们就让我辞职，这太软弱，姓于的不干！”

日寇并不会因为于学忠的强硬而放弃了《何梅协定》所要求的内容。他们步步逼来，不断加码，条件提得越来越苛刻。限令兑现“协定”各款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

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措施：下令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宣布了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命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

于学忠率领队伍西行，西行。仿佛中国所有的空间都太小，难以容下这支为抗日做了应做的事情的队伍。

他对天长叹数声，却并不紧催战马，任其慢慢地踏行。

随行的警卫兵捡起了一片树叶，掸掸，放在嘴边。不过，他没有吹什么曲调，最后将树叶贴在脸蛋上。他好热！

远处一曲“走西口”，凄凉，哀婉，萦绕于山野，许久不散。

撤退的队伍行至一条河边，涛声吼叫着，像在送行。

五

还有两支队伍撤离河北省，西行。

他们是中央军第2师和第25师，分别由黄杰、关麟征二位师长带队。去处：徐州和洛阳。

山那边是山，拐过弯去还是弯。队伍走得同样很艰难，很容易使人想起51军的撤离。

出天津时，它们和51军的队伍是搅在一起的。不过，慢慢的，距离就拉开了，那是因为归宿的方向不同。

弯弯的山路。两支队伍变得越来越细，拉成了两条弧线，飘忽飘忽，流向远方，随时好像都会断线。这线最终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圆。

关麟征师长此刻的心情完全像离娘的孩子一样悲凉、孤独。对蒋介石，他关某人从来是满腔忠诚，以心相见；抵抗日寇，这是民众的呼唤，尽力为之。然而。谁会想到，如今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被日寇赶出了河北。蒋介石竟然连句保他的话都没吐。可悲呀，可悲！

关师长又一次回头望了望雾霭缭绕中的、模模糊糊的北平的影子，霎时，悲愤、怒怨、凄然相交的复杂感情缠绕在一起，无情地袭上心头，五脏六腑好疼！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部队离开北平时的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难以言喻的、难以忍耐的场面……

当时，他把团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进行撤离动员。这是一间空空旷旷的会议室，原先定了位的凳子不知被什么人搬去了不少，剩下的歪歪斜斜没规则地放着。与会的数十名军官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真个的“散兵游勇”，桌面上蒙着薄薄的一层灰尘。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了曲里弯拐的犹如蚯蚓似的印迹。

会议室里显出的凄凉、清冷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这个师长也失

掉了昔日哪种在部属面前盛气凌人的威严，半坐半靠地挤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前，给大家刚念了《何梅协定》关于撤军的内容，马上就有人发问：“何梅？哪一国人，怎么没听说过呢？”他不得不作了解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人。何梅是两个人，何应钦，还有日本人梅津美治郎。”“噢，原来这样，一个中国人，一个东洋鬼子！”

一阵哄堂大笑。

下面，他宣布的蒋总裁关于军队调防的命令也被笑声吵声淹没得烟消云散。

笑后，便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心都像压上了一块重石。

师里决定把撤离的时间放在夜里，这是有道理的。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变得浮躁、火爆，仿佛一堆干柴，见火就燃，如果白天撤离，就不定会节外生枝地惹出多少恼人的事情。就让夜幕为全师的指战员作一块遮羞布吧，黑灯瞎火的晚上悄悄地离去，即使发生点意想不到的事，别人也难看到。不坐车，是步行，而且是长途夜行军，到长辛店去登车。

这是个很不安静的夜。啄木鸟在远远的什么地方狠劲地啄着树干，它是啄这个不同寻常的夜，啄每一颗烦躁的心。

队伍默然地行进着，竟没有任何响动，当然那种脚步声踩在地上是很沉重的，只是太单调，也就显得十分寂寞……

关师长这时候想得更多的事是学生军训总队。那些孩子们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让他牵挂。

白天，他去宣布解散军训队的命令，还没等他把文件拿出来，学生们就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围上来，谁也不说话，用求援的目光望着他。原来大家从风言风语中已经得到了军训队解散的消息，谁也不愿相信它会是真的。这个军训总队是应爱国青年的强烈要求而举办的，国家正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危难，热血青年们谁不想用军人的素质和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为国尽忠。正在受训的三千余名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政治、学军事，一个个像充满气的足球，时刻要射向企图侵吞中华民族的日寇强盗。现在他们从关师长的嘴里得到证实，军训总队确实要解散，这是上面的命令，也是《何梅协定》中中方必须履行的条件。学生们愤怒了，像煮沸的水一样躁动起来了，有的抱成一团痛哭流涕，有的三五成群围着关师长质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违背民意的决定？”有的索性就做起了鼓动性演说，抬高嗓门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做可以任人宰割的绵羊，我们不解散，我们要抗日！”他这个师长在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劝导学生们，要大家理智一点，准备好撤离的工作。为了长远的事业，我们只能这样，保存自己，抗日的神圣大业需要我们出力的地方还多着呢！同学们都看出了师长的无奈、啥也不说了，只是哭，有的是大哭场。先是几个孩子哭，后来是好多孩子都哭了起来。很快，整个军训总队一片哭声，哭声一片。哭得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呆站在一旁，任同学们哭。他也记不得哭了多长时间，突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卖国贼绝没有好下场！”随之，整个军训队又沸腾起来了，口号声一个接一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

激昂的口号声过后，也许同学们把心中的积愤发泄出来了。感到很疲劳了，军训队平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打捆行李，做着撤

走的准备……

关师长离开军训总队走出好远了，还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不像是学生的哭声，抽抽泣泣，时断时续，声音很苍老。

他的脚步被这哭声拖住了，不由循着那哭声走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在伤心地流泪。

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前他站住了，这儿曾是个马厩，此时房前房后堆满了零零散散的粪便，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使用过的一间遗弃了的破屋。奇怪，明明刚才还听见那哭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怎么霎时变得悄不声的没一点响动了？

关师长轻轻推开用竹杆编成的半虚掩着的门，一看，呈现在眼前的惨景令他心寒：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老者像一堆骷髅似的卷缩在墙角的乱柴堆中。他脸上的五官已经被脏兮兮的污秽涂抹得难以分辨了。唯有那双无神的眼睛在怯生生打量着来人。可以看出，他饥饿至极，定是多日没有进食了。

“你是什么人？”关师长满脑子的疑团，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跑进军营的，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老者不回答，只是那双没神的眼睛闭上了，像一盏奄奄一息的小油灯灭了。

“我在问你话，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这里是军营，不许外人进来的！”关师长的声音很和缓，一点也不着急。他知道在这样一个也许很快就被饥饿夺去生命的人面前发威，实在是一种罪过。

老者的眼睛又从那一团松软的、折折皱皱的肉团里睁开了，仍然没有一点神气。他有气无力地给眼前这位在他看来威风凛凛的长官讲了几句话，声音很小，像马上就要断掉的游丝。但是，关师长还是听清了，老人说他是从关外来的，唯一的儿子五年前当了兵，他是来找儿子的。

关师长什么也没说，他又能说什么呢？

他离开了马厩。他只有一个祝愿：这位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儿子的老人能多活些时间。儿子走了，平津乃至河北大地上暂时没有中国的军队了。老人的儿子也许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出了马厩，在外面站了好久，才慢慢地向帅部走去，脚步很沉。他紧紧地咬着嘴唇，才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缓缓行进的军车在痛哭！

两条深沉的车辙里灌着的却不仅仅是泪水。

整个华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51军、还有中央军撤离河北省后，这里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片空白。它将要变成一片汪洋，横行一时的野兽不被淹没，善良的民众就要遭殃。二者必具其一，不会有另一个结局。

华北温凉的夏夜，中国已开始流浪。

那个身无半文的老人从干柴堆里挣扎起来，他没有追赶队伍，却扑进了那一片滔滔海浪之中……

狗咀嚼着日头，太阳掉下来的碎片意外地变成了缕缕笑容。

日寇突然改变了策略，变直接武力侵占为主要采取政治谋略，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恶人的美梦做得总是格外甜蜜，而且有时还能得以实现。只是为了过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现”是昙花一显。日军已经取得了他们实现华北自治的第一步胜利：扫清障碍。他们得意忘形，跃跃欲试地向第二十步骤逼进：选择屈从于日本的角色，成立华北自治政权。

说穿了，鬼子需要一个由它们自己操纵的傀儡。

谁是这个对象？

宋哲元。

日本人瞧上了他。

蒋介石也在物色他在华北的人选。在经过多次的筛选、比较之后，最后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当年的一个日本战地记者，对宋哲元的外表作了这样简洁的描写：“他矮个，发胖，身穿中式服装，光头，留着中国式胡须。身長五尺开外，体格魁梧，显示出山东出身的军人风采。”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顶瓜皮帽。日本记者没有把这个富有个性的帽子写上一笔，实在是个遗憾。

他是一级陆军上将，是冯玉洋的主要将领之一。188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字明轩。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早在1921年，宋哲元在冯玉祥麾下当旅长时，就出类拔萃，与其它四个旅长张之江、李鸣钟、鹿仲麟、刘郁芬，被人们称为“五虎上将”。1929年，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后，宋哲元等十名国民党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政府。宋哲元等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向冯军压来。于是爆发了中原之战，冯军败退，宋哲元被迫率兵退入陕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过五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也失去了实力。

纵观宋哲元的历史，最闪现光彩的一页，莫过于长城抗战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称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的。从1933年2月底开始，日军进攻热河，占领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军，到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方告结束。在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宋哲元和29军的官兵们浴血抗敌，万死不辞。一度，敌我双方争夺高地，形成对峙，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以及师长冯治安、张自忠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击毙击伤敌人百余名，并缴获大批武器。在数个月的对峙中，宋哲元率领部队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战斗至4月中旬，日军突然打开了友军的防守阵地，使宋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迫使宋部不得不撤退到通州，于是，日军攻占了长城各要隘，并直逼北平城下。

后来，宋哲元在回忆长城战斗时，这样形容将士们的杀敌士气：

“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好利索！”

每每提起在长城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宋哲元心里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诫自己的部属：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应该把他们未了的事情分担一些。他总是尽量要求自己这样做。

宋哲元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一贯很明朗：他赞成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常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样的运动。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因为他怕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他就发出通电，提出对日作战。遗憾的是他的通电没有促成蒋介石的抗战。也许这是宋哲元意料中的结果，所以他不感到意外。有这么一件事也许可以说明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所持的谨小慎微态度：那年，他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亲自登门祝寿，当时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后来，宋哲元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把寿礼退回。别人劝他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这样会伤两国和气，这是大事。宋哲元一气之下，便将瓷花瓶砸了。

这就是宋哲元，一个尚有民族气节但并没有下最后决心与日寇决战一场，还在犹犹豫豫时进时退的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

日军相中了他，在他身上打主意。是因为：宋哲元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眼下属“骑墙派”。将他留任在华北绝对比蒋介石另安排一个心腹要有用得多。

显然，蒋总裁看穿了日本人这极其毒辣的一手，便设法要挫败其阴谋，他先一步地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宋哲元及其所属几个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刚过一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撤消了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

双方都在争取、拉拢宋哲元这个实力人物，他会倒在谁的怀里？

1935年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正式提出对华北的三点主张：（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日寇侵吞华北的血口在继续急剧变大。

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和《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在这些文件里，将广田外相在日本第68次议会上的演说，即所谓“广田三原则”公诸于世：

（一）中国应该首先彻底取缔排日，并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最终应该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承认，反满洲政策自然放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

（三）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

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设施。

紧锣密鼓，恨不能一步登天——这便是日本帝国策动华北自治的基本心态。中国人有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日本人摇摇头，说：不，应该口一张就变成个胖子才对。

没有突破口一切都白搭。他们非常明白这个浅显却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付诸行动的道理。抓住宋哲元不放，对，就从策动他开始。

但是，一次次碰壁。当然，偶尔也有奏效的时候。

宋哲元很有点稳坐钓鱼台的气度，不点头也不气恼。

日方代表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期宋在 10 日内宣布自治。

随之便是日军的武力配合：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调动部分陆军集中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部分海军军舰驶向大沽口。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掠过。

不能不说是强大的压力，但宋哲元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时限已到，他没有宣布自治，也没有给日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别说是日本人，就是蒋介石此刻对宋哲元也有些费琢磨。

七

土肥原贤二来到了北平。

从东北动身时，他对完成此行所担负的使命满怀信心：“没问题，我一定会努力组织起华北自治政府。”对谁他都是这么说，那份自信从眉眼间足足地溢出来了。

土肥原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冀东亲日派殷汝耕；第二步说服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

通过殷汝耕来控制冀东，这是土肥原走的一步高棋，算他有“眼光”。

冀东，泛指河北省东北部处于热河省和平津之间的 20 多个县市，著名的开滦煤矿、天然良港秦皇岛都在这里，通往伪满洲国的铁路干线也必须从这里经过。日本帝国垂涎这块农业发达、资源丰富的小绿洲已经好久了。按《塘沽协定》划分，这里属于停战区，区内的治安由中国保安队负责，中国军队与日军均不得进入。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河北省将冀东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行政督察区。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行政督察区。在这片停战区执勤的保安队的大小头目都是日方指派或推荐的，殷汝耕是停战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始，由日方推荐殷相任蓟密行政督察区专员，滦榆行政督察区专员由陶尚铭担任。陶曾在国民党政府外文部任过职，对日本军部的话并不是那么顺从，所以殷、陶之间矛盾迭起。后来，陶便愤然辞职，殷就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滦榆”的专员。

殷汝耕是货真价实的日寇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他曾两度东渡日本，分别在鹿儿岛第一高等学校工科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归国后使自己全面“东洋化”，身著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妻，……。他和土肥原等日本实力人物打得火热，求荣华富贵。他曾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谈判，以出卖祖国主权为乐。

土肥原现在要把宋哲元和殷汝耕捏在一起，从而达到控制：华北的

目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平津地区的西、北两面已经被日军所控制，如果冀东再落入他们手中，则又可以从东面对平津加以包围。这样，最终侵吞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就是手到擒拿的事了。

土肥原频繁接触宋哲元，有时一天三次不请自到，上门讨好，外加威逼。

宋哲元始终没有答应。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他从开始跟冯玉祥将军时就抱定的心愿，现在要他沦为汉奸，宋某不愿上钩。

土肥原虽然十分恼火，却没有失望。随之而来的是对宋哲元的最后通牒：11月20日是限定实行“自治”的最后时间。土肥原显得异常坚决，他扬言：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还不兑现，我们会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宋哲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离土肥原的限期只剩下四天时，他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既倾诉苦衷，又施加压力。电文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时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以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这时候，土肥原仍在不失时机到宋府威逼利诱，一次次通报日军大军压境的声势。19日午后宋哲元送走了登门“拜访”的土肥原后，立即离开北平到天津探望老母去了。

土肥原跟脚追到天津……

宋哲元仍然软顶硬拖，就是不给日方明确的答复。

日寇按捺不住难以等待的焦急心情，于11月25日将蓟密、滦榆两区合并为滦蓟区，并把不属于停战区的昌平、宝坻、香河、宁河四县也纳其中，在通州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儿皇帝”殷汝耕被封为委员长。

土肥原显然是一种完成了使命后的轻松喜悦之神态，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倾心的祝贺，他在天津某饭店秘谋大计的会上，喜滋滋地对殷汝耕说：

“殷君，我们就以香槟举杯祝贺成功吧！”

日本人很喜欢中国的香槟酒，土肥原在喜庆的日子里不能不提到它。

殷汝耕这时候巴不得将天津所有的香槟酒买来与主子倾底而干。不料，全市的香槟酒已脱销，他不得不改变主意，赶忙向土肥原献媚：

“咱们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更有意义。”

土肥原听了，一击殷汝耕的肩头，眉飞色舞地说：“殷兄，你大大的忠心帝国，难得！难得！华北的天下非你莫属。”

庆功宴席至深夜方散。天上无月，厚厚的乌云笼罩着四方。殷汝耕急于到新政府去坐第一把交椅，连夜摸黑驱车驶向通州。

蒋介石根本不给日方好脸色看，面对日寇的为所欲为，他断然采取了几项措施：

撤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
派宋哲元担任冀察绥靖主任；
罢免殷汝耕，拿办。撤消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奉命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日本华北驻屯军蔑视中国主权的言行。

不能说蒋介石这几条措施都是做给日本人的，另外的一层“杀鸡给猴看”的含意绝对不可低估：宋哲元，你不要在我老蒋面前跷二郎腿，我有能力和气派收拾你。殷汝耕不是被缉拿了吗？还有，何应钦北上代表南京政府就任驻平长官，说明华北不是你的独霸天下。

日本人并没有被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唬住，他们限期宋哲元宣布“自治”的要求没有取消，只是时间又放宽了几天。

宋哲元颇有点两头受夹攻的感觉。谁都在拉他，谁也都在打他。这还是人么？一气之下，他便称病到西山休息去了。

对于蒋介石新委任的冀察绥靖主任的职务，宋哲元坚辞不就，连连给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表达了这个意思。

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北上，与宋哲元商讨安定华北的方案。没想到，宋哲元只和他照了个面，敷衍几句，就躲而不见了。宋哲元知道南京派这个“驻平长官”的良苦用心，不愿让姓何的分化自己的权力。

与此同时，日军的15架飞机列队在北平低空盘旋，何应钦的居仁堂收到了殷汝耕署名的传单，要求南京政府响应“自治”。这是明目张胆地赶何应钦走。

何如坐针毡、如过火海。他感到自己随时都有把命搭在这里的危险。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29军的师长冯治安觉得这时候该给自己的军座宋哲元说句话了，便在呜呜的飞机声中请见何应钦，给他说宽心话：“首长，请你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完全可以负责。”何应钦对于冯师长的关照自然要表示感谢，但是他总觉得姓冯的这话说得有点欺人太甚，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何应钦的生命完全掌握在29军手中吗？他妈的，准是宋哲元教他的师长来羞辱我何应钦的。真不是东西！

何应钦也是腹背受敌呀。别说他，就是把蒋总裁搭上，也难以承受眼下北平这超负荷的压力。何几经请示总裁，又和来平的几位要员商量，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当日，何应钦与秦德纯、萧振瀛等人拟定了一个“暂纾组织大纲十二条”，规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第二天，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多田骏转告了这个方案。之后，何应钦、宋哲元见面，对于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案作出最后协商。

全国人民用极大的愤怒回击即将诞生的这个机构。这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机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及民众跟着从北平街头传来的怒涛也纷纷举行示威活动。

即使在南京方面也不可能没有人谴责宋哲元等人勾结日本的行径。监察院还特地举行紧急会议，建议政府下令惩办降敌辱国的宋哲元。国民党“北方元老”张继难以按捺一腔激怒，找到蒋介石痛哭流涕地怒骂宋哲元，恳求中央严办这个卖国贼子。蒋介石自有他的考虑和打算，这

样回答张继与一切不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单去责怪宋哲元不是办法，他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撑持华北危局，一切都本中央意旨行事，我们不会真心与日本合作的。

显然，蒋介石没有不批准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意思，但是何应钦心里却有点发毛，唯恐蒋介石把这事“搁浅”，便努力地给蒋做工作，终于，他如愿以偿，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2月11日发布了《国民党政府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令》，预定12月16日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奸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为委员。

众怒难犯。举国上下都在声讨出卖国家的人，处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口号：“‘政委会’是变相的华北自治，我们坚决反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机构”。何应钦在北平根本无法呆下去，每日每夜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在他住所的街上或门前示威，叫响着他的名字骂他。他不仅仅是处境尴尬，而是生命安全也没有保证了。于是，12日晚他悄不声地乘平汉线专车返回南京。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政委会”延期成立。

蒋介石的主意没变，南京政府也没有收回成立“政委会”的命令，何应钦更是贼心不死，铁了心要设置这个机构。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主办的当局如临大敌，当天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大会是悄悄举行的，会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会场十分冷落，仪式也很简单。宋哲元和及其它委员出席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致开幕词，从他的神态、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满足，因而显得颇为称心。但是，细心人还能看出，他仍然有心病，这毕竟是鬼子们下了力气扶植起来的一个政权，鬼子，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呀！所以，他的眉头有时皱得像核桃皮，不讲话。开幕词就几句话，讲得简单、含糊，完全是客套话，看不出任何倾向性，使人感到他很滑头。

相比之下，他在当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灵的自白：

“应本善邻原则、力谋邦文之亲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况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害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辛善，哲元愿以最大之诚意，为最后之努力。”

如果不用指名道姓地点出这番话出自谁的口，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这是长城抗日战斗中那位“抗日英雄”的心迹。当然，人们绝对不会用他的言语去定论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他怎么做。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属于半自治政权，它既同国民党有联系，又同日军有联系；它不同于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权，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权。这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的产物。也有人说它是变相的“自治”政权，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作为宋哲元本人，他也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军方的干扰，又得听命于南京的蒋介石。日方企图逼迫宋哲元进一步脱离南京政府，而提出了“华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怀抱。蒋介石的算盘珠子也拨得蛮如意，他一再派人给宋哲元送去亲笔信，要他“忍辱负重”，拖延时间，明明白白告诉

他：我们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宋哲元难做人了，双方都有压力，两边都有诱惑，怎么办？他经过一番苦想、权衡，终于有了对付日本的策略。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他的对策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对日本要“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

日本方面曾极力干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选，想尽多地把亲日派塞到各个重要岗位上。最初，他们推荐了三十多人的名单，其中一大半是他们的心腹，宋哲元拒绝了。后来经过何应钦与日方反复协商，由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 17 人的名单。17 人中，属于东北军系统的 4 人，属于西北军系统的 6 人，这 10 人是反日的实力派，是宋哲元力争的结果。

对于政务委员会中的亲日派，宋哲元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把他们排除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需要他们平衡自己的心态。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做非为。他们公开的出卖国家同时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他鄙视这些人。姓宋的虽然主张中日亲善，但他有脊梁骨，他还不会堕落到在鬼子的胯下爬行。

日方在政务委员会安排的亲信主要有：

潘毓桂任政务处长；

陈中孚任外交委员会主任；

陈觉生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兼北宁铁路局局长。

王揖唐任委员会常委。

这些人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国人对他们无不恨得咬牙切齿。这，宋哲元心里是有数的，基本的态度是：像对待政务委员会其它各派系势力代表人物一样。一律给以礼遇，但是当他们的做出十分扎眼的有损国格和宋哲元脸面的事情时，便毫不客气地坚决除名。

宋哲元是军人性格，说一不二，有话音就有行动。

宋哲元硬，日本人也不会软，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安插进来就是为了给宋哲元施加压力，使政务委员会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那是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宋哲元接到了潘毓桂、陈觉生等人递上来的一份“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组织法”，让他审批。

宋看完这份报告，心里的火气直冲脑门，他把潘、陈二人找来，责问他们：

“你们的心劲不小啊，汉奸殷汝耕费尽心血没有于成的事，看来你们是死心踏地的要干成功！”

一语戳到疼处，潘毓桂们的额上立即渗出了汗珠。他们的这个“自治方案”与殷汝耕的那个方案几乎一模一样，这些人就是要把华北从政治、经济以至信仰，一律纳入日本统治之下。

宋哲元的火气还没消去，他进一步逼问道：

“是谁指派你们搞这个方案的？蒋总裁、还是华北的民众？”

潘毓桂们额上的汗珠又渗出一层，他们无言答对。

宋哲元早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方案是在接替土肥原担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亲自授意下出笼的，他就要问这些日本人的亲信们，要他们交出他们的“后台老板”。见潘、陈只是言词闪烁地支吾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宋哲元便将文件当场撕毁，摔在了潘毓桂面前。

土肥原没有办成的事松室孝良同样也达不到目的。

宋哲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身边有这样的日本暗探存在，随之他就对

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了清理，先撤了潘毓桂的政务处长职务，换上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长杨兆庚。就在这时候，王揖唐又公开站出来强烈要求实行华北独立，宋哲元坚决拒绝，两人发生争吵。宋下令将王免职。一不做二不休，随后宋又借故驱逐了陈中孚，把外交委员会主任换上自己的儿女亲家贾德耀，然后让 29 军参谋长张维藩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以与陈觉生的北宁铁路局长相抗衡。

宋哲元该松口气了吧！不。他说：只要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一天，日本人就一天也不会让它安生。我已经做好了应付一切麻烦事的足够准备。

这期间，天津市市长肖振瀛被迫辞职。原因是肖总是背着宋哲元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29 军的将领对此极为不满。想想看，一市之长，失去了自己所辖地面上实力派军方的支持、不仅仅是不支持的中立态度而是强烈反对时，他还能存在一天吗？天津市市长空缺，谁来顶缺？

日本方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安排自己亲信的极好时机；宋哲元也不会使日方的愿望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谁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谁都在防着对方的进攻、而自己又绝对不会放弃进攻。

日方推荐他们所豢养的直系余孽齐燮元担任天津市市长。

宋哲元断然拒绝。

日方在变化着花招，他们开出了一张不能出任天津市长的 19 人名单，来限制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这个名单，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建议南京国民党中央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这是蒋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准了。

在此之前，蒋就起过一个心思：用张代宋。蒋介石对宋哲元存有戒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蒋的肚量再大，也不会允许一个曾反对过他的主要对手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蒋想控制华北军政大权之心一日不灭，就一日不可能不设法让宋哲元靠边。于是，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权诞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北军二号人物鹿钟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与张自忠之间有矛盾，便想利用这种矛盾，促其内部分化，最后顺其自然地以张代宋。哪知，鹿钟麟来到北平一了解，宋与张的矛盾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剧烈，更重要的是张自忠对南京方面并没有多少好感。蒋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实际意义了。

蒋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于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一直没有搞掉。他们的维妙关系就这么若即若离维系着，犹如沙漠里的幻景，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但总也消失不了……蒋、宋都是具体的人，他们不可能逃脱人世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只能这样说：他们遇到的矛盾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烦恼。

宋哲元总是两头奔忙：29 军——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29 军。两头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绪的场所。一次，宋给官兵们训话，他突然给大家提了个问题，问：

“我们的敌人是谁？”

官兵们齐声回答：“日本军阀！”

宋哲元点了点头，但是好像还不放心，又叮嘱大家说：

“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不要那么大声喧嚷。哦！千叫唤那是一个钱也不值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坚忍’与‘备战’并行并重的。你们千万要牢牢记住呀！”

这话乍听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语。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说给南京方面听哩！

开会下来，有人给宋哲元递了个话，说眼下国人对29军的首脑人物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暧昧不明的态度有所微词，舆论界很不满。宋哲元听了显得额外激动，忿忿不平地说：

“张学良走了，何应钦走了，华北就应该白白送给日本人吗？中央要我负责，守大门，又要我本着不抵抗政策，与日本敷衍，又骂我投降日本当汉奸，你看这日子怎么过？”他冷笑一声，声音低了下来：“不管人家骂我们是石敬瑭也好，是张邦昌也好，咱们不卖国，不投降，问心无愧，管他妈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懒得理他！”

继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之后，宋哲元又让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随之，他便建议将冯治安委任为河北省省长、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两省两市之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了。

八

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从1935年开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他们用政治手段侵吞华北的阴谋遭到失败。

新接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气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翘了起来。他从天津专程赶到北平，问他的部属：

“我们的‘自治’没有成功，什么的原因？你们还有什么招？”

部属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田代又回到天津，还用那句话问他们在天津的官员，同样没人回答。

田代没有疯，但是他说了一句疯话加浑话：八格牙鲁，我们的帝国八格牙鲁！

留下这句浑话，他又到北平去了……

中日的矛盾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双方正在向战争的道路上迈进，且步伐越来越快。

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改变了策略，用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侵略、控制华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表现了急欲占有华北资源的野心：“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同一天，日本内阁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则更明确地露出了带血的贪婪的牙齿：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

把这些称作日本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并不过分。他们要梦想成真，便时刻进行着使蓝图变成现实的或是海盗式的夺抢或是强人之难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他成立“华北国”。遭宋哲元拒绝。

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进，又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具体计划。

宋哲元没言声，当然也没摇头。

就在这时候，南京政府电告宋哲元，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会洽商。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田代的要求。

日军非常恼火，田代拳头狠劲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滚翻在地。

他们最恼火的还不是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后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尤其可怕的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可以与曾经抵挡过无数次侵略者的万里长城齐名媲美的另一道铜墙铁壁。

中国的大地此刻到处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点燃起来的能焚烧一切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图偷走太阳的人必然会变成被烧死的野兽。

这个谁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实不仅被当时的实践、也被后来的实践一再的验证，因而成为亘古不变的评估：日本强盗的烧杀掠夺越疯狂，它

从正义在胸的民众手中得到的惩罚就越丰盈。

这是一组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打击日寇的历史数字：

“1932年，日本关东军死伤突破了三万人；1933年死伤高达四万二千余人；1934年死伤近五万五千人。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关东军出动了仅有的三个师团的主力‘讨伐’抗日武装，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关东军付出了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

这就是一切侵略者无法抗拒的应得的报应。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遗余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时候，清华大学等十校学生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义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国的自由。多么滑稽，抗日受限制，救国没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它大中学校的支持、响应。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2月初，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随之，指挥总部、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和宣传队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万余名学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冒着严寒，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响亮的口号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民心沸腾，众志成城。学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驻平长官何应钦面交请愿书，何应钦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进了西山的别墅，拒绝会见学生代表。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警察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封闭了西直门，阻止学生入城参加游行，派出军警用水龙驱散游行队伍。用大刀、木棍袭击游行学生，逮捕三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大地到处是民众为日寇设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头已经在燃烧，为遍野越烧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缕光焰。

也是在这时候，发生在南京的同样是震惊历史的“汪精卫遇刺”事件，也许更能说明日寇在中国民众中培植的仇恨达到了怎样一种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很得意地说：“这次全会显示国内趋于团结的喜人形势。”

9点钟，中央委员们从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之后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了开幕式。会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合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可是蒋介石迟迟不到场，合影无法进行。

代表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摄影机前。静悄悄地等候着。

蒋还是没有来。

也许主持会务工作的人觉得这样无限度地等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只好宣布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缺了主帅，气氛有些沉闷，照片上每个人的脸肯定是半阴半晴。

正当代表们转身要迈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的记者群中“叭”射出一颗子弹，命中站在第一排正在转身的汪精卫的左眼外角下左颧骨。汪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飞来第二颗子弹，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满脸是血，疼痛难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时不知咋办。就在第三颗子弹刚要射出来的一瞬间，紧挨汪坐着的何应钦说了声“危险”，将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颗子弹已经飞出，射中了汪的后背第六、第七椎脊骨旁部位。接着又是“叭”一声，这是第四颗子弹，未击中。

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下。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手握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喊着打倒卖国贼。孙原先是19路军的一名排长，怀着对淞沪抗战被出卖的旧恨和东北沦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这么一个“民粹派式”的行动。他的目的在于刺杀蒋介石，因蒋介石未出场，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汪精卫。

孙凤鸣在现场被捕

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身和孙搏斗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张继，他急忙奔到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孙挣扎着又射出两发子弹。

紧接着武将张学良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手腕一松，手枪落地。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停止射击！怎么可以不留活口呢？”

蒋介石从屋里冲了出来，这样大声喊着。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卫跟前，跪下左腿将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问：

“汪先生，你，不要紧吧？”

汪撑着双手半坐起来，脸色苍白，血气全无。

10时半，汪精卫被送进了中央医院，他神志清醒，言语清楚，左眼下面肿得胀乎乎的。医生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背痛得像穿刺……

亲日派汪精卫落得这样的遭遇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发表了卖国投靠的亲日演说，当时遭到了国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点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仗着主子发威的劲头哪里去了？

汪精卫遇刺，给人们留下太多的谜。尽管蒋介石说“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个死结。

因为孙凤鸣是个硬汉。

他被卫士放枪击中，流血过多。送进医院后濒临死亡。

南京当局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为的线索，指使医院每小时给他注射强心针十次多。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长陶履谦等亲自守在病房，追问孙凤鸣是受了谁的指派。

孙凤鸣的肉体正承受着残忍的折磨，他绝不会给这些刽子手留下一句供词。但是，该说的话他不会带走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微微张着的嘴唇间迸发出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留给“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精卫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是签字，再不打日本，我们就要亡国，中国人要做亡国奴了！”

第二天清晨，孙凤鸣就平静地死去了。

后来，冯玉祥就孙凤鸣的事发过几次感慨，称赞孙凤鸣的行为。他说：

“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是，我们就容不得这样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后来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们却养活了一个汉奸，我们要为那姓孙的青年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国民党的高层将领里也有说公道话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错。但是，水的力量确实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九

1936年5月，华北驻屯军擅自将兵力由二千人增加到六千人。

紧接着，日军又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联手，签订《华北防共协定》，企图将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增加到两万入。

宋哲元真不可琢磨，有时候表现得对日军十分强硬，你瞧多气派，把政务委员会里的日军亲信撸掉了好几个；有时又那么孙子，日军给他头上撒尿他连个屁也不敢放。六千兵力、两万兵力？日军想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竟然允许他们增兵。这个宋哲元，在关键时刻挺不起腰了。怎么办？外力促他站起来。

华北的民众不答应了。

先是天津的万名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高呼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口号，像潮水似的从大街上漫过。

随之，北平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天津人民斗争的游行示威。

全国各地抗日团体都纷纷来电来函，或举行活动，表示支持天津民众的正义斗争。

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急剧分化。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之后，两广组织“抗日救国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江西南部。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阻止两广军队北上，一面收买两广军队将领。他的收买奏效，7月4日，驻广东空军驾机投奔南京，使两广出兵失败。

难怪历史在某个章节显得那样沉重，甚至窒息，原来它的出口处密密匝匝地堆满了路障和清除这些重石的呐喊。

宋哲元不得不拒绝了日寇增兵的要求。

我们面前站的不是一个杀手，而是整个仇恨。

1936年末，华北驻屯军在北平近郊举行了持续一周的军事演习。日军的这次举动，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却给了北平军民以新的刺激。敌人发泄一次，我们的人民就成熟一次。大概这就是对侵略者在人民面前示威的最本质的诠释。

就在日军演习后的第5天，29军也针锋相对地举行了一周的军事演习。

也许深陷的春天才格外真实。

也许残缺的年代更能激励人们去追求完美。

在冲锋号声里，抗日的中国人永远无法终止自己坚定的步子。

每个人每天都在行路，因而对自己对事物都会有新的感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地强硬了起来。日寇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碰壁，失败。

一种等待交锋的希望侵略者的心中萌生，这也是一种动力。他们有几分恼羞成怒，将子弹推上了膛：“用武力征服中国！”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咬出这句话时，嘴里分明像含着一枚苦涩的核仁，咽不下，又不想吐出。

咬碎它！这当然是一种仇恨的发泄。

他们的目的暂时没有达到；他们的野心一定不会收敛。

脆弱，有时也显得很坚强。

时间，不会因为想拖住它的人而就得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也不会因为急于打发它的人而变得转瞬即逝。1936年似乎是不紧不慢地晃悠走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个局势呢？

不知道。

它挖中国人的肉，喝中国人的血。民心浮躁，矛盾交错，气候多变，前景莫测。

有多少中国人夜里不敢睡觉，白天无心做工，在家防着暗杀，出门不知去处。刺刀总在他们眼前浮动，狞笑老在他们耳畔响着。人人随时都可能挨一刀，伤不着内脏也会砍着骨头。不管刀刃落在何处都会有洁白的鲜血流出。

中国在哭泣。

民众在怒吼。

人们期望黑暗中会有一盏汀，哪怕是一盏比黑暗稍稍显得光明的小灯。

绝望中的人往往把死亡当成一种义务。

十

出人意料的是，当1937年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凌晨踏着铺雪的小路不知不觉来到后，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种狂风卷着的枪声以及刺刀送来的婴儿的哭啼。

野兽没有了残忍的发作，世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静，人们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大家太惧怕那种平静之后突然而来的狂飚了，那是一种摧毁人类的腥风血雨。但是，感情脆弱的民众还是希望这种短暂的平静能延长时间而维持下去，哪怕多维持一天也是好的。

这年之初，的确是风平浪静的。

一只鸽子正唱着有魔法的歌。

日寇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强硬之中好像兑了一点人情味！1月底，日本的所谓“稳健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行动，不再

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而是与南京政府实行‘捷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国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

接着，形势似乎变得更平缓了。广田内阁倒台，新组阁的林銑十郎，起用了“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林銑十郎不想做一只狼，而是要当羊，他明明白白地标榜要以新的姿态开始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实行新政策。新在何处？简言之，就是“不尚武”的“佐藤外文”。

当然，如果日方的许诺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话，人们怀疑他们的诚意就不是没有道理了。问题是他们出台了一系列表示“亲善”、“友好”的措施：

——日本政府派出了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商讨两国邦交调整和经济提携问题。儿玉频频与蒋介石、张群等要人会晤，气氛融洽，言谈坦率，没有以往留在国人脑海中的鬼子的那种匪气。

——下令他们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停止对绥远、山西、南京及其它方面的分离工作。并解散了几支伪部队。

——宋哲元、张自忠应邀赴日参观日军陆海空联合演习。

——日本一个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及其他军政要员举行联欢，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亲自出席联欢会。

日本和中国，何曾有过这样的亲善气氛？何曾有过这样的热闹场面？

日本人和中国人，拿着矛要戳人和拿着盾防身的人在一起浪漫？

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地出现在“佐藤外交”上。

世上的任何事情，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包括人和人的交往，如果出现超乎常人的规范甚至连展开想象的翅膀都追及不上的事情，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有一场悲剧发生。例如，黄鼠狼给鸡拜年；再例如，狐狸欣赏乌鸦的歌喉；还例如，老狼把一束鲜花送给了山羊……

夏日的正午落了一场雪，而且是不融化的雪。世界在剧烈的狂啸，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意味深长的还有一件事：

华北驻屯军拨给 29 军一个营的三八式野炮。

查遍日本对华政策的所有档案，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再扩大一点范围，希特勒对他的对手，墨索里尼对他的敌人，均没有用过这么绝妙的手段。

三八式野山炮，作为礼品赠于中国军队，而且是一支抗日有功的军队，太令人深思了！

一个精彩的谜。

平静，平静得宇宙间到处是喧嚣！亲善，亲善得老虎成了佛爷。

火山在即将爆发的一瞬间，死一样的寂静。

黎明在快要降临前，浓重的黑暗将大地压得喘不过气来。

摧枯拉朽的反攻就要发起了，前沿指挥部里只能听见秒针在有力的弹动。

1937 年的这个春天，花照样在竞相开放，鸟儿依旧在尽情欢唱，解了冻的江河流泻得好不顺畅！

只是，中国人变得默默不语。他们抬头望望天，天湛蓝，深远。奇怪的是，那只高飞的鹰掉下了一只翅膀。

落雪的白天，远方漆黑一片……

就连日本驻上海的记者松本重治先生都感到这气氛有点蹊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像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6月中旬，他前往华北摸摸情况。

在北平，他找到几个朋友，朋友什么也说不清楚，只告诉他外交使团的许多人都到北戴河避暑去。

北平街上很平静。一只军犬在悠闲地散步。

松本重治想到了学生运动，听说大学生正在组织罢课。他在朋友的带领下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四所大学，学校里鸦雀无声，连学生的影子都没有。

那只军犬仍在散步。

他想：真怪？……

十一

1937年春夏之交，或者把时间放得稍远一点，到1936年下半年，日寇的侵华政策，尤其对华北的政策确实有所改变，出人意外地变得温和甚至多情起来了。这不奇怪，因为在日本国内也有“稳健派”，即使那些至死不改的“强硬派”也有握着屠刀喘息的时候。总之，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局势从外表上看是趋于平静。

杀人是不会美丽的。

日寇正用刺刀尖在蓝天上画着和平鸽。对华北政策的突然改变掩饰着他们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善良的好心人还有一些列不到善良人中的糊涂人，不少都被日寇的笑脸蒙蔽了。以为刽子手成佛了，因而显得晕头转向，仿佛要坐着白云漫游太空一般的乐观起来。

自然，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毛泽东这位伟人就是站在山巅纵观战争全局的。

1937年5月3日，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这样告诫大家：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这是来自高山上的声音，也是大海浪尖上发出的召唤。
中国人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救亡抗战。
因为行盗者已经跑在了防盗人的前面，越过大洋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十二

眼下，日军盘算着如何把丰台搞到手。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是平津的南大门，东距广安门 12 公里，西到卢沟桥 7 公里。丰台自古就是花卉之乡，乡民以养花为生者占大多数，有“丰台芍药甲天下”之美称。

当然，日寇瞄准了丰台不是眼馋它的花香，而是瞅中了它的战略位置，这里自清末建起火车站以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津浦、京沪、沪杭甬、南满等路联络运输，均以此为枢纽，全国交通以本站为会车点。丰台镇成为军事、经济、政治上的战略要地。

日寇要实现侵吞北平、天津乃至华北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丰台。眼下，丰台镇的主要地面，尤其是火车站由 29 军守卫着，这使日军很不安宁，犹如芒针刺背一样不安宁，他们做梦都想着丰台成为自己的天下。

日军驻进丰台镇开始于 1935 年 11 月，先是小股的宪兵队。后来又有步兵联队、战车队等。当时日军驻扎的是旧英国兵营，即今天丰台火车站东北处的东仓库。野心勃勃的日寇对所占的这一块“弹丸之地”很不满足，他们要扩展地盘，独占丰台。

29 军住在火车站对面，距日军营房仅 300 米左右，两个敌对的军队相隔如此近的距离，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

日军的挑衅不断发生，制造事端的借口也千奇百怪。

他们连续泡制了两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

毒辣辣的阳光像砸碎的玻璃碴，溅射在丰台南郊的田野上。不见农人，也没有庄稼。村庄变成了兵营，田禾还没成熟就被铁蹄践踏得紧紧贴在地面上。日本兵在这一带不断地新建着营房，戴瓜皮帽的兵多了，那些差不多像日本兵个头一般高的狼犬比它们的主人还要猖狂，从日军营门前走过的中国老百姓经常被咬伤。

望着那一日多似一日的日本兵营，还有在兵营前称凶称霸的狼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憋满了气愤。是准允许这帮强盗在这儿建营房？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地面上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自由？

丰台镇的居民，附近工厂的工人以及驻守在这儿的 29 军的官兵们，大家都咽不下堵得心口发疼的这口气。

寻找发泄的机会，尽管这种难以控制的发泄很可能会招来更残酷的报复。

这天中午，丰台镇显得浮躁、动荡，太阳的射线像灼热的针刺扎着人们的皮肉，热辣辣的疼。几只干渴的乌鸦站在一棵枯死了的树杈上，呱呱呱叫个不停。

这时，一列闷罐车运载着满满的一车士兵徐徐地开进了丰台火车

站。这是 29 军第 37 师 110 旅 219 团 3 营的队伍，他们调防来到这里，加强丰台的防守力量。

列车停稳，首先走下车的是营长金振中，这位 30 岁刚出头的营官，坐了大半天火车虽然显得有几分疲惫，但威武英俊的基层指挥员的帅气从浑身上下仍能透露出来。他穿的是与他的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腰间的皮带上挎着一支手枪，裤腿上打着紧紧匝匝的绑腿。越发显得精悍有生气。

清一色的一个灰布方阵砌在站台上。金振中站在队前适中的地方，对大家训话，他说：

“从今天起，我们营就开往宛平城和卢沟桥，在这两个地方值勤，任务就是守卫这座城和这座桥！”

之后，队伍分乘几辆汽车，向各自的营地开去。

看着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丰台镇和附近的军事要地，日本军人的心里毛扎扎的像吞下了刺猬，好难受。割了他们的肉？剥了他们的心？两者兼而有之。

日军兵营里的那些坐立不宁的兵头们，呆呆地站在营门外向丰台火车站的方向张望着，他们好像在盼着什么，又似乎不知该盼什么。

他们望着……

在阴森森最暗的深处，一团模模糊糊的杀机，从这些盗贼目光的顶端跌了下来。

鬼子兵在寻找机会。

这一天，又一系列载运着中国士兵的火车开进了丰台。几个日本兵恶狠狠地用目光挖着列车，然后聚在一起接交头接耳唧咕什么……

离铁道不远处的田野里，中国士兵正放牧着军马，五匹马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啃吃着青苗。

就在列车驶进车站的一瞬间，突然鸣叫的汽笛声惊动了正在吃草的马。五匹受惊的马狂奔起来，冲进月台，尔后又跑出车站。十多个战士紧追不放，逮住了四匹马，另一匹马仍在撒欢，最后窜进了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日军一直企盼并倾心寻找的闹事机会就这样来到了。他们扣留了那匹马。那几个交头接耳的兵这时涌了上来……

不是枪打的伤口，照样流出了血。

中日双方围绕这匹马便有了一场刺刀见红的决斗。

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强压心头的怒气，耐着性子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

日军的粗野蛮横，使人觉得人世间的所有公理、法制在这个培育法西斯分子的国度没有任何作用。他们说：要马？没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给。说着就拳打脚踢地痛打中国士兵。

打了人，他们还有理，留下话：这还算客气，没有动枪。

一个中国士兵被踢伤，脸上起了青块，腿在流血。中国士兵当然不干了，围着日本哨兵讲理。为什么不还军马还要打人？

没有人跟你讲理。

这时，不少日本兵持枪跑到了营门，添岗加哨，如临大敌一般。气氛霎时变得异常紧张。

中国士兵解释着情况，他们根本不听，还端着枪威胁：这儿是日本

的军营，再闹我们就要开枪了。

谁能咽下这口气：丢了军马挨了打，还落了个罪名。中国士兵自然不会甘心。他们抗议日方打人，并强烈要求其放还军马。

日军撒野说：打你们是因为你们闯入本军营地闹事，打得应该。如果再纠缠还要打。

他们只字不提扣留军马的事。

侵略中国的赋子反倒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中因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追寻军马反而有了罪？咄咄怪事！

中国士兵硬起来了，日本兵也不软。双方在日军的营门前大吵大闹，眼看就要喷出火药，射出子弹。

这时，路过日军营门的 29 军的几名军官赶来制止了自己的部属，喝令他们离去，这才没有使事态当时恶化下去。

如果这几位军官知道自己的“好心”换来的是一场“恶报”的话，他们绝不会多管闲事地规劝自己的部下“偃旗息

的确，中国士兵的忍辱负重并没有使日军善罢甘休。他们狂妄的野劲因为得到了短暂的歇息而疯长数倍。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大摇大摆地走进了 29 军 37 师的马厩。几个哨兵拦也拦不住，他是冲进来的。

“你要干什么？”管理马厩的士兵问他。

“干什么？干我想干的事，你们管得着吗？”特务理直气壮他说。

中国士兵起初还没听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就反问，这是我们军队的马厩，管你什么事。快走开！

那特务听了，脖梗一直，凶狠狠地说：

“你们的马厩？哪家文书上写着？这马棚明明是我花钱买来的私人财产，让你们强占了，还不快点给我腾出来。再胡搅蛮缠，我不会给你们好果子吃！”

这当儿走来几十军官，他们都是 37 师师直的参谋，一了解是这个痞子耍赖要占领马厩，就对大家说：

“别听他瞎起哄，这马厩一直是我们的 29 军所有，怎么会变成他的呢？神经病，别理他！”

这特务原来就是地痞，他受主子指派闯进 29 军军营完全是为了起哄闹事。无风不起浪，他才最难受呢！现在他见人来得多了，就拔出随身带的短刀，在眼前抡了一下，又在大腿面上一拍，发出脆脆的响声，说：

“反正这马棚是我的，如果不马上腾出来我就要拿几个开膛试问，让你们瞧瞧！”

世界上还真有不怕死的，一个中国士兵应声就走上去，对着那特务一拍胸部，硬铮铮地说：

“有种你就拿我开刀！想霸占军队的马厩，又想杀人，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那特务真被这硬汉的话和行动给唬住了，一愣一愣的，傻了眼，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就是这时候，谁也没有提防，“忽啦”一下不知从什么地方拥了上来二三十名日本兵，全副武装，一个个握着明晃晃的刺刀为那特务帮腔助威，当下就有几名中国士兵负了伤。那特务见有了救星，便凶劲倍增，

又有一名中国士兵被他刺伤。

至此，在场的 29 军官兵才明白，原来这个特务在中国军营耍赖霸占马厩的事是与日军一起合谋导演的一场挑衅。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再不还手，那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也有辱我们的军威、国格。于是，战士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自卫还手，几名日本兵也在刀下见了红。

特务和日军被迫退出军营。

风雨在瞬间便凝固成鬼子恶狠狠的双眸。

退出并不是日军的目的。他们有了这个制造事端的口实之后，便向宋哲元提出了抗议。抗议的内容有四条：

第一，29 军向日方道歉；第二，赔偿损失；第三，惩戒肇事军官；第四，中国军队自丰台撤出。

宋哲元让人把这四条要求给他读了一遍。沉思良久，才似问似答似怒似骂地说：

“娘的，不老实地呆着，跑到马厩里来惹事，挨了打，活该！”

他似乎发觉自己责骂的对象错了，忙改口说：

“这小日本也真是，有什么事不能协商，非得动武才称心！你来硬的，我也要当英雄，还能不流血？”

之后他闭口不吐一个字了，只是用中指反复地抓着光脑壳似乎仍在沉思他的什么问题。

部属提醒他：如何答复日方提出的要求？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拍桌子：

“接受前三条！”

撤军，他没同意。

日军当然不干了。从本质上讲，他们提出的四条要求中最核心的一条是要中国从丰台撤军。

日方继续提抗议，四条要求一条也不能打折扣。

如果宋哲元真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军队的威望，其实并不复杂，只要他对日军的抗议来个反抗议，质问他们凭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霸道称强，信口雌黄地要强占 29 军的马厩，退一步讲，为了他这位 29 军首领的威严，他也应该提出这一抗议。但是，他没有，日军第一次抗议时他没有。第二次抗议时他仍然没有。

面对日军第二次攻势凌厉的抗议，宋哲元已经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断然拒绝接受第四条的勇气了。怎么办呢？他来了个“变通”，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部队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驻防，又将 37 师的另一个营调到丰台。

宋哲元再三声明：仅仅限于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那个营，其它部队一律不动。

大概他以为这个声明会堵往一些人可能会“说三道四”的嘴。

他也以为自己十分巧妙地出卖了原则，践踏了国格。一声长长的叹息，显然他如释重负似的轻松。

不，宋哲元错了。中国民众的嘴他堵不住，日军更不会领他的情。贪婪的日军远远不是要看一出“狸猫换太子”的闹剧，而是要把所有中国的军队都赶出丰台。这是他们既定的不变目标。

现在，这个独占丰台的目的是还没有达到，日军便恶狠狠地抱怨宋哲

元，你太不够意思了，姓宋的！

只要气温停在冬季，落雪是随时可能的。

日军干的所有事情都会违背宋哲元的意愿的。宋哲元越来越感觉到了这一点。

华北驻屯军给驻丰台的日军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加速兴建营房、让大部队早一天进驻丰台。

果然，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完成了本该近半年才能干完的营建工程。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强行进驻丰台，兵力大约 2000 人，是中国在这里驻军兵力的 5 倍。

有了这样雄厚的兵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丰台一带挑衅闹事了。

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丰台事件”——

这天，日本侨民森川大郎没有任何理由地闯进丰台中国驻军营地，他先是纠缠哨兵，后来冲撞卫兵，卫兵不依，双方殴斗了起来。森川太郎被刺受伤。

森川的拙劣表演很容易使人把他与那个朝鲜籍的痞子特务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流氓，都是授人以柄的工具。

日军走了与上次一样的路，对中国军队提出抗议。所不同的是这次简化了“要求”的内容，就留下了赤裸裸的一条：29 军撤出丰台，让防。

还有一点与上次相异，他们提出了让防的理由，“驻车台日军感受到了 29 军的威胁。”

这分明是贼入的逻辑：我要偷盗你的家产，还抗议你门上的“铁将军”威胁了我。

日军想在丰台得到的“安全感”，对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亡国，当奴才。

宋哲元很可能是装糊涂，接到日军的抗议后他根本没有理会“撤军”的事，派人交涉赔偿、道歉、惩办打人凶手，等等。

宋哲元这种既想装聋作哑，又显得软弱可欺的做法，当然骗不过日军，也只有给侵略者增长了得寸进尺的野心。日方特别提醒前来交涉的代表：“请你转告宋将军，我们对赔偿、惩戒、道歉这些履行公事式的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们需要的是撤军，中国军队从丰台撤出去。”口气十分肯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宋哲元作难了，当然，还有气愤。洋鬼子真不是东西，我们换了一个部队来驻丰台，这已经够给你面子了。你还不知足，要我的军队干干净净地撤出丰台。简直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娘的×，狗娘养的！

一通脏话骂出来后，气得军座胸脯忽儿忽儿的起伏着。这一生气，他便对与日军交涉的代表说：“不答应他们！”

“不答应？”交涉的代表反问道，他不相信这话会出自宋哲元的口。宋军座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胆量，且如此干脆？

宋哲元连忙补充了一句：“不答应，也不拒绝。就这么办。”

“军长的意思是拖？”

“明白就好！”

你可以卡壳，也可以造成僵局。但是，日军不可能在灰尘的喧闹声中变得寂寞。他们继续频频抗议，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气势夺

人。显然，他们要制造一个一触即发的氛围：箭在弦上。

日军企盼的机遇又一次降临。

“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来到了，29军的将士们纪念这个日子的方式很特别也很有意思：全军的连队都拉到外面去进行野外演习。官兵们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习武练功，很是投入。演习场地龙腾虎跃，杀声冲天，在几里外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支队伍那种势不可夺的战斗力量。

可以肯定地说，全军这天的这一行动是宋哲元的主意，起码是经过他的同意，才会有这样整齐化一，意义非凡的举措。可是，军长又疏忽了，他不会想到这次名为演习、实则向日军示威的军事行动触怒了日军，于是才发生了后面的故事……

让我们把镜头缩短、聚光，仅取5连的一个特写场面吧。

按往日的常规，演习一般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该收兵回营了。可这一天，大家练兵的劲头特别足，到下午六点钟了还没有收场的意思。跟随5连训练的冯治安师长觉得该是自己发话的时候了，便对5连孙香亭连长说。

“孙连长，大家操练了一天，又累又乏，该结束演习了！”

直到这时候，不少官兵听见了冯治安的说话声，才知道师长一直站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一股敬意不由得从心中油然而升。

孙连长整队，清点人数，点评，然后带着队伍向丰台镇上的营房行进而去。当他们走到镇上正阳街时，正好与一队日军相遇。看样子日军的人马有一个中队，百十号人。正阳街是丰台的交通要道，街面狭窄，人流的密度稠。现在，两支队伍在此处相遇，肯定不能同进通过，必须有一家稍候一旁，等对方通过后再通过。

问题在于：冤家相逢在狭路，谁也想抢先，谁也不让谁。

夕阳的余辉从军人攥枪的手心里悄悄流过，天黑了。时间的紧迫使两支队伍抢路的气氛更浓烈了。

只见日军的领队一声口令，士兵们刀出鞘枪下肩，齐刷刷地迈开步伐，夺路先行。

5连不甘受辱，全连人员静站路中央，就是不让道。

想走的走不动，静站的岿然不移。

两个国籍的两支队伍真刀真枪地对峙在正阳街上。

好久，无言无语，只是静静地对峙着。

终于，一个日本军官走出队列，摸摸翘着的奸笑的八字胡子，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生硬地说：

“皇军的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

有中国士兵对骂了一句：

“皇军的大大的羔子。”

日军官听不懂，问：

“羔子？什么羔子？”

中国士兵作了翻译：

“王八羔子！”

“哄”的一阵大笑。

日军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王八羔子，跟着中国士兵一起傻笑了起来。

又站出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吼着给他们让路：

“八格牙鲁，中国的29军，给皇军让路。”

5连的一个战士把嗓门抬得高高地骂道：

“日本小杂种，滚回你们老家去！”

双方对峙大约有10多分钟，形势越来越紧张，谁也不向谁低头。

这时，日军小队长岩井少佐一挥挥手，带着2名日本骑兵冲进了5连的队列。

立即，5连的队伍被冲散，有的战士为了躲开军马，跑出队列到了一边。两个日本骑兵开心了。吆喝着军马又踏又踢，好几个战士被马踢伤。

日本兵在一旁拍手叫好，疯狂的乐呵。

5连的指战员难以忍受这种侮辱，便纷纷举起枪托回击那狂奔乱跳的战马。受惊的马撕肝裂肺般地鸣叫起来……

日军中队长穗积大佐不干了，他的脸变得紫茄子一般难看，冲到5连孙香亭连长面前，野狼似地吼叫起来：

“你的部属的太不像话，侮辱了皇军，罪该万死！”

还没等孙连长说话，穗积就下令日军散开，包围了5连。

穗积扬言：只有解除5连的枪械，我才下令我的队伍散开。

孙香亭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会出现更恶化的局面，那时他也不好向上级交待。于是。他便冒着危险，走上去与日军交涉，希望双方都作出些让步，让队伍顺顺畅畅从正阳街上通过。

“你说的真好听，顺顺畅畅？你们打了皇军的战马，这叫什么的顺畅？想大干一场吗？”

穗积所说的这每一个字都带着不怀好意的挑衅，他的中国话突然说得流畅起来了。

孙香亭忍着性子又说了几句好话，甚至提出只要日军解除了对5连的包围，他可以立即带着队伍让开路，让日军先通过。

穗积根本没有一点儿要交涉的诚意，他竟然下令扣留了孙香亭。他嘻皮笑脸地对孙香亭说：

“孙连长，你只有受委屈了。等事情有了好的结果你再回你的部队。”

5连的官兵哪会容忍日寇抓去自己的连长、便主动列队荷枪，有的把子弹也推上了膛，准备还击。

两支军队武装对峙在正阳街上。

连空气都变得绷紧绷紧，仿佛稍一撞动就会破裂。

又对峙了10多分钟。

最后，还是5连做了退让，正阳街上的这场冲突才告结束。

圣人说过：在你走投无路时千万别回头。一回头，你就会走上死路。此言极是。

5连在正阳街退让了半步，招来的是无穷的后患。

日军就沿着这些微的退缝，凶狠地大步踏来。他们很快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第1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赶往丰台支援受阻的那队日军。

受阻？

要说受阻，首先是日军荷枪实弹地阻挡了中国军队的正常军训。

支援？

更无从谈起。中国军队主动退让，日军已经班师回朝。

他们的无理出兵当然会受到中国的驻军盘查以至阻截。在丰台以北的大井村，29军拦住日军大队，希望他们调头回转，不要在军事重地寻衅闹事。牟田口廉也很粗蛮地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的目的地就一个：丰台镇。”

说着，他就指挥部队强行前进，完全是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眼看日军就冲破防线大踏步前进了，中国军队不得不鸣枪警告。日军的队伍乱了阵脚，顺着枪声跑的有，迎着枪声跑的也有……

早就巴不得把平、津搅成一锅粥的牟田口廉也这会像一只发了疯的老狼，跳窜起来，狂叫不止，他下令割断了北平与丰台之间的全部电话线，接着又包围了中国军队。

激烈的枪战开始。

围在“孤岛”上的中国军队尽力突围，日军恨不能把包围圈缩得更紧，更结实。

整个丰台镇都浸泡在连珠炮似的枪声里。

青青的树叶被枪声咬得纷纷落下。

浅浅的溪水被枪声震得断流。

农人们说：天空是一块断砖，它随时都会掉下来砸着我的老屋顶……

战争的发展按照日军设计的蓝图进行着，他们占领了丰台所有的重要军事地段，包围了29军在丰台的全部营房。

也许牟田口廉也不仅仅是在夸海口，他说：“从现在起我可以宣布，丰台已经不属于宋哲元的了！”

宋哲元不知是否听到了这话，反正丰台镇的民众被牟田口廉也们的鼓噪搅得很不安宁，这一夜，小镇彻夜颤栗着，时而冷枪冷弹，时而激烈交战。双方都有伤亡。

次日清晨，日军雇佣的民夫把一具具尸体或伤员，抬到了火车站上。

很快，从北平就传来了这样的消息：

“卢沟桥的战事马上就会燃起来的！”

也许这是宋哲元最担心的事情，他立马做了两件事：下令丰台驻军立即停止射击；把37师副师长许长林、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召来，交办他们一件事。他说：

“你们立即去找日方交涉，双方先到现场调查，然后会商解决办法，列几个条条出来。”

许长林有点迟疑，怯怯地问：“日方不会干的，我方停止射击后，他们的枪声一直没断，能看出来这次他们是要抖尽威风的！”

宋哲元：“要不这么急急火火地把你们找来干啥？快去办，第一步先停火，然后再协商解决办法。”

许、甄二位没敢怠慢。据说，以后的调查、协商都还很顺利。与日方的协议也很快就达成了。

奇怪的是，迟迟不见中方公布协议内容。想必内中定有难言之苦吧！后来，倒是从日本方面透露了协议的3条内容：

一、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指挥官道歉：

二、中国军队立即自丰台撤退至距离铁路 2 公里以外；

三、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

这一回来哲元确实有些优柔寡断，不知该如何走这步棋了。经他之手与日方打交道进行交涉而达成的协议记不得有多少了，想想看哪一回不是这“老三段”式的内容？道歉、惩办、撤军……他非常熟悉，非常反感，也非常犹豫。再一再二，甚至再三再四，他都可以耐着性子去办。退让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现在，要他办的事情是再五再六了……

宋哲元恼火得快在办公室里呆不住了。他痛恨日军的贪婪、无耻，更多的却是责备自己的无能！

这，大概就是中方迟迟不公布协议内容的真实原因所在。

自然，公布不公布内容似乎并不十分重要，要紧的是行动，是怎么去做。

人们拭目以待。

宋哲元是躲不过去的，初一、十五都无法躲过。在拖延了几日之后，他还得答复日军方面提出的要求。按惯例办，前两条答应他们。至于撤军，他自有他琢磨出来的办法一日方提出“撤至南苑或西苑”，他作点修改，自个找了个撤兵点，移防到赵家庄。

注意：不叫“撤军”而叫“移防”。

抹不掉的事实是：丰台给日本人让出来了！

宋哲元的“变通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据可靠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把丰台镇让出来的那天夜里，宋军座一夜未眠。日本人用刀子割中国这块肥肉，军座毕竟不是铁石心肠，他心里难受呀！

强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虽然他们也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里程，也有不少付出，但想得到的总算装到兜里了！

更令人可悲可气的是，中日的军队还举行了一个“和解”的仪式：双方军队在丰台车站列队相向而立，相互敬礼，表示误会已经解除。

不敢说来哲元对这个仪式就打心里赞赏，但是，在牟田口廉也们看来，这肯定是一个十分得意，十分感人的场面。他们特欣赏自己的这幅“作品”。

可是，多少中国人的心在滴血！

误会？把具有战略位置的军事重镇丰台“误会”给了法西斯。

解除？仇恨拧成的疙瘩难道是可以“敬礼”化解吗？

何为劣，何为好，巨姓们心里自有一把公正的尺子，29 军广大指战员们也看得明明白白。

这是可以想象得出的艰瓜 29 军官兵们炽热的抗日热情在宋哲元军长那样一种阴阴阳阳，忽热忽冷的情绪的影响下，要想充分地喷射出来是多么不易！日军肯定是摸透了宋某人这种琢磨不定的动向，所以才对 29 军采取的每一个抗击行动都肆无忌惮的、以十倍百倍甚至于倍的疯狂去报复。因为他们心里有个底数：最终可以从冀察政务委员会捞到一条虽不十分可心但还算称心的“鱼”。

这不，让人咬不碎，咽不下的这种事又来了……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城畔几颗亮晶晶的星儿仍然睁着眼睛窥探着人间的兴衰、哀乐。

一辆日本兵车驶至朝阳门，此时城门已经关闭，兵车仍然试图撞门而入。

守门的警察张玉亭和保安二队班长张巨挺上前拦车，要其示出通行证。

日本兵说，没有通行证，这城一定要进。

二张有些为难，上级有规定，不得放行任何一辆无证的兵车。特别是在夜里，更要严格盘查出入城门的行人、车辆。

日本兵车的驾驶员把喇叭摁得山响。二张不敢擅自做主，打电话向上级请示。上级回答：“立即开城门放行。”兵车驶进城门洞之后，停下，从车上跳下来5个日本兵，揪住二张就打。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他们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饱打。为啥？日本兵说他们开门迟缓，误了军中急事。张巨挺被打得最重，鼻口流血，腿部也留下了累累伤痕。

这些日本兵打了门卫还不解恨，又冲入宪兵驻守所，一个日军怒气冲冲地抓住29军守城排长解东启，掏出手枪就想打人。解排长奋力反抗，挣脱了敌人。日军鸣枪威吓。这时城上29军的守兵见敌人恶意向凶，也鸣枪示警。5个日本兵这才爬上汽车仓皇离去。

恶人先告状。日本兵车直驶卫戍司令部，5个鬼子兵说中国守城兵阻挠他们执行公务，并开枪追捕他们。

当晚12时半，卫戍司令部派员与日本宪兵一起到现场调查。张巨挺示出伤痕，说明是日军打伤了他。日本宪兵无话可说。

日本驻屯军对调查结果不服，凌晨两点钟，又派副官河野到现场重新调查。

河野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完全是一派要把已经调查得出的结论推翻的架势。他先提出要登上城墙察看，被守城部队拒绝。之后，他又提出要和张巨挺单独谈话，中方满足了他的要求，把张唤来。

河野问：“你被打伤了？”

张答，“是的，看这腿上的伤。”

“是谁打的你？”

“一个日本兵。”

“你要具体地给我指出是哪一个人打了你。”

“当时天黑人多，我没有看清，现在不能随便指认。”

“说不出是谁打的，有伤也不能作为证明。”

“你们不讲理。我腿上的伤明明是日本兵打下的。”

“你不能证明这伤是日本兵打的，就得出具另一个证明，说你没有被日本兵打过。”

张巨挺火气冲天，大声喊着对河野说：

“你胡说。就是日本兵打了我！”

次日，张巨挺到医院检查，取来诊断证明腿上的伤确是因被殴打所致。

日方不但不承认他们打了张巨挺，还反诬陷29军的士兵开枪射击日军。

他们原本就是一帮无赖。一个正常人与无赖去争辩真理，真理就玷污，正常人也会被划入无赖之列。

十三

29 军驻丰台官兵们对日寇的挑衅所进行的还击，赢得了举国上下的赞许，鼓舞着民众的抗日激情。人们把 29 军的勇士视为抗日的英雄，连挎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学生也知道写封慰问信寄到卢沟桥前线。

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南两位“诸侯”李宗仁、白崇禧打电报给宋哲元：“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如果把这份电报仅仅理解为对宋哲元的赞扬，那就不全面了。那样，宋军座会有些无功受禄的尴尬。电报上的那句：“勿再退让”，不能说是损他，反正不是歌功颂德。

来自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的电报、信件均表达了人们对身处抗日前哨的这位军长的热诚期望。当然，大家对他为抗击日寇所做出的那些抹不掉的功绩充分给予了肯定。

确实，在宋将军身上存在着需要国人督促的地方。就是说，在众目睽睽的监视下，他可能对日军的态度更硬一些。不能否认，他曾经和眼下都有过抗击日寇的主张和行动，人民冠之于他“抗日英雄”的称谓并不过分；但是人们同样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冀察地区军政最高首领，他对抗日的退让也太频繁了，使 29 军将士回击日寇的一次次胜利变为拱手送给日军的贡品。

不是要否定他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担心他能不能继续创造辉煌的历史。得到的并不等于拥有。到手的金元财宝包括荣誉仍然可以被人盗走，或者自己把它丧失；出唇的歌固然动听，深藏在心底的话语也许更富有征服力。

宋哲元，你属于哪一种？

他肯定是一个费琢磨，而且继续要世人不断琢磨的人。

一片黄叶缓缓地飘扬下来，遮挡住了悠长的视线。我们透过这黄叶的缝隙悄悄地看宋哲元，也许看得更清楚些。

眼下，日寇对华北的政策在“退让”了一阵子后，忽然又变得强硬起来，这本是意料中的事。要不，它最终怎么能把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侵占到手呢？那么，宋哲元是怎么想怎么作的呢？人们似乎还难以揣摸得透。

就在这时候，宋哲元亲自导演了一场“中南海鸿门宴”。这是一次极为丰富的“宴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把本来掩藏的心态以至灵魂袒露在餐桌上。如果宴会的操办者早就料到这点，那么，人们对他的英明伟大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宋哲元没有福气享受人们的这种钦佩，他的言语他的行动，都在不可辩驳地证明他在走着一条路，一子低三下四的可怜兮兮的路……

这一年六月，华北的天气似乎比往年这个季节要燥热得多，高悬在当空的烈日很像个喷射着火星的大轮子，热流好似刚从锅里蒸出来，碰在人身上海漉漉的热闷。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点清凉的爽心。

也许天气并无反常，只是人心太浮躁罢了。

这天上午，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附近军队连以上军官，由 29 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

作陪。

在平、津乃至华北地区，这肯定是规格最高，气势最隆重的一次宴会。

赴宴的要员阵容：

中方——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

北平市市长，29军副军长秦德纯；

河北省省长，第37师师长冯治安；

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

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

独立第26旅第227团团团长杨干。等等。

日方——

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

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

军事顾问松岛、樱井。等等。

另外，还邀请了在北平的北洋军阀和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陪座。

29军的团以上干部在未进中南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今日到这里来要干什么，当时接到的通知是到怀仁堂集合。可见这次宴会是很神秘的。

宴席共摆了8桌，双方要人和社会名流坐了两席，其余6桌，每席是三四位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交叉有序，颇为讲究。在主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这个名为“联欢”的宴会，却没有一点轻松欢乐的气氛，像死了人似的，显得沉闷森严。尤其是29军的军官们，个个板着脸面端端地坐着，泥胎一般。

宋哲元端起酒杯，发表祝酒词：“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友谊长存！”

松室孝良端起酒杯，他的答词是：“日中亲善，携手共进，”

宴会气氛仍然很沉闷。

宋哲元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扫兴的局面，他又不好发作，只能频频地与左右的或河边或松室孝良或吴佩孚去碰杯，也说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但是始终出不来他想象的那种气氛。几只有数的杯子很单调地碰着，声响却很清脆。

中国的军官今天是怎么了？只是闷着脑袋吃菜、喝酒，嘴呢？为什么在这种本该热热闹闹的场合不多讲几句逗乐助兴的话。当然，偶尔他们也举起杯来，不过不是与日军的军官去碰，而是越过这些鬼子找自己的人干杯。日军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冷淡，倒是主动地与为邻的中国军官碰杯，且大声叫喊着：“良辰美酒，对酒当歌，来，干吧！”

真佩服这些酒坛子，他们喝十杯八杯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宴会上多亏有了这帮浪子们伴着酒水的狂言狂语，才多少有了几分活起来的气氛。但是绝不是欢愉的气氛，而是那种闹嚷嚷的犹如走进了杂乱无章的集市上的感觉。

宋哲元的脸上总算有了一丝半缕的笑容，他多少得到了点满足。宴会渐渐进入了“佳境”。

先是有个日本人站起来为他的弟兄们祝酒，也为中国朋友祝酒。尔

后，有个中国军官站起来礼节性的回敬各位……

不要说当时，就是事后在座的每一个 29 军的军官们，包括肚量很大的宋军长，都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十分突然也实在使“人们难以理解的事。那是酒到三巡已经半酣的时候，坐在主席座的松岛忽然起身离座，身子一跃，跳到了旁边的空桌上，放在桌面上的一只空碗哐一声被他撞得落地粉碎，只见他学着中国人施礼的样子，双手抱拳，摇晃了几下说。

“诸位，我来给大家助兴，表演个节目。见笑了。”

日本军官们大声吆喝着，为他鼓掌，还有人吹起了口哨。

中国军官都瞪大眼睛看着站在桌子上的松岛，谁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将发生什么事。

松岛从桌上跳下来，先是躬腰之后踢了几下腿，接着便跳起了一个舞蹈。

日本军人为他再次鼓掌。

松岛越发得意了，他拿起一把显然早就准备好的放在他就餐桌下面的刀，抬手投足地挥舞起来。他边舞边告诉大家这叫“刀舞”，好几次他故意将明晃晃的刀挥到中国军官的眼皮底下，待中国军官们要发作时，他一个转身，噌一下把刀又收了回去，挟在自己的胯下……

29 军的军官们停止了饮酒吃菜，瞪目怒视着这个狂人的拙劣表演。

日军军官的吃兴随着松岛的战刀不断挥舞而猛增着，他们划着拳，吆喝着酒令，屋顶几乎都要被揭起来了……

松岛可能玩够了，也许是疲倦了，他再次跃上桌子，随之做了个刀劈胯下的动作，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的表演。

他在原处落座，抓起酒杯揭底干掉。

热酒下肚，松岛尖叫一声。人们怀疑这是暗号？

果然又一个日本军官应声跳上了空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在场的中国人自然不懂他唱的什么内容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显得格外得意，好像要把屁股拧掉似的摆弄着腰肢，扭得十分投入，还不时地挤眉弄眼地在中国军官面前摆谱，左手捏出个响哨，右手又捏出一个响哨，随意挑衅。

他的低下唱腔及下流的扭摆动作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日本军官们的阵阵喝彩。那混球昏了头，更加唱得放肆，跳得无聊。

肯定是为了给这个倒胃口的“歌手”涂上一点更诱人的油彩，这时，另外两个日本军官跳出来给他助威，一个蹦上空桌子放开破锣嗓子高唱起来，另一个在地下围着宴席狂舞。

这 3 个日本人凑成了一台戏，使整个宴会都显得乱哄哄的像一窝蜂。

这不是唱歌跳舞，这是一伙无赖在挑衅。

中国的军官们这阵子气得快把牙咬碎了，不少人捋起袖子准备回击鬼子。

首先站起来的是李文田副师长。

他早就憋不住心头这股向外喷射的怒火了，这时大踏步地走到那张空桌前，挽起袖子，清清嗓子，说：

“看我的，给各位唱段京戏黑头腔。”

他唱的是《铡美案》里包公怒骂陈世美的那段唱词，嗓音粗壮、圆润，吐字刚劲有力，他是想把那些狂人的气焰压下去的。

可是，日本兵仍在旁若无人的跳着，唱着，不会唱不会跳的都津津有味地吃着，喝着。他们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京戏黑头腔，你唱的再卖劲也触不动他们的心！

要治这帮蠢驴看来还得想别的招。

在座的 29 军的军官们都把目光投到了董升堂、李致远身上，他俩会武术，在军里军外是出了名的。这阵子应该露一手，压压邪。

冯治安悄悄走到李致远桌前，小声地说：

“伙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是时候了，上！不能输给小日本！”

李致远正准备来一手时，没想到董升堂已经站了起来，说：

“我来表演，打打拳！”

他把“拳”字咬得很重，那是说给鬼子兵听的。

说毕，他一个箭步跳到席位中间的空地上，打了一套八卦拳。他手推臂挡，刚柔相济，表现了极深的武术功底。

这拳打得日本军官一个个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从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内心很不舒服，一定在想：怎么能让中国军人用这样漂亮的拳把我们打下去呢？

董升堂的八卦拳打到酣处。

同伴们给他鼓掌加油：“好，再来一个！”

他收起了动作说：“见笑了，我的节目到此结束，后面还有精彩的。”

李致远应声走了出来，他练的也是武功，打了一套国拳。他的动作整齐、干净、利落，手起刀落，配合得当、默契。手劈下去犹如快刀斩乱麻，刀劈下去天地似乎都在颤抖。几个日本军官看得直咂嘴，离座来到跟前观看，李致远挥刀而去，吓得他们怯怯地直后退。李致远忙说：

“对不起，受惊了！”

日本军官只是傻笑。

李致远收场，刀技表演结束。

耍罢武功再来段“文”的。何基津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他身子一蹦，跳到了那张空桌上说：

“我给大家唱支歌。”

他唱起了李大钊先生在日本留学时作的那首《黄种歌》：

黄种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先着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
只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笔，
后哲先贤。

……

昂扬的歌声，在有节奏的击掌声助威下，更加雄壮，震撼着天宇。使人感到，这一瞬间宴会厅里除了何基沣的歌声就是中国军官的存在。

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局面了。

有两个日本军官发恨要改变宴会厅这不利于他们的形势，只见他俩像两团弹簧一样蹦了起来，其中一个喊了声“一、二”，两人便做起了相同的动作，腿一蹲一起，双臂伸出又收回，很像一对好玩的木偶。两人也喊着相同的歌儿，是歌儿吗？很像水田里拉着犁杖的老水牛在吃力地叫着。

何基沣的歌声被这噪音压哑了。宴会厅分明又变成了日本人的世界，他们起哄似的鼓起了掌。

这时，秦德纯走到李致远身边，捅捅他，说：

“老李，继续练你的武功，把绝招拿出来！”

李致远又走到原先打拳的那块空地上，双手抱起向四座作揖，说：

“失敬了，看我接着练吧！”

他再次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这是在学生时代学的，如今过去了十多年，竟然没有忘掉，而且打得更加圆熟、刚劲。年龄长了，拳艺也跟着长了。功夫是自幼练就的！

接下来，日本军官的舞刀开始了。

李致远回到座位上时，几个日本人上来给他敬酒碰杯，表示亲善。

一个日本军官说，“李旅长，能耐大大的有！”

李致远谦虚地说：“小意思。”

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服气的，你瞧他们那刀挥得多狠，把所有仇恨都涂在了刀刃上，卷着狂飚呼啸。

他们玩的是“倭刀”。在中国老百姓的印象里，“倭刀”就是佩挂在日本鬼子腰间那把短而粗的战刀，它是日本兵凶残野蛮的独特象征。他们砍人如削泥，鬼子刀！

此刻，“倭刀”的挥舞者拿着刀在席间变换着花样舞耍着，一阵阵噼哩叭啦的乱响。

李致远难捺心头的怒火，这时他转过身向传令兵招招手，传令兵来到面前，他嘱咐说：

“你赶快乘车回去，把我那把柳叶刀拿来。”

传令兵转身一溜风，没影儿了。

这期间，宴会厅里的“节目”一直在不间断地表演着。基本上是双方交替出场，你上来他下去，谁都想把对方镇住。

东洋鬼子的“倭刀”又耍了两轮。

他们玩的很蛮，很投入。在日本军官看来那自然是精彩不过了。这，从他们那一直不落的掌声里可以得到证明。

董升堂又亮相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西北军使用过的大片刀。在席前有章有法地劈了一趟刀术，刀刀入肉，招招有劲。非常解渴。

一位日本军官突然站起来，对董升堂说：

“董旅长，你的刀艺非常的好，绝顶的成功！”

为了回报他的好意，董升堂又劈了一趟刀术。

就在董升堂舞刀的时候，传令兵把“柳叶刀”送来了，他跑得气喘

吁吁，落脸淌汗。当他双手把刀递给李致远后，脸上浮出了完成任务后的那种轻松而畅酣的笑容。

李致远离席，对传令兵说：

“把你的布鞋贡献出来。”

他说着就用皮鞋换了传令兵的布鞋，穿上，系好鞋带，然后在地上踩踩，怪轻巧的。他这才接过刀，摸摸刀身，又拭拭刀刃。一切准备停当，他上场了。

他劈练的这套刀术叫“滚堂刀”。

这是他在十多岁时学的祖传刀法，几十年来，一直未丢，特别是从军以后，练得更勤了。他的“滚堂刀”常练常新，早已不是原先的那套刀法了。正因为有了新意，才显得更精，真是炉火纯青。这把“柳叶刀”是他亲自选来的上好钢材精心制作的，系心爱之物。全旅指战员几乎无人不知道李旅长有一把“柳叶刀”，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一年四季都挂在房中央的墙上，满屋生威。

此时，只见李致远握刀站定，闭目稍停，是在运气吧！然后，他双眼圆瞪，猛然起步。随着一声喊“杀”，他的身子腾空而起，刀刃已经从日本军官们的眼前扫过，好像刮了一阵狂风，那一撇撇胡子也随之抖了几下。他前砍后劈，上挑下勾，一会儿如猛虎扑山，一会儿像莽蛇静卧，每一刀都带着嗖嗖的风声，使他的身子完全隐没在一片寒光之中……

牛皮不是吹的，不服气不行。在场的日本军官被李致远精湛的刀技征服了，有几个日本人走过来为他敬酒，他们显得蔫蔫的，刚才那份趾高气扬的劲儿锐减，他们用小饭碗盛酒，酒是中国的烧酒，和日本的啤酒掺和在在一起的叫不上名字的酒，不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李致远不怕这盛酒的碗吓人，也不怕这碗里装的“鬼酒”，喝！他接过碗，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不能让日本人小看了中国的军官。

敬酒人说：“李武术家，你的刀法大大的好，喝酒也是海量！”

说着又递上来一碗酒。

李致远没有半点犹豫，接过来，又一仰脖子，干完了。

再递。又一碗酒送到他面前。

李致远上厕所小解，趁机吐掉嘴里的酒。回来后接过碗，又一饮而尽。

他没有醉。

敬酒的人傻了眼。他们今天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海量。

又有几个日本军官拥上来给李致远“敬”酒。他不推辞，接过来全都喝掉……

在场的所有日本军官全都仰起雁一般的脖子，眼睛瞪得像铃铛，望着李致远。

耍刀，比不过中国军官。

喝酒，也没有中国军官这样的海量。

李致远就是不醉。

松岛显得比在座的任何一个日本军官都要焦急，尴尬。在主席上的日本军官中，他的职务不算最高，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比河边、松室孝良要操更多的心，承担更多的使命。这时，他站起来，有点气急败坏地说：

“难道我们就没有招儿了？输了？”

说着，他走出宴席桌，站在那块空地上，他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在手里玩弄着。

全体人员包括日本军官在内，都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用手指了指宴席上的一位日本军官，随之将武装带扔给了那个军官。

干什么？日本军官不知道，拿着武装带无所适从。

松岛又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那军官明白了，便动手把武装带捆在了松岛的头上。

松岛在头顶上放了一个大酒壶，晃悠几下，让酒壶在头顶平衡，站稳，又把三支烟叼在口中。同样，在两个鼻孔各插一支烟，两个耳朵再塞上两支，这还不算，在肚脐眼上还要按一支。最后，他让别人帮他把八支烟全都点燃，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使法儿使八支烟一会儿同时冒烟，一会儿又同时不冒烟……

洋相，超级洋相！

别人谁也没有他这一手。松岛赢了。

这对于洋相百出的人，人们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兴趣，更谈不上去尊重他。松岛的败胃口的无聊表演，在一阵起哄的大笑之后，没人再理睬他了，他自知没趣，便草率收场。

这场宴席上的“节目表演”，李致远的刀技达到高潮，松岛的“洋相”跌入低谷。还会不会有奇峰崛起，谁也说不上来……

日军肯定是不服气的，他们不会在松岛败下阵的表演后结束这场有预谋的挑衅。

河边和松室孝良再次交头接耳……

他们的部属终于想出了为首脑和自己解围的办法：目标，宋哲元。在“太岁”头上动土。

宋哲元似乎有所预感，他忙起身准备走开。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刚站起来，9个日本军官就走到酒席前，齐声喊一声号子，便把他抬了起来。那情景就像举重一样，高高地举过顶，却久久地不肯落下来，就那么静静地举着。宋哲元感到五脏六腑都被人悬吊了起来，但他却不敢吭一声，只能强装笑脸地任人举着，举着……

与此同时，另外几个人把秦德纯也举了起来，情景跟举宋哲元一样。

鬼子兵的这一“节目”真他妈的出乎人意料，29军的军官们一时全傻了眼，不知该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河边和松室孝良站起来观阵，他们笑得很甜蜜，满脸的横肉都缀着笑。

毕竟29军是个很大的世界，脑子灵的人有的是，他们不能就这样让鬼子折腾自己的军长。这时有人向伙伴使使眼色，喊了一声：

“来呀，礼尚往来，我们也举起来！”

立即就有五六个人拥上来，照此泡制，七手八脚地把河边也抬了起来。与日军相比，29军军官们抬河边有了新的创造：他们高高地将他抛起来，落下接住；再抛起来，再落下，再接住……

日本人的摹仿水平远远超过了创造能力，他们也学着 29 军军官的样儿，将宋哲元、秦德纯同样抛起，落下，接住；再抛起，再落下，再接住……

双方都发泄着，就这么以原始的取乐法野蛮地发泄着。谁也巴不得把各自的对手高高地扔向太空，永远不要落下：又恨不能重重地摔在地底下，一百年也站不起来。

怀仁堂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紧张！

当宋哲元又一次从“太空”落到地上时，他终于费尽周身之力从那一帮日本人手里挣脱了出来，连连说：

“好啦，好啦！谢谢，谢谢！”

日本人对他表示了谅解，不再“抬举”他。

那边，29 军的军官仍在折腾着河边。

宋哲元走过去，对自己的部属说：

“行啦。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河边也被“解放”了出来。

宋哲元很害怕闹出事来，便给左右两边的河边和松屋孝良悄声说了几句什么，之后，转过脸来对大家说：

“今天的联欢会开得很好，不，应该说我们的宴会很成功，大家都吃得可口，玩得也开心。刚才河边旅团长说中日亲善长存，我很同意，中日亲善长存！”

河边站起来带头鼓掌。

宋哲元宣布：“联欢宴会到此结束！”

中日两国的军官们陆续走出怀仁堂

宋哲元破例没有先走，他是最后一个走出怀仁堂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脚步变得好沉重，好沉重……

回到住所，宋哲元的胸腔里还像灌了铅一样沉闷得难以平静。自责、羞愧、怨恨、失意……各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在一起，折磨着我们这位心里堵着难言苦楚的军长！

他想：

也许不该举办今天的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以我的名义，以 29 军的名义，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举办这个宴会；

也许就不该在宴会上唱那些歌儿练那些武术……

他的思绪很乱，比一团交错得没有头绪的乱麻还乱！

今夜，在这个无法平静下来人睡的北平夜晚，他的心情被“联欢宴”的余波撞击着，不是兴奋，也不完全是一种心灰意冷，而是对往昔的深情的追忆。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毛泽东。

怎么会忘记呢？那是几个月前，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来信，正是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使他对日寇的态度趋向强硬。

事情是这样的：

在日本大量增兵华北，以武力威胁中国的时候，宋哲元确实有些不知所从，而身为华北地面上的军政要员，他多么需要一个明晰而坚定的思想。他感到自身力量的有限，除了请示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外，还想到了在大革命时期给过他许多帮助的那些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于是他派

刘子青专程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自己“情殷抗日”的心情，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也派代表张金吾（张经武）到宋哲元处，担任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代表，决定双方密切合作。

毛泽东给他的信就是这时候写的。他很荣幸今生有了这样一个得到毛先生亲笔信的机会，那封信至今仍然完好无缺地保存着。

毛泽东的信上写道：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批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乃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今夜，宋哲元想起这封信，并默默复诵了信中的主要语句，心中被一种难言的愧疚撕咬着。他宋哲元并没有放弃抗日的主张，如当初一样一直率领 29 军将士在这形势一触即发的卢沟桥前线与日军周旋，而且还准备作更复杂的残酷的周旋乃至斗争。可是，他也觉察到自己似乎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与自己意愿相悖的一条路。打心里讲，他宋哲元不愿意走这条路……

夜，已经很深了。天上的几颗星星悄悄地钻进了一朵浮云里打盹去了。

宋哲元仍无睡意，他长叹一声：

下步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该怎么走呢？

丰台已经给日军让出来了！

他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夜，很茫然……

十四

不管宋哲元和别人怎么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29军眼下和以后能大义凛然地站在平津前线抗击日军，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全国民众的支援分不开。

29军不是孤军作战。

但是，民众支持、团结宋哲元抗日却走过一段曲折的路……

毫无疑问，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活跃也最有朝气的一支力量，可他们的偏激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学生与29军及平津军警、保安队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宋哲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他一到天津就遇到了“抬棺游行事件”——

一名叫郭清的爱国学生被冀察当局逮捕，惨死于狱中。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学生们极大的愤慨，他们抬着郭清的尸体举行了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宋哲元是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50余人被捕，多人受伤。

刘少奇立即给北平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对几天前发生的“抬棺游行”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在华北，不团结宋哲元，不联合29军，抗日救亡就很可能是一句空话。来虽然育对日军妥协的一面，但我们要看到他率领的29军是一支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决不肯做汉奸。如果我们放过这支抗日力量，那就等于给日寇帮了忙。

少奇还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董振堂、赵博生能够参加宁都起义，我们也就可以做宋哲元的工作使他打日本。

这期间，少奇同志在天津亲自布置了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和清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内容的“五·二八”和“六·一三”游行示威，这两次游行对消除学生和宋哲元的对立情绪起了很好作用。游行的起因是：当时日寇加紧了华北武器走私，并给华北增兵一万多人，进占北宁铁路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天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和兵营，完工后将被迫参加卖苦力的中国民工集体屠杀，然后将尸体抛入海河

两次游行中，民众首次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拥护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果然，沿路军警没有对游行队伍实行镇压，只是跟着队伍两旁走。

日本人强烈抗议共产党组织的两次游行，宋哲元则公开发表谈话，称学生运动并没有越轨。这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是有成效的。

1936年岁末，29军针对日军的大演习，也在固安举行了三次对抗大演习，宋哲元亲临现场指挥，中共领导的学委组织清华大学的同学到演习地去参观慰问，献旗致词，鼓舞演习将士；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特地组织学生到29军的南苑驻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直到七七事变的前两

天，北平学生还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到宛平城慰问 29 军指战员……

中国共产党还在 29 军内部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到 29 军的要害部门。

中国共产党是一双坚强有力的手，推动者 29 军在卢沟桥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

眼下，日军把丰台镇得到手以后，便紧锣密鼓地猎取下一个目标：强占卢沟桥。

日军几乎连气儿都没有歇喘，就迈出了占领卢沟桥的第一步：他们提出要在丰台、卢沟桥之间建造营房。

——又来了，故技重演。

谁都能看透，日寇要向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县渗透。宛平是丰台西南大门上的一颗铆钉。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这个明目张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

不同意绝不等于能使日寇收敛自己的狼子野心。他们变着法儿向宛平扩展兵力。

日军的一帮兵到宛平县城周围观察地形，来去大摇大摆，神气活显，好像在他们自家门前一样逍遥。

中国的士兵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日本兵回答：“搞军事演习。”

在他们看来，当兵的搞军事演习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管不着。确实，刚开始对鬼子兵的这种行动无人管，他们每个月或半个只搞一次演习，使用的都是教练弹，而且时间都安排在白天。中国方面不过问，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很快日军就得寸进尺了，青面獠牙地露出了凶相，他们的演习频繁起来，每三日至五日就举行一次，教练弹也换成了实弹，且是夜间行动。

29 军出面干涉了，要求日军停止这种威胁性的演习。

日方不仅不接受中国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队伍要穿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到永定河西岸去进行野外演习。

野外？

自从搞军事演习以来，他们哪一次也不是在屋内进行的呀！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29 军坚决给以拒绝。

日军我行我素，根本不把 29 军的拒绝放在眼里。他们偏偏就在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整好队伍，准备开到永定河对岸去。

中国士兵坚守岗位，寸土不让，就是不许日军过去。

日军领队的军官撕破嗓门似的下达了口令：

冲，冲过去！

中国士兵打开刺刀，威风凛凛地站在大路中央。

“你们不要忘了这是中国的地盘，我们是守卫国土的中国士兵。”

“支那兵小小的，你们太不知趣了，我们进城、过河是要执行重要任务的。”

日军的队伍硬往前冲。

中国的哨兵持枪怒视，山样地站着不让路。

双方对阵，舌枪唇战，只剩下扣动扳机了……

冀察政务委员会出面了，给 29 军下了一道命令：放行，准予日军进宛平城。

委员会的理由是：要给“亲善者”找个台阶下。不，这是给侵略者垒起了一道前进的高台。

中国的官兵们敢怒敢言，大家心里憋着气，冲着北平的方向叫着宋哲元的名词质问：

“日本鬼子是你干爹吗？你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优待？”

宋军座的耳朵根能不发烧么？

日本军队第一次进入宛平县城时，中国士兵的心像被铁钳咬住了一样难受。看着那些耀武扬威的鬼子，气得战士们牙都咬得咯嘣响，真恨不得摺倒几个才解恨。

但是，不能！鬼子进城是军长的命令，部属不敢违抗！

日本兵的傲慢和横蛮并没有因为领到了一张穿越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通行证”而有所改变。一个日本军官折断了一棵小树，拿在手里摇着作乐，看把他美的，好像打了一次大胜仗！破坏了一棵树，值得这么自豪吗？

29 军的几个战士受不了这种刺激，他们决心要杀杀这家伙的威风，使他们明白马王爷的三只眼有多厉害。

“赔！你要赔偿这棵树。”几个战士把那个日本军官挡住，围上了。

没想到日本军官竟然听懂了，也用中国话回答道：“赔？树是你们的吗？它长在大街上管你们屁事！”

说着，他挣脱包围圈，想走开。

几个战士又拦住他，说：

“树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弄坏了当然要赔！”

日本军官实在赖不过去了，只好掏出两角钱扔了过来。

战士们不是图这几个钱，日本兵身上的钱是臭的，他们争的是这口气。

穿城而过的日军队伍渐渐远去，战士们的心里像被人摘掉了五脏六腑一样难受，空虚。中国的军事重镇可以让鬼子兵自由穿行，这是哪一家的规矩？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几乎每天日军的演习队伍都要从宛平城穿过，无人阻拦，无人过问。宛平城变成了日军通向军事前沿的“安全走廊”。

日寇与 29 军的冲突也随之增多，两国军队的关系呈现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的趋势。

卢沟桥上的石狮处在动荡。浮躁的氛围中。它们瞪大了眼睛，那表情不仅仅是愤懑、惊异，还有一种等待。

等待什么呢？

夜风传来低缓的涛声絮语，它串起夜色的神秘与朦胧。

这一次日军的军事演习是空前的。

参加演习的部队近一万人，假设进攻目标为北平。卢沟桥、宛平城则是重点攻击点。演习范围达四万平方公里。

鬼子兵是一群凶残的土匪，对演习地域内的老百姓、庄稼、建筑物

任意摧残、破坏。小粮、台潞至河台一带刚刚熟透的棉花和小红门附近的白菜全部被踏毁无遗。还没有成熟的高粱及其它庄稼被日军勒令全部砍倒；农民的不少房屋也被毁坏了；有五个收庄稼的农民因为不识字误入日军警戒线，凶暴的鬼子使用溅水皮鞭将他们抽打而死……

世界变得残酷了，夏日里窗外有一股寒风唱着只有它自己才懂的歌。

多少女儿没有回家，爸爸出门去寻找……

日军演习队伍在经过朝阳门时，横行霸道，鸡狗猪鸭统统被枪杀。有的鬼子冲进居民的家里逞凶。

一个 11 岁的女孩看不下去了，大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口号是她从爸爸、妈妈那儿学来的，他们每天夜里都在家里这么喊着。

几个鬼子听见了，上去就把小女孩抓小鸡似的抓起来，痛打一顿。

他们怒向小女孩：还骂不骂皇军？

小女孩又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鬼子便把小女孩扔进了隆隆行进的坦克履带下，立马就碾成了肉泥……

民众在哭泣！

北平在呐喊！

卢沟桥却没有流泪。只是那些石狮子闭上了双眼。

一个鬼子兵望着隆隆的坦克履带，得意地说：我最高兴听到戮手中国人时发出的哭喊声。

不，他说错了。履带是碾不碎小女孩的怒骂的。听，全中国都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黄河和长江一齐在怒吼！

十五

日本的“求和”、“让步”政策只能是一个阶段的权宜之计。

果然，日寇不再主张对华北实行“自治”了。用日本参谋本部的话说，在对华北“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

带血的牙齿露出后终于使那张笑脸变得扭曲了。

这应该算是很权威的说法了——1937年初夏，日本驻华武官嘉多城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汇报工作时，这样说：

“认为在华北由于我方让步，即可以消灭抗日政策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有利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或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元化。日本应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应铭记不论在任何场合，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在的形势逐步恶化。”

这话是针对林銑十郎内阁讲的，因为“让步”政策是这个内阁实施的。其实，真实情况是：林銑十郎内阁在推行“让步”政策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血淋淋的战争屠刀。即使这样，日本国仍然嫌他“软弱”，宣布他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

林内阁被迫在 1937 年 5 月 31 日辞职。

四天后，即6月4日，新组阁的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成立。这是个转折点。从此，日本对华政策便正式进入了以军事侵略为主的时期。

近卫文麿，这是个战争魔王。他的所有工作都放在一个立足点上：
战备！战备！！

他在发表了就职演说后，就中国问题专门发表了谈话，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恶狠狠的一句话：心须征服中国！

永定河畔，一堵残墙倒了。

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残骸。它倒了，在枪声还未响起的时候就倒了……

历史就是这般沉重而空虚。

十六

距离卢沟桥事变只剩下不足一个月时间了。

当然，那时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有个“七月七日事变”。但是，置身在卢沟桥畔的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说不定哪一天要出点事的。

日本鬼子的一连串的异乎寻常的动向使中国人有了这种预感。作为军人，29军的指战员们不得不从这时候起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在北平以南的卢沟桥头。

从6月初开始，他们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卢沟桥一带设了阵地，也增加了兵力；

从6月26日起，他们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这当然是宋哲元的决定了；

也是从6月下旬起，宋军座指示将卢沟桥和宛平城作为重点防守阵地。219团驻守在宛平和长辛店地区，其中，第3营被指定为加强营，专门负责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

其实，金振中营长在头年春天就驻守在此地了。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心中有数。眼下，担负了特殊的任务，金营长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他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

全营共6个连队，计1400余人：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2个轻重迫击炮连。

金营长对兵力的部署如下：

铁路桥以东及其以北是重点防守地域，将战斗力较强的11连置于此处；

12连负责防守宛平城以南的地方：

9连驻扎在宛平城内；

10连集结在卢沟桥西首大王庙内，为全营的预备队；

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头，负责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

轻迫击炮连则放在城东门内，随时准备支援邻近部队；

重机枪连集结在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前方哪里需要加强火力，就开往哪里去支援。

部署完队伍以后，金振中并没有丝毫的轻松之感，压在肩头的担子

更重了。战斗还没打响，他的心他的思绪他的精力已经飞到了前沿阵地上……

紧张吗？不全是。

担心吗？不全是。

企盼吗？也不全是……

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本来都是老兵了，仗也没少打，胜仗、败仗都经过，身上也挨过敌人的枪子。可这阵子为什么他的心扑腾扑腾跳得厉害？思前想后，他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打仗，不打仗还养兵干什么？而是地不知道这一仗何时会打起来，打起来后又是个什么局面，这才是他心神不定的原因所在。

他出了办公室的门，在营部的院子里散步，思考着问题……

西山衔着夕阳，久久不肯坠落。

这晚，全营部队除正在岗上执勤的以外，全都集中起来进行晚点名。金振中给官兵们训话，他的声音很洪亮，说：

“我们3营驻扎在卢沟桥地区已经一年多了，日本鬼子是个什么样儿，大家都有数，谁的心里没有一本日军行凶做恶的罪行账？但是，日军像眼下这样不分昼夜的疯了似的进行挑衅，还真少见。今天下午河道里几个种瓜的农民又被日军的狼狗咬得奄奄一息。兄弟们，这都是仇都是恨呀，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3营处在最前线，脚下就是卢沟桥，485只石狮子部看着我们呢！这是军首长对我们3营的信任和重托，我们担负着保卫卢沟桥，保卫北平的重任！”

说到这儿，他突然抬高嗓门说：

“从现在起，我们全营提一个口号，大家要记住，这个口号是‘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这是咱们3营的誓言，每个人每天开饭前、睡觉前必须朗诵一遍，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地动山摇的回答声。

金营长说：“好！大家给我朗诵一遍，一——二——”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巨大的浪涛排空般的吼声，迅速地弥漫天穹。

月亮在天边打颤。

十七

7月6日，北平地区突然降了一场少见的大雨。呼啸的狂风卷着雨柱，拍击着宇宙间的一切生灵。所有的声音都被大雨吞没了。

每一个士兵的心被雨水淋得湿透。

地面上的雨水淌成了一条条数不清的河溪。

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下雨，直到吃早饭了，还没有停的意思，且呈现出越下越大的势头。

卢沟桥罩在了无边无际的蒙蒙烟雨中……

日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没有中断。

他们的队伍在铁路桥东回龙庙前的演习场地上操练着，攻击目标是卢沟桥。又是演习冲锋，又是构筑工事，还有隆隆的战车在雨中驶过……

雨声……

枪声……

履带声……

打更人优郁的叫喊声走过夜空：

“平安无事！”

卢沟桥的夜又饥又渴。

上午，日军的演习队伍冒雨踏到了宛平城东门外。一个日本军官找到 29 军的守城部队，提出要求：队伍通过县城到长辛店去演习。

3 营长断然拒绝。

日军赖在城外不肯退去。

3 营的哨兵严守着城门。

局势很紧张，双方都在悄不声地进行着军事部署。

雨悄悄地渗透到夜色中。

天，渐渐地变暗了，夜幕落下。叮铃当啷的雨声却敲得更欢更响了，伸手不见五指。

日军退回了丰台。

何基沣旅长对 219 团下了命令：注意监视日军的行动，随时将情况报告给我。

命令逐级下至 3 营。

金振中对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何旅长的指示，他要求每个人务必做好战斗准备，还做出一条规定：日军进入我部阵地百米才准许射击，绝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力网。

金营长是深入到每个班排和执勤点传达命令的，不能留下一个死角。

他返回营部时，雨仍在急剧地下着。他感到身上的湿军衣很重，心情也很沉重……

雨丝搅得他看不见路，只能凭着平时的记忆摸索着前进。

夜，12 时，熄灯号声在风雨的弥漫声中掠过夜空。

3 营的官兵今晚睡得好晚。一阵阵雄浑的口号声响在卢沟桥畔：

“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永定河的河道上，亮着一只眼睛，那是农人茅屋里点的油灯。

风雨中，灯灭了。漆黑一片……

谁能找回那盏灯……

第二章

金振中顶着风雨走向卢沟桥·宋哲元对何基沣说：桥和城出了问题，有人要打我和你的屁股·3营的战前动员会·深夜宛平响起枪声·日军丢失了一个兵·佐佐木当“红娘”·29军拒绝鬼子进城调查·牟田口廉也肚里没揣好肠子·一木清直演双簧·枪声打断了谈判·第一枪是谁开的·庐山的舞曲伴着卢沟桥的枪声·樱井要用绳子吊死在宛平城墙上·谢团长对何旅长的承诺·大刀队夺回铁路桥和回龙庙·斯诺在卢沟桥前线采访。

—

当时间的脚步行进到7月6日与7日相衔接的临界处时，宛平城里的人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过去了一天！

雨，仍然无休止地降落着。昨天的一切已经被雨水淹没了，曾经有过的担心、惊恐，都不重要了。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今天：7月7日。

今天会像昨天一样让人沉闷、窒息吗？

早饭后，雨停了。田野的轮廓从浓浓的阴雨中渐渐地亮了出来。可是，人们那被日军的枪声射得于疮百孔的心并没有消肿，无法轻松。弥漫在天地间的湿漉漉的水气在刺人的阳光里愈来愈变得晃眼，惨白……

回龙庙前的树杈吊着一块当钟用的铁块，使人感到它永远也不会有响声了，像具尸体。

午后，天气骤变。风卷着铅块似的云，忽啦一下就把蓝天涂暗了。云很低，使你觉得家家的屋脊就紧挨着天的边沿，房屋仿佛很快就会压塌。

迅雷发出吼叫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滚过。那响雷碰到了卢沟桥的石栏上，立即炸起一阵刺耳的响声。桥面上溅起一束曲里弯拐的闪电。

云愈来愈低，天空被挤压得变暗。

树叶一阵碰响，竹杆白雨跟声而来，似天河流了下来。

转瞬，地上就亮闪闪的尽是水了。

紧下了一阵子，顶多有十分钟，雨就慢了下来。一道一道的雨丝拉着弧线飘飘摇摇，扯挂在空中。

卢沟桥畔的七月雨，时下时停，时大时小。老人们说，这个季节天是不会有好脸的。

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胸口犹如重石挤压着。金振中的心里像着了火一样无法平静，干什么也不是，什么不干也不是，总有一种胸膛里要爆炸的感觉，连往日几乎是雷打不动的午睡也破例的没有坚持了。他走出营部站在门前的广场上向远处张望。远处，永定河水亮亮的如一条柔带，飘飘地钻进了笼罩着浓荫的山中……

通往卢沟桥的路被几天来的连阴雨泡得软软的像发了酵的面，一个光背农人牵着两个泥猴似的娃儿，蹒跚而来，腿肚子被泥浆吞去了一半，艰难地拔着脚，一步一挪地走着……

金营长将视线从远处收回来，他感到肩负的责任很重，他从来没有这么沉重的感觉。

卢沟桥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他和部属们的心像待射的箭，白天黑夜都放在绷紧的弦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打盹儿。他每天早、中、晚必须到部署在前沿阵地的每个连队去巡视，他真担心在这不该出现哪怕一丁点儿漏洞的时候，营里的某个角落会出其不意地捅了漏子，要命呀！在这个时候惹下麻烦，那是不能仅仅用“失职”二字来搪塞的，团长以及旅长会提下你的脑袋试问。

守卫卢沟桥的3营的营官就是那么好当的么？当初提拔他当营长时的喜悦此刻变成了揪心的焦虑。

生活在卢沟桥地区的中国人，尤其是军人，一无比一天更强烈地有了一种预感：离发生枪战的日子不会太远了。那些从宛平城外的路上耀武扬威开过的日军演习队伍迫使人们出现这种预感。

从昨日开始降落的这场雨给于天地间罩上了一层令人压抑的水雾。宇宙似乎变得窄小了，朦胧了。该远去的变近了，该亲近的却变得遥远了。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以奇特而恐怖的面孔恫吓着善良的人们。

枪声。风雨中的枪声像穿透厚厚的布帘子后散发出来的声音，木然，沉闷。

日军的演习在这样的雨天也没有停止过。

金振中仍然站在广场上向远处望着，不时传来的每一声枪响都射在他的心肺上。

演习的队伍是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3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带队，演习地域在卢沟桥以北的回龙庙附近。鬼子是昼夜演习，夜里比白天折腾得更凶。

据后来在日本出版的一份《卢沟桥战斗详报》记载，日军这次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系回龙庙之误。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这三个地方之间各距约千余米，呈等边三角形。回龙庙内驻有中国士兵。

日军就是要在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弄枪耍枪，他们的气焰有多嚣张，可见一斑。

金振中回到营部刚落座，电话铃就尖叫了起来，他拿起听筒还没放到耳廓上就听到了吉星文团长的声音：

“是老金吗，刚才你屋里怎么没人接电话？”

“我看了看鬼子的演习，这小日本欺人太甚，风雨无阻，回龙庙都快被踢腾翻了。”

吉团长：“我们的忍让是有限的。我现在就给你传达旅长的指示……”

金振中拉开抽屉拿来笔、纸，准备记录。

团长接着说：“旅长指示我们，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如果日军进行挑衅，就坚决回击！”

毫无疑问，在这时发出这样的指示，是鼓舞人心的，哪个战士心里不憋满了对日寇的气愤？金营长详细作了记录，怕有遗漏，又给团长把

记录稿重述了一遍。

末了，吉团长又叮咛说：“老金，风声越来越紧了，看来刮风以后就是一场暴雨，我们既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又要做好防雨的工作。用旅长的话说这些日子我们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有什么情况你要及时报告。”

“请团长放心，金振中和 3 营全体指战员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去战斗！”

风声雨声混搅成一股巨浪，在北平郊外的不宁静的大地上飞溅着。宇宙间充满着一片哗哗的水声。

天仿佛是一个漏斗，漏水如注。

何基沣旅长的双眼里网满了血丝，他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了。的确很累，蜡黄的脸色犹如刚害过一场大病。但他仍然得硬撑着身子去做他必须做的每一项工作。他的旅分散在北平附近的各个点上执勤，卢沟桥、宛平自然是他关注的重点。宋军长说过：“老何，别的地方出了问题我和你要打他们的屁股，卢沟桥和宛平城出了问题，上面要打我和你的屁股。”他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尽管还是过去那副担子，但分量不一样了。今天，他的心里猫抓一样难受，立坐不宁的不知为什么？

他无心在屋里呆下去，披了件雨衣出了门，扑进了风雨中，枪声射透了雨帘……

金振中也在风雨中跋涉着，步子急促，踩得地上的泥水扑哧乱溅。他穿的是一身便衣，手里掂着一把铁锹，这样子很像永定河畔的一个庄稼人。

在可以查到的历史资料中，对金振中履历的记载如下：

金振中，29 军 37 师 110 旅 219 团 3 营营长，1903 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城关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祖辈耕田为生，家境贫寒，他幼年在一家水果店当学徒。一次因不慎打碎了柜台玻璃，怕老板责罚而离家出走。辗转流离，于 1924 年适逢冯玉祥将军在河南招募新兵之际，遂投冯军。不久，考入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冯部排长、连长、少校团副等职。1930 年编入宋哲元将军领导的第 29 军，担任中校营长。他作战英勇，战功辉煌，在 1933 年喜峰口战役中，他率领部队夺回失去的阵地，荣立战功，受到冯治安师长的嘉奖；他还受到了一次特等奖，那是 1936 年初，他作为营长带领全营在冀西地区开展了清剿汉奸的战斗，他的营冲锋在前，专打硬仗。他们冲入敌人固守的斋堂村，捣毁了由汉奸临时拼凑的“冀西防共自治政府”，俘敌 1800 有余。

抗战期间，金振中任上校团长，6 旅副旅长，77 军军部上校附员等职。1948 年淮海战役中，他随张克侠、何基沣将军率部起义，投奔革命。

金振中营是 1936 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城和卢沟桥防务。这时，卢沟桥的形势已经相当吃紧；丰台落入日寇手中，日军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弹上膛，箭在弦”，这就是当时卢沟桥的局势。

金营长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多次对同事和部下这样说：“我们守卫的这座桥一旦落到日本鬼子手中，北平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金振中是个爱国心盛又非常谨慎小心的人，在上级已经确定他的营

到宛平和卢沟桥接防，但部队还未行动时，他特地找到冯治安师长对一些自认力争关重大而自己又不好把握的问题，当面作了请示。

“师长，眼下，日军的三个中队不分昼夜地对卢沟桥和宛平城进行演习攻城战术，谁都看得出来，他们是死了心要占桥占城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我3营来守桥来住城，我的想法有两条，第一受命于危难之时责任重大；第二，为国尽忠，万难不辞，我做好了流血牺牲最坏结局的思想准备。”

“据我所知，从师里到旅里以至团里，经过认真研究后才决定派你们执行这个任务的。毫无疑问，在我们师里想率领部队开赴卢沟桥头担任防务的大有人在，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你金振中。”

“感谢领导的信任，3营全体官兵会尽力尽心守卫一城一桥的。我现在想请示师长一个问题，假如日军要强行占领桥和城，我们该如何应付？”

“这是你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乃至军座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燃眉之急的挠头的事情。我想过了，我们基本的对策应该是，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的处境。舍此，你，我无第二条路可走。”

应该还有下文的，可是冯师长却戛然而止，无话了。金振中未得到想要知道的话，当然耐不住了，便追问了一句：

“我很想听听师座对这个基本对策的具体高见，须知本职属下级军官，对国策军策知之甚少，需要师座经常指教。”

“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大家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内外人士都关注着它，目前全国抗日热潮已达沸点。如果我们对这儿的事处理得稍有不妥，就会受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当然，我们要更多地看到平津对我军带来的优势，这里毕竟是个富饶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民众经的多见识广，不仅能满足我军的开支，更能提高官兵觉悟。这些是别处驻地的军队无法相比的。这两者之间，你要很好地审时度势。鉴于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冷静或者理智地处理与日军的关系。再就本部来说，也想争取时间充实实力。就是说与日军的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好自为之。这就是我的意见。”

金振中似乎听懂了师长的话，又似乎没有听懂，或者说没有完全听懂。因为他明显的感到师座这番话与自己以往得到的指示有异。不过，他还是表态同意了师长的话。他是个军人，必须服从。

“我会记着师座的训示的。我决不惹事、但也决不怕事。”

师长没吭声，金振中的话显然埋着一根刺。停了片刻，金还把那刺露了出来：

“另外，我和3营的全体官兵更懂得这一点：如果日军硬要攻占宛平城和卢沟桥的话，我们一定会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

师长仍然未语。

金振中始终记着他冯师长最后倾吐的决心：

与城、桥共存亡。

其实，何旅长早就这么指示的。

时间一天天的推移，金振中的决心越来越变得铁铸一般的坚定不移

了。

日军的蛮横气焰使金振中懂得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使命。

此刻，金营长向卢沟桥走去，风风雨雨，步履艰难。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泼洒着，路很滑，他的两个裤腿溅满了泥浆，有时一条腿或两条腿窝进淤泥中，他不得不挣扎许久才能拔出来。雨衣的折皱间一次又一次地积了不少雨水，好沉好沉，他抖露抖露，继续赶路。

远处，有人影在雨中走动，那是哨兵，老远他就认出了金振中。

“长官，请你到 11 连检查工作。”

金振中还礼，踏进了营门。

这是卢沟桥东头，11 连驻地。当初挑选哪个连队守桥时他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拉 11 连到这里来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这是一把尖刀，插在卢沟桥头会使敌人闻风丧胆。

11 连连长陪着金营长在连队巡视。

他们走过火车站，来到一个土堆前，顿足，打量着对面的一片开阔地。那是日军经常演习的地方，离他们立足处顶多有 500 米。此刻，演习地上水溅泥飞，一片凌乱、杀气腾腾的景象。那些鬼子兵一个个喊着中国人谁也听不懂的口号，冲杀、拼斗、匍匐……真个是一伙疯人。

“敌人在玩命了！”金振中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用手指给连长看：“瞧，这气势是要吃人嘛！”

连长透过雨丝看到一队炮兵紧紧跟着步兵拖泥带水地驶过。炮队刚过，一队战车又发出隆隆的吼声驶了过来，盖过了风雨声，大地也被那笨重的履带碾得微微颤动。

金营长若有所思地看着雨幕中这异常的“图像”。日军不可一世的气势汹汹的演习使这位中国的营长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谁也说不清他在这风打雨浇的地方站了多久，变成了水人，身上、脸上流着长长的雨水。

他石雕一般，静静地站着……

连长一直陪着他看日军的演习，两人无语。

金营长回到 11 连连部时已是下午 3 点钟了。他没有落座，对连长说：

“你带着你们连的几个排长现在就往营部赶，准备开会！”

接着，他又通知其他几个连队的连长，让他们也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营部去。

十几个紧张得像被人追着似的连长、排长们踏着泥泞，从不同的方向朝营部跑步而来。他们也明白给自己留一份轻松，对于走上火线的路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停步，仰起脸让雨水浇浇自己，是要给自己一份清凉吧！

从连队到营里，倒算不上太远的路。可是，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谁知道会有多长……

二

卢沟桥的西首，有一座庙，当地人叫大王庙。3 营营部就在这庙里。现在，到卢沟桥观光的人还可以看到这座庙。

大王庙建于明朝，正殿三间，飞檐琉璃瓦，石兽屋顶站，很有些民族建筑的风格。正殿对面是一座二层戏楼。大王庙并不供奉神像，供奉的是乌龟或蛇。永定河经常泛滥成灾，每年汛期，当地百姓便从河里捉一只乌龟，没有龟捉条蛇也可，供在正殿，然后请来戏班子在戏楼上为它演戏，以祷免于洪泛。还真灵，凡是这样做了，就没水患。有几年由于乡亲们疏忽未供龟、蛇，洪水便很不客气地把房屋、庄稼淹了个一塌糊涂。

3营把营部设在大王庙，丝毫没有为自己祈祷消灾免难一说，不过，机灵的通信员还真从河滩捉了一只乌龟供在殿里，没有大戏可演，他便唱了支歌儿，企望日本侵略军点燃的战火只烧死贱寇，千万别伤了善良的百姓。

看来，这种企盼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眼下，日军的罪恶黑手越伸越长，已经殃及到卢沟桥、宛平城……

7日下午。

3营的军事会议在大王庙召开。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战前动员会，是在营、连、排三级指挥员中进行战斗动员。全营该到会的全部到了。会场的气氛紧张、肃穆，每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仿佛随时都会破裂。

正式开会前没人说话。

金属响亮地撞击沉默。

正殿檐角的铃铛怯生生响着。

这是必然的了：第一个发言的是金营长。他翻了翻手中的小本本，又合上了。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大家的情绪，他先讲了一个鬼子在阵地上撒尿的细节。很逗，他说：

“演习休息的间隙，不少鬼子捂着裆部，小跑到一边去撒尿，排了一长溜队。能看得出来他们憋得够呛，尿射得好高好远，比鬼子兵那矮墩墩的个子还要高。”

在场的人哗一声全笑了。

11连连长出来作证：“营长、我怎么就没有看见鬼子兵撒尿呢？再说，下那么大的雨，尿能射多高多远，你是怎么看得见的？”大家又笑了。

金营长没有辩驳。真也罢，假也好，目的达到了，气氛已经缓合。言归正转。金营长说：

“有一点是真的，谁也不能不承认，这就是鬼子兵的演习进行得非常认真，看样子他们是真的要干起来了。今日开会就是要告诉大家，疯狗就要扑出来咬人了！”

大家都挺起身子，静静地听着。

金营长接着说：

“这么大的雨，日军还在动用步兵、炮兵、战车搞联合演习。现在看来他们的狼子野心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暴露，是气势汹汹的暴露，是急不可待的暴露，是恨不得把整个中国都吞掉的暴露。”

每个与会者都认真作着记录。有人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老大的狼头，那狼的舌头吐出来足有一尺长……

“日本人马上就要下手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否则就要被动挨

打。各连立即再检查一次战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一旦发生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事情，坚决回击它！”

金营长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

“如果有一个来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逃走，那就是我们做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今天在座的各位，用军长的话说要打屁股的。”

他停了停，不是休息，而是在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和日军开战，毕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他有些紧张，也很谨慎。

他继续说：“当然，那条规定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就是日军进入我们阵地百米内，我们才能射击。”

他又举起了拳头：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三

几乎是与3营开会的同一个时间里，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接到何基沣旅长的电话报告：

“日军今日的演习与往常有些异样。”

“具体说说！”冯师长预感不妙，追问。

“炮兵以及战车的数量比往日增加了一倍还多。另外，敌人的弹药配备数量也明显的增加了。总之，来势很猛，下着雨一直也没停止演习。”

“下雨？保定的天气朗晴朗晴！”

“卢沟桥的竹杆白雨已经扫射了两天啦！”

“噢……”

保定城外，一辆美式吉普车像箭簇一样射向北平。

冯治安不住地催着司机：快！再快点！

吉普车吃着公路，公路变短，再变短……

四

与军营相比，宛平城里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居民就不显得那么火烧眉毛的紧张了。这里的火药味淡多了，如果你是从3营阵地走进城里，明显的感觉是，高高城墙围起了另外一个世界。

尽管这些日子日军不间断的军事演习给人们带来的不祥之兆一直笼罩着这个城池，但7月7日这一天似乎与往常任何一天没有多少区别，日军照样在演习，宛平人照样在担心。然而，人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规律，一样地下地干活，一样地打水做饭，一样地吆喝牛到河边去饮水，一样地给娃娃喂奶……宛平城里没有少什么，只是多了这场冷不丁落下来的比昨天还大的雨，这雨仿佛把人们与外界隔绝了，这样反倒使大家有一种安全感。

掩饰是雨帘的本领。

但是，这场雨最终也会把一切都袒露出来。必然这样。

很巧，这一天是选举“国大”代表正式投票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清早一起床就忙开了，他们分成几组到各区乡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监

票。河北省有规定：各投票点上的票箱不能启封，要原封不动地送到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市，而且必须当日送到。

这样，负责搜集各点上投票选举情况的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就显得格外忙碌了。他的办公室在这一天便成了全县的中心，各区乡镇都围绕着他忙而又乱、乱而又忙地运转。

电话铃响了。一个乡里请示写在票上的候选人最多能有几名；
又是一个镇上的电话、反映票箱太小，难以装下选票；
这是来自城关镇的电话，还是提出了票箱太小的问题……
电话，电话……

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都快把这间办公室抬起来了。洪大中却显得很镇静，有条不紊，总是耐心地、果断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做文秘工作多年，磨练得成熟，圆滑。

下午4时，所有的票箱都准时送到了县上。洪大中的办公室门前堆起了一座小山。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题，这么多的票箱怎么往保定送呢？

体积庞大当然是个困难了，但还不是主要的。最让他伤透脑筋的是赶不上火车了。每天在卢沟桥车站停车的各次列车全都在下午四点钟之前。如果赶到前一站长辛店去搭车，也要等到夜里才有车，这样就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保定了。

洪大中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转，就是琢磨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围。无奈，最后他和铁路局联系，请求他们批准5点30分南下的一列客车破例在卢沟桥站临时停车一分钟，把护送票箱的人员带到保定。铁路局对这一种大事不敢拒绝，很痛快地同意了。

洪大中亲自将票箱送上了火车，目送着列车驶出车站后，才长长地吁了口气。他有一块石头从心里落地的轻松之感。但是，随之，便有一个疑团泛上脑际：省里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宛平当众启开票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实在琢磨不透这里的奥秘……

远去列车的铿锵声从耳畔渐渐消失，霎时，车站变得空荡荡、静悄悄。洪大中若有所思地将目光从暮色苍茫的远处收回来，慢腾腾地移动脚步向城里走去。

雨，已经停了。田野在消失了火车吼叫声引起的震颤以后，显得格外开阔，豁亮。清风徐徐，爽气入心，没人高的高粱苗在微风里哗啦哗啦地碰响着，那是在唱歌吗？洪大中的心情并不轻松，挽在他心里的那个疑团越来越大……

夕阳在西天燃烧，大地披上了一件得体的彩裙。满天的火烧云却渐渐褪色，变暗。夕阳像个火球，赤裸裸地露在西山之巅。

洪大中望着即将落山的日头，有几分伤感掠过心头。

沉没的，是夕阳的光环；不沉的，是这座卢沟桥的躯体。

太阳终于收起了洒在大地上最后一缕阳光，洪大中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依托，胸腔如荒原一样空荡荡。

他一回到县政府，早就在宿舍门前等他的公务员急忙近上前，怯生生地说：

“科长，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好像在修筑工事！”

洪大中心里一缩，“好像？我不要好像，告诉我可靠消息！”

公务员马上作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是在修工事！”

洪大中立即出了门，拐到3营驻地找到金营长打探虚实。219团的一位副团长也在场，他没说话。金营长说：

“下午我到外面转了一趟，该看的全看到了，日军已经拉开了要打仗的架势，把我们往梁山逼。我们营里开了会，该准备的都准备齐全了。枪在肩，弹上膛，只等着吹冲锋号了。”

一直没有言声的副团长这时说了一句话：

“鬼子每一天都在修工事！”

他的脸冲着墙上的挂衣钩，你根本无法断定他是对谁讲的这话。

洪大中摇了摇头，眼睛闭了好久才睁开。

他从3营出来，又到了一趟警察局。他们互相通报了情况，又商量了有关事宜。警察局的同事告诉他：今晚我们要把城东门关上，以防万一出事。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哗啦哗啦的雨声敲打着每一个胸腔里装着心事的宛平人。

洪大中感到浑身十分乏困，他和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把手放在胸口，心跳得急促。心儿从来没有这么跳过啊！怪？

远远的，可以听见城外村里谁家的健牛拖着长悠悠的声腔叫着：哞

——
很凄凉……

洪大中把放在桌上的手枪移至枕边。

五

大约是夜里11时不到的时候，在宛平城东面突然响起几声枪声。

这枪声穿进每一个熟睡了的宛平人心里，肯定会有不少人起身支楞着耳朵听动静，可是，大地又变得静静的，死一样寂静。不知名的夜虫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更增加了夜的寂静和幽深。黑洞洞的夜很像无底洞。

雨，还在下着。

不久，就是一阵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大地在风雨中震颤，宛平城也在震颤。

3营的指战员们听到了这动静！

县城里的地方官员被吵醒了！

居民们也在枪声里开始躁动！

大雨如注，天被捅破似的倾泻着泪水。

城里城外的军民都传着一个惊慌失措的信息：鬼子要攻城了！

街上乱糟糟的。但是，很少听见有人说话声，只是脚步声连着脚步声……有跑步的，也有轻轻走动的，还有跺脚的。

金振中虽然早有突然事变来临的思想准备，此时也难免不紧张。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拨通何旅长的电话，报告，请示。

“可以断定枪声是从日军营地传来的。枪声响起来后，他们的队伍就拉出来了。至于拉到何处去，现在我还说不清。宛平城里的民众也慌

慌乱乱地不知怎么办……”

金振中想尽量说得清楚些，但他确实说不清。

伺基津的回答十分简明，“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回击来犯的敌人！”

放下电话，何旅长立即给 129 团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得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如果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

3 营官兵很快就接到了这三条命令。

事情的发展却变得格外扑朔迷离。枪声响后，再没有动静。

不少人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好像在企盼什么，甚至在想：枪声呀，你再响几次吧！就在这一瞬间，把你所有需要发射的子弹都放出来。放完，就别再有枪声。

人们还是祈祷一切灾祸悄然逝去。

绵绵的雨丝拉长了人们的这种心思。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六

枪声来自日军演习场。

实事求是讲，他们是冲着“假想敌”放枪的。“假想敌”是大王庙、卢沟桥还是宛平城？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问题是，他们不仅不承认这个事实，还要耍诬赖，要栽赃于人。带领队伍演习的清水节郎却称枪弹声是从铁路桥附近堤坝方向和宛平城方向发射的。那些地方驻守着中国军队。

接着，清水节郎又说，他们的一名士兵去向不明……

他立即派人到丰台第三大队把此事报告给了大队长一木清直。

一木不愧是个皇军称道的具有雷厉风行作风的指挥员，他似乎连考虑都没考虑当下就断然决定部队主力立马出动。同时一个电话到了北平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旅团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住宅……

河边到秦皇岛检阅步兵第二联队去了，职务暂时由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代理。此人也够神速的，他一接到一木的电话，就前往现地部署战斗。

分明一切都是现成的……

七

接近 11 时 40 分时，北平市市长也是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寝室里的电话铃不间断地响了起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的电话……

负责对日交涉的委员林耕宇的电话……

29 军营地的电话……

他们报告的都是同一件事：

当晚 11 时左右，日本陆军某部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走失士兵一名。日方称该士兵被中国军队绑架到宛平城，他们提出要率部队进城搜索。

秦德纯问：日军方面讲没讲他们的士兵是怎么走失的？

答：讲过了。当时演习行将结束，他们正在整理队伍时 29 军驻卢沟桥部队向其开枪射击，使演习队伍一时混乱起来，便丢了一个士兵。

秦：29 军向他们射击？血口喷人！

他很想再发泄几句心头的火气，但忍耐住了，忙把听筒从耳朵上拿开，让自己的激愤不要传递到对方。稍停了片刻，他又对着听筒以非常干脆且洪亮的声音说：

“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事前并未得到我方同意就强行在这里演习，这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侵犯了我国主权。日方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他们更不得进城检查。”

他强调说：

“他们没有这个权，任意走进中国的一个城去搜索所谓他们走失的士兵。不过，念起两国的友谊，可以等天亮后，令该地的军警代为寻找，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电话铃声仍然不时响起。

秦德纯睡意全消。他的脑际整个地被日军的那个士兵占据。他有预感：走失的士兵这根导火索很可能会引爆一颗炸弹！

他在寝室里踱步，煤油灯的光给墙壁上投射了一个清瘦的影子。屋外，猫头鹰闪烁的眼睛被雨打湿。

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需要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他拨通了王冷斋的电话。

此刻，王冷斋不在宛平城，他住在北平南长街的家里。王除了身兼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宣传室主任外，还担任北平市新闻检查所所长，这样，他只能身在一处，心挂两地。尤其是新闻所所长这个官职对他的制约力更强，报纸、电台、通讯社当日或次日的重要新闻必须由他签发。一般情况下，他上午在宛平县办公，下午去北平市批阅公文，晚上在家里过夜。

7 日夜，王冷斋自然没有睡觉，无法睡觉，在秦德纯来电话前，早有好几个电话拨来了。这时，他抓起话筒立即就听出是秦德纯的声音，忙说：

“市长，您好，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冷斋，这个晚上我们谁都不能休息。日本的演习部队走失了一个兵，你知道了吗？噢，已经知道了，那好，那好！方才日方提出要进城搜查，我坚决拒绝了。究竟真相如何，我需要尽快掌握。你要即速派人查明，以便处理。”

王冷斋：“市长，我已经电话通知有关人调查去了。一有情况，就给您汇报。”

也许秦德纯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便说：

“这样吧，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一趟。有些情况咱们需要面谈。”

“是，我马上就到！”

这时，夫人已经为丈夫准备好了雨衣、雨鞋，悄不声地站在他身旁。

屋外滚过一声炸雷……

王冷斋和夫人同时感到脚下的地连带着屋子颤动了一下。

王冷斋走出门。

外面是风雨交加的世界，整个北平仿佛在瘫痪……

王冷斋刚走出去二、三步，就被夫人喊住了：

“冷斋，金营长的电话！”

他不得不返回到屋里……

八

王冷斋正在听金营长的电话报告：

“接到日军走失一名士兵的消息后，我们对我方守卫卢沟桥的部队进行了检查，每一个守兵都查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开枪。因为每个人所配发的子弹不缺一颗。另外，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我们的警察在城里各处都搜索了，根本未发现有所谓失踪的日兵。”

王冷斋说：“好！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秦市长，他刚才还催问此事呢！”

话筒里静悄悄，显然金振中在那头还等着他说话呢。

王冷斋举起话筒吹了吹，说，“日军在卢沟桥找茬闹事已经寻谋了多日，今晚出现这种事完全在预料中。让它骗鬼去吧，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它在哪儿发疯，我们在哪里收拾它！”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老金在那头的焦虑和愤懑情绪，他的声音像炒蹦豆一样从话筒震动膜上跳了出来：

“漆黑的雨夜鬼子到卢沟桥我军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为我军守备森严，无隙可乘，才捏造了丢失士兵的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谣言！鬼话！”

王冷斋说：“只要日头不从西边冒出来，我们就不会让鬼子进城！”

叭！电话挂了。

“……”

他不可能是冲着金营长生气。作为宛平地区地方的最高领导，对于霸道蛮横的日军近来在卢沟桥地区无恶不做的行径，他简直一刻也难以容忍。但是，他明白只有有理有节地与敌人斗争，方可取胜。他深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几万民众，任何的疏忽、鲁莽都会造成影响一线或一片的损失。他要让大家从他的表现中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一个：卢沟桥不是日寇的天下，宛平人民绝对不做亡国奴！

……

王冷斋系福建省福州市人，1891年出生，8岁那年他就进福州陆军小学学习，18岁考进保定军官学校，与李宗仁、白崇禧、刘峙、顾祝同、秦德纯等高级将领同学。后来参加了讨伐张勋的战争。二十年代他脱离军界，在地方政府专门从事文化工作，先后办过《京津晚报》和远东通讯社。他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披露了当政者的贿选活动，因此他与著名的进步记者邵飘萍一起被军阀通缉，被迫离开北平到天津、上海躲避。

1935年冬，王冷斋应秦德纯市长的邀请，到北平市政府担任了参事，还兼任了其它职务。

从 1936 年秋季开始，由于日军虎视眈眈地盯上了平津，使这个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是日军军事演习的主要活动地，因而也变成了事变的火山口。河北省与日军的交涉事件就从这个时候起一天天多起来，但省会保定距离宛平县近 200 里，许多事省政府难以顾及。于是，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亦称宛平专署）便应运而生，它专门办理交涉对日事务。时间是 1937 年 1 月 1 日。宛平专署下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四县。王冷斋被任命为督察署专员兼宛平县县长。

其实，王冷斋真正的实权还是体现在他担任的县长上。因为专署所辖四县的一般行政工作仍属省府管理，专署是个空架子，只设一个秘书室，并无其它机构。它仅仅办理对日交涉事件而已。

王冷斋的夫人胡太太是北平女界一名流，只要她从街上走过，准会有众多的目光射在她身上，那是赞许和敬慕的目光啊！胡太太系名人马相伯之高足，一表人才，才女气派。她能诗善画，尤善词令昆曲，这在北平文艺界是无人不晓的。每当茶余饭后，笛声绕梁，声飘户外，多少路人，住足倾听，心儿深深沉入胡夫人演奏的完美意境中。当时北平文化界称王冷斋的家庭为“极乐世界”，自然，这个世界有一半或者一大半是胡夫人创造的了。

王冷斋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办事能力，是大家公认的，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出众的外交秘书，使他如虎添翼，在社交场台上自由，自如，左右逢源。这个秘书不仅精通日语，社交广泛，而且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另一个是官场上的红人。毫无疑问，这哥仨对抬高王冷斋的身分起了重要作用。

可惜宛平专署是个短命的机构，1937 年 1 月诞生，到了 7 月就被卢沟桥的枪声摧掉了。但是，王冷斋为捍卫祖国尊严守在卢沟桥上与日军周旋、交战，用鲜血书写的那页历史永载史册。

.....

王冷斋挂上电话后心中越发的感到沉闷、烦躁。他连雨衣也没带就出了门，扑进了风雨中。这个时候他要到城内更多的地方走走，看看。不只是为了让宛平的民众看到自己，而是自己需要看到更多的群众。

一个独斟自饮的人总是觉得自个很美丽，只有到群众去咀嚼自己，甚至让大家一起咀嚼，才能找到真正的路该如何走。这便是王专员做人处事的信条。

出了门，王冷斋方知路太泥泞，泛浆，地上满是积水。看来那双雨鞋是多余的，自己应该赤着脚.....

九

就在王冷斋挂上电话的那个时候，也许刚刚进入 7 月 8 日的凌晨。但是，宛平城里很少有人分辨得清是 7 日的末尾还是 8 日的始点。就在这时候，激烈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不知道这枪声从何而来，好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近日，演习的鬼子常常放枪，莫不又是他们向“假想敌”发射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对它进行追根刨底的耐心和兴趣了，所有的耐心、

兴趣还有希望，早被日军第一次响起的枪声就打掉了。枪声却不能代替一个世纪的太阳。

这时候，日本使馆武官又一次给北平市打电话威胁：如再不允许进城搜索，将用武力保卫前进。

他们大概只想到自己的蛮横可以生效，却没有想到世界上总是有人不会屈服于蛮横。是的，连命都被别人捏在手里、随时有可能被毁掉的人，还在乎什么威胁吗？

中方给日军的回答很明确：不能同意你们进城。如果进城，一切后果由日方负责。

随后，日军把宛平包围起来……

这阵子，宛平城内是一派也许有些人憋破脑子也想象不到的异乎寻常的景像。军民们开初产生的那种紧张恐惧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地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防止日军破城的工作。干着活儿的人们大都显得非常兴奋，卖力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就有机会打鬼子了。多年来被日本帝国主义欺压而积攒的怒恨，这回可以采取报复行为了。如果说在几十分钟前还有不少入想的只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话，那么这时候大多数群众打消了出城逃命的想法，他们说，咱们就呆在城里，鬼子来了，距它拼；不来，咱就做战备的工作。总之，为抗日出把力。

不用动员，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运输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或背水泥麻袋，构筑临时防御工事。

东西城门已经被大家用水泥袋、沙袋堵紧封死了，仅在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都用棉被遮着窗口，这样既可以防止灯光外射，还能防止流弹。

一些当年在宛平城里的人，在五十多年后回忆起“七七之夜”的情景时，无不感慨地说：“不伯了，简直什么都不怕了！甚至有一种逆反心理，让鬼子早点进城来，这样好收拾他们。他们欠的债太多了，只有拿脑袋才能还清。”

十

漆黑的夜，坚固得无一缝隙的黑。

只有雨声泡湿了天地。

熬夜的秦德纯推开窗户，抬眼远望，雨中的灯盏闪烁着不可琢磨的形迹……

忽然，案头的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来。

是吉星文团长打来的，他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

约有一个步兵营的日军附一个机关枪连，还有部分山炮，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

秦忙打断对方的话，问：

“你在给我报告的同时，采取了什么措施？敌人已经攥紧拳头打我们了，老吉！准备扣扳机。”

他是市长，更是个军长，不能不想着自己的军人职责：打仗。

吉星文回答：我已经将城防布置妥当，迎候敌人的突然袭击。

秦：我是说宛平城和卢沟桥两个重点战区的情况如何，现在就是要把子弹推上膛。

吉：是的，食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

秦德纯继续说：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要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也下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将话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噢，这番话好耳熟？对啦，就是昨天，或者是前天吧，上级已经两次传达了副军长类似这样的指示。这就是我们的市长，不，是军座。他为了守住国家的每一寸热土，不怕别人叨叨自己重复讲话，腻歪自己罗罗嗦嗦，同一句话反过来说一遍，又倒过去讲一次。吉星文听着听着胸部热了，是军长的心烘热的，是军长的话暖热的！

秦又说：“老吉，请你把我刚才的话转告给冯师长，还有何旅长！”

吉：是，我一定再给两位首长传达一次你的指示！

“传达就是传达，什么再传达一次？”

“是的，再传达一次。因为军长的这个讲话精神我们都已经学过了。”

“学过了也要再学。只要日寇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我们就不放弃抗击鬼子！”

吉星文攥足劲，对着话筒大声喊了一个字：是！

一阵风，把两颗心吹过了永定河。

十一

卢沟桥的这个黎明，七月的黎明，应该是湿漉漉的，还有一轮蛋黄似的晓月。

实际上，卢沟桥的这个黎明干得拧不出一滴水，干涸得像起了许多褶皱的抹布。月亮也被淹没了。

低矮的天空下，是一门门对着城他和石桥的阴森森的炮口。

炮口下是愤怒的、沉默的土地。

因为最后的倾诉是沉默。

泥泞的黎明。

寒冷的七月的黎明。

老百姓的梦中将灌满叭叭的响声。

十二

这个夜晚对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大佐来说，绝对不是轻松的。他如坐针毡，心窝里毛刺刺的，分明钻进了一只刺猬在折磨他。

在他的意识里，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日军的一名士兵因中国军队开枪受惊而走失，被卢沟桥守军绑架到了宛平城里。

他想见到秦德纯市长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他希望中国能承认错误，

并放出那名走失的士兵。

自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了。至于中国人怎么想，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不是他描绘的那样，他没有去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

总之，他要设法见到秦市长。一定要见！

他一连拨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有秦的影儿。哦，明白了！在这个时候，用电话是很难“见”到秦这样的重要人物的。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不需要见的人也太多了。

他想到了一个最有可能找到秦德纯的人：佐佐木健儿。

佐佐木是同盟通讯社北平分社社长。他长期在中国任职，从 1932 年就与秦德纯建立了密切联系。下面这件事足以能说明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宋哲元在一些与日军交涉的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以后，使华北驻屯军感到异常恼火，他们想在宋的身上采取措施，使他倒向日军，或者说不倒向日军也罢，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题上不与日方作对也行。当初选他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瞅上了他与蒋介石之间有纠葛。没想，蒋、宋毕竟都是“娘家人”，他们时不时就把腿伸进了一条裤腿里。不行，得设法让蒋、宋分家，起码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你姓宋的保持中立，不向日方头上泼脏水总可以吧！他们开始研究宋哲元了，终于发现宋的秘书长戈定远不是个东西，宋的好多点子都是他的脑瓜里爬出来的。对，这是个危险人物，要把这个钉子拔掉。

为了实现“拔钉子”的目的，松井找到佐佐木，没拐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也许已经看出来，冀察政务委员会现在越来越倒向南京了，为了阻止它中央化，驻屯军打算让宋哲元的秘书长辞职。这件事当然不会直接向宋提出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佐佐木很骄傲，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说：“辞职？这样的做法太扎眼，也很难办到。我可以使姓戈的荣升，这样不是同样能使他不担任宋的秘书长吗？”

荣升？你有这么大能耐？松井惊讶，但更多的是佩服。

“我当然没有这个权力了，但我可以让秦德纯去办。”佐佐木很得意地表白着自己的广大神通。

很快，佐佐木就把秦德纯请到一家高级会馆，一边悠悠闲闲地吃着，一边推心置腹地谈着。秦自然明白日本人又给他出了个难题，而且是一个对中国人不怀好意的难题，但他不好驳友人的面子，又不想让驻屯军尴尬，就决定任命戈定远为宋哲元驻南京代表。

绝！好个秦德纯，真有他的。

宋哲元对戈定远的信任确实是“超拔”的。过去蒋介石请他参加南京、杭州、庐山等会议时，宋总是让戈代表自己去参加，由戈与蒋介石接触。蒋也没有别的想法，在他眼里戈就是宋的当然代表。现在秦德纯任命戈为“驻京代表”，这是提拔使用，顺理成章，宋不会阻止，蒋介石也不感到突然，表面上又不伤戈的面子。真可谓三全其美。

就这样，戈定远的秘书长职务被免去了。

佐佐木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他竟然可以使 29 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转。

现在的问题是：佐佐木找不到秦德纯！

自 1936 年秋以来，日中关系日趋紧张，凡是两国人员有接触的地方都布满火药，划根火柴就会爆炸。在这种情况下，秦德纯一直避免见日本人。倒不完全是为了避嫌，主要是他鄙视这帮侵略者。

佐佐木有这个自信：只要能知道秦的住处，他就可以设法见到秦。

他想到一个人：北平《实报》社社长管翼贤。此人与秦德纯关系甚密，他经常出入秦公馆，还能不知道秦去何处？

管接到佐佐木的电话后，立即赶到了特务机关总部。

松井、佐佐木、管翼贤三人在一起谋划，商定；先由佐佐木与管翼贤去市长公馆，为松井与秦见面进行联络。

管很自信，说：机关长放心，我能使秦市长会见你。

松井的脸上舒展着笑意。

8 日凌晨 1 时半，管陪同佐佐木来到秦的公馆大厅里。真没想到大厅里坐满了人，管扫了一眼，有十多个，他认识的有王冷斋，其它人的脸在灯光背阴处，看不大清。在座的人吵吵嚷嚷，分不清是谁的声音，但话题都是谈日军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开枪的事，个个脸上是愤怒的表情，拍案陈词。秦见来了客人，做了个手势，让他们进了另一个房间，随之他也跟去。

在这种场合下，佐佐木觉得和秦说话再绕弯儿就大可不必了，便直来直去地说：

“日军昨晚进行的只是普通演习，并没有实弹射击。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方面进行了‘不法射击’……”

秦德纯打断了佐佐木的话、责问：“你来就是给我讲这些吗？”

佐佐木忙说，“不！别误会，事情发生后双方肯定都是满腔火气，我想谁都应该克制些，协力做调解工作，使小火不要变成大火。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吗？”秦问，眼里闪出一点光亮。

“我是搭桥人，中国人叫穿针引线。松井找你已经很久了，他想与你面谈。”

“他要谈的问题告诉你了吗？”

“并没细说，可我知道他想化解矛盾，改善日中眼下的紧张关系。”

秦的脸上浮出一缕硬硬的笑，说：

“那好吧，我准备会见松井大佐。”

直到这时，秦仿佛才记起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一位异国好朋友，和他握了握手。

佐佐木手功真硬，握得秦德纯的手直发疼。

他送客出门。

半个小时后，松井随同管翼贤来到秦公馆，可以说这是中日谈判前的一次谈判。秦、松两人简单的寒暄了几句话后，便切入了正题。他们很快商谈了一个初步协议：

先将两国军队隔离；大致上日军在永定河东岸，中国军队应集结于该河西岸；尔后，由双方派遣代表到现地谈判商定具体解决办法。

奉说：这个协议只是权宜之计。但眼下很需要走这一步。

松井：双方都需要冷静，只有冷静下来理智才能战胜感情。

秦德纯对于松井这“理智”二字极不愿听，什么叫理智？中国人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这就是理智。他本想发作，回敬松井几句，但忍耐了。没这个空，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办呢！

松井显然没有发现秦这一微细的变化，仍然满脸喜气的说这讲那。秦这时已走进了大厅里。

松井离开秦公馆时，时针刚刚迈过三点。

路上，松井在心里又一次做了祈祷：去时很灿烂，但愿回来更辉煌。不知何故，他的心跳得特厉害……

宛平城突然变得很静。

稍远的什么地方有马儿柔柔的鼻息，一连响了几声。

这是这个夜晚对黎明的宣誓吗？

宛平，不是一座死城。远处好像有堤坝在断裂，破碎……

十三

8日，凌晨3时许。

王冷斋手持公文包，急匆匆走过日军警卫守着的大铁门。他是奉命来与日军谈判的。

这是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总部。

王冷斋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踏进会场的。这间不大的会议室气氛显得肃然，且带几分清冷。

一张不大的椭圆形桌子周围坐满了人，显然都是在等着他，他抬头望了一圈，中方的代表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委员孙润宇、参议林耕宇和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松井久太郎孤身一人坐在另一边，脸上挂着热汗，正以手当扇地扇着。他也是急匆匆赶来参加会的。

没有人宣布谈判开始。

但是，已经有人报告发言。双方一开口就是据理力争的争辩。王冷斋开头炮。

他就“谁开第一枪的问题”，郑重其事地声明。

“枪声来自宛平城东门外，这是每一个长着耳朵的人都听到了的。我方在那里并无驻军，何谈开枪？”

松井不以为然地说：“需要更正王专员的话，是枪弹声，不仅仅是枪声。还有，具体的说，枪弹声是从宛平城和铁路桥附近传来的，那两个地方驻有中国的军队。”

王质问：“我们已经查过了城内的每一个守兵的子弹，一发不少，怎么会有枪声？”

松井突然转移了话题，说：“我们的士兵被贵部绑架进城，我们要进城搜索。”

王反驳：“你们在城外演习，士兵怎么会在城内失踪？再说，宛平城在夜间已经封闭，你们的兵是长了翅膀飞进去的？”

松井坚持己见：我们必须进城搜索！

对于他的蛮横不讲理，王冷斋很愤然，他不得不站起来甩出一句话：就算你们丢失了十兵，也与我方无关。宛平城不许任何外国军人进去搜

查！

冀察当局的几位代表，很少讲话，好像他们的任务就是“坐会”。

松井看到王冷斋竟是这样毫无情面地与自己论战，心中十分恼火。在战火暂停几分钟时，他很傲慢地问：

“王专员既然是中方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我希望能带来一些与军方不同的情况。”

王冷斋说：“很遗憾，没有。我只带来了事实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日军演习的地方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那里未设一兵一卒，我城中守军也并未开枪。只是在日军炮轰我宛平城时，我军才会进行还击，以示惩戒。”

就在谈判进行的当中，出现了一种具有喜剧性、也是富有讽刺性的事，我方代表得到可靠消息：日军失踪的士兵已经归队。

我方代表交头接耳一阵骚动，引起松井的注意。

其实，在此之前半小时，也就是松井进谈判会议室时，他已经知道了此事。但他仍然装疯卖傻地提出要进城去搜查已经归队的士兵。

日军声称走失的这个士兵是个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传令兵，他在执行任务返回时，由于天黑路滑走向相反的方向，因表接到方才秦德纯已经得到的那个报告：驻丰台日军数百人，正全副武装开赴卢沟桥。

王冷斋望望夜空，心情像锅底一样沉闷。

他茫然无措……

十四

拂晓前，洪大中从宛平城赶到了丰台。

他此行的任务就一个：开辟中转站，将卢沟桥战地的战况以及王冷斋专员向北平请示报告的问题，及时无误地转达上去。

宛平城的通讯联络已面临着夫灵、瘫痪的危局。再说那儿从昨晚起就处在了日军的严密窥视之下，打电话、拍电报已经没有什么安全系数了。

“中转站”建在何处？

这是个颇费脑筋的事情。因为丰台也不是安全地带，满眼都是日军，还有汉奸……

再者，让洪大中这样的“头面人物”干这种密而不宣的“地下工作”，这本身就很容易招人惹眼。他这个王专员的秘书兼第二科科长，平常的工作是应付县府日常事务以及处理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丰台的国人和外国人都十分熟悉他的面孔。现在这种非常时期他冷不丁的出现在丰台镇，还不引起人们、尤其是日军和汉奸的注意？

没有办法，王冷斋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大中担负“地下工作”的任务最合适。专员有他考虑问题的特殊思路：越是招人注目的人往往反而不容易让人注目。

这叫逆向定律。有道理。

当然，作为洪大中本人，他依然是小心了再小心，谨慎了还谨慎。能见一个人就决不见两个人，露一次面能办成的事就决不让人再见第二次面。

一到丰台镇，他就把自己藏在一间房里，尽量与外界隔绝。这是丰台商会的办公地方，商会的人早些天就逃颠了，电话也是现成的，顺手牵羊，拿过来就可以用——这是他感到很可心的一件事。说实在的，洪大中来丰台开辟“中转站”，开初发愁的还就是电话，它是联系北平与宛平的神经，没有它，一切无从谈起。

他很快就和丰台的总机接上了头，他们一听说洪科长是为了传递卢沟桥的战况而来，立即表示：“我们24小时都值班，保证随叫随到。拿出两条线给你作专用线用，以免漏掉消息。”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愿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赤心。

洪大中找来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机旁。他觉得自己是整个卢沟桥战区的值班员。

不，还有一位值班员。他就是守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宛平县府公务员小刘，他也是昼夜守着电话机，专员找他他马上就得到，之后把电话内容转告给洪科长，再由科长转给北平。

今夜，在宛平和卢沟桥有多少这样辛劳的值班员！

这阵子，没有要事通电话，线路空着，洪大中便和小刘在电话上聊了起来。

“小刘，现在你就是一个义务电话员了，千万别离开电话机，那样会误事的。即是房子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你也不能逃命，一定要守好电话。”

“我记住了，科长。我想不仅要做个义务电话员，还要做个不怕死

的电话员。你说呢？”

“对，你讲得很好，咱们两个都应该做不怕死的义务电话员！”

“科长，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我的领导，肩上责任重，今后用到你的地方还多着哩！只要你和王专员，还有其他领导人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难关，日本人就张狂不了几天，老百姓就不愁没有出头的日子。”

“小刘，话不能完全这么说，现在我俩为了打鬼子当了电话员，你光荣，我光荣。没说的！听，好像电话铃响了……”

是的，放在桌子上的另一部电话机急促地叫了起来，小刘忙抓起听筒听起来。

洪大中在这头焦虑地等待着……

铃声。小刘传递着战况：

“科长，有事，急事！”

“慢点讲，一字一句讲。”

小刘讲了这样一件事

日军大队人马正向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开进，看样子他们要强占这两个地方……

十五

一辆汽车载着双方代表驶向宛平城。

行至丰台时，被日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拦住了，他要求中方代表到他们兵营去面谈。面谈？王冷斋心里直打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牟田口怀里肯定没揣好肠子。

王冷斋身不由己的走进了联队院里，中方的其它二位代表紧紧相随。大家都预感到这个胖敦敦的矮个子日本队长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但是，他究竟要演什么戏，不得而知……

等大家都坐走后，牟田口冲着王冷斋说：

“阁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问题处理的全权责任。我军失落士兵一事，要迅速处理，以免延误扩大。”

牟田口讲话的口气很大，他正在代理河边旅团长的职务，还能不威风？

王冷斋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的结果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责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

牟田口从王冷斋身上得不到如意果，又转身对林耕宇蛮横地吼叫：

“都是你们搞的嘛，使我们的士兵丢了，现在又不处理。”

林显然没有敢顶这个庞然大物的气度，忙卑屈地说：“完全是误解！误解。”

牟田口斥责道：“误解？关于误解的事以前就说过了。我不会相信！仅仅拿‘误解’是交待不了这件事的。”

林无话可说了。

牟田口也许看出了还是应该和王冷斋交谈才可能会得到点什么，王是专员兼县长嘛。所以，他又这样问王冷斋：

“我的大大的不明白，作为文官的你，有制止中国军队行动的权限和气魄吗？”

这是挑衅，中国人叫“激将法”。

王冷斋回答：“我已经给你说过了，现在事情还未调查明了，谈不到什么处理，更无所谓制止中国军队行动一说，至于说到气魄，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有制止任何侵略者侵犯自己领土主权的气魄！”

牟田口继续纠缠，“我还要问问阁下，假如事态已经调查得明明白白了，你是在当地的处理这件事，还是要一定的向你的上司请示？”看来他根本没有打算让王冷斋回答他的问话，接着说下去：“日本方面已决定由森田彻副联队长全权处理这事。我想，因时机紧迫，如来不及请示上级，阁下自有权宜处理此事王冷斋打断了牟田口的话：“先调查清楚，再谈处理。就这样！”

牟田口露出凶相赤膊上阵了，他对王冷斋说：“你现在就下令，让我们进城搜查。”

王冷斋大笑起来：“阁下不觉得卖国的帽子戴到我头上不合适吗？我不会让你满意的。”

牟田口一甩手，走了。

到哪里去？

他的身前有一条路，身后也有一条路。

不，他要走的路在他的盘盘肠子里。

牟田口在他的办公室正拨着电话……

调查人员分乘两辆汽车前往宛平城。

牟田口这时按他们既定的对策派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前往卢沟桥地区指挥他们的队伍。

这之前，他已打电话通知了在那里的日军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

汽车向宛平城驶去。向西，向西，汽车把路背在车厢里。

此时，7月8日凌晨4时。

王冷斋等3人乘坐的汽车一离开丰台日军的军营，就看到路边数百名日军分乘八辆汽车先他们一步向卢沟桥方向开去，他的心一沉，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看来刚才牟田口让他们在丰台停留是别有用心……

他想飞往宛平，但汽车只能一步一步地赶路……

十六

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正演着一出双簧。

一木拿着电话请示：“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请示联队长，不，是旅团长，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才好？”

牟田口恨不得将对方从电话机里扣出来好好训斥一顿，甚至揍一顿。他很不满意地质问一木：“受到敌人攻击应该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幼稚可笑的问题来！”

是的，一木的台词没编好，他马上改口说：“我方是否应该予以回击？”

牟田口肯定地回答：“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做贼心虚，一木深知挑起战争的严重责任，因而又紧问了一句：

“那么，我们真的开枪也没有关系吗？”

牟田口不说话，心想，这个一木今天是怎么啦，为什么变得这样婆婆妈妈？饭桶！

一木确实感到分给自己的角色没有演好，有些愧心。他马上说：

“好，我这就进攻敌人。既然这样，这件事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

牟田口的心也在咚咚地跳。虚。

他抬起手腕瞟了一眼：“4点23分。”

一木校正了自己的时间。他在抬腕的瞬间，整个身躯都抖了一下。

此刻，预谋这场战争的所有的好战分子都在校正时间。在他们的眼里，阴谋得逞的时刻肯定是辉煌灿烂的。和平却酣酣地躺在睡梦里。

林中的鸟儿也没睡醒。

一木清直率领第三大队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中国阵地扑去。

不过，他有点朦胧，问身边的士兵：中国的阵地在哪里？黎明随着露水消失。

十七

和平正酣酣地躺在睡梦里。

7月的林子里，如往的树杆间闪过一个黑影，有人举起枪瞄准树上的鸟儿。

一伙娃儿们躲在后面合起声来说：打死这打鸟的人。惊飞了鸟儿……

十八

雨帘子罩着风挡玻璃。

汽车继续前行。

雨刮，像一只勤劳的手，不停地擦拭着玻璃。不，它是在擦拭路。

王冷斋心急得起火了。今天这路程怎么变得这么长？可是，日军的8辆汽车早颠得没影儿了。

雨中，汽车爬坡。空气很潮湿。路面干涩。

车速又慢了下来……

十九

一木肯定会有一种感觉，今晚，大概所有关注中国卢沟桥的目光都盯着他。这使他不仅仅有一种自豪，还有压力。

他接受了发动进攻的命令后，在五里店附近遇到了向宛平城行进执行调查任务的松井少佐。他们肩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目的都一样。话便说到了一起。

一木告诉松井，他是去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那完全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口气：

“到时候，将会是我宣布卢沟桥被日军攻占了。明白吗？我们注视

卢沟桥这座不平凡的桥头堡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松井听罢自然很羡慕，连他也觉得有几分得意，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份功劳。不过，他想了想，又有点深思地说：

“中国的军队会不惜代价地反击你的进攻的。这，我早就听他们说过的。”

“他们说过？谁？”一木好吃惊，他简直怀疑这个松井是个密探了。

“冯治安师长！”松井回答得十分坦然。

“冯治安？”

“对，是他。我见到过他，我提到了29军向我军的不法射击。冯说，他属下的部队不会派到卢沟桥去的，如果城外有部队射击，那一定是土匪。”

“土匪？那一定是骂我们的了！”一木不傻，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松井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在城外部署了兵力，这个，不必隐瞒，也不能隐瞒。有冯所指的‘土匪’，你进攻起来就有了保证，不会发生事故，所以，我支持进攻卢沟桥。但是，对宛平城的攻击，我们则要等一等了，因为城内有很多良民，这些良民的厉害不会亚于军队，我们会寸步难行的！”

一木从松井的话里得到的是力量。当然，他也悟出了点东西。感谢松井。甚至他想到了一个问题：松井应该叫松木。一木、松木，双木成林嘛！

一木率领部队鼓起心帆去赶路了。他到了卢沟桥附近的沙岗村，马未下鞍，人未休息，就部署攻击了。部队全部散在各个点上，成战斗队形。步兵炮对准了回龙庙。

庙里驻守着29军的部队。

现在，一木在心里反复地练习着四个字：

“准备射击”。这是他要下达的战斗命令，第一个命令。

日军为什么要把回龙庙选为进攻卢沟桥的突破口，也可以说是整个“七七事变”的突破口？

先从回龙庙说起。

这座建于明代的庙宇位于卢沟桥以北约1400米的永定河东岸的高坡土台上。顾名思义，回龙庙就是龙回头的意思。这自然是当地老百姓的美好愿望了。永定河从遥远的上游流到距卢沟桥不远处时，河身突然变得狭窄，窄到只有上游河身的三分之一还不足，而水头突然增高，高到高于上游水头的一倍还多。这样，促使河水返向回流，很容易发生水患。于是，乡民便建造了回龙庙，祈求龙神保佑他们消灾免难。

回龙庙以东是一大片开阔地，约有4平方公里。日军的军事演习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回龙庙是个战略要地，中国常年有驻军在这里守卫。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城驻军为犄角，从南北两方护守平汉铁路桥。日军一旦进攻铁路桥，就会受到两翼驻军的夹击。

此刻，一木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强攻夺取回龙庙，尔后攻取铁路桥，西进渡河，长驱直入卢沟桥。

度过风雨漂摇之夜，去迎接黎明。

守庙者和攻庙者都会这么想。

……

如今，在卢沟桥再也找不到回龙庙了。它早被历史的风尘淹没殆尽。

卢沟桥事变中这座庙宇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守者顽强，攻者死拼。它曾经三失三得，那三间正殿、四间配殿，毁坏严重，荡然无存。只是那土台高坡尚残缺地赤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初，庙基柱础还依稀可辨，后来很快就被风沙掩埋得无踪影了。

不过，今天来卢沟桥旅游的人还总忘不了回龙庙，他们常常指着土台高坡的东坡沿处两座水泥建筑物说：“看，那就是回龙庙！”其实，错了。你只要走近它就会发现这两座水泥建筑物尚存有射孔。原来是当年中国军队修建的两座碉堡！

人们怀念回龙庙。

二十

载着调查人员的汽车越走越慢了。不是因为道路泥泞。

此刻，在王冷斋的眼里，卢沟桥、还有桥东的宛平城像天边的彩云，能想象得出它们的绚丽，却得不到它们的滋润。

他的心已经飞到了桥上，他的脚已经踏进了城门。

车速骤减，沙岗村到了。停车，下人。

这儿离宛平城东门只有二里地，一竿子就能够得着。

王冷斋看到，公路边的沙岗和铁路涵洞一带的地方已被日军占据。借着朦朦的不知从何处透出来的微光，似月不是月似灯不是灯的微光，可以看到那些鬼子兵大多数俯卧在地，做射击准备。地上满是泥水，他们的军衣以至肉皮肯定被泡透了。机枪和炮也都已架起，不长的炮筒伸进了黑洞洞的夜色里。

攻城的阵势已经摆停当。

寺平坐的车是第一个停下的，他却是最后一个下车。

“请你过来一下。”寺平向王冷斋招手。

王站着未动。他凭什么要听从一个鬼子指手划脚的调遣。

寺平只好走了过来，步子很快，气势汹汹的，像一阵旋风。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地图，对王冷斋说：

“王长官，现在事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方和日方都拿出了开枪对立的准备，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一触即发，我们按原先的步骤调查、谈判显然不行了。你说呢？”

王：“什么叫双方开枪对立？中国军队是捍卫自己的国土，日方是侵占别人的国家。”

寺平见王冷斋说完这话就要走，忙软了下来，以缓和的口气商量说：“不要赌气嘛，王长官，说气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眼下最要紧的是双方都解除对峙。我想了这么个办法，你看行不行？现在只有你迅速命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双方再商讨解决办法。”

听了寺平这个方案，王冷斋反而显得很镇静，因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说：

“谢谢你颇费心机想出了这么个办法，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此来我只负责调查使命，这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原本已经议定，你不是不知道的。刚才牟田口就要求我以地方官员的职权尽速处理，我断然拒绝。你现在比他更明确地提出我军撤出，日军进城，这种无理要求，我不会同意的。知道吗，我不同意！”他反复强调地说。

寺平：“那么，请问阁下，我们的谈判该谈些什么内容呢？”

王冷斋：“现在我们先负责调查，待明了情况，再说谈判的事。你所提事情，离题太远，我只能使你失望。”

寺平好像抓到了什么把柄，一双小眼睛一忽闪，问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能进城？平日日军演习都可以穿街而过的。”

王立即反驳道：“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并不明了以前的情形。日军的演习向来都在城外，我们从未允许演习队伍穿街而过。你所谓的先例是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

寺平接前任的工作还不足三个月，被王冷斋质问得张口结舌，满脸通红。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尴尬，很快他就变得恼羞成怒，说：

“我提的要求，是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阁下见机而行，免得被动。”

王冷斋的回答只两个字：“请便！”

又一个人出来与寺平搭伙威胁王冷斋。

此人就是那个所谓代表日方全权处理问题的森田彻副联队长。这时，他一脸杀气地走到王冷斋、林耕宇等中国代表前，说：

“请诸位过来，看一样东西。”

“东西？什么东西？”王冷斋已感到这个“全权代表”要撒野了，便提高了警惕。

森田彻并没有隐讳自己的打算，直叙心意：

“让阁下们看看日军的阵势，受受启发！”

于是，中方代表被胁迫到日军已经部署好的阵地前。

一排排枪炮在夜色中凝聚着阴森的寒光。

仿佛还可以看到趴卧在地上的那些日兵们的凶神般的脸。

森田彻走到林耕宇面前，说：

“现在该你说话了，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你们的王专员，要他在十分钟内迅速做出决定，只有十分钟。如无解决的办法，严重的事件马上就要爆发。枪炮不长眼，到时候你们可不要抱怨我没有及早提醒你。”

林耕宇说：“我想说的和要说的话，王专员都说了。”

双方对峙相持起来。

身边就是日军的阵地。那些炮群明显的又把脖子伸长了几分……

寺平站出来“解围”：

“此处非谈判之场所，咱们避开阵地，到城内从容商量如何？”

寺平说着话里又射出了威胁的锋芒：

“双方的矛盾宜解不宜结，万一事态扩大，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谁负全责？”

王冷斋见状，也无别的良方可施，便与其它几位中方代表交换了意见，同意到城里谈判。

他们走进宛平城。

冰点下会有生命涌动么？

二十一

日军攻城的枪炮声打断了谈判。

枪炮齐发，宛平城淹没在烟火里。夜空里窜起一股尘烟……王冷斋正在守军指挥所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与日方代表谈判。

谈判？

这是中国军队的守约：敌人未开枪前，我方不先射击；一旦敌人开炮，我们坚决还击。

双方打了起来。

流弹在空中相撞，发出铿锵之声。

一群山雀被惊飞，穿过了永定河……

二十二

宛平城内，谈判会议室里。

枪声、炮声不时地震动着这间平房。

王冷斋质问松井等日方代表：“是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酿成了这次事变，责任完全在日方！”

松井无话可说，只是说：“阁下息怒！阁下息怒！”王冷斋，“你必须承认，日方要负完全责任！”松井强辩：“开枪或许是出于误会。我们还应该致力调解此事，勿使扩大！”

“还误会？宛平城都要被你们的大炮摧倒了！”王冷斋甩下这话，破门而出。

外面，碎砖瓦砾落得满路都是……

二十三

可以肯定，引发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日军开的。

牟田口在卢沟桥事变过去了7年后，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当时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1946年6月24日接受法庭传讯时也供认，7月7日晚的第一枪是他指使人放的。

卢沟桥事变还未发生时，在日军方面甚至在东京就已经有人“预测”要出事。据今井武夫回忆，在事变的前一个月，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就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发生柳条湖一样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6月30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派驻北平人员曾对人说：“一星期以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

二十四

同一个时间：7月7日晚。

庐山和卢沟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景象。

蒋介石把宴请各国使节的日子偏偏定在了这天下午，大约7时左右，大宴结束。随之，宣布舞会开始。

舞场很豪华，一刺朗明的彩灯与有节奏的脚步一起旋转。

蒋介石没有在舞场出现。他坐在旁边的休息室里团目养神。他很累，现在需要静下心来休息。

宋美龄挽着一位高鼻梁的洋人踩着柔柔的音乐，几乎是原地走动。她表现得高雅、端庄，却不失礼。使人感到舞伴是被她左手的那两只指头轻轻地提着走动。确实很雅致，她的身子与对方若即若离，没有任何一处相衔的地方。

“蒋夫人，庐山好地方，浓荫遮蔽，清清爽爽，夏天的炎热在这里是没有的。”

他们旋转到了光亮处，看清了，这位舞伴很可能来自美利坚。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祖国，总是值得自豪的事。宋夫人脸上溢满笑容，旋即笑容却消失得干干净净。她对舞伴说：

“何止庐山一处是避暑的好地方，中国地大物博，富饶美丽的地方多着呢！先生有机会去一趟昆明，那里四季如春，保准能让你迷上。还有新疆，那里有天池，有火焰山，吐鲁蕃的葡萄……”

就在这当儿，卢沟桥响起了枪炮声。

当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当时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宋美龄仍然在飘飘悠悠地起舞，她是踩着卢沟桥的枪声跳舞的；蒋介石仍然在休息室里闭目养神、他是枕着卢沟桥的枪声养神的。

蒋介石选择7月7日晚这个时辰和各国使节吃喝、作乐，他没有什么错。遥远的卢沟桥发生的事情，与庐山他安排的这种场面，完全是一种碰巧。可是，这种历史的巧合使他把自己置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即使在过了多少年后每提起此事，他依然有口难辩。

舞会结束后，天已很晚。蒋介石夫妻回到住所，疲乏得连话也不想说了，立即安睡。很快，鼾声就响了起来。

侍从室主任（蒋的秘书）陈布雷在蒋家夫妻就寝以后也很快就入睡了。他也够忙够累的，蒋介石有多忙他就有多忙。但是有一点他无法与蒋总裁相比：早晨蒋还没起床，他就得先蒋一步起来；晚上蒋已经休息了，他还往往不能睡觉。

7月7日夜，庐山的夜色中响着打雷似的鼾声，是不是因为蒋介石和陈布雷的鼾声响在了一起？乏人打响鼾嘛！

时针悄悄地走过11点……

侍从室电台收到南京急电，侍从首先送给陈布雷过目。陈从酣睡中醒来，揉着惺忙的双眼问：

“什么事呀？急电？”

“卢沟桥出了岔子，29军同日军发生了冲突。”

陈布雷赶紧从侍从手里接过电报，看了电文。他呆想着：冲突？到了什么程度？怎么一句也不交待？这帮无用的饭桶！

太太也醒了，她知道了电文的内容后，对丈夫说：

“冲突，那地方近些日子天天有冲突。反正就是那些碰碰磕磕的事，明天再说吧。现在深更半夜的，你把总裁叫醒也办不了什么事。”

陈布雷觉得太太言之有理，便叹了口气，说：“好，睡吧。大概又是日军在惹事生非。在总裁眼里，延安的一举一动，要比日军的挑衅重要得多。”

夜很静。庐山别墅区鼾声依旧如雷。

蒋介石一觉睡到8日清晨，他一起床就看见办公桌上放着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报告。除了昨晚陈布雷收到的那份电文外，还有秦德纯发来的报告。他阅罢公文后，脑袋嗡一下，几乎晕倒。卢沟桥出事无疑，这，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事态恶化得如此快，这是他所料不及的。他确实有些震惊。

当天，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蒋介石一生坚持写日记，凡他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均在日记里留有笔迹。这实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日，蒋致电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二十五

今天是1937年7月8日。

像昨天一样，这个日子依然缀满了斑斑弹痕。

雨停了，是在黎明时分突然停的。

天并没有放晴，雾沉沉的浓云重重压在头顶，好像随时又会挤出一场雨来。

雨倒没有再来，云缝里筛下了颗颗冷冷清清的星花。

聚积在屋顶瓦上和树叶中的雨水还在叮铃铛啷地滴嗒着，使人感到满世界都是雨滴声。

地上一片泥泞，分不清路在何处。

星花不见了，黎明前的黑暗吞噬了卢沟桥的影子。桥如一座山峰沉沉地坐在永定河上。

远处，闪烁着一点鬼火似的灯光，缓缓地流动。那是夜行的日军战车，它已经在那里夜游了好久。大地在这灯火的运行中微微抖动。

午夜来临。战车行至黑暗中，成为比黑暗更黑暗的一部分。

大战前的黑暗。

大战前的沉寂。

宛平城里。

谈判桌上总是不会平静的。

樱井还是那幅傲不可犯的、正人君子的模样，居高临下，仿佛一切

均可由他指点。他向中方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索丢失士兵。否则，日本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樱井提此三点要求时，金振中就在现场，他听了，心中的气愤像怒火一样向外喷涌。处罚营长？屁！你日本鬼子有什么资格处罚我？他无法按捺心头的火气，质问樱井。

“漆黑的夜里，又下着这么大的雨，你们到中国的警戒线以内来搞军事演习，心怀什么险恶目的？你们张口闭口说走失了一名士兵，有何证据，谁是证人？退一步讲，即使丢了，也是你方带兵人的责任，与我们有何相干？……”

樱井不干了，他打断金营长的话，粗喉咙大嗓门地说：

“对罪魁祸首一定要惩！严办！明白的吗？”

金驳斥道：

“祸首？谁是祸首，你们最明白。该惩办的不是中国军人，而是你们。你们昨晚炮轰宛平城，民房炸倒了许多，军民被炸伤不少，城内惨不忍睹，应该由你们赔偿中方的损失。我们的士兵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有之！”

愤慨时不会流泪。

可是，心在流血……

二十六

坐在战车上的一木清直于行进中又一次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五时半。

他一直没有下达全面向卢沟桥和宛平城进攻的最后命令。

这时，他走下战车，举目四顾。是在寻找，还是在等待？

断了根茎的夜色，渐渐向远方褪尽。

天亮前，很冷。卷过了一阵带着冰渣的风。

终于，一木给在中国华北平原上这支窥视许久许久的日军。下达了一个历史性的战争命令：步兵向宛平城外的中国 29 军的阵地进攻！

枪声拧成一股撼天震地的气浪拔地而起，飞过湿漉漉的、黎明前的原野。

瞬间，给人一种地球都要毁灭了的感觉。

中国军队立即进行反击。

枪弹在天空中倾繁地交叉碰撞，发出刺耳的怪叫。

一木继续宣布战令：炮兵开始射击，支援步兵的进攻！

他的手臂笔直得像根棍子，指着一个方向——沙岗村北侧的大枣山。日军的炮兵阵地就在那里。

于是，枪声、炮声卷搅在一起，火龙奔腾般飞向宛平城、卢沟桥……

微微的晨曦中，可以看出一木清直脸上的表情十分得意，但然。那当然是一种险恶的得意，凶残的坦然。

日本帝国主义精心发动的一场全面侵华战争，便沿着一木清直的这手臂开始了。此时此刻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在这时定格：1937年7月8日晨5时半。

二十七

这一刻，华北平原一片黑沉沉的静。似一片无边的湖。

枪刺、炮声也穿不透这寂静。

卢沟桥的枪声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

北平城似乎离宛平战区也很远，很远。

秦德纯寓所里的电话铃响得炸耳，是在报火警吗？

秦抓起听筒，吉星文的声音就蹦了出来：

“报告首长，日军一个步兵营在四门山炮的配合下，正向卢沟桥涌进。后面还有一个机关枪连……”

秦没让吉团长再讲下去，说：

“这个情况，我已经听你报告过了。”

吉团长急忙递上话来“不，刚才我报告他们正加速挺进卢沟桥，现在我要给首长报告，日军的炮火已经开始轰炸起了卢沟桥……”

屋外一阵地动山摇，枪炮声淹没了听筒里的对话，秦德纯大声呼叫：

“吉团长！吉团长！……”

电线断了。

山畔站着一棵孤独的树，正对着天空拔节……

二十八

金振中营长心中还一件事放心不下：

铁路桥东头的我军阵地是日军望眼欲穿的目标，也是中国军队守卫的重点地段。排长李毅岑带领全排士兵守卫在那里。金营长把李毅岑排放在桥头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最佳选择。绝对放心。

在一木清直率领第三大队主力排成四路纵队凶神一般向回龙庙及铁路桥发起进攻时，金营长的心活泛了一下，生出一个问号：

“李排长他们能顶得住这伙土匪吗？”

他没有再往下想，也没有犹豫，像山洪下来之前加固堤坝一样，派去一个排协助李毅岑守桥。

这个排是从11连抽调来的，排长叫申仲明，是个说话声音如洪钟、走路能带起一阵风的角色，说一句话地上就能砸个坑。

金营长用战前动员时的那种口气和申仲明说话：“从现在起，李排长的任务就是你的任务，你们要并肩作战，日军从哪里扑上来，你们把它在哪里消灭掉。记住，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是！营长请放心，我们一定狠狠地回击来犯的侵略者。”

震撼天宇的声音。

申排长带着小分队穿过敌人的火力网，迅速赶到桥头阵地。

一个战士在行进途中倒下。日军已经发现了这支增援部队，恨不得

一口把它吃掉。

来不及掩埋自己的战友，只能踏着他发烫的身躯铺平的通往前沿阵地的路，义无反顾地冲锋！

申仲明站在桥头一处隐蔽的地方，注视着四周的动静。

此刻，牺牲了的战友那还没有冷却的热血在他的周身流淌，冲击着他的脑门和胸膛，唤醒着一个中国士兵不应该死去的良知。

申排长望着水定河中倒映着的幽幽山影，耳畔不时滑过的流弹声竟像小琴弦一样拨动了他的心。他回忆起了生命里令他永远心花怒放的事情……

那个深冬，春风流火，一夜间融化了千山雪。

申仲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 1935 年。当然是秘密地入党了。

从那一刻起，他有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追求。入党介绍人这样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是个全新的人。

但是，他仍然是国民党 29 军的一名排长。这个既合法又不合法的职务虽然使他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担心踩死了蚂蚁，却也使他“合法”地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他鼓动他的士兵和战友要毫不怜惜生命地为民族的生存而抵御日寇的侵略。他对他们说：

“热血男儿，在这连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眼看就要变成亡国奴的关键时刻，如果都不能站出来夺过鬼子手中的枪，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话是不是说得露了点？有些人用诧异的目光打量他。这些人也许会想：这个人怎么啦，一天老是宣传打鬼子，他的嘴为什么就不停会儿喝口水呢？

申仲明当然会在这些疑虑的目光中变得谨慎一些。不过有一点那是肯定的：他不会放弃宣传抗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申仲明的鼓动和带动下，29 军的不少士兵成为抗日的积极分子，在当时或以后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抗日的中坚力量。

今夜，日军在中国的卢沟桥上挑衅闹事。

他站在桥头，是守卫大桥的第一哨兵。他的身后还有许多战友，他一点也不孤立。这儿有一道铜墙铁壁。

面对冻上，他的心被 7 月黎明的野人烤热。

黎明鸟的叫声戛然而止。

从回龙庙方向走来一队日军，直逼桥头。

申仲明大声喝道：“站住！”

日军趾高气扬，依旧前行。

申拉开了枪栓：“什么人？不许动！！”

吼雷一般的喝令，日军被镇住了。

从日军队列里走出一个人，显然是他们的长官了，他向中方提出：要到中国驻军阵地搜寻失踪的一名士兵。

申仲明回答：这里是中国军营，我们没有见过日军士兵。

那日本长官不理申的答话，往前走来……

申：“我已经说过了，这儿是中国的军营不许任何人来搜查。”

日：“谁规定的？你们绑架了我们的士兵，没有权利讲什么不让搜查的规定。”

他手舞足蹈，怪声怪气地吼着，却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随着他这旱蛙似的喊叫，本来站在 10 米开外的那队日军也冲了上来。

申仲明和他的排的士兵岿然不动地立在营门口。

日军无法超越，被迫停步。

申仲明警告敌人：你们再朝前跨一步就闯入了军事禁区，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

短暂的对峙、沉默。也许只有 10 秒钟、20 秒钟，也许还不到……开枪了！这是日军侵犯中国领土的枪声。

桥头一片正义与邪恶交织在一起的枪声、硝烟……互相厮斗着，互相吞噬着！

只要海活着，大山就不会死。

申仲明和全排士兵始终紧守营门，不许日军前进半步。申指挥大家到一个工事里，占着这有利地形向日军射击。他以一棵树杆作掩护，狠狠地揍着冲上来的鬼子……

就在这时候，那个日军的长官喊了一声什么口令，电子们的所有枪口都转来集中对申仲明，一排火舌喷吐出来，像无数条火龙，扑向那棵大树……

申仲明中弹，倒下。

大树杆上留下点点露着惨白木质的弹洞。

地上一片血迹……

申仲明牺牲了！

他身体周围的血迹渐大，变黑……

永定河溶进了新的生命和血！

申仲明去得太快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他牺牲时手臂还指着桥头的方向，那是告诉战友：要保卫这座桥！

日军还在强攻卢沟桥。

大树前的那滩血，点燃了冬天涂徐升起的朝霞、这是雨后的朝霞，缕缕硝烟映衬得它更加鲜亮，绚丽。

李毅岑指挥着他的排、还有申仲明排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士兵，继续在桥头战斗。

血海。怒涛。

卢沟桥头的自卫反击战始终是一次强与弱的较量。

敌人的人数三倍于我方，敌人还有六挺机关枪，这是李排长根本无法拥有的。

敌人像羊群一样冲上了阵地，犹如刚刚出山谷的洪水。即使有一座堤坝，并不可能拦住每一次山洪的冲击。当李排长和他的战友们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后，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困境中，不得不端起刺刀，冲进敌群……

阵地上丢下敌人一片尸体……

黑沉沉的夜幕被枪声震得一颤一抖。

这样的夜，再红的血也会变淡。

人血不是水。

二十九

回龙庙已经被日军攻占。

这是卢沟桥事变中日寇占领的我军第一个阵地。必须把日军怎样占领这个阵地的过程乃至细节写出来，公布于众。了解这件事的过程肯定比知道它的结果更重要。

不叫的狗最会咬人。

错了。清水节郎是齧着尖利的犬牙在光天化日之下咬人，结果也没人防住他……

这就是事实——

一直到7月8日，日军还在演习。

回龙庙东面的一大片开阔地，往东直到大瓦窑村，少说也有四平方公里。这片中国的土地好像是它祖奶奶卖给中国的，日军白天黑夜总占着，步兵演习，联合演习，风也不躲，雨也不避。绝对没有应付局面的意思，而是实实在在的实战演习。从他们的身上也许人们会明白日本军人的那一身武士道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具体地说，这是7日的深夜之后，8日的黎明之前，在这天的这个时刻，该睡的醒着，该醒的却睡着了，于是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我11连1排守卫着回龙庙。

庙宇的对面就是日军的演习场地。

两军对垒，准都可以看见谁，包括到伙房吃饭、进厕所解手。但是，谁也不“干涉”谁。

这也叫和平共处？

这时候，雨停了，借着弄不清是从何处射来的微弱的光，只见清水节郎手持指挥刀，向1排正步行进而来，他走得很像回事，完全是训练有素的样子。

11连连长站在阵地前面看着，他的后面还站着几个“看热闹”的士兵。谁也没往别处想，都以为清水节郎是在搞演习，长官在演习时为士兵做示范动作这是常见的事。再说，这些日子来，1排的战士每天每夜都这么看着日军在这儿演习，不足为怪。尽管如此，当连长看到清水直向自己的阵地走来时，还是给了个让他停止前进的动作。清水节郎没理我方连长的制止、仍旧手持指挥刀一步一个节拍地走了过来。

连长开始有一种大势不妙的感觉了。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在他的这种感觉刚萌生的一瞬间，清水节郎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他连这个日军中队长的几根稀稀疏疏的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中队长根本不允许中国的连长把自己要说的话喊出来，便挥起指挥刀刺了过去。

连长当下就倒在了血泊中，他想喊的那句话始终没有出唇。

这时候，清水节郎倒使出平生之力喊了一句话：“冲呀！”

早就潜伏在夜色中的日军，跟着清水节郎的指挥声冲上来，偷袭了1排。

1排排长沈忠明，带领全排战士冲进敌群，奋勇杀敌。他们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毫不退缩，寸土不让。敌人恨死了冲杀在前面的沈忠明，用枪打死他以后，又挥刀刺了他几刀……

黎明时，1排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回龙庙落入日军的手里。

这就叫偷袭。

《军事辞典》的“偷袭”条目应该增添新的内容，清水节郎的无耻行径使许多军事术语失掉了其严密的组织性和科学性。

三十

卷一个漩涡，再卷一个漩涡。

让天下所有的类似回龙庙的据点最好都跟着他的指挥刀旋转。

此时的清水节郎肯定是这么想的。

一座庙宇不可能是日军进攻宛平的终点。

哪个贼都不惧怕漫漫的夜。

清水节郎的贪得无厌表现得有增无减。回龙庙被他“偷”来以后，他立即兵分两路，向宛平城东门和卢沟桥发起了进攻。

这时候，日军的大炮开始轰作城墙。

炮弹呼啸着、带着火柱飞过夜空……

三营的指挥部被炸毁，立即窜起一股冲天大火。

雨，又下了起来。红雨，血雨……婴儿的啼哭是撕肝裂肺的。

卢沟桥在怒吼、晃动中撩去它的寒衣，化为灰烬，露出了它的光背脊梁。

流弹穿过的地方必然有丰碑一座……

婴儿的啼哭之后是几声清晰的吠声。

很快，吠声也掉进了无边的枪声之中。

阡陌上，勾头坐着一人影。

不是写生的画家，也不是研读唐诗的书生；战地的现场实录使他忘了周围的战壕还有从战壕里发出的枪声。他在卷着硝烟的笔记本里留下了冰冷的字迹……这是那个疯人般挥舞着大刀的水清节郎吗？

也许应该感谢清水节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笔记里看到当时的战斗情况……

“……占领龙王庙（应为回龙庙——引用者）北侧待命的第八中队，在黎明（微明时刻）渐渐到来时，利用丈八高的高粱和玉米地，隐蔽地继续前进，前出到回龙庙东北方向大约三百米的庄稼地边沿。这里到前方堤坝间，连接着大约一百米的水田地，尔后的前进，暴露在回龙庙北面约五十米左侧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壕一带，而且水田也妨碍着队伍的通过。”

“在那里，中队为了迷惑敌人，争取尽可能接近的方针，对各队下达了各种准备的命令。于是第二小队在第一线，第一个队做预备队，配属了机枪的预备队，在附近的田地和柳树丛隐蔽地占领阵地，在他们的掩护下，第一线部队以平时演习那样的行动通过了障碍，一部分在永定河的中游向右岸前进，到达后向左迂回逼近敌人阵地（到向左迂回时，虽然第一线部队，有小队长之外另一名士兵监视着敌人阵地，还是给了在停止时尽量警惕左侧方向的射击等详细指示）。”

“一切准备就绪，同行动起来的第一小队一起到堤坝上看到，永定河水因几天前下雨而显著增涨，混浊的水流缓缓流过。附近的河宽大约二百米，干燥季节很容易涉渡，现在察看的结果，知道水流中心深度为八十公分以上，河水泥泞涉渡困难。因此，打消了右小队进发到前岸的念头，在堤坝斜面以外也没

有展开的余地，这样，预备队增加到第一线的只有第一个队。”

“这个期间秘密观察回龙庙（堤坝上的一个小庙），幸而什么设施也没有。如果有坚固的民房做防御，也会给尔后的攻击造成不少的障碍，幸亏上天保佑，行动在工事完成之前。”

“这时候大队部的书记来到，传来大队进攻命令的要点，也知道了大队主力第一线已经进入到阵地前沿约三百米的位置，根据河川状况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大队长那里迟误了），向敌前沿推进的第一小队长野地少尉统辖的先头部队，开始用一般速度前进，这时，在我方监视中站在壕外的中国军队军官等，急速跳进壕内，同时从壕内一齐开始了射击。”

“于是，中队开始应战，在机枪的掩护射击下突入阵地，追击退兵，一举推进到回龙庙南侧。时间是上午五点半钟，灿烂的旭日光辉，冲破了东方低垂的暗云，更加激励了我军官兵士气。”

“这时，主力机枪、步兵炮也开始了射击，中队在共同努力下，野地少尉始终突击在先，继续追击，席卷敌人阵地，突击开始仅七分钟就到达桥头北侧，在这里同第七中队的先头部队会师了。”

“一方面，一下子接近敌前的大队主力第一线，听到了回龙庙方向的枪声，立刻改变成进击，冒着敌弹前进。特别是在左侧第一线的第七中队，在来自左后方城墙上射来的敌弹和来自城外西侧村庄约百名敌军的反击下，果断冲击，到处突破敌军，进到堤坝一线，这时完全占领了桥头以北的敌人阵地，第一线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很快猬集到桥头附近，因从永定河两岸和城墙上猛烈射来的交叉火力，和附近时时有迫击炮弹的爆炸，至此，部队渐渐出现了伤亡。”

“大队长紧跟着第七中队冲到堤坝，目击右侧的情况，改变了当初的决心（担负击退左岸敌人后的交涉任务），进到城内和城外村庄附近能阻击敌人退路的位置，尔后寻求对策，督促第一线各队执行向右岸进击的命令。根据命令转向全线追击，有的冲上铁桥，有的涉渡浊流，冒着敌人炮火，特别是冒着来自中野岛兵营附近侧面机枪的猛烈火力射击冲向右岸。击破一部敌人后，大致沿着长丰支线停止行动，整理战场，收容死伤，联络后方以待机。上午十一点时，为了解除卢沟桥城内中国军队的武装，接到了连队在左岸地区后退集结的命令。”

“可是由于敌人火力特别是翼侧机枪的猛烈射击，不用说，涉河到中流时，我方将处于连收容死伤都不可能的状态，因白天行动困难，而延期实施原来计划，以后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联队命令有了改变，日落后才开始行动，晚十一点半集结在一文字山东北侧，并入了联队长指挥之下……。”

应该给清水节郎的“作品”这样评价：真实。或者基本真实。

它是难得的另一类向导，可以引着我们走进敌人的营地，以一个侵略军前线指挥员的视角观察敌我双方的战地实况，这是在别的位置上无

法看到、或者看到了无法评价的。

清水此人的细心弥补了无情的战争带给我们的理所当然的疏漏。他的“战地笔记”中的许多情节都是蘸着硝烟流弹写出来的。我们珍惜他的“作品”，因为它是史料。

当然，清水笔下之误是难免的。

先不说他站在“皇军”的位置上观察那场战争因而颠倒了許多黑白，单就他在笔记中描绘的7月8日拂晓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时的天气就是错的。清水写道：“灿烂的旭日光輝，冲破了东方低垂的暗云”。不对，那一刻，没有旭日的光輝，而是日军的枪炮声伴随着一阵急风急雨卷进了宛平城。

有人指出，清水大概出现了“幻觉错位”。那个时刻，东京确是霞光四射的朗晴，卢沟桥却是暗云、急雨的天气。

清水为什么要把一个沉重的日子“错位”得那么轻松？

这应该是一个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

三十一

大概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清水节郎在他的“战地笔记”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地名：“一文字山”。

肯定地说，在中国的地图上或者实际版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地名。它是日本人具体地悦是一木清直为了演习方便自己随意命名的一个地方。

“一文字山”在宛平城东门外，东关的东侧。此处由于长年飞扬的沙土淤积成坡坡岗岗，荆棘丛生，所以，当地老百姓叫它大枣园或沙岗。它是宛平城外唯一的一处制高点，走上岗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宛平城东门及城墙。卢沟桥事变时，此地系日军一个重要的阵地，事变前是他们的演习场所，事变时，山麓入口处的民房为河边正三旅团长攻城的战斗指挥所。

还记得吗？一木清直在下达了进攻宛平的军令后，同时指挥日军的大炮配合步兵攻击宛平，那第一炮就是从这里打出主的。据资料统计，自7月8日5时30分开始炮轰宛平城起至7月20日止，日军共发炮11次，都是由大枣园的这个炮位发射处发炮的。

一木清直很得意地说：“一文字山，是大大的有功劳的小高地！”

说这话时，他就站在日军战斗指挥所外面的一个沙丘上，满脸挂着狰狞。

中国人则会这样回敬一木清直及所有战争狂人：一文字山这块本来神圣的中国领土上，永远地留下了抹不掉的兽迹！

今天，如果你还有机会进一趟宛平城，当地人告诉你许多值得一看的“事变遗址”中有一处是分外惹人瞩目的，那便是城东墙北侧的那个弹洞。这弹洞就是日军当年在大枣园发射的炮弹留下的永久纪念。

大枣园还有一处值得人们瞻仰的遗址，那便是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烈士的墓，墓堆为砖石砌就，墓地庄严肃穆，来此地的国人无不站在赵将军的墓前静静致哀几分钟。赵登禹是在7月28日的南苑激战中为国献身的。当时将尸体就地掩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基淬将军奉冯治安将军之命，将赵师长和29军阵亡于卢沟桥地区的将士忠骸迁葬于大枣

园。

从此，大枣园这块热土便埋下了在当年事变时没有来得及安葬的中国士兵的魂灵——足以让子孙万代都感到沉重且无限骄傲的血肉之丰碑。

把赵登禹师长的墓迁建于大枣园，这是河边正三、一木清直、清水节郎等日军指挥官绝对没有想到也下愿看到的。记得河边正三当年攻下宛平城以后，站在大枣园的沙丘上不可一势他说：

“对于一文字山这个炮阵地，帝国不会忘掉的，我们会在这儿建起纪念碑的。”

河边没有食言，事变后不久，他就让人在沙岗顶上西侧立起“支那事变发祥地”纪念碑。使人不解、甚至略感有点可笑的是，那是一块木制的碑，没出几年就被风雨吹打得无踪影了。河边怎能不晓得木碑是下会耐久的？

三十二

清水节郎移位提前描绘的“旭日灿烂”的风景终于出现了。不过，那是在一小时后，日军屡次进攻宛平城却没有攻下的时候。

雨，停了。

房檐水仍在嘀嘀嗒嗒地撕扯着，悠悠长长，不紧不慢，每一声都敲打着湿漉漉的几乎要冒水的土地。

阳光从云缝里挤出一缕缕彩色瀑布般光波，投射到天空，犹如一片片倒挂的彩帘。

一直紧响了大半夜的枪声此刻变得疏稀下来，只是有一声没一声的、好像从东边又似乎从西边响起来，且枪声软软的、尖尖的，使人有一种分明是弹头射到了棉花堆里的那种感觉。

卢沟桥战地上的沉问感一点也没有减退。硝烟散发出的浓烈的火药味、柴草燃烧中的湿霉味、尸体烧焦后的腥臭味……板结成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空气层，沉重地压在似醒非醒的落雨后的地上，又随意扩散开来。使你感到卢沟桥地区的每块地、每棵树、每座山包，不仅压抑、沉闷，而且在孕育着一种紧张、一见火星立即就会燃爆的紧张气氛。

宛平城像一座沉默的山峰，岿然不动地卧在永定河畔。

平静，一切都死死的平静。

但是，谁都能感觉得出这种平静是暂时的，短暂的。

正在城内谈判桌上交涉的樱井坐不住了。

很难猜得透他出于何种考虑，这时手持白旗登上了城墙，像东京街头的交通岗一样，摇晃了几下。随之，攻城的日军便停止了射击。

他们对宛平城久攻不下，疲惫了，借此机会喘口气，攒把劲再射击。

樱井虽然再没有下令射击，但是日军很快又开始炮轰宛平城了。

这是从大枣园炮阵地上发射的第二发炮弹，宛平城被咬去了一个角；第三发炮弹也射中了，我军3营指挥部再次遭轰炸城，今夜变成了桥。

没有错位。野心勃勃的日军要用大炮端掉这座城堡。

留在城里谈判的日方代表并没有从他们自己的炮声里受到鼓舞，相

反都有一种送葬的不祥之感。城毁了，还会有他们吗？

樱井第二次给金振中提出了那个臭得发腥的要求，他唯恐金听不懂，比比划划地说着：

“请你和你的部下，用绳子把我们四人系着从城墙上送出城外。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了，还由你向我军说明，中方已经同意于本日傍晚撤至城西十华里以外。这样做了，我们就立即停止攻城。”

对于这种带着儿戏又挑衅性的要求，金振中断然拒绝，并给以怒斥。他说：

“至于你和日方的代表想用绳子吊死在中国城墙上，我们一概不负责，连尸体都不负责送还。说到要我们的军队撤至城西十华里的事，我这样告诉你吧，侵略者一日不无条件的放弃侵略中国领土的梦想，作为中国的一名军人我就不会放弃回击侵略军的神圣职责！”

樱井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表示遗憾。

仍然没有放弃挽回残局的最后一丝希望，樱井又退了一步说：

“那么，别的条件我们可以暂时不谈，你还是把我们四人用绳子送出城外，怎么样？”

金用极轻蔑的口气说：

“谁要吊死在中国的城墙上，请自便，我方概不负责。”

贪婪的怕死鬼撞在正义铜墙铁壁上最终的回声是可怜的叹息。

三十三

日军向铁路桥东端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已经记不得他们扑上来多少次。

敌人全部的攻击都被我军击退。

李毅岑负伤了，许多士兵战死在阵地前。

也许敌人认为他们最后取得胜利的时机到了。进攻！数倍于前次的兵力进攻。一次又一次进攻，兵力递增着。

李毅岑指挥的两个排的兵力几乎全部阵亡……

铁路桥失守！

金振中走了果断的一步棋：他把守卫卢沟桥的第9连抽调出来，亲自率领着，向围攻铁路桥东段的日军反击。

每一个中国士兵此刻都会想：我要抱住每一根桥杆，至死不放！

三十四

何基津旅长把目光从一摞文电堆里找出来，熬得通红的双眼很干涩，他举起手背揉了揉，然后隔窗喊着他的警卫。

“小李，准备车于，咱们进城一趟。”

中士警卫李振江很快活地应了一声：“好，马上就得！”

他明白“进城”的含意，旅长要回家了。好像是他马上要去见久别的娘似的，乐得颠儿颠的满脸挂笑。

旅部设在西苑，旅长的家却在城里北海后门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里。何基津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都很严格的指挥官，平时不管有事没事

他都坚持在旅部过夜，只有到了周六才肯回家。可是，近日北平的形势紧张得好像有人在不住地拧着发条，何旅长担任战备值班，每日每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他已经有十来天没进城里那座四合院的门了。为此，小李心里很不安，城里城外都风传着日军要强占北平，炸平北平。旅长的太太和孩子不知急成啥样儿了！

李振江今天要亲自开车送旅长回家，他要和旅长一起回去帮太太料理家里的事。他风风火火地做完出车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紧催着旅长上了车，好早些到家。

此刻是下午1点多钟。

在车上，何基沣才有闲暇伸胳膊展腿地松了松筋骨，舒舒坦坦地打了个呵欠。他一忙起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何太太说过，按说老何这旅长的官儿也不算小了吧，可以享享福了。可他呢生就受苦的命，越忙越高兴，越闲越难受。此时，他坐在车上，是这几天来难得的一个闲空时间，便有了心思和小李聊天。他告诉小李，今日有人请客，饭菜都摆在了席上，就等着他“开吃”呢。他再不进城，就有点六亲不认了。小李听了加大了油门，赶路。

车到西直门，突然从后面什么地方传来轰隆的大炮声。那炮声显得很遥远，但震人心。一连放了好几炮。何旅长忙让小李刹住车，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说：

“是卢沟桥的方向在打炮。敌人又逞疯了，看样子要出事的！”

他说这话时，脸上阴云密布，心事很重。

小李不便说什么，只得又开起车走了。

车子刚一驶过北海后门，何旅长家那扇黑漆大门就可以看到了，只见旅长的大太太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着，她不等旅长又168会等谁呢！

“快开！”旅长紧催着。

车在门口停下，太太紧跑几步到车前，有点气急败坏地对何基沣说：

“快点，去接电话。急事！”

电话比旅长先一步进家门。

何基沣显然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忙跳下车奔屋里去接电话，同时嘱咐小李：

“车子快调头！”

转瞬，他就回到了汽车前，说：

“有紧急战备任务，我们立即赶快回营房！”

太太提了一包不知是吃的东西还是换洗的衬衣，把旅长送上了车。她满脸的惆怅。

汽车启动后，何旅长才告诉李振江，我军在卢沟桥战场上的情况下大妙，回龙庙和铁路桥两处阵地已经失守。现在他要火速赶回旅部，调兵遣将，千方百计地把阵地夺回来。

“开快点！越快越好！”

他不住地这样催喊着，小李把油门早就踩到底了。他像旅长一样，巴不得使轮胎变成翅膀，飞回营房。

糟！车子行至海淀附近时，遇到了麻烦事，一户出殡的人家抬着棺材走在路中央，人、车把路拥得实实的，根本无法过去。

小李被迫刹住了车。

“走呀，你呆在这里也要去吊丧吗？”旅长急了，出口伤了小李。小李望望车前如同潮涌一般的人群，不知该如何办才好。

“往前闯嘛！”旅长急得两眼快冒火了。他大声说。

小李瞅好了一道夹缝，开上车往前蹭着，蹭着……

总算闯出了送殡的人群，汽车的翼子板却在墙头上撞了一个大坑。他们回到了西苑营房。

何旅长一进营门就喊号长：

“快吹集合号，营以上干部集合！”

何基沅任旅长的110旅，当时有两个团，129团驻守在宛平城一带，团长吉星文率领着全体指战员正与日军殊死作战。220团就随旅部驻在西苑。这天，何旅长集合的便是220团的干部。

何讲了卢沟桥地区对我军很不利的严峻形势以后，就开门见山地对大家说：

“敌人已经占领了回龙庙和铁路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两个阵地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祖国的领土一分一寸也不能送给日本鬼子。”

讲到这里，他见220团团长沙世全站在队伍前列，就抬高嗓门指名道姓地说：

“谢别子，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想来见我。”

谢别子是谢团长的外号，此人身高体胖，大头黑脸，打起仗来，能杀能砍，敌人见了望风丧胆。这时他手一摆，对何旅长说：

“旅座放心，我一定拿下铁路桥，也一定来见你！”

“好，这才是谢别子的性格！”

开赴卢沟桥的队伍出发了。

谢团长身背一柄长刀，走在前面。何基沅坐着汽车随在队伍后面……

何基沅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此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在29军的地下工作者了。

何基沅1898年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县。那个年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我国。看到祖国被肢解、人民被蹂躏，少年何基沅愤怒填胸，报效祖国的愿望一日比一日强烈。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又进北平陆军大学学习，他和中国共产党在29军的另一个地下工作者张克侠是要好的战友，两人一同投奔冯玉祥部队，后来又一同改编加入29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何基沅升任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他看到东北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恨不能率部队奔赴沙场，与日寇决一死战。长城战斗中，37师奉命来到冷口、喜峰口一线接防。当日军向37师进犯时，他亲自带领骑兵去抵抗。临战前，他对几百名官兵做动员，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是爱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有这样的旅长，骑兵官兵士气格外高涨，大家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大刀，向日军冲去，敌人屡屡告败，29军的大刀队威名大振。

长城大战之后，29军移驻平津，何基沅提升为110旅旅长。他大义凛然，始终站在第一线指挥作战。1937年共产党北方局组织发动一大批进步学生参加在北平西苑举办的军训，他担任集训大队副总队长……

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北平失守。这时何基沅

又升为 179 师师长。9 月，日军向大名府猛攻，何率领部队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三天两夜，由于寡不敌众，大名府失守。何心如刀割，不忍心大好河山落入敌寇手中，他坚决要求前去与敌人决一死战。报国为民的心愿竟然得不到实现，副师长硬把他架到马上，撤到南乐县城。何深感自己的双手双脚牢牢被人捆绑着似的，不能大刀阔斧地去抗日，自己又难以挣脱这种境地。伤感、绝望之中，他竟拔出手枪自射，左胸中弹，倒在血泊中。部属来抢救他时，发现他身上有一张墨迹未干的纸条，上面写着：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

1938 年春节，周恩来在武汉见到了前来寻找共产党的何基淬将军，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赞扬道：“南京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下，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泮将军！”说罢，周与何一起大笑起来。……

队伍向卢沟桥前线开进。

他坐在汽车里，不时地向车窗外望去，正在拔节、吐穗的高粱和玉米，软塌塌地泡在一片水汪汪的田野里。他看到，有的断了叶杆，有的耷拉着脑袋，还有的被烟火烧烤得成了一柄柄黑秃秃的光杆杆……

战争使盛夏的原野呈现着一派凄凉景象。

他静静地看着窗外，塌圯的民房在他眼里，受伤的岁月在他眼里……

三十五

当身材魁梧的何基泮出现在卢沟桥前线时，指战员们都有一种盼来了救星的感觉。他们知道自己的旅长会像当年 29 军在喜峰口痛歼日寇一样好好教训这帮侵略者。兵少了首领总是没战斗力的。

在宛平城里县政府值班的小刘扑捉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把它通报给“中转站”。

洪大中一听到那欢快的电话铃声，就知道准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抓起听筒就急不可待地说：

“是我，小刘。什么事？快讲。”

小刘兴奋得直喘，说：“何……何旅长到了宛平！”

“何旅长来了？太好了！他是什么时间到前线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露出来？”

“军事行动嘛，来无影去无踪。”

小刘按捺不任心头的喜悦，接着说：

“旅长这次来是挑选突击队员的，组织一个大刀队。还有，他把 220 团也带来了，就驻在永定河西岸作预备队。科长，有鬼子的好戏看了……”

何基泮一到前线，就去观察地形，了解敌情。转了一圈，更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组织大刀队刻不容缓，杀进敌人的胸膛何基泮真不敢想象回尤庙和平汉铁路桥这两个阵地失去后，下一步卢沟桥战场将会出现怎样的不利于我军的局面。这是每个人在稍稍思考以后都可以估计得到的后果：

只要日军占领了永定河沿岸的回龙庙和铁路桥，他们就可以随时通过铁路桥踏上永定河西岸，迂回至卢沟桥，堵住宛平守城部队的退路，

使城内守军腹背受敌；与此同时，敌人分兵进犯长辛店，于是，良乡、涿县等也就轻而易举地成为它们的囊中之物了。这样以来，中国军队就“顺其自然”地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北平亦将成为一座死城……

在部署作战方案的当初，何旅长就意识到回龙庙和铁路桥是两个必须死守的事关重大的阵地。没想到，气焰嚣张的日军在我军尚无充分作战准备的时候，出其不易地一举占据了这两个战略要地……

所幸的是，8日这一天，日军在回龙庙、铁路桥这两个点上一直按兵未动，没有向河对岸运动。原因是，他们的后续部队还未到达，担心西进的过程中被我军消灭或围困在河滩的开阔地上。敌人的犹豫给我军带来了一段极其宝贵的“空白时间”，何旅长就是利用它把大刀队组建起来，集结于河西岸待命……

29军的大刀队曾经在历史上展示过它的光辉英姿，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辉煌。

那是在兵家必争的古长城线上，在易守难攻的喜峰口雄关隘口上……

1933年春，日寇的铁蹄眼看就要踏进关内，张学良急令29军首先占领了喜峰口，要求他们在这一段长达三百余里的防线上追击拼杀日军。当时29军的装备极为简陋，枪支陈旧，型号复杂，弹药补充异常困难。军队缺枪少弹何来战斗力？他们便制造大刀分发给士兵。大刀队应运而生。他们的刀刃在长城线上杀出了一条令敌胆颤的威风之路。

当时日军以兵多势重，武器精良的优势，多次用大炮猛轰喜峰口两侧的我军阵地，我方伤亡数百人，也没有攻得下被日军占领着的高地。

双方的文战已经拉锯似的交锋了两天多。十分残酷。尸横遍野。我方的几次反攻均未奏效。身为前线总指挥的张自忠师长这时毅然决定：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实施近战夜袭以痛击敌他要放出大刀队扫平敌人的营地。

3月11日深夜，两路健儿身背寒光逼人的大刀，在当地樵民、猎手的带领下分头出发了。几口的腿部被敌炮弹炸伤的赵登禹旅长也裹伤出战，亲临前线指挥。

冬寒未过，北国的山野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呼啸的野风像断了一只腿的山鹿在原野上狂跳着，夹裹着雪团冰渣扑向日寇阵地。大刀队悄悄地走在寒夜中，官兵们难捺心头求战的激奋，巴不得一步就跨进敌人的营地。

日军的炮兵部队驻扎在喜峰口东西两侧，那些自以为天下无敌的“皇军”们，在这样的夜晚正高枕横卧，睡梦正甜，万万没有想到将有一柄利刃砍进他们的梦中。

大刀队卷着朔风悄不声地摸进敌人的营地……

当日军们从睡梦中惊起后，明晃晃的大刀已经齐刷刷地架在了他们的脖根下。睡意惺松的鬼子兵迁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魂归西天了，一具具尸体倒在荒草丛中。剩下为数不多的漏网的鬼子，从血淋淋的刀口下侥幸逃命，都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这一仗打得好漂亮，大刀队扬威长城，敌人元气大伤。

据统计：杀敌千人以上。夺获敌军坦克、大炮和辎重粮秣难以计数，但因无法携回，当场被我军官兵们炸毁、烧光。

火光映红了斑驳雄浑的古长城，映红了深邃宽阔的长城夜空！

四年后，何基沣带领 29 军的大刀队在卢沟桥战场上再展雄威。

傍晚，阴雨绵绵，远山近岭都罩在烟雨里。

宛平城外，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动地，还有日本鬼子吱哇乱叫的喊爹叫娘声。

每一锋刀刃都快地挑断了蒙着视线的雨丝，每一把刀尖都拓宽着乡间这多雨的小路。敌人大都钻进了高粱地，高粱被砍得唰唰作响，鬼子与高粱一起倒了下去……

就在大刀队开始与敌人拼杀的一刹那间，从宛平城上传来了一阵万箭齐发似的机枪声。噢，千万别误会，不是敌人发现了大刀队派来援兵，而是我军为了掩护大刀队的行动在故意鸣枪呢！枪声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大刀队乘机杀进了敌人的大本营……

天黑了，不断有我方的伤员被抬下来。

伤员中有 220 团 1 营 1 连的孙连长，外号人叫孙秃子。他打起仗来特别勇敢，似乎不知道什么叫死。刚才他是最先冲进敌群里去的，身上被鬼子穿了 7 刀……

英雄的大刀队不负众望，终于把回龙庙和铁路桥夺回到我军手中。

战斗结束后，何基沣对谢团长说：“我们的战士真正的了不起，了不起！走，咱俩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如果不去看，你没资格当团长，我没资格当旅长。”

他总是有这么一颗虔诚的心，对他的士兵、对他的人民都是那么虔诚。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到了还冒着硝烟的前线。

这是一片高粱地，遍地血迹，满眼硝烟，几乎所有的高粱都被削去了半截。日军撤退得慌乱，尸体也没顾上拉走，还有三具被砍下脑袋的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

谢团长领着何旅长来到一片空地上，他指着地上一摊摊血迹，说：

“孙连长就是在这里倒下去的，他一连砍死了 6 个鬼子，自己身上也被日军捅了 7 刀……”

谢团长说不下去了。

何旅长什么也没说，他脱下军帽，深深地三鞠躬……

洪大中又接通了宛平的电话，他给小刘传达秦德纯的指示：

“喂，是小刘吗？市长让我转告前方的官兵，尤其是对劳苦功高的大刀队表示祝贺和慰问。”

“慰问？那也少不了我一份呀。我在这里值班已经一天多了，困得直打瞌睡，可是连一眼都不敢合呀！”小刘拉长着奶腔向洪大中“讨功”，很是可爱。

洪大中说，“当然不会忘记你的，小功臣！我把市长的指示还没传达完呢。他指示，我军在夺取铁路桥和回龙庙以后，不要继续追击，以免使事态扩大。”

小刘马上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你不打鬼子，鬼子可不会领情，要杀你的！”

洪：“市长说，我方正与日方交涉……”

枪声骤起。电话断了！

惊飞的夜鸟又落在了另一棵树上。

不过，那儿没有它的窠。

三十六

当然不能说北平变成一座死城了。

像宛平城一样，北平也是抗日火线上的一座碉堡。此刻，满城的激情像烈火一样在燃烧。民众的抗日之心聚积成又一座火山。

响动的枯叶，扇起翅膀。

卢沟桥是大鹏鸟之首。

但是，北平毕竟成为一座孤岛了。

交通断绝。

通讯线路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从8日晨起，四周各城门时开时闭，穿往的行人比往日大幅度减少。至晚8时，除内外城之间的前门、和平门可通行外，其它城门和路口一律断绝交通。

如果你此时置身于城里，就会感到你是在一座空城里生活，虽然你还会感觉得到人们屏住气的呼吸声，以及各个暗角里有人在走动或说话。一切都是悄声的，提心吊胆的。

北宁铁路线上的列车也停止了行驶。

交通瘫痪给中日双方都带来预料之中的困难。但是，首先受到威胁的是日军，他们在卢沟桥前线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无法后送。

日方提出，开一专列将他们的伤员运下来。当然不仅仅是伤员了，包括那些丧命于火线的日军尸体也一并运到某个地方掩埋起来。中方没有同意。强盗要在中华大地上为侵略这块土地的“英雄”建造陵园？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欺人太甚的事只能点燃积淤在民众心中对日寇的仇恨。

日方继续交涉用列车后运伤员的事。“运尸”的事再不提了。

中方仍然没有答应。为了抵抗侵略者而勇敢负伤的中国士兵也在前线等待着运到医院去治疗呀！

日军交涉此事的代表是一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敢死队，他们不是协商了，而是逼着中方按照他们设计的圈套行事。

终于感动了“上帝”。参加交涉、协商的中方代表已经没权裁决此事了，最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出面答应了日方的要求：用一列临时列车将日军伤员运载到北平城内，然后转运到同仁医院收容。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伤员在北平得以妥贴的治疗以后，多少中国军民在诅咒这个世界太残忍！

东交民巷有人赶路。很像是从宛平赶进城的樱井。

他转回头来，就不见了来时的足迹。178

三十七

我们有意让前线的枪声渐渐远去，把历史的镜头拉到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难得见到的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看看另外一些人和景。

这是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郁郁葱葱的树木罩着小院落的围

墙，使这里明显的成了与卢沟桥前线相比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清静中透露着森严。

司令部的最高长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生病卧床，他卧室的门紧紧地闭合着，门外站着一个人笔直的卫兵。

代理司令官职务的桥本群少将是相当称职的，从6日的夜到现在，可以说他就没有闲下来过。电话、电报、战报以及不断登门请示有关前线事情的各级指挥员……有8个桥本群也够他忙的了。

称职的他把本来乱糟糟的局面处理得有条不紊，使生病的田代皖一郎很放心地养着病。

那是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的时候，一份从战地来的报告前线实况的密件已经送到了桥本群的案头。他当即立断，就把有关人员召集到司令部开紧急会议，通报战况，研究对策。

会议是闪电式的，决议当场就形成了。

就在与会者走出驻屯军司令部大门时，桥本群派出的两个参谋和知鹰二和铃木京已经到了宛平战场，正进行现地联络、调查。二位“钦差大臣”传达了驻屯军的两个命令：

一、命令驻天津各部队于8日晨3时做好一切出动准备。

二、命令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即返回

桥本群当然没有闲着，他又开始给东京陆军中央部写报告。在两个参谋在平津宣布那两个命令的同时，这份报告已经通过电波到了东京。电文是：

“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时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注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多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应该把这看作是陆军中央部对卢沟桥事变的最早的回应——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接到了以下的命令：

一、日军要确保占领永定河左岸以及卢沟桥附近，在此基础上谋求事件的解决。

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

三、下列部队中午由天津出发经通州公路到达通州时，受你指挥：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缺步兵两个小队）、战车一中队、炮兵第二大队、工兵一个小队。

牟田口确实感到肩头担子很重，但这是一种透露着信任与自豪的压力。舍命保君子。他立即下达了体现自己新的权威的第一号命令，接令的是副联队长森田：

“指挥一木大队，对卢沟桥中国军队提出要求撤退到永定河右岸，如果需要，解除（中国军队）武器，占领卢沟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有这种意图，请速执行。”

森田不敢违令，马上与中方提出交涉。牟田口说这是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图，岂止呢？森田比牟田口看得更深一层：东京也正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这一步棋呢！

那个在半小时前狂得还像疯狗一样的森田，这阵子像只驯猫一样静呆在宛平城外一家作为日军临时歇脚的民房里，等候180着中方代表前

来谈判。

于是，林耕宇和寺平便缒城而出，和森田面谈。

森田几乎把牟田口给他的命令重述了一遍，总之，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否则解除其武器。林耕宇代表中方作了明确回答：中国军队不会撤退。我们本来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往哪里退？难道退到日本去不成。

谁也不让步。谁也无法前进。

都声明自己把春天高高地举着。肯定：有一个是不开花的枯萎季节。

日寇再次向宛平城猛烈地射击。

枪声很猛。

枪声更烈。

桥本群又给东京发出了第二封电报报告：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中，又遭到回龙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据说日本军人最不相信石头缝中能长出水灵灵的嫩芽这样的“浑话”，认为凡是浑话都是诗化了的语言。他们就认准一个死理：中国的版土应该是他的。

石头变成弹头砸向它，它也不改初衷桥本群迁没有来得及用石头去试试路途中那条河的深浅呢……

三十八

牟田口的那点自信心已经被碰得支离破碎，这是肯定无疑了，但是，他还没有失去最后的信心。作为东亚帝国的一名军人，在登上出国战车的那一瞬间，他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我的帝国是不会失败的，就像太阳不会从东边落下去一样。一定！成功属于每一个远征的士兵。

卢沟桥的枪声响了，终于响了！

每一个日本军人犹如在战壕里盼来冲锋号一样倍受鼓舞。他们只想用“长驱直入”四字来形容一切，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附属品。附属品！这是一块很难得的原始木质，可以雕刻出许多珍贵稀有的花样。没想，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非常不顺利。中方根本不接受撤退的意见。这使牟田口十分恼火。岂上是恼火，他恨不能把那些竟敢反抗“皇军”的中方代表抓来剁成肉块。岂止是肉块，捣成肉浆才痛快。可是，能这么淋漓尽致地达到目的吗？即使能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还是不退不让，日军仍然进不了城呀！

强忍恼火与敌周旋。对，周旋！

牟田口启开了砚台，它，一个小小的长方形，非端非歛，看上去平平常常的无特别之处，却是地地道道的纪晓岚的家珍。他又脱掉笔帽，在砚台上膏着笔。这套文房四宝是一位中国友人赠送的高雅礼物。他喜欢书法，尤其喜欢中国的方框字书法。这位中国朋友琢磨透了牟田口的心思，他唤水，送来了雨。解渴！此刻，牟田口要写一封信，当然不是一般的信了，是写给中国29军驻守宛平城军队的信。听说是一位营长带领人马驻在城里。营长？不能给他写信，太小的官了！就写给宛平驻军，这182是公事公办，他牟田口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写信，而是代表日军向

中国军队交涉重要事情。明白吗？两国之间的交涉！

信必须写得有气派，要拿出东亚帝国的口气来。当然还得要求中方把事情办好，毕竟是有求于人家嘛。

牟田口这么想着想着便提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

樱井等人是进城协商问题的，谈判代表。现在可以这样说，任何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谈成，已经一天多了，仍呆在城里。日方自然会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军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我方的一名士兵绑架进城了吗？但是，代表们的个人安全问题还不是主要的，最要害的是我们需要他们出城详详细细地谈一谈城里的情况，他们是从中国内部来的，掌握的许多事情是很重要的情报。我们已经发报给樱井了，要他们设法摆脱中国的纠缠，早日出城。但是，没有任何消息。中方在昨晚就封闭了城门，禁止人们出入宛平。

牟田口继续写信，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要求：

“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5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否则日方定以重兵踏平宛平城。”

关于撤退的事，日方已经多次对中国军队提出来了，中方不干。不答应，还得提。从某个意义上讲，你不愿意接受这才是我们求之下得的所盼呀！如果事情都是那么顺顺利利的，一点就破，能“踏平宛平城”吗？能发动起灭亡中华的大战吗？真是！我们就希望乱，乱了才可以得到更多，乱了才能摧毁想要摧毁的一切仇恨，才可以建成想要建成的一切美好。至于说走失的士兵现在已经归队，这有什么呢？归队了也要进城去搜查。你当初可以绑架我们的士兵，我们就永远保留进城搜索的权力。

牟田口又写了其它的话，大都是“必须”、“否则”之类的强调词。总之，这信要代表大帝国军方的水平，要使读信人看罢出一身冷汗才对。不，最好是打颤才痛快！

末了，他的目光停留在“重兵踏平宛平城”那几个字上。他心里美滋滋的，脸上浮现着甜蜜的笑容。他非常欣赏这7个字，那真是世间最美最美的文字了！

重兵踏平宛平城！

牟田口眯缝着双眼，好不自在。他在咀嚼着自己，也在咀嚼着享受。仿佛这世界已经是属于他的了，他就独自卧在时间的中心。

三十九

拆除栅栏，让空间再大一点，让世界再大一点。

包括牟田口在内的许多日军都会有过这样的愿望。因为那个形状如败叶似的岛国实在小得可怜，容纳不下狂人的野心。

宇宙变小，地球变小。

他们很实用，此刻保不准他们又希望天下所有的路都可以变得装进自己的兜里，任其摆布。

起码为牟田口送信的这个士兵会这么祈祷。去宛平城29军的路为什

么这样长，总也走不到？其实不是路漫长，而是一路的盘查、询问使他走了不少“盘肠路”……

牟田口希望他这封信可以得到如意的结果。

问题是在那样一个枪林弹雨中一个日本鬼子去中国军营送信，容易么？

信送到宛平城已经是 8 日午后了。雨下得好大好猛。水贼样的送信人！

正像牟田口所预料的那样。第一收信人和第一阅信人都是金振中营长。他的营守卫着宛平城和卢沟桥，他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宜。他会向上级长官请示自己没有把握、或者虽有把握却是事关重大的事情的。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就在眼皮底下，有他们的指点，他会免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错误。

但是，对于眼下收到的牟田口这封信，他却没有请示的意思。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方针，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营每一个指战员都铭记在心、并且每天总要朗声背诵几遍的那十个字：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金振中把牟田口的信展示在手掌里、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好像怕有所遗漏，他又读了一遍。撤退？笑哩！这应该是中方向日军提出的条件。上级派 3 营来宛平驻防，就是要我们守住这个地盘。中国军队守卫中国的土地，何谈撤退？至于樱井出城的问题，他走了，我们跟谁谈判？再说，樱井进城协商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国人绝不会把侵略者请进城的。要出城，自便！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

金振中在那张早已剥落掉油漆的方桌前坐下，摊开牟田口的来信，拿起笔在信纸上方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话：

“宛平城和卢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钢笔字，很有劲，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内容简练、干脆，完全是板上钉钉子的口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金振中满意地描视着这个答复。对啦，还有一条，这就是樱井等人出城的问题，牟田口既然作为交涉的一项内容提出来了，那就得回答他。有来无往非礼也。于是，他在原信的另一空白处，又写下了一句话：

“樱井等人也属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写完，金营长笑了。我怎么替樱井做主了，他会心甘情愿地与城、桥共存亡吗？他要怪罪我的。也罢！怪罪就怪罪吧，谁让他当初削尖脑袋要往城里钻呢！既来了，则安之。出城？哪会那么容易，满天满地都是流弹飞子，保不准哪一颗会叫樱井先生碰上的。我们不让他出城，是为他的安全着想的！这有什么不好？

金又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就这样，牟田口的来信被金振中轻而易举地作了处理。原信退回，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一封很特殊的答复信。

金振中自然不会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他们会用发动新的进攻来报复的。

已经有许多次这样的拒绝了，也有许多次这样的报复了。但是，金振中有预感：敌人下一次的进攻很可能要玩命。比如，它会以强大的炮

火摧毁宛平城和卢沟桥；再比如，它会以战车掩护其步兵夺我方阵地；在夺取我方阵地时，敌人炮兵必然向我方阵地后方延伸射击……

金营长在估计敌人的行动时，总是习惯于往最坏处想，他宁肯把敌情设想得严重些，也不愿因为轻敌而吃了亏。因为他十分明白，自己面临的实在是一伙洪水猛兽般的侵略者。

他的心里沉沉的。

抬起头向窗外望去，雨丝儿如线，挂满了天空。满腔的忧虑如这雨丝缠绕着他心。

他有个想法：再开个会，让各连的领导及部分排长参加，把一些情况和想法再给大家讲讲。

说开就开。很快参加会的人就到齐了，大家就挤在这间既作会议室又是他睡觉的房子里。鹰的翅膀从天空掠过的时候，大地一片肃然。他讲了以下的话：

“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打仗嘛，死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敌人的炮兵一开始向我方射击时，各连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余的人员都要隐蔽起来。敌人的炮兵发泄之后，敌人的战车很可能掩护步兵来夺取我方阵地，这时，各连隐蔽的队伍迅速出击，与敌人的战车、步兵作殊死的战斗，消灭敌人于我阵地前。也是在这时候，我们的轻重迫击炮连和机枪连，要不失时机地向威胁我方最大之敌猛烈攻击，彻底把敌人消灭掉……”

他讲得很仔细，很真切，不像在预测敌情和部署我军的兵力，而是在真正指挥一场战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会使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他认为，指挥员就应该这样。

末了，他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掌握在他手里作机动用的 9 连、10 连做出去，放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去摔打。

9 连、10 连两位连长举目望着金营长，那意思是：哪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呢？

金用手指向地图上的两个圆圈：回龙庙、大瓦窑……

永定河里，一只鱼儿钻出水面；转瞬，又沉入了水底。

挂果的 7 月。

棵棵蒲公英很像一队队女孩在寻找回家的路。

四十

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必须提到他：斯诺。

在中国，许多人都熟悉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少人都知道他在中国的一段传奇经历。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西行漫记》。国人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斯诺；世界通过斯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毛泽东、周恩来……

但是，许多人并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事：

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斯诺在北平写完了《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章；在卢沟桥变变的第二天，即 7 月 8 日清晨，他就出现在宛平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7 月 7 日一夜，斯诺都没有人睡。

从北平西南方向响起的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到燕京大学南门外他的住所里。

斯诺向街坊邻里打听出了什么事，人们告诉他，日本人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还要攻占北平。

他的心一紧，心儿便飞到了打炮的地方。

8日天刚蒙蒙亮，斯诺就驱车赶到宛平前线去观察，采访。对于斯诺这样神奇的作风，绝不能仅仅用“记者的新闻敏感”去解释。

也许读者还记着，8日凌晨，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经过。与会的大多数是日本记者，斯诺以美国驻华记者的身分电参加了会。今井武夫讲完话以后，斯诺的脑子里挽了许多疑问的疙瘩，他便质问今井：“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地上演习？你们是否真的有士兵失踪？”“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武力？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而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今井武夫哪里敢正面回答斯诺这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质问，只能用“无可奉告”这种外交辞令去敷衍。

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新闻发布会，怎能搪塞像卢沟桥事变这样引起世界公众注目的大事？斯诺知道作为一个真实反映中国情况的记者的责任，他于会后继续到前线去调查、采访，凭借自己的眼、耳、嘴，更重要的是心去发现，去感受。他亲眼看到日本兵占领了卢沟桥车站，他亲耳听到了日军向中国守军猛烈开火的枪声。这就是中国八年抗战的开端，斯诺完全以一个亲身经历人的身分取得了发言权。

无疑，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中国军民在日寇面前表现的英勇、善战，冲击着这位外国记者的心，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他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由开始的“中立者”、“旁观者”，变为后来的：“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住所很快成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

是的，那时斯诺的家经常成为中国抗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避难所；

有些进步的知名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日寇的搜捕、迫害，就住在斯诺的家里；

他帮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到山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他还同意东北流亡到北平的抗日爱国者在他的家里秘密设置了一部短波无线电台；

他的家中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着中国人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宝石、钻石、翡翠、玉器等宝物。

善良的斯诺几乎每天都要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而操劳，奔忙。

这就是一个目睹了卢沟桥前线日寇暴行、并当面质问这些侵略者为什么不从中国土地上撤走的外国记者的当时的所做所为。

他，记下了清水节郎像疯了似的冲向回龙庙的凶相。

记下了申仲明排氏倒在日寇枪声里时那一瞬间的怒喊。

记下了何基津指挥大刀队夺回铁路桥的雄壮场面……

岁月会风化著文。

历史会斑驳记忆。

斯诺，还有那本《西行漫记》，永远沉默不语地站在历史的堤坝上。

四十一

这日下午，牟田口联队长亲临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

这时，从事皇岛赶回北平的河边正三旅团长也来到丰台督战。

斯诺仍在宛平前线，他会捕捉到这些吗？

牟田口在他的阵地走了一圈，观察到了一些问题。他感到把第三大队分割成在永定河东、西两岸，兵少力单，颇为危险。他便重新部署兵力，做了如下调整：

第三大队在傍晚前全部转移到回龙庙以东的大瓦窑地区。

与此同时，调第一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

阿边坐镇丰台，他是总指挥。

牟田口和河边在合谋走一步棋：9日拂晓前攻击宛平城。190

四十二

回龙庙和铁路桥被中国军队夺回的消息传到了大枣园河边的临时指挥所。

他稍稍一震，之后，仍然很镇静的样子。

9日拂晓前的行动计划不变。

河边这样悦。他嘴里分明咬着狰狞二字。

远方田埂上一头猪的影子和他溶为一体……

四十三

北平。秦德纯的私邪。

今井武夫正和秦德纯会商。不是谈判，谈判不会在家里进行，也没有这种轻松的气氛。

赵登禹师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荣允也在座。会商取得了一个原则上的意见：不扩大事态。但是，没有具体解决的办法。

夜。一只不知什么动物掉进水田里，溅起蛙声一片。之后，就是静，长时间的、子弹也射不透的寂静。大瓦窑地区更是像死僵了一样的寂静。

河边正三，还有牟田口，以及所有的日军都在等待9日的拂晓——那时，他们早已部署好的援军便会赶到。

第三章

蒋家智囊团上了庐山 通州变成孤岛·牟田口三次派人进城送信 日军炮击专署办公房 大刀队再次显神威 金营长负伤 一个日军伤兵的归宿 坟滩上躺着一木清直的尸体 宋哲元的治军之道 谢团长有一个连的“庄稼兵” 王冷斋舌战樱井 深夜，一位老者为石狮祈祷 伺基津的烦恼 张自忠怒斥今井武夫 事变时宋哲元回到了老家 日本政府通过派兵中国的决议 山本五十六的“黑匣子”。

—

从云缝射来的阳光，把庐山烤成了火炉子。

往日那清凉似泉的浓荫躲在哪朵云层？

这个夏天，庐山真熬人。蒋介石感受到的是火的热力，光的残酷。

这完全是心态变化后，产生的畸形感觉。

蒋介石这些天来所有的烦躁和失态一概源于卢沟桥的枪真的，直到现在他还希望这次枪声只不过是冲突而已。坐下来谈一谈，双方都做些让步，握手言和。尽管通报前线紧张战局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送到他的手中，而且他每份都必须认真过目，但是这种求和的幻想始终没有破灭。他确实希望这恼人的冲突会变成泡影。枪声过后，一切都平平静静犹如他希望的那样。

蒋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日军不容他心想事成。卢沟桥前线的军民也不会答应他屈辱求和……

这时候，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个人：周恩来。

那是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事。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下被释放了，碍于面子，放不下总裁的架子，他当然不会把感谢之情写在脸上，但他不能不记着共产党人的这次“救命”之恩。在双十二协定签订以后，也许是出于真心，也许是为了转移话题，他就中国形势的发展动向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只给他回答了六个字：“战争迫在眉睫”。实话说，对于周恩来的这个推断他有点不以为然。战争的威胁存在，这一点他什么时候都承认，可要用“迫在眉睫”来形容，他真不敢恭维。不过，周恩来的才华和见识使蒋又不得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绝对不可忽视的位置上。要不，后来他就不会把他的智囊人物集中起来，就中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的对策问题进行商讨，周恩来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警告使他揣上了一个心事，现在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商讨会在庐山的别墅区举行，时间在卢沟桥响起枪声的前几天。被蒋请上山的入有汪精卫、张群、孔祥熙，全是决定政策的头面人物。开门见山，蒋让大家先讲话，他说：“我们面前的这个日本帝国已经使我们好久无法安静下来做我们自己的事了，到底该怎么办，请诸位发表高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你们的意见我都会好好考虑的。”

委员长很诚恳，大家也就谈得了必拘束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汪精卫，他说：“日本是只老虎。这不是我的发明，国人和洋人都这样形容过它的凶残，这确实是个事实，连英美各国都对

日本惧怕三分。如果我们冒险用兵则孤立无援，那是明摆着的去打死仗。”

他不再往下说了，点烟，大口地吸起来。蒋介石的眼睛一直盯着汪，看不出是鼓励他继续讲下去还是腻歪他说出这种灭国人威风的话。有一点汪很清楚，蒋最反感别人讲半句话就打住，所以，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全部抖搂出来：

“以兄弟之见，在当前形势下，力主镇静，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意气，置国家千万劫不复之地。”

蒋双目闭合了一下，没吭声。

张群站起来，给与会者点点头，又坐下。他开始发言：

“我始终有一个不改变的看法，我们今天国策的基本精神，在于消弥战祸。舍此，我们只能把自己推入火坑。日本如果进 194 攻，中国必败。因此，仗是万万打不得的。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日本，而在延安。”

说到这里，他斜目扫视各位，扫至蒋时他的目光特别多停留了一会儿。他看出来，总裁对他的发言有兴趣，便暗暗生喜，又慷慨激昂他讲了下去：

“下面这个现实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心向背，目前举国一致要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战争是困难的。我想，既然延安方面胆大妄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也势在必行，那么我们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就让日本同延安打吧。无论谁打败，对我们毫无损伤，这是上上之策。”

蒋介石咳嗽了一声。这是他对某件事满意的习惯表示。

该孔祥熙发言了。蒋介石就请来了三个人，已经有两人表了态，这样，孔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三个发言人。

孔不同意汪精卫和张群关于美国惧怕日本的说法。他顺手从文件夹里取出一摞材料，从中列举了许多数字和事例，一在说明美国之强大，二在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他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美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

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插语：“那你就耐心等着好朋友的援助吧，等中国被日本灭亡了，也许它会发表一个空头宣言，谴责几句，声援几句，不痛不痒，如此而已。”

孔祥熙不理睬张群的干扰，接着说：“倒是日本会惧怕美国的存在，它才不敢轻举妄动呢……”

这时，张群打断了孔的话，还想说什么，被蒋介石制止了：

“我不是说了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在对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这是难免的。我不强求一致，你们也没有必要争个水落石出。不急，咱们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下次接着再议。”

第二次商讨会在两天后举行。不知何故，蒋介石的神情有些急不可待，他对与会者说：

“上一回大家都谈得很好，我很感激。今天咱们再凑在一起谈谈，已经发表过的意见我看就不重复了，我想多一些新的主意。”

他明明是下不是逐客令的逐客令。与会者都很知趣，发言便变得简短、明了。

孔祥熙上次似乎没有把话说完，或者说对自己的主张表达得不十分

清楚。这次他直截了当地抛出了一个主张：“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

大概没有人不认为这是谬论。

孔祥熙却显得很自信，平静，他对自己的主张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要引诱日本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袖手旁观，这样，了不起是参加战争。”

依旧无人理睬孔的发言。蒋一直双目紧闭着，似在沉思。

张群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十四字方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

蒋没有听得太懂，问道：“岳军，你好像说的是和尚庙里求签。请你讲得详细些好吗？”

明白了，蒋介石一是没有太听懂，二是对这个十四字方针感兴趣。这，从他的表情和口气里可以看出。张群来了情绪，兴致勃勃地说了下去：

“什么叫‘和必乱’呢？就是说，假如我们自己不抗战，还反对延安打日本，也不允许老百姓收复失地。这样，我们的处境必然很不利，即使东京不再大举进攻，而我们内部也会发生哗变。这个变化，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利的。大家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局势僵着，中日之间没有战争，但延安方面必定扬言抗战，到那时候老百姓拥护延安无疑，中国还不大乱吗？”

蒋问：“那什么是‘战必败’呢？”

张答：“这句话不是兄弟我的意思，是总裁您的高瞻远瞩。”

“我想再听听你是如何理解和发挥的。”

“如果我们同日本打仗，我们输定了，必败无疑。三口亡国论，七日亡国论，这是不容置疑的名言。”

“是的，我曾经讲过类似‘战必败’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对于‘必败’两字我有了新的认识，应该说败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未必就是非败不可。这是我要纠正的，纠正我的话，也是纠正你的话。”

张群对蒋介石的话未置可否，他接着住下讲：

“兄弟讲的第三句话叫‘败而言和’。这四个字如何讲呢，简言之，就是先打后和，或者叫败中求和。我的意思是说，目前我们不能同日本和谈，若要和谈不但会引起国际间的诧异，而且会遭到延安和全国民众的反对。延安的共匪会推波助澜地向全国民众嚷嚷：大家来看啊，蒋介石还没打就被日本人吓破了胆，讲和了。如果我们第一步不去讲和，而是同日本打过一仗之后，吃了亏，遭到惨败，这时再同日本讲和，那谁也就无话可说了，认输了，认错了。全国民众到那时候就会明白过来，而且会连连说：“还是蒋先生有远见，没有下决心同日本较量，否则亡国灭种不堪设想。”

汪精卫听得入神，他这时风助火威似的插话说：“我同意张兄的意思。我还是那句话，英美都对日本惧怕三分，我们算什么？和日本较量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张群有了“同盟军”，讲得更加眉飞色舞了：

“我的最后一句话叫‘和而后安’。这是十四字真言中至关重要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日本打过几仗了，我们败了，和谈也成功了。”

到那时候，日本就再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了。好！主张收复失地、全面抗战的共产党，就可以被我们收拾了。共产党一解决，国家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蒋介石得到这个“十四字真言”后，心里异常高兴，真得感谢这个张群，好主意！好主意！

眼下，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日军完全是一副不获全胜誓不收兵的势头，根本不容你“败而言和”。“十四字真言”明明不灵了。蒋介石看出来，张群也罢，汪精卫也罢，都无法解救他眼前的困境。倒使他难忘的是半年前周恩来留下的那句刻骨铭心印象的话：“战争迫在眉睫。”如果早听了这警告似的提醒，他蒋某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面对日军的突然进攻而无所适从有人形容，卢沟桥响起枪声后，蒋介石像走钢丝，不走不行，走也不行，快了不行，放慢也不行……

二

从8日清晨开始，平津公路线上的咽喉，宛平专署所辖的通州就出现了人满为患、车满为患的灾难。道路窄了，短了。房屋矮了，小了。整个县城给人一个超负荷容纳人流、车潮的感觉，仿佛马上就会爆炸。

连日来时停时雨的阴雨，把满世界都漫成了水泽，让通州县城成了水中的一个小岛。这里滞留着日军的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部队。他们是从四面八方调遣来增援卢沟桥前线的日本军队，堵在这里已经一天一夜了。

通州因梗塞而瘫痪。

瘫痪使通州变得更加梗塞。

县城随着滴滴嗒嗒的雨滴声还在继续膨胀、扩张，它实在难以接受这种超过本身承受能力数倍的拥挤、浮躁和呐喊，于是，便溢了出来：

汽车像方向盘失灵似的飘出了公路，歪歪斜斜地栽满了路边；

人像没有了轡头似的奔马顺其自然的走进了每条深深的小巷甚至居民的院里；

小城的居民们则一家人或者数家人集中起来紧紧地蜷缩在一间祖辈传下来的黑房里，不敢迈出门坎半步，屏住呼吸大气不出，胆怯地好像在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通州可着嗓门嘶喊了一个白天，当夜色降落之后，突然变得静悄悄的。抽掉了血气一样的静悄悄，死一样的静悄悄，爆炸前的静悄悄……

唯有悠悠长长的雨声敲打着满城湿漉漉的军人、军车。

通州瘫痪在阵地前沿的战壕里。

如果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此刻在自己的客厅里团团转的河边正三，显然是把他看得太渺小了。他是一头掉进枯井里的老牛，怒吼着、挣扎着要跳出这口把他即将吞没的井。他确实还不曾这样暴躁过，像吃了火药似的，只见他跺跺脚，用掌心一击桌子，开始骂娘。老牛在井中东一撞，西一碰，却硬是找不到出口在哪里。他又是一击桌子，大骂：

“娘的，八格牙鲁！为什么不让我死了呢！”

人往往在悲观至极时都说些反话，浑话。其实，河边正三哪儿想死呢？他要堂堂正正地昂首挺胸地活着，还要千方百计地把瘫在通州的增

援部队抢救出来。他不能没有这些部队！他的帝国不能没有这些军队！为了这些在他眼里的“命根子”，他穿针引线，上窜下跳，几经周折才把它们从各地“引”到华北，眼看就到卢沟桥了，马上要加入到大进攻的“战争交响曲”中去。谁料，出了这场意外的麻烦。

通州！通州！

应该诅咒的通州。

河边正三的手终于伸向门把，他仅仅犹豫几秒钟，就拧开门。一阵风雨迎面扑了进来，他又紧紧关上了门。

外面是他去不得的世界。

他又喘喘地在屋里跳审起来，只是无一句话，那两撇胡子要飞起来似地翘动着……

牟田口就站在河边的一旁，他一直没有吭声。这时他把一块手绢递过去，让河边沾去额头上的汗水。

天气闷热，经不住折腾。他满脑门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

河边扔掉了凝聚着腥汗味的手绢。

他需要爽心的凉风。

他不能不心焦。第一枪已在7日夜间打响，如果大规模的进攻不在8日，最晚9日紧紧跟上，这不等于给中国军队留下了宽宽裕裕的反扑时间吗？

反扑！中国的反扑将会比我们的进攻疯狂千百倍。河边确信自己的这个推断是不会错的。

急！告急！

增援的部队向通州告急！

通州向卢沟桥前线告急！

卢沟桥向河边告急！

……

在经过一阵像无头苍蝇似地乱飞乱撞之后，河边反而变得冷静下来了。他往雕花太师椅上一坐，招招手让牟田口来到自己跟前，说：

“中国人爱说一句话，叫做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现在我们只有向他们学习了，唱一支拖延时间的歌了。”

“拖延？哦，我明白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多部队在通州受阻，我总不能把他们都背到卢沟桥来吧！”

就这样，河边和牟田口商定，推迟了进攻宛平城的时间。

当然，他们不会叫“推迟”，那样有辱于一个指挥已的名声。河边的说法很坦然，且洋洋自得。他说：

“就这么定了，我们把攻城的时间选择在9日拂晓。”

河边抛出这个决定时才是8日的下午。簏面细雨下得正紧。

绵绵雨丝拉长了河边的心思，也拉长了8日午后到9日拂晓这段距离。

河边望着阴沉沉的天空，直犯愁：怎么打发这段漫长的时间呢？

的确漫长。战场上，特别是在战壕里，哪怕等待半分钟也是煎心的悠长，难熬……

河边感叹：

我要拐杖！

三

真的感谢人类祖先早就创造了谈判这种胜了可以要挟对方，输了可以乞求对方，两军相持胜败难料时，可以稳住对方，在战场上可以缓解争端的行之有效的妙方。眼下，河边和牟田口玩的就是这一套魔方：谈判。

他们认准了：在谈判中可以赢得难得的也是神圣的时间。

于是，牟田口再次派人送信。好像生怕送信人把信送到月球上去似的，他再三叮嘱说：是宛干城。不要过卢沟桥，回龙庙旁边就是。记住了吗？宛平城。

宛平城东门紧紧封闭。

送信人只得绕道来到西门。因为他有车田口的“手谕”，又是给王专员送信，守门的卫兵很客气地放他进城。

这是一封很简练、明了的信，就写了一行字：“请王专员或金营长出城谈判。”

“出城谈判？”

鬼子真他娘的会玩花样。谈判桌这方寸天地竟玩出这多名堂，一会儿进城协商，一会儿出城谈判，尽是花花肠子！双方组成的谈判小组刚刚在城里以不欢而散结束了一次会晤。该说的都说了，想说的又不让说，现在有什么必要出城谈判？

王冷斋看罢信，不屑一顾地将信往桌面一撇，冷淡地说：“我们没有时间陪敌人玩花招。”

金振中拒绝得更坚定：“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守卫国家领土的重任是不许一个指挥员擅自离开职守的。”

河边还在等待着回信。

秒针的每一次跃动对他都显得那么沉重而漫长。他的正常感觉已经没有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得像河里的小鲤鱼一样使人无法抓住它。按他的想法世界最好是攥在他手心里的一种玩物。此刻他下一道命令，让时间停止运行，直到他们的援军赶到卢沟桥为止。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公正的时间老人连一个惜时如金的善良人都不会偏爱，更何况对一个杀人如削泥的刽子手。

河边泥胎一般坐着，他确实有山穷水尽的感觉，该使出的花花点子全使出来了。

“你不赐舍我，我就拖住你！”

他的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现在的人们看过京剧《红灯记》的总不少吧，会记得鸠山说话时的神情的。河边就是那个样儿。

他不信没有办法治中国军队。河边还有什么事能被难住吗？笑话！

又来了，牟田口第三次派人到宛平城来送信。严格地说。这不是信，是声色俱厉的最后通牒：

一、限于当天（指8日——作者注）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也撤退至河东。逾时日军即实行以大炮轰城：

二、通知城内民众迁出；

三、城内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等，请令其出城。

王冷斋看完信，冷笑一声了之。

送信人有几分奇怪，问他冷笑的哪般。是的，他总不能带着这在他看来不明不白的笑回去见主人呀。

王冷斋很直率地告诉这位“使者”：你们放明白点，这是在中国，侵略者有什么资格以“老太爷”的口气发号施令？

送信人对这样的回答仍不满足，要王冷斋对他们信中的三条意见作具体答复。王便逐一驳了那三条：

“请你转告牟田口，第一，本人是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事，不便回答他；第二，对于城内的民众，我们自有处理办法，不必贵国劳驾顾虑；第三，至于樱井等人我方早就令其出城，是他们愿留在城内商谈，还声明要尽自己努力使事情得以解决。这是他们一番好心，我们怎好赶其出城？就这些。请你回报你的主人。”

送信人走了，他没有走西门，偏要从东门闯出去。急于见到主人的心情使他忘了东门是禁止通行的。

王冷斋的答复并不会使河边、牟田口们感到意外和失望。从某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结果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切努力纠缠不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吗？中方越不按他们的意见办，才越使局面显得五彩缤纷和零乱，乱中好搅和，乱中能够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

牟田口的脸上是一种说得意不全是得意、说失意不全是失意的复杂的、令人难以琢磨的表情。他对送信人说：

“拿酒来！”

他在亢奋的时候总要喝酒……

对于牟田口的表情以及表演，王冷斋当然是不会看到的。但是，他有一种预感：

日军即将进行的报复是加倍的残忍、疯狂。绝对会如此。

王冷斋做出决定：城内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律搬走，到民房里去办公。

从政府的办公地方到老百姓的住家，顶多也就几十米远。就这目光可及的几步路却一下子把敌人推到了遥远的彼岸，本来清晰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本来唾手可得的事情变得难以下手。日军不会因此就善罢甘休。他们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侥幸经验：胜利往往出现在坚持一下的挣扎之中。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

牟田口的第三封信遭到拒绝后，日军对宛平城的炮轰便随之开始。这是他们早就定下来的对策。

王冷斋的努力不可能付之东流。

果然，专员公署办公厅的房子首当其冲地成为敌人炮击的头号目标。好些人包括王冷斋在内都看到了，那炮弹打得很准，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第一发就击中了，接着，日军的数炮齐发，猛轰一阵，专署的房子被炸得东倒西歪，变为一片废墟。

只因王冷斋早走了一步棋，才使日军的愿望变力泡影。

这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成为许多人探索的一个谜：日军的第一炮为什么就击中了专署的办公房子？

谜往往是神秘的。因其神秘也就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揭开这个谜的迁是当年的当事人冷斋和洪大中，事过几十年后，他们在各自写的回忆卢沟桥战斗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宛平专署成立时发生的一件事。这种事将人们引出了五里雾——

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是第一个来专署表示“祝贺”的外国人；接着，日本驻丰台的宪兵队长和日本在丰台的警察署长都相继前来“祝贺”。按说，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还算不得紧张，甚至可以用“友好”二字来形容。专署成立，日方派人来“祝贺”，下奇怪。问题是一木的行动令人生疑，他原来外出都是骑一匹高头大马，谁都知道他的专人坐骑是从不离身的。可是这次从丰台到宛平城五里之遥的路，他却出入意外地徒步而来。怪？

好些中国人当时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这闷葫芦里装的是鸡还是狗。不过，人们对此事也没有过多的去深究。吹了一阵风，也就过去了。

读了王、洪二位的回忆录后，许多了解当年日军第一炮击中宛平专署大厅的人，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们马上想起了一木清直下马步行的那个镜头，原来这个日军大队长在步以当尺、测试距离呢！

可是：我们太善良，也太迟钝，没有一木清直那样的“远见”——他在发动“七七事变”的半年之前，就开始测试“炮距”了。

四

日军以首击专员公署为信号的这场战斗打得十分凶狠，虽然前后不足半个小时，这是三封信未换来如意企愿的惩罚，这是帝国主义强盗积蓄了半年之久的险恶阴谋的总发泄，他们把刻骨的仇恨集中在第一发瞄准专署大厅的炮弹上，更集中在随后发射的每一发炮弹上。他们要摧垮世间所有令他们仇视的障碍。

宛平城浸淹在枪声、硝烟以及瓢泼大雨交夹的战争交响曲里。

中国守军的反击相当顽强、英勇。同样，他们有扫平一切害人虫的气概。

守城的官兵这样说：

“至死也不退让一寸国土！”

在城外配合作战的指战员说：

“只要我在，就咬住敌人不放！”

他们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情况下，在敌人的炮口前顽强地支撑着，守卫着已经冒起了浓烈硝烟的卢沟桥的每寸热土。

一个士兵被飞弹击中，左胳膊负伤，鲜血如注。他从衣服的前襟撕下一块布条，牙咬着布头，用另一只尚好的手迅速地扎绑好伤口，又要去冲锋。战友们大声喊着让他下去，他头也没回就冲上去了。

一行血迹播进土地的深处。

又一个士兵负伤了。他肯定是重伤，躺在地上好久未动。这时另一个战士猫着腰冲上去，背起他一滚，滑到了旁边的战壕里。

刚才战士倒下的地方落下一片密集的子弹，串起一股烟尘我军不断减员的情景使日军受到鼓舞，他们洋洋得意，用以多胜少的、盛气凌人的凶劲和气势压境而来。敌人的9辆坦克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气势汹汹、横冲直撞地开了过来。看样子他们下决心要冲破29军的防线，企图

一举占领宛平城。这杀气夺人的坦克，丝毫也没有使中国士兵有退缩的意思。

最数 12 连的战斗激烈。

敌人越不过他们的枪口。

战士们凭着手中的步枪。手榴弹，猛冲猛打，疾风卷落叶般地堵住了坦克掩护下的日军。并很快把他们断成一截一截的小块。随后分而治之。

从整体看，无论就武器装备和兵力而言，日军均占优势。但是，一旦把它们切成块分段包剿，中国守军就变成以多吃少，胜券在握了。

这是金营长拿手的“快刀斩乱麻，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 12 连像一把利剑斩得敌人大伤元气的时候，金营长抓住这有利战机，命令两个轻重迫击炮连，集中人力消灭敌人的坦克和密集的队伍。他自己率领 9、10 连的主力，从 12 连右翼插上去，攻击日军左侧背。刚刚被打得骨髓流了油的敌人，这阵子又被不知不觉地抽掉了左肋骨。

这叫什么战术呢？金营长说：“不是我的发明，别人早总结出来了，叫‘攻其不意，打其不备’。”

敌人的两肋突然插进了一把刀锋，先是晕头转向下分南北。很快，他们便大梦初醒。反击，狠狠地反击突然而来的中国军队。

反击？

一是晚了，二是不灵了。

不是吗？他们的大炮和机枪，还有步枪，对已经站在他们眼皮底下的中国军队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杀伤力。任何一发干弹换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与对方同归于尽。

这就逼着双方必须进行肉搏战，枪口对枪口，刺刀对刺刀。

刺刀见红，日军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势力会遭到如此强硬的反抗，不客气他说，他们本想一路顺风地冲进宛下城，把这座碉堡似的小城变成自己指挥千军万马的点将台。现在。一切梦幻都破灭了，只得调转头来去打击骚扰自己的神兵一般的中国守军。进攻，他们是有取胜的把握：防御，他们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位哲人讲过，只想着打胜仗的军队是很难取胜的。这句话让你思考一百遍都不觉得枯燥。它发人深醒，很富有哲理性。日军现在尝到的是自己酿造的苦果。

河边正三们只得收起了求胜心切的锋芒。下一道命令：退。边退边打。

没那么容易。想打就打，打下赢就退，天下的便宜都成你的了？

堵住它！

何基淬旅长也下了命令。

西苑驻军很快就开到了八宝山、衙门口一带，准备截断日军的后路。河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何基淬太神了”。

进，没有成功；退，又没有退路。

河边从雕花大师椅上站起来，问他的部属：

“你们告诉我，是准给何基淬走漏了消息？”

没有人吭声。实在大冤了，他们对河边忠实得几乎连自己的脑袋都变得名存实亡了，河边想的一切问题就是他们想的一切。何谈走漏消息？

河边在为难了一阵子后，还是下了一道死命令：撤退！千方百计地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退到营地！

好容易日军损兵折将退回到出发时的地方。

浓重的夜幕宠着北干，笼罩着宛平城。

枪声、炮声，渐渐地稀落下去。弹丸疲惫了，也该休息了。一片死寂。

河边没有睡，应该说这时候他是最没有睡意了，当然不会是亢奋了。一支竹箫横在他这间如梦的屋里。

他很动情于吹箫。此刻却连望它一眼的兴趣也没有了。他往床上一躺，双腿叉开，瘫了下去。

很静。

这是疯狂之后换来的宁静。

日军的阵地上整个是一片刺不透的寂静。

这是战前的静。时间已经跨到了9日的临界线。

五

这个夜晚，在卢沟桥前线中国军队的营地L，恐怕要数吉星文团队组成的这支青年突击队士气最旺盛了。

这是又一支出现在宛平城里的大刀队。

战士们一个个像出山的小老虎，堆积如山的请战书使宛平城都显得很臃肿。

强盗放了火、杀了人想溜号，没门。

官兵们一直要求：追出城去，打击鬼子。

几个没有被批准加入大刀队的战士竟然哭天抹泪他说：再不让我杀敌，我就要疯了！

任何人的请战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上面没有命令，团长、营长、连长没有这个胆量去批准大家追杀敌人。

于是，官兵们自作主张自行办事，他们开始爬墙了吊起绳梯爬出城；绳梯少，有的“贼大胆”等不得了，便飞身跃下了城。

城下是一片高粱地。7月时节，没人高的青苗是绝好的隐身地。

队伍在青纱帐里行进。

一片哗啦哗啦的碰响声。

雨点砸在高粱上的声音和青年突击队员们摇响高粱叶子的声音搅在了一起。

只听见响声却看不见队伍。

战士们沿着永定河，向敌人的营地靠近。

旋风从高粱地里扫过。

雨，哗哗地急下……

队伍急速地前进……

突击队悄下声地走进了敌营。敌人并没有睡觉，但是我们的战士是能工巧匠，利用这雨声，还有密密的高粱林，给清醒的敌人制造了一种梦境，当然，日军不可能没有发现敌人摸了进来。只是等明白过来后，

已经晚了，中国军队两面夹击地把他们结结实实地包围了。

“有入！糟糕，敌人！”悟懂的哨兵终于恐慌地叫喊起来。

“老子让你他妈的喊……”一个战士粗鲁地骂了一句，上去就捅了那哨兵一刀。呜呼，哨兵见上帝去了！

敌营大乱。

中国军队继续谱写着“大刀曲”。

一柄柄刀锋闪着复仇的寒光，卷着呼呼的疾风，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叫声刺耳，鲜血飞溅。还没有成为刀下鬼的日军像谁喊了声口令一样纷纷丁跪求饶……

捅死日军哨兵的战士绝对可以称为英雄。后来，他手中的刺刀一连挑死了13个鬼子，还抓了一个后的。他提着这个活鬼子的衣领抖露几下，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鬼子听不懂，傻愣着，但是一看见那明晃晃的刺刀他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吓成了一摊烂泥，啥也说不出来，只是大哭不止。战士用刺刀在他背上一拍，说：“算你有福气，老子批准你做个俘虏！”

虚弱的假死并不等于失败。

这毕竟是一伙掌握着精良武器且有着“武上道精神”的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当他们走出梦境以后，立即会现出狰狞、凶残的原形，以百倍千倍的疯狂对付杀进他们营地的中国军队。很快，剩下的还没丧命的鬼子就拿起了武器，步枪、机枪、手榴弹甚至连小山炮，一齐开动。

我军死伤了一批官兵……

后来，一位有幸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大刀队的队员回忆起这场鲜血飞溅的肉搏战时，这样说：

那真是杀红了眼，我们的战士和日军都杀红了眼，刺刀挑弯了，枪筒烫得烙手。遍地都是尸体。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的刺刀上串了敌人的两个脑袋，他还不解恨，大声地说，我要创奇迹，再串它两个。许多战士当时都有这种心情，巴不得一刀砍下去把所有的鬼子都扫光。后来，敌军被打退了，战士们还追着去戮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追回来。他们是离弦的箭，开弓哪有回头箭？再打个比方，猎犬追赶兔子，那劲头恨不得跳到兔子的前面把兔子截住。

当时，中国的部队有这么一条规定：只能死守，不准进攻。鬼晓得哪来这么一条奇怪的规定？日军从日本本土都攻到中国的华北了，我们却不能对这些强盗进行反击，大不能让人理解了。好在我们的官兵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该杀就杀，该攻就攻。惩罚侵略者有什么罪？

回忆往事的老人像个纤夫，背负着石头一般的重压，给后来人讲过去。他脸上的每条深深的皱纹都沉淀着历史的痕迹。人们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从这沉重的重负下解脱出来。更相信他那经过磨难的、诚恳的脸是永远也不会凋谢的。

这次战斗日军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一个中队被砍杀在阵地上。

29军的突击队也伤亡了一大半。

河边的指挥所被战争烧去了一个角，满地是漏进来的雨水。他抬头望望天，乌云很低，像追歼敌人的队伍在走动。

河边没有任何自责自愧的表情。

六

每个人也许都有忘乎所以的时候。

卢沟桥前线 29 军的每一个连队几乎都在狂呼这次歼击敌人的胜利。这时，有人报告，还有一股溃逃的敌人正偷偷摸摸地走在一片高粱地的顶端。

立即，就有几个战士追了上去！

“不能让一个鬼子溜走！”

这是金振中营长的话。

在胜利后，中国军队有个疏忽，忘了清扫战场。

不以死为惧，但不能不以生为贵。

事情终于发生了——应该说这在意料之中：

那个受伤的日军隐匿在了青纱帐里。

金营长站在一处低洼地上，喊着：

“大家注意，谁也不许站着冲锋，一律匍匐前进！”

他刚说完这句话，从青纱帐里甩出了一颗手榴弹，在他的脚下开了花。他的左腿下肢被炸断。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又飞来一颗流弹，从他的左耳旁穿进去，又从右耳下穿出来。

那个躲在暗处的伤兵并不得意，严重的伤情折磨得他龇牙咧嘴，他用拳头砸着被雨水泡得像发面似的地。地上是他的血。

也许想到了死？他已经对得起河边正三了。

另一个暗处，中国一位士兵举枪瞄准着伤兵。

日本伤兵随着一声枪响，倒了下去。

金振中营长负了重伤。

他没有倒下，也不能倒下。这一个营的兵力靠他指挥，没有了指挥，便成了无首之尤，如何打仗？他用双手接着伤口处，下让血流出来。然后，他叫随从兵给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就带领着一个连队冲上去了。

随从兵追着他喊：“营长！营长！”

金营长的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还是冲上去了！

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吉星文团长几次劝主振中下来治疗，都未奏效。

吉团长急了，便带着几分火气，说：

“老金，这里还有我在嘛。你就放心地到医院去治疗，你的伤势不轻，耽误不得！”

金振中仍然表现得很任性，说。

“我不要紧的，等打完这一仗再去看医生。现在大家的战斗情绪正旺，你让我下了人线，我也无心治伤。”

吉团长不得不下了命令：

“你现在就去住院。治好伤是为厂更好地战斗，难道一个营长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吗？”

金振中不得不从人线上下来，几个战士把他送进了附近的长辛店车站，搭上火车送往保定医院去救治。

金营长负伤住院的消息很快就在北平传开，宛平城、北平市的各界

人士纷纷到医院看望、慰问；全国各地的慰问信、电也不断地发到卢沟桥前线，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专程来到了保定，赠送给金振中一枚“抗日先锋”的银盾。

金振中躺在病房里，四面是洁白、宁静的墙壁，他觉得自己被关进了囚牢里，心里万分焦急。伤势的疼痛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他最担心的是日军是否被全部歼灭，前线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心穿过白墙飞到了炮轰弹飞的火线上。他看到了战友们，他们当中有的躺在弹坑旁边，永远地睡着了……

护士进来给他输液，他忙挣扎着起来，说：“扶我下去走走，我要看看我的战友，他们都来了！”

护士惊愕地望着他好久，最后把他按倒在床上……

这已经是9日的上午了。

雨停，风息，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肺。被雨洗好些天的太阳显得格外的清新、灼热，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上，天空因了它而显得更加深远，纯净。新鲜的太阳照耀着弹痕累累的宛平城，照耀着挽着缕缕硝烟的卢沟桥。

夜幕降临。

枪声暂时地沉入了地下。

荒野，日军的夜哨人鬼难分。

有人敲门。

星星说：这是墓门，你走错了地方。

夜，很静。

还有人想打捞埋藏很深的收获，他颇费脑子的想了一遍又一遍。

谁？

一木清直。

七

一木清直有个习惯动作、也有句口头语——那是在他要做的事情眼看就没有希望成功的时候，他会陡然拍案而起：“八格牙鲁，老子就不相信会翻船！”

他绝对不是那种谁都可以把他捏扁的角色。天生不长翅膀，却总是想飞。飞多高，他并不在乎，反正要离开地面。这也叫一种精神吗？

一木清直正是靠这赢得了他周围上上下下的人们对他赞许的目光。

他很会挣扎，在挣扎中拓宽那立马就要断了的小路，去铺平那深得足以能把他栽进去的陷陝。也怪，绝路逢生。他竟然常常能在渺茫中升起一叶风帆。

因此，中国有一伙尾随他的汉奸，用很特别的语言评价他们这个主子，一木有福，他偏偏能使麻绳下从细处断。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日军大队长时时刻刻都把生命掂在手里。在远离岛国的中国为日本帝国卖命，就那么容易么？这儿的民愤是一片无边的人海，随时烧死每一个来犯者都是可能的。

那么，这一回呢？

宛平城没有拿下来，虽然专员公署轰了个稀巴烂，但毕竟没有达到

他们设计的目的。宛平仍然牢牢地掌握在 29 军的手里。

这是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的。是的，不能容忍！

一木清直的那股窝在心里的气又上来了，这气一冲上脑门就是力量，就是仇恨。他把他的部属们召来，吼着嗓子这样说：

“我们要下这个决心：4 个小时内，让宛平城和卢沟桥成为我们的。你要有这个决心，我要有这个决心，大家都抱定这个决心，我们才能将大帝国的旗子挂在宛平城楼上！”

从话里不难品出这位自信得几乎发狂的大队长，其实是很自卑的。狂到极处便是脆弱。

一木就这样向宛平城再次发起了进攻。他坐镇指挥所，发号施令的气度陡增三分。尽管外表看来镇静自若，但他的几位颇为知己的部属还是看出了大队长今日有点慌慌乱乱。那两撮仿佛贴在腮帮上的小胡子，即使在不讲话的时候也一动一翘的。不知为什么。

他的指挥从来很讲究，今天更是层次分明。战争的指挥是一门高超而复杂的艺术，并不是所有的肩膀上有个脑袋的人都能掌握的。这是一木的观点。

先是调动炮兵向宛平城。卢沟桥轰击。一卞那斩钉截铁式的手势，往日经常这么摆乎，但，这一次斩得更有力，截得更干脆。

狂轰滥炸长达 2 个小时。

紧接着，一木实施他作战方案的第二步：数十辆战车掩护步兵向 29 军的阵地扑去。

“扑”，请注意这一个字。确实是扑去，铺天盖地地扑卷，饿狼扑羊似的贪婪！

那气势分明是要把眼前所有的障碍统统碾碎，压平。

然而，碰到了“钉子”。

早就做好回击敌人反扑准备的中国守军，这时集中了 4 个多连队的人力消灭敌人的战车和密集的队伍，强大的火力网把来势凶猛的敌人“定格”在一个地方，劈头盖脸地打。

这样的局面是一木清直绝对不能容忍的。他急了，疯了，几乎是从指挥所跑出来，站在一片坟滩上履行他的指挥职责。

他看到几个日军抱着脑袋往后跑，便喊道：“饭桶！给我往前冲！”

有一群中国守军冲了上来，他火急人燎地对他的部属吼叫道：“咬住敌人！一定咬住不放！”

他的嗓子嘶哑得喊不出声了，两只眼睛像两口火井，冒着的的逼人的凶光。

部属们都下敢看他，那是要吃人的一双眼睛呀！

一木清直伤心极了，他的指挥不灵了，他的部属总是冲不上来，而中国军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组织起的进攻压了回来，为什么 29 军的阵地变成了咬不动的“钢镚”？而他的队伍就像豆腐一样一碰就破？

他实在不理解。

一木急得在坟滩上乱跳乱窜。他先是踏上一个本来就不高的坟滩，嫌低；又蹦上另一个较高的坟滩，还是不够高。此刻，他真巴不得窜到云层上去看看整个战局。也许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把自己变成一枚重型炮弹，从空中投下，砸射在中国的阵地上——那个阵地是他的眼中钉呀！

一木在坟滩上疯了似地走来走去。突然，他感到中国守军的人力都集中到他身上了，他马上走下坟滩，这样会缩小目标。

此刻，一木只有一个心愿，走出坟地去！

可是，密集的人力网已经绞住厂他，使他失去了自由。

走不出去的坟滩地！

这是一片野坟滩。在村人们印象里，这里平时很少有人来过，只有那些野狗交媾时才到这里来活动。绝了人迹的坟地，因了这些狗们的放肆，益发增加了一种阴森森的气氛。

坟滩上坚硬的地面，留下了一木焦急而零乱脚印。

他挣扎着要冲出坟滩。谁料这次的挣扎却失败了，有一个魔影死死地拖着他，使他根本无法摆脱。

他一次又一次地下达了进击的命令，不是为了吃掉敌人，而是让他的部队把他救出坟滩地。可是，中国守军一次又一次把他的部队压了回去。

他还在挣扎……

这时，中国的军人已经冲进了坟地，他们喊着他的名字：

“一木清直，别藏了，快点站出来缴枪，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缴枪不杀！……”

就在这一瞬间，一木清直也许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大地一阵颤裂，地动山摇似的颤裂。他只感到晕晕昏昏的，好像被人牵着耳朵飘上大空，又像让谁拽着腿跌入了地层下。在经过了这么不知是上还是下的一番折腾之后，他便被一条小船运载着流向了遥远的地方……

灵魂之光渐渐地深入到地穴之中，闪了一下，便永远地灭坟滩上躺着一木清直的尸体。

八

毒花花的太阳照着一木清直的尸体。

他没戴帽子，脸色铁青，军衣被撕扯得索索拉拉，上面还有烧过留下的破洞。

带着血腥味的风漫过湿漉漉的、冒着焦臭味的田野。

29军的一队队士兵身背雪亮的大刀，守卫着经过浴血战斗才得以守住的卢沟桥阵地。

风，吹拂着尖利的刺刀。

风，擦拭着不眠的准星。

风，给战士们带来爽心的清凉。

风，把一首凡人刚刚在火线上写下的诗，送到每一个已经被枪声惊醒或还没有惊醒的同胞的耳畔：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日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
卢沟桥头的无理取闹。

如今已有 29 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听呀，杀敌的喊声起了，
健儿们的鲜血已洒在北国的荒郊！

不要迟疑，不要退，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前进吧，热血的男儿啊！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卢沟桥，怒吼吧！
我们抗战的时刻已经来到。

这首题为《怒吼吧，卢沟桥》的诗，作者叫流火。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位怒满胸膛，血气方刚的诗人。不，也许他是一位战士或普通老百姓。总之，已经没人知道他（她）是谁，以后也再没有见到他（她）有诗作发表。但是，这首诗直到今天还流传着。

流火的诗中有一句话：“如今已有 29 军的崛起”，这不是随意的点缀之言，而是作者在弹落如雨的卢沟桥前线目睹了抗日勇士的行动后的真实写照，打心底里抒发出来的肺腑之情。

是的，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火线上，29 军是站立在卢沟桥畔的一道铁墙，落在它身上密密麻麻的弹着点，向国人昭示着它的顽强，它的战绩。

29 军抗战的功绩不可灭！

说起 29 军抗战，就不能不提到这支军队的发迹史，不能不提到军长宋哲元……

这是一个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凄凄惨惨的小镜头——

深冬，中原大地上呼啸的寒风卷着雪粒漫过黄河。

宋哲元，正在黄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慌慌张张地赶着路，他。军衣不整，一身疲惫，跟在他身后的几名警卫兵似乎比他还要手脚无措。

溃军可悲。他们不知该到何处去躲藏。

后面一群追兵正闹闹嚷嚷地赶来。

这还是那个在西北军担任过北路军总司令、后来又升为西北军总司令的宋哲元吗、中原反蒋大战以西北军失败告终，宋哲元沦落为逃难人。

没遮没拦的河弯停放着两只小木船。

宋哲元好像遇到了救命符，不等船夫开口，他就跳上船，警卫兵相随之上。然后，他一挥手，对船夫说：

“过河。费用加倍。”

船夫啥也没说，划起双桨，船便颠簸着驶向对岸……

过了黄河就是反蒋势力的最后一块阵地：山西。他盼望那儿是安全港。

阎锡山会接纳他的。

此时是 1930 年 11 月。

这一年的年梢，冯玉祥将军率领的 30 万西北军加盟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前，联合军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当时宋哲元任第 4 路军总指挥。

1931 年 6 月，蒋介石下令将残余的西北军编为一个军。

当时的阵容为。

军长：宋哲元。

副军长：刘汝明、吕秀文

总参议；秦德纯

参谋长：张维藩

第 37 师师长：冯治安

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

这个军就是后来按全国陆军统一编号排下来的第 29 军。军部驻扎在山西运城。

从此，西北军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但是，冯玉祥还在，他培植的军风，播下的种子还在。

长城激战中，宋哲元亲自督战。他挥笔写下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条手谕。传令全军，军心大振。

宋哲元固然继承了西北军严明治军的传统，但是他对指战员们更多的是注入了守旧思想和南京中央的政治色彩。走进 29 军军营的各个部队，最惹人上眼的是一幅横匾，它 1 米宽、2 尺高，十分的精美、别致。横匾当中印制着三张画像，每张像均配有对联。

中间为孔子像。题字：“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对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右边是孙中山像。题字：“革命导师孙总理”。对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左边是蒋介石像。题字：“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对联是：“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

这条横匾从像片的选择到题字、对联的审定，从设计到制作，均是按宋哲元的意图审定。“恢复旧道德”，对联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治军的一条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固执地提倡尊崇孔孟。治军、从政和为人处事概莫能外。宋哲元是从孔子的故乡齐鲁大地长大的，家庭以及社会的熏陶都使他把孔子视为圣贤，22 岁以前，他已经精读熟背不少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和《左传》。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四维下张，国必下强。读经可以明理，明理方能救国。

这样一个儒生军长，能下用儒家思想制的他的部队吗？

29 军官兵都要熟读经书，每逢周三、六晚他们邀请名儒来军营讲授经书，营以上干部军官必须到堂听课。战乱年间，部队频繁流动甚至移房，这个讲授经书的制度也未废除，军部编译了四书五经的解说，印制成袖珍本，人手一册，随身带着；军部还编写了《八德军歌》，每日令士兵咏唱。士兵有了过错，必诵唱《悔改歌》：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尊孔读经是为了爱国尽忠。没有民族气节的军队何谈战斗力？

29军的士兵在就餐前还要唱《吃饭歌》，歌中唱道：“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力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他们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更是别具一格。国耻定为日本进攻中国的这一天。所有部队都要咏唱他们自行创作的《国耻歌》；食堂里在这天做馒头时上面印着“勿忘国耻”的字样，让官兵们将食物与字一并吃下，以示刻骨铭心。有时还要下令大家禁食一天，静卧反省，以期部属知耻而后勇。在一些营团连出现过这样纪念“国耻”的办法：买来几头猪，贴上写着“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的标签，由各连选出一名代表端起刺刀向猪刺杀，哪个连队的代表将猪刺死了，就抬走猪去吃。

每日朝会时节，带兵的军官必须与士兵有这样的对话：

“东三省是哪一国的地方？”

“我们中国的！”

“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十分痛恨！”

“我们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我们早就惊醒了，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这种种“爱国”“爱民”的教育，在士兵心里深深埋下了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也是29军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的精神支柱。

毫无疑问，垂青军史的长城线上喜峰口之战、罗文峪鏖兵是29军抗击日寇的得意之作，整个长城抗战中，他们歼敌三、四千人，击毙日军大佐级指挥官2人；当然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5000余官兵伤亡。一时间，宋哲元及29军诸将领成了全国人民称颂的抗日英雄。日军则对宋哲元怀恨在心，1935年日本参谋部所编之《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宣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历次战役战胜，攻胜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

下面发生的事情是宋哲元，也是全国人民没有料到的：29军将士们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被“塘沽协定”出卖了，宋哲元接到了调令：“29军调离长城喜峰口，暂驻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玉田、宝坻、香河一带待命返察。战士们得知此讯后，痛哭流涕，宋哲元也十分气愤，但是作为军人，他必须服从。他在宣布调令时，以很复杂的心情对大家说：“我们以30万大军，不能抗拒5万敌人，真奇耻大辱，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所可告者，仍本一往精神，拼命到底而已。”

说到宁哲无将军，还有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是在喜峰口战役时，大刀敢死队临战前，宋哲元去作动员，他要求队员要抱有必死的决心方可参加战斗。他的话刚一说完，侯万山老班长站出队列，向军长陈述说：“我妻子在家中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侯某在此次战斗中如有下侧，望军长多加照顾。…宋将军听了，不由得心头一酸，他满口答应了侯班长的要求。在后来的抢占喜峰口战斗中、侯班长表现得异常勇敢，哪儿有硬仗他总是在哪里露脸。为了掩护司务长送饭，他被敌弹射中了胸膛。侯班长牺牲后，宋哲元很悲痛，他特地派人找到了侯班长的家属，慰问、了解情况。原来侯班长共有7个孩子，老六和老七是一对双胞胎男婴，兄名福，弟名禄，家中生活并不富裕。为了保证这两个烈

士的后代活下来，宋哲元除了让有关部门抚恤侯班长的家属外，又将两个男孩抱回家中认为义子，取名纪峰、纪峪，以兄念喜峰口、罗文峪牺牲的烈士。

身经百战的宋将军，原来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人：张克侠，29军的参谋长。中国共产党在29军的地下工作者。

张克侠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1916年考入北平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2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奔了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任学兵团副团长，团匕力张自忠。1927年他赴苏联学习，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分配他回到西北军工作，冯玉祥任命他为张自忠所在师的参谋长。29军成立后，他调任军副参谋长，仍兼任张自忠师参谋长。张克侠在29军时与共产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不与其他任何党员发生联系，包括29军的另一个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何基沣。

1937年5月下旬，宋哲元显然已经预感到形势的紧迫，他不得不抓紧时间进行一项工作：研究抗日的对策。具体他说，他给各级指挥员提出了一问题：日军如果真的要下手强占华北，我们从现在起应该做哪些事情？

宋哲元当然不是虚张声势地“制造敌情”，而是实打实要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拿出具体措施来。

研究对策的会议很快就召开了，宋哲元亲自主持会议。与会者各抒己见，讨论得好不热烈！军参谋长蹦出了一个方案，怪出众的。他建议：

“必要时我们可以撤出北平，保存势力，以待全国抗战。”

许多人不同意这个方案。什么叫“以待全国抗战”？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缩回去，找僻静的港湾去“保存实力”，谁去上前线？

其实，军参谋长的这话一点也不陌生，南京政府早就有人这么放风了。

张克侠站起来，直抒意见，他端出了一个早就想好的方案：

——将29军30万大军编成几个集团军，分为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带，首先消灭区内日寇分散部署的驻屯军，然后相机出击，一举击败日军在华北的2万兵力，最后集中全力挺进山海关收复关外领土。

宋哲元对这一方案极为赞赏，他对张说：你就按这个设想先做准备。

随后，他又专门开会研究张克侠的方案。

张的意见全部被采纳。

这时，日军的军事演习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时，29军的军事演习也搞得紧张而有秩序。

1937年7月5日，北平的学生界派代表来宛平慰问29军的指战员。

指战员们肃立，向学生行注目礼。

卢沟桥上的每头狮子在唱。永定河里的每滴浪花在唱。宛平城头的一轮冷月在唱。

九

一木清直死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该容纳他，一个罪恶的灵魂会污染整个空间；然而，这个世界又少不了这样的人，人们总是从反面教员的身上吸取有用的东西，从而使生活显得丰富多彩，使自己变得耳聪目明。

一木清直的死罪有应得。

他静静地躺在坟滩里。

天空有几只秃鹰在盘旋。

与一木清直一起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的还有他指挥着进攻宛平城的那个中队，它被中国的军队吃掉了。

这样悲惨的结局日军是不愿看到的，也不会接受它。

谈判。日军又提出了谈判。

这是他们唯一的退路。

也是他们惯用的缓兵之计。

牟田口站在了第一线，他没有再写信，而是以卢沟桥前线日军的名义直接与北平市的首脑人物联系。在他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会斗胆地走出一条新路——与秦德纯对话。

于是，在北平秦德纯的私邸，中日再次举行谈判。

这是第几次谈判了？二次、三次？……记不得了。其实，弄清它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中方的代表除了秦德纯外，还有 29 军 132 师师长赵登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荣允。日军代表除驻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外，还有松井久太郎，和知鹰二和寺平忠辅。

此次谈判没有了前几次谈判时的那种质问乃至争吵的气氛。当然也不可能是和气、亲热的场面。一场激战把双方都折腾疲乏了，谁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兴趣去表现自己的强胜。

日方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他们要求中国以保安队接替 29 军。

中方未提出异议，默认了日军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天津，29 军第 38 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和日军桥本群参谋长也举行了会谈。

两处都在谈判，但是最后拍板算数的是松井和秦德纯，他们达成了三点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至丰台，中国军队撤退至卢沟桥以西；

三、宛平城内的防务，除城内原有的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防务，人数限于 300 人。

三项协议达成后，落在了纸上，但是日方代表不愿签字。于是，这个停战协议便成了以口头形式出现，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

这是很费琢磨的一件事，他们主动提出谈判，现在达成了协议，却不愿签字。

只能这样理解：搞鬼。

问题不在于世上存在着鬼，而是确实有人给鬼提供了使其施展鬼才的舞台。

人家说谈判，我们就停战；

人家让撤出宛平城，我们就拱手相让；

人家不愿签字，我们就决不坚持……

按中日代表协定的撤军时间是9日上午9时。由双方派员监督。

日军不是冰，而是失掉原形的水。

他们每刻都巴不得积聚天下所有的浊流，不仅仅是为了淹没良田，而是给善良的人们创造灭顶的水患，灾难。

首先破坏协议的是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

这不能不提到他8日晚下达的那个命令：

“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攻击。”

“明天”，即今天，7月9日。

当时，即7月8日，河边下令向卢沟桥运兵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不可能未卜先知次日他们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以及由这个结局而带来的一个“协议”。那么，到了现在，中日双方已经有了停战协议，他就该履行协议的各条款项，撤兵。

不，河边根本不按照协议的规定去撤兵。他仍然要执行他头天晚上所下达的命令：增兵——第一联队主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所余一部分兵力占据了沙岗。

河边有他的理由：“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议。”

别人便无话可说了，因为协议上确实有“监督”这个内容。

世界上果真有那么一些人脸皮厚得子弹也穿不透。明明是他放了火要烧别人的房子，可他咬着死理说自己是赶来灭火的。

河边可以派兵监督中国是否撤兵。

那么，谁去监督日军呢？

中国军队开始履行撤兵协议，向卢沟桥以西撤退。

这时，河边再一次下令炮轰宛平城。100余发炮弹从日军阵地上一气儿就发射出去了。

中国方面责问日方：为何开炮？

日军回答得慷慨激昂：掩护部队撤退。

不对。掩护哪家部队撤退？他的军队根本还未撤退，何谈掩护？

中方抗议：你们违约！

日方这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向丰台撤军。

中国按照协议派300名保安队到宛平城去接防。

接防的石友三这支保安队在河北省乃下平津一带很是有一点名气，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全仰仗了石友三此人。

石友三大下一般了。概括他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他从个流落北平的闲散者混到军营里，先是因为身材矮小，不够兵格，补为马夫。后来竟当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接下来，就官运亨通，一路顺风，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以至军长。真够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二是这家伙做的坏事千车也载不完万船也运不尽。他在升任旅长期间，驻军包头，广结当地土绅地主、富豪大贾，每逢地主或商贾被抢遭劫时，他便派兵拘捕枪杀。所杀者多为平日不甘忍受剥削凌辱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长工、佃户、苦力、夫役等。不到半年，被石杀害的百姓就有500人之多。

难怪当地老百姓称他为“石阎王”。日寇入关后，石友三一头栽到土肥原怀中做了干儿子，土肥原则利用与石的关系，通过石勾结土匪在冀东、玉田县一带组织河北战区保安队，骚扰华北，充当日军侵华的别动队。眼下，石友三是冀北保安司令，收了土匪队伍改编为4个步兵团，

驻防清河、北苑、黄寺一带将要到宛平接防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日本人先用它自然是很有眼力了。

自己的队伍来了，日军仍然不给开绿灯，他们刁难的是中国军队，决不是冲着石友三。

开往宛平城和卢沟桥的 300 名接防部队，行至大井村时，受到日军的突然袭击，保安队当场阵亡 1 名士兵，受伤者数名。整个队伍被阻隔在这里。

中方提出双方监督撤兵委员前去交涉。

日方不表示同意，却也不拒绝。搁置。拖延。

原来，保安队行进到大井村时，日军对他们进行搜身检查，提出种种刁难：

不准携带重机枪入城；

每人带子弹不得超过 30 颗。

按照日军的这个“标准”，保安队的全体成员几乎都不够入城条件。日军把保安队拦截在大井村，不让进也不许退。

整整僵持了 3 个小时。

到了中午十二时多，监督撤兵的中方委员周思靖、日方委员中岛弟三郎才到了大井村，就保安队接防问题与河边交涉。胸有成竹的河边当下就提出了三条：一、城内中国军队只留一个小队，其余全部撤到永定河西岸；二、保安队限定 50 名，只能携带步枪和 30 发子弹；三、为了监视中国军队撤退，由日军旅团长到宛平城内巡视。

日军又大踏步地向前进了一步。

中方则小心翼翼地向后退了两步。

自然第三条没有答应。目前任何入还没有把河边请进宛平城“巡视”的胆量。

这样，所有携带机枪的保安队员以及身上带的子弹超过 30 颗的保安队员，只好回到北平去“轻装”。

无理的、没有边界的纠缠，耗掉的不仅仅是主贵的时间（不用说日军赢得了时间），更可恶的是磨秃了官兵们的锐气（不用说日军受到的是莫大鼓舞），直到下午 6 时，才有 50 名保安队员疲惫不堪地离离拉拉地进了宛平城。

其它“轻装”的队员返回大井村，再到宛平城，已经是晚上 7 点多钟了。不过，不是双方协议规定的 300 人，也不是河边提出的 50 人，而是不足 200 人。这大概是既给河边留了点“面子”，又给了他点“厉害”。

河边是不会知足的。得寸进尺是他至死都不会改变的本质。就在中国保安队在大井村受阻的时候，河边的一道命令，将机械化部队——第 1 联队第 2 大队从通州调到丰台，接着又调到宛平东北郊的沙岗去驻防。这是明显不过的企图了：他们想乘中国军队与保安队换防的机会，占领宛平。

阴谋未得逞。宛平毕竟不是他企盼的那么容易到手。

河边当然很恼火，但是他又有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中国在宛平只有战斗力很弱、人数很少的保安队驻防，以后夺取宛平的机会还能没有吗？

河边的脸上爬出了水波似的笑意。他对部属交待道：

“请转告王专员，我们要进城慰劳。”

“慰劳？”部属不解。

“傻瓜。慰劳劳苦功高的石友二保安队。庆贺‘和平’即将实现！”部属心领神会，立马去联系。

中方拒绝。

河边不罢休，又吩咐部属：

“买来最好的香槟酒，越快越好。”

香槟酒买来了。

他又派人将笠井、广濑以及通译官爱泽找来，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这些礼品，作为日方的外交人员前往宛平向中国方面祝贺，具体说是向王专员祝贺。记住，是祝贺‘和平’即将实现！”

说着，他望了望那些已经包装得讲究华丽的香槟酒，诡秘地一笑，又说：

“也许这些礼物并不很重要，几瓶香槟酒而已，但是不要忘了你们的身分是外交人员。”

3个“外交人员”神鬼莫测地进城“祝贺和平”去了。

准能掀开河边书写的这页冗长繁琐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

十

这两个村子有着十分相似的名字。

一个叫干杨树村，另一个叫大杨树村。

挺拔、葱浓的白杨树犹如一道绿墙围村而立。

一条凸凹下平的乡村土路把两个相距下远的村庄牵得紧紧，好像生怕跑了其中一个似的。

团部指挥所设在于杨树村，旅部指挥所设在大杨树村。何基淬旅长下部队很方便，一迈脚就到了指战员们中间。

现在，他来到老谢的团部，屋里空空无人。

谢团长正在教新战士投弹，示范动作做得好棒，手榴弹出手就是50米开外，何旅长高兴地喊着谢团长的外号。

“谢别子，悠着点劲，说不定马上就要和鬼子再真刀真枪拼一回哩，不要到时候劲儿用完了，可就抓瞎了！”

老谢这才知道旅长来了，忙放下手中的教练弹，恭恭敬敬地给旅长敬了个礼，旅长还了礼，他才拿下举着的手臂，和首长畴嗑起来。

何旅长说：“从各方面情况看，日军没有歇着，正在积极准备反攻。日本人像泥鳅一样狡猾，我们必须多长个心眼，用它对待我们的政策制定我们对它的政策以牙还牙对付它。”

谢团长说，“我到各个连队都走了走，大家的警惕性很高。我们已经吃过日本人不少次亏了，总不能老吃亏吧：眼下最主要的是刚到部队的这批新兵，要突击抓抓他们的军事训练，上了战场才能个顶个地干呀！”

河基淬很赞赏谢团长抓这项工作，带着表扬的口气说：

“老谢，你又走到前面去了，好嘛！关于你抓新兵军事训练的工作，你再想想都有些什么立竿见效的做法以及还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细谈

一次，我好在我其它团里夫讲讲。”

谢团长很谦虚，经验没说，存在的问题倒列举了好几条。何旅长一一记在了本子上。未了，他再三叮嘱谢团长说：

“随时注视日军的动静，做好应战准备！”

谢团长一连说了两个“请旅长放心”，何基沣才又驱车到另一个部队去了。

老谢本来就是很精细的指挥员，现在经旅长这么一点拨，他的警惕性就更高了。他盘算着该怎样和日本鬼子周旋、才能把他们的动向随时掌握在手、好寻机痛痛快快地收拾他们一顿。

他把自己的几个“军师”召到一堆，琢磨着办法……

“好！高招！”当他们决策出一个好套套时，谢别子高兴得一击大腿直叫绝。

老谢的新招是：他派一个连队的人马到距铁路桥下远处的观音庙住下来。之后，让一部分士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进到田里去锄地，随时观察日军的动静，枪支就放在庄稼棵中间，有了情况马上就能投入战斗。

也许是这些不寻常的“老百姓”引起了日军的多心。留意；也许有人告了密……

这天，一股日军突然向田野里的那些“老百姓”进行袭击，随后包围了观音庙。很明显，鬼子想把“老百姓”吃掉。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另一块地里干活的“老百姓”这时立即拿起刀、枪，冲了上去，给日军来了个“反包围”。鬼子很像堵在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国守军里应外合，犹如夹馅饼一样，把这股敌人砍成了肉泥。

十一

王冷斋是在日方的“外交人员”进城以后，才得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进驻沙岗的消息。马上，一股冷气直冲他的脊梁。

协议诞生才几个小时，日军已经第二次违约了。

王冷斋有一种了当的后悔莫及的感觉。

“祝贺”的代表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在想一个问题，日军压根儿就没有商谈停战的诚意，他们只不过在玩弄阴谋、拖延时间。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对这个问题只是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的话，那么现在他看清楚，河边的面目、谈判的日方每一个代表的面目，他都比过去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狼有一副凶残的恶相，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有时候乌云遮住了阳光，狼给了你一个背影，你看时它很像一只猎犬。仰首是天，低头是地，平视才能洞察站在面前的恶人。我们必须这样。

当夜，日军又一次向宛平城进行袭击。

枪声、炮声搅和在一起，从城墙上飞过，飞到远处，那飞子突然尖叫一声，好像钻上了高天。

夜深沉。

枪声急。

枪弹把夜幕穿透，血流如注……

王冷斋当即找到尚留在城里监视撤兵的日方人员中岛第三郎，问：

“请你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打炮又开枪？”

中岛第三郎显得很精神，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放声一笑，说：

“王专员你又神经质啦，不是一切都很正常吗？”

他在打岔，想溜过去，王冷斋一本正经地提醒他：

“日军确实在炮轰宛平城，我要你回答这是为什么？”

中岛第三郎两手一摊，说：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那么就请你与军旅团司令部联系，正式回答我们的问题。”

中岛第三郎只好去联系。

少许，他回来了，回答王冷斋：

“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军绝无攻城的意图。”

王冷斋反驳：“明明在开枪打炮，为什么还要说误会？”

中岛第三郎不作正面回答，只是反复说一句话：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之后，日军停止了射击。

勇上骑一匹烈马，奔驰在不算开阔的空间里，他想把这杂乱踩踏得粉碎，但是，流水无法溶化笑声。

傍晚，王冷斋奉命去北平汇报卢沟桥前线的最新情况。同车去的还有日方代表中岛第三郎。

行至沙岗下，王冷斋看到日军的四、五顶帐篷仍然孤零零地撑在郊野，帐篷前二两两的士兵们正忙着架设电话线。挖炮台、测试距离什么的。还有几个日军站在涵洞口的铁道旁，声色俱厉地对每一个来往的行人严加盘查，样子很凶狠。

王冷斋的车也无例外地被拦住了。

“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一个日本士兵操着并不流畅的中国话老远就吼道。

不等王冷斋说话，中岛第三郎已经停在了日军士兵前，他解释一番，日军才允许王冷斋通过了涵洞。

王冷斋心里的疑团挽得老大：日军哪里像撤兵的样子？……

汽车披着浓浓的夜幕徐徐进了北平城。幸德纯已经等候在门外了。

王冷斋汇报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他说：

“沙岗地区的日军根本没有撤退，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大炮架了起来，炮口正对宛平城。”

秦德纯气愤地说，“太不像活了！他们张口闭口要监视中国军队撤退，可自己呢，根本就不打算撤退！”

平常讲话很文雅的王冷斋这阵子也说了一句粗话：“婊子养的这伙东西！”

秦说：“日方不执行协定，我们应该找他们去商议。”

王说：“我这就去，要他们讲个道理出来。”

中岛第三郎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他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傲慢相。

天空已经没有了血色，夜黑得如同锅底。

孤独的黑鹰想逃脱这个世界，它死死地扭住自己的翅膀，想飞，但

它挣丁开巨大的射穿不透的黑网。
枪声又响起，夜幕在颤抖……

十二

和王冷斋对话的是樱井顾问。显然对在这时候接待王冷斋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丁慌不忙。镇静自若。完全是一种盖世压人的气度。对王冷斋的提问他都对答如流，且没有纰漏。

王说：“我从宛下来北平的路上，看到贵国仍有兵力未撤出卢沟桥。”

樱井反问：“兵力？你看到的是一个班，还是一个连，或者是一个营？”

王：“在规定撤军的地面上就是留一兵一卒也是违犯中日双方谈判协议的。”

樱井忙转移了话题，问道：“你光看到我方的士兵还留在沙岗，那么，你看没看到我方两具士兵的尸体？”

王一惊：“尸体？什么意思？”

樱井觉得自己终于压住了对方，便明明白白地告诉王：“中国军队打死了我方 2 名士兵，直到现在连尸体也没有找到，我们正在沙岗附近搜索。”

王想了想，马上有了对付樱井的话，说：“搜索尸体还用得着架设电话线和支起大炮吗？”

樱井狡辩：“我们不能下考虑你方的突然袭击。你们既然能打死 2 名士兵，也就可以打死 20 名。”

王冷斋回击对方：“那好，既然有尸体未找到，就由中日双方派人在卢沟桥附近徒手搜索。”

樱井表示同意。这是理屈词穷后的唯一可走的路。

双方商定：午后一起出发去搜寻尸体。

谁料，到了预定时间，中方代表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日方人员的面，溜了。

有人在微笑时，总会露出像狼一样的牙齿。

十三

卢沟桥的夜何等沉重。天上只有一颗星星没有死去。它向人间诉说着心事。

一位老者犹如老熊似的顺着河道一步一挪地走向卢沟桥。他偏不走大路，也不走近卢沟桥，只是挪动着碎步向前走着。

守桥的哨兵，还有鬼子的流弹，都不允许他去看那些魂牵梦绕的石狮了。天天响枪，夜夜打炮，他真担心伤了石狮，少了一只，或者几只……

老人已经快 70 岁了，他家祖祖辈辈就住在永定河边，离卢沟桥不足一里地，从他刚记事起便知道桥上的石狮子是 485 只。真的，是 485 只。有人说，卢沟桥上的石狮数不清。不对，他一只一只地数过，没错，485 只，一只也不多，一只也不少。他太喜欢那些小精灵了，一个个活灵活现，每次看到他，都分明想从桥上跳下来跟他玩。他多么富有，是 485 只石狮子的朋友这些日子卢沟桥不太平，老人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座狮子桥要毁在这场战乱中……

白天，他不敢出门，现在，夜深了，他悄悄地溜出村，顺着河道走

到离石桥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地方，停了下来……

老人双膝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眼睛闭上，心灵打开，冲着石桥的方向，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起来：

“上苍保佑，这 485 只石狮一只不少、一只不死地度过这场大难……”

夜空那颗唯一的星星也隐去了，它是不是索回了老人的祷祝？

他佝偻的身躯仍在河道上跪着，跪着……

十四

就在卢沟桥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再一次将自己的主张、决心、希望公布于众。这是一部宣言书。

我们将 1937 年 7 月 12 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刊载的这篇《通电》转抄于此：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 7 日夜 10 点，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7年7月8日

进军号又一次吹响。

我们并不想流血。

可是当敌人将刺刀在我们的面前打开时，我们只能冷静而坚强地面对这个现实。

从《八一宣言》到《卢沟桥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抵抗外敌的欺凌始终是中共矢志不移的神圣事业。

1935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次会议同意的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贯彻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何敌对行动或意见上利益上的差异，都应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战。宣言还号召全国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实行“全国同胞总动员”，去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奋斗不止。

1936年12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同志在会后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两个文件比《八一宣言》，大大前进了一步，它们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平津战场上抗击日军的29军，是这个统一战线队伍中的一支值得国人自豪和称颂的部队。

中国共产党的“卢沟桥通电”给正在奋力抗日的全国军民送去一份强大的动力。

此刻，日本国内正酝酿着出兵计划。

关东军将混成的第11旅团主力集结在承德与古北口之间，布局在长城一线；

天津的日军纷纷出动；

其空军主力也集结在锦州和山海关。

中方通报敌情的报告一刻比一刻吃紧：

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开进北平附近；

敌人的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运进；

大井村、五里店正被日军占领；

平卢公路不通行了。

桥本群参谋长偕随员到卢沟桥前线视察。

日本将出台大动作……
战争往往在和平的日子里发生。
吃人的魔王正在屠刀下成群地舞蹈……

十五

在战场上，一次战斗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下一次战斗的开始。这短暂的战争间隙给了参战双方一次重新整理自己的难得机会。整理自己的同时也深化了对敌人的认识。

此刻，何基沣很是烦躁。其实，不仅仅是烦躁，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压制的愤懑，3小时前，他作为代表之一奉命来到北平，和日方商议停战之事。日方代表在协商中的狂妄和无赖使他觉得自己坐到这个谈判桌前是绝对的走入了误区。这不必说了，因为是否与日方谈判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由于日方的无理纠缠，谈判中断了，他和中方代表等着樱井等日方代表归来，好按照日军的要求去搜寻他们的士兵尸骸。可是，左等右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樱井们根本不露面。

何基沣已经没有任何耐久力去应付这种消磨士气的谈判了，他打算一走了之，便对同事说：

“打仗死人，这是常事，日军有什么理由提出要我们寻找他们士兵的尸体，我们牺牲了的指战员们他们负责给找尸体吗？”

同事说：“鬼子在玩阴谋，我们有些人太轻信他们的谎言了。我们不能再这样退让了，眼看卢沟桥和宛平城都变成日军的地盘了！”

就在这当儿，中方代表得到消息：樱井们早就像贼娃子似的悄悄溜出了城。

何基沣和几个代表像被人当头给了一棒，全懵了。

日军一次再次的失信背约，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全在这无耻的耍赖中收获了。和平只能用尊严来维护，软弱和轻信换来的必然是灾难。何基沣感到自己有辱于作为一个中国军队指挥员的良心。夫意、惆怅、沉闷爬满心头，他很想打开所有的窗子透透空气，可是周围是一片黑洞洞的夜，哪有窗子？

等不见樱井们的人影，何基沣那宽阔的额头聚起深深的皱纹。几天来发生的一些令人不解的怪事再次袭上心头。使他万分难受……

“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那天晚上他确实接到了上级下达的这个命令。太突然了，他没任何思想准备。不许出击？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命令，敌人来进攻，我们不出击，这“抵抗”不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吗？命令，命令！何基沣作为旅长，思想不通也得执行。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

当晚，何基沣一夜未合眼，他真不敢想象，这道命令传到摩拳擦掌的29军广大指战员中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它会像一道金箍咒一样束缚大家的手脚吗？

不知道。

何旅长是9日奉命率领部队从京西绕道八宝山，来到卢沟桥外围待命的。他随时准备把队伍拉上前线，痛歼近日来不断在桥头附近挑起事端，进行骚扰的日本电子。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冯治安师长给他们旅的

任务是：10 日夜间袭击驻丰台的日军。军人接到战斗任务总是很兴奋的。何基沣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双脚一并，恭恭敬敬地给师长行了个军礼，说：

“师长放心，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教训日军，使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谁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只能得到自取灭亡的结果。”

冯师长以赞赏的口气说：“基沣，我了解你，相信你会有出色的行动。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民众的事。你和我的心愿是一样的，这就是坚决捍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尊严。”

何基沣正是怀着这样决心奔赴卢沟桥前线。

9 日 驻扎在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在调兵遣将中逐渐形成了对驻丰台日军的包围。与此同时，驻保定的某团和东北军某部骑兵团及两列钢甲车也开到了长辛店附近。中国军队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让敌人成为瓮中之鳖。

何基沣昼夜守在前线指挥部里，他等待着向敌人进攻的命令，虽然这种等待很熬人，但毕竟是一种向往已久的期盼。他把浑身的每根神经集中起来都系在那部电话机上，按他的想法，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准是上级下达战斗的命令。

凡是等待总是让人焦急的。夜深了，他还在屋里踱步……

叮——铃——铃

他快速转身抓起听筒，一听，原来是 38 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的电话。

“我是张自忠！”

这雄浑却陌生的声音让何基沣着实有些诧异，张不是他的直接首长，这时来电话会有什么事？在这样一个深夜里……

“张师长，我静听您的指示。”何基沣像对待冯师长一样对张将军这样说。

“基沣，辛苦了！我想问问卢沟桥前线情况。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日军在那里不断的挑衅，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关注那一块地方的。天津嘛，是北平的近邻，更应该随时了解前线的形势。对啦、刚才我给秦副军长通了电话，他很担心宛平的局势，看来日军近日还会有新的动作。”

何基沣听出来了，张师长一定是觉得自己的部队目前没有直接参加卢沟桥的战斗，才绕着弯说了这么一通话，同时搬出了秦德纯。何基沣觉得自己应该给张师长主动汇报发生在前线的一切，便说：

“说起日军的动作，并不是这几天才有的。他们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挑衅，军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张：“很显然，敌人的目标决不是一个卢沟桥，他们的胃口很大，要吞掉整个华北以至中国的。”

何：“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一声命令，就开上去全歼日军！”这样说似乎还不能表达全体指战员求战心切的情绪，他便又提高嗓门说了一句：“大家的劲头憋得嗷嗷叫，再不下命令，都要蹦起来了！”

张自忠没有再说什么，对话暂时中断，屋子里的气氛莫名其妙地有了几分尴尬。

何基沣手里握着静悄悄的听筒，不知所措。欲放不能，欲悦无话。就这样尴尬了好一阵子，才传来了张师长的声音，不过，不再是询问情

况了，而是在开导：

“基泮，但愿我要说的话不是给你泼冷水，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条道上走车，在一条河里行船，想的做的都一样。”他有意停顿一下，大概是梳理自己的思绪。“你上面说的那些话，我不但理解，而且要我处在你的位置上，也会这样说。可是，咱们换一个位置，你当师长或者军长，我当旅长或者团长，就要谨慎行事了。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对于日军的野蛮、残暴侵略，中国人民是会很好地教训它的。问题是在眼下，你们要大打一场的做法是愚蠢的。如果真打起来，找想会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我们的行动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他们可以借抗战堂而皇之地消灭我们。这些问题不知你们考虑过没有？”

何基泮绝对没有想到他所尊敬的张自忠师长会说出这么一番令他失望的话。他不便回答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但是，作为下一级的指挥员，他可以提出问题向上级请示。于是，他问张自忠：

“那么，师长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并不会因为现在我们的善良，它就会改变侵略中国的野心了？”

张自忠避而不答，只是说：

“带兵不愁没有仗打，但是我们不要为个人去打仗。”

张师长这后讲得太重，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何基泮难以接受，他带着几分无名的火气说：

“现在的情况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而且已经是肆无忌惮地在对中国进行烧杀掠夺，无恶不做。我作为中国军队的一个不算太高、却也不算太低的指挥员，如果在这种本该上火线为国拼杀的时刻却说无仗可打，而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还有脸见江东父老吗？”

张自忠的口气变得缓和了，其实他一直就没有动过火气，只是这时的口吻里注入了更多的人情味：

“基泮，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哪里能说不打日本鬼子呢？而是说怎么个打法更能收到好的效果，像现在这样集中兵力大打，是否合适，是否是时候，我们要考虑。”

何基泮的火气仍然没有消散，说：

“怎么个打法？总不能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把左脸也伸给人家吧。这样，还有中国人的骨气吗？”

张自忠见何基泮的态度这样坚决，丝毫听不进他的劝阻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自己不是何的直接上司，下命令是不行的，何况这种事也不是下个命令就能解决的。实话实说，张自忠也有想不通的问题，可是，有什么用？他还有他的上司呢！

放下张自忠的电话后，何基泮的心里更是毛刺刺的不能安宁了。再后来，他就接到了那个他一辈子都想不通的电话：只能抵抗，不许出击……

此时的何基泮，决想不到4年后，张自忠会战死在疆场，成为不朽的抗日英雄，在我国抗日战争守土殉职的将军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上将，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50个同盟国中殉国的最高军官。

那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率领的部队撤退至湖北宣城洪山山

区罐子口，在南瓜店新街附近遭到日军的猛烈袭击，阵地被敌人突破，伤亡惨重。这时、张自忠身边仅余 1000 人左右。敌人已逼近指挥所。部队弹药将尽，向他告急。他回答，“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光了，要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牙齿咬。”他率领特务营作最后苦撑、但特务营多短枪，面对机枪大炮，只能挨打，发挥不了攻击作用。他仍然沉着指挥，左右督战，视死如归。他身上两处受伤，部下劝他退却，他严厉喝斥：“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阵地的大部分被敌人包围，张自忠兀立山头，扬起手枪，发起冲锋。日本兵在阵地前一个个栽倒，他自己的战士也越战越少。午后，日军攻入张的总部，他把参谋长、顾问预先都支派走了。唯独高参张敬不肯撤离。最后终因弹尽力孤，总部官佐与特务营长以下全部壮烈牺牲，张敬也用左轮手枪毙敌三四个后而倒下。张自忠身中 3 颗子弹，胸部几乎洞穿，血流如注，宛如血人。左右硬拉他往后退，他怒目奋睛，厉声巨喝：“这是我成仁报国的日子，我只能战死，绝不后退！”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何基沣还在等待着樱井们的归来。

没有命令，他无法撤走。虽然樱井们已经出城溜了。

窗外，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高粱地，风儿吹来，哗啦哗啦的响声涌得满屋都是。大嘈杂，他不爱听。

他抬头隔窗望去，月光下高粱地边有一棵歪脖子树朝世界深深鞠躬。

再远处，有一匹失惊的、夜不归圈的马在撒欢，越跑越远。他觉得那是他的坐骑？

不要在中途倒下。

追马去。

何基沣走出了门……

十六

日本东京的这个早霞是用人血染红的。

9 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日本国内。无疑，这使日本军界内部的所谓“不扩大派”感到高兴。他们手舞足蹈，准备按既定的思路行事。

“扩大派”当然很不舒服了，心里犹如填了一堆碎玻璃碴，割得慌。

何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七·七”事变后，就要不要把这一场局部冲突扩大为侵华的全面战争，在日本陆军中央部出现了两种派系。两派都主张武力侵华，但各有其具体的想法。

“扩大派”是想快刀斩乱麻，迅速给中国一击，使之屈服。在这些疯狂者看来，列车载运上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事变用一个月时间就解决了。”“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另外，陆军次官梅津也是“扩大派”的强硬代表。

“扩大派”占多数。

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策划“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抗战力量，他们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在卢沟桥发生的冲突。理由是：一旦真的发生全面对华战争，日本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更可怕的是。这时苏联会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那样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不扩大派”有一个估算：如果日本没有动员 15 个师团的兵力，筹备 55 亿日元的军费，出兵中国肯定是失策。

两派的分歧并无实质性区别。在日本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是一致的。

杉山元的得意很容易使人能想到四个字，发狂，野心。

一位外国记者在作品里特别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杉山元在卢沟桥响起枪声的那些日子里，饭量突猛增加，吃起来狼吞虎咽……法西斯分子视侵吞别国领土、掠夺别人财富永远是“美餐”。

豺狼的逻辑是：吃人肉比什么都好。

从 7 月 8 日起，参谋本部宣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一个计划：从关东军抽调 2 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 1 个师团；从国内派遣 3 个师团……

杉山元踌躇满志，又是带着明显的担忧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必须派兵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介石就会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这样，必定危及我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很明显，这话是说给石原莞尔听的。

石原莞尔也在解释自己“不扩大”的观点，却只字不提满洲国有可能被蒋介石收回的事。他说：

“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地动员起较强的力量，眼下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一旦发展成大战，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就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一句话：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不幸。”

“扩大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立即反驳了石原莞尔：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当年不是你策划了满洲事变吗，我们只不过是效仿你的事业而已，没想到你却打起了退堂鼓。”

石原莞尔不语。

接着发表与石原莞尔针锋相对意见的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水律佐比，他说：

“石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其实只要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派出大量部队出兵中国，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

日本国内关于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争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国。于是，在中国对侵略者日寇也就有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守卫国土，无情地回击强盗的侵犯。另一种则是对日寇抱有幻想，总想稳住日军，使战局不要蔓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讲的那番话挺特别，也许可以代表国民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当何的老朋友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现在驻南京武官喜多诚一悄悄地提醒他，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势可能无法控制时，何以反提醒的口气对喜多诚一说：

“如果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10年后看。”

喜多诚一对老朋友的话似乎很不在意，但他没有公开反对，只是淡淡地一笑。

何应钦要尽到朋友的责任，接着又说：

“请你把我的话转告你的政府。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何讲这番话时是1937年7月，10年后，即1947年7月，日寇已于两年前就战败投降，蒋家王朝亦面临着无法挽救的全面崩溃的大难。

何应钦是个“天才”，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日本侵略者的结局的预测，可以说准确无误。

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必然获得和侵略者一样的失败结局？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内的“主和派”人物，他也许了解二者之间在命运上的联系。

就是在这时候，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使正在召开的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当即立断的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杉山元等人的派兵案被搁置起来了。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的“日本政府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方针是：

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我方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和对今后提出保证。

看了以上五点，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所谓不让事态扩大的方针，其实质是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何以见得？第一，它把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方面，以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为前提来解决事件，提出要中国撤退军队、道歉，这样只会使事态越来越恶化；第二，它还提出“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日本将采取“适当措施”，这就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日本随时都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

巴不得别人变成僵尸，他再用鞭子任意抽打你。他一边打还一边念念有词：我打你是为了让你复活。这不仅仅是欺骗，而且是一种卑劣。

十七

对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来说，似乎不存在“扩大”与“不扩大”的派系，起码不是那么明显。他们千里迢迢开赴中国，如果不打仗就要失业的。大打还是小打，反正都是一个打。所以，内阁会议提出的所谓“不扩大”的五点方针后，他们上仿下效立即向29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条变成了四条，显得更明朗、简要，因而也就更露出了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

- 一、第29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声明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二、给肇事者以处分；
- 三、卢沟桥附近的水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它各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的取缔办法。

7月10日上午，驻屯军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了以上的要求。当然是有书面材料了，但是传递材料的日方代表，并没有先交出来，而是像宣读天皇的“圣旨”一样，向冀察当局的代表宣读了一遍。中方的代表当场未表态。

世界上果真有这样奇怪的事，在中国土地上行凶作恶的人竟然用一本正经的面孔抗议中国人。他们口念佛经手拿屠刀，乍看无法统一，其实才是天衣无缝的统一。胡德坤先生在他所著的《“七·七”事变》一书中，十分尖锐的、一针见血地对日军这四点要求的实质进行了剖析：

“明明是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却反倒要中国方面道歉；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抗日团体。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条件，以制造事端，为扩大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和时机，也是对日本内阁“不扩大”方针的最好注脚。”

注脚。确实是一份企图把局部争端引深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难得的注脚。

侵略者把世界磨成了刀子。

“扩大派”在喊：血。

“不扩大派”在叫：死亡。

中国，有什么理由不抗战？

十八

地平线不是路的终点。

当日军用他们提出的四条要求没有迅速换到所盼望的东西时，他们心急如焚了。

督促，让中方交涉如何落实四条，越快越好。

冀察当局便指派张自忠为与日方交涉的负责人。

可是，张自忠病了。病情蛮重，床也下不了，虽然抱病在身，他也不会推卸这份沉重的信任，他委托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张允荣代表他去与日方谈判。病床前他接见了他们。

他再三叮嘱二位代表：事关重大，不可轻视。该坚持的分寸必争，该让步的毫不吝啬。

齐、张请他谈谈对此次交涉的基本想法。

张自忠对这个话题显然很有兴趣，从床上坐起来，似乎没有多想就说：国人无不厌恶战争的，它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摧残是无法弥补的。能不打这次仗就绝对不放一枪。当然，现在说不打仗显然是天方夜谭了。但我们要力争把卢沟桥这场战事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使它蔓延开来。这，就是基本想法。当然，它不是我的想法了。

齐燮元冒昧地问了一句：几次谈判，日方都提出要我们从卢沟桥撤

军的事，我们不依，日方又不让步。不知师长有何考虑？

张自忠没作正面回答，只是不可琢磨地说了一句：往哪儿撤？换换部队总是可以的吗？

齐燮元似乎听明白了，说：坚持原则，灵活机动。

张自忠没点头，也没有摇头。

7月10日下午4时，张允荣与日方代表松井开始谈判。

日方提出的其它条件都好办，甚至说都可以应诺。唯有关于撤军的事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松井说：“中国军队只有从宛平、卢沟桥和回龙庙撤出，我们才有继续谈下去的基础。”

张允荣则说：“如果我们提出你们的军队从东京撤出，改由中国的军队去占领，你们将做何感想？”

松井听了，气急败坏地嚷道：“你这是无理取闹，对谈判缺少起码的诚意。”

张允荣反问：“那么，贵方的诚意表现在何处？难道就是要把中国的领土占为己有，这就是诚意吗？”

松井：“我要和张自忠师长面谈。”

张允荣：“好。我奉陪！”

张与松井出门，乘上车，前往张自忠的住宅。

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下着大雨。

道上有一辆马车在吃力地前行，啪啪的滂沱大雨落在马的腿上，催紧了它的四蹄。

两道深深的车辙，很快就灌满了雨水……

张自忠躺在床上听了张允荣重述了日方提出的四条要求，他很生气，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喘喘地说：

“惩处肇事人？日本人是肇事者，是你们制造了这起事端。要惩处就惩处你们自己。”

他冲着松井这样质问，身体太虚弱，一激动就大喘不止，身体支撑不住了，又躺了下去，张允荣帮着给他放了枕头。

松井在一旁很尴尬，一直没有说话。看来他对惩处什么人这一条似乎不太感兴趣，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撤军。这事使他很头痛，日军给他的任务他没有完成。这时，他对张自忠说：

“张师长，还有第三条呢，这是最主要的，刚才我和张允荣先生没有取得共识，所以特地来找你交涉。”

“第三条，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的军队，是这样吗？”

松井赶紧递上话：“对，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这个地区。”

张：“谁说的？为什么？”

松：“为了避免惹起事端。我们希望如此和睦共处。”

“屁话！中国撤出永定河东岸，让日本人去占领，这叫和睦共处？为了避免事端发生，你们就应该从中国的领土上彻底撤回一兵一卒。是你们要并吞宛平城，才有了卢沟桥事变！”

“张师长息怒，我是代表日军来与你谈判的。”

“我也是代表中方与你讲这些话的！”

说到这儿，张自忠摆摆手，不愿说下去了。

谈话陷入僵局。

松井没有讨到便宜，很失望地走了。

交涉再次卡壳。

11日晨，秦德纯亲自给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打电话，表明中国方面对日方所提条件的答复：“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从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当时秦是冀察当局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回山东老家去了），因而，日方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最后答复。

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仍按照他们所提的条件，企图撬开已经有些板结了的与29军谈判的僵局，继续进行着积极的活动。他很自信，一定要撬开！

情况的发展到底如何？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记载：

这时我挺身而出，表示决心，愿意负责打开僵局，请求委以重任。参谋长大概也希望能够万一获得成功吧，所以就应允了我的要求。

我感觉到，现在才是日华之间和战的关键，因此特地去找宋哲元的亲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贾德耀，托他代为斡旋，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于是就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

上午11时半，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字陪同，单独前往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和张，并加上孙润字，一共3人。

我首先发言，反复谈了日军的要求。对此，齐燮元回答说：“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卢沟桥为日本军所占领，冀察政权岂不是丧失了立场？”

于是，我擅自提出建议说：“万一中国方面能依从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可以自动地从卢沟桥周围撤兵。”

齐燮元立刻表示同意，回答说：“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人所要求的条件，全部承认。”说着，亲自取笔，就现成的信纸用毛笔拟就下列草案。当时认为这一下子总可以扭转危机了。

一、中国与日本交战之部队以地主之谊对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处分惹起事端之部队长官，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

二、中国军为与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而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厢，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本事端认为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各团体之嫁祸，故此将来对之彻底取缔。

达成了这一协定之后，我马上回到特务机关，但桥本参谋长因回天津军司令部，刚刚动身，我于是又追到南苑机场。

沿途每个紧要处所，照例都有冀察方面的警察进行盘查，所以比平

时更要多费一些时间。抑制着焦急的心情，来到南苑，参谋长已经登上飞机，螺旋桨刚刚发动，真正是还差一点点时间就要出发了。

我把乘上飞机的参谋长请下来，就站在那里汇报了交涉内容，参谋长对于解决办法，立刻表示满意，并对签订协定的程序又作了一些指示。

至此，我才松了一口气，欢送参谋长起程。连日来费尽心机，总算得到了收获。

不料我在下午 2 时回到特务机关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已经在等待我了。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马上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的声音：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 3 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今井武夫的有关 11 日的中日交涉情况就回忆到此。

当时，他也感到有几分失意。毫无疑问，日本国不仅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民，连他们自己的军人也受骗了。战争贩子们历来都如此残酷。

这样，原来约定的中日双方在 7 月 11 日下午 3 时签订协议的事就出现了困难，还要不要签订呢？今井感到为难。他向特务机关长松井作了报告，松井也不敢拍板，只得请示已经回到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桥本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回答：“照签不误”。

晚上 8 时终于完成了签字手续，这就是《秦德纯——松井协定》。

“协定”对中日双方代表在交涉时提出的 3 条内容均予以承诺。

一件事情又走完了一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被别人牵着退了一步，对日本来说，他们蛮横的、却是理直气壮地将铁蹄又踏进了中国一步。

中方的某些人表现了出奇的虔诚。

协定签字以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国方面大概以为和平已经不成问题了，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当天晚上放虎归山，把几天来俘虏的 200 多名日军，全部送回了丰台。

日本帝国并没有因为中国有些人还在做梦就中止了自己的胡作非为。相反，他们乘着这对自己说来的大好时机迫不及待地公开了其狼子野心。11 日半夜，他们最先向国内民众广播了这样一条歪曲事实的消息：

“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他们否定了“协定”。

接着就宣布了出兵计划。

狐狸一旦给它的猎物跳足了花样舞以后，会变得十分疲累，便发出了一串串亢奋的叫声。那不是歌，而是饥饿的讯号。于是，它开始觅食，目光贪婪地在荒原上搜寻……

十九

7月11日，宋哲元从山东回到平津前线时，脸上不是愁云也不全是阳光。像以往一样很平静，蛮有几分大军长的派头。

但是，明眼人还是看出来，那是装的。他心里很虚，或者说很紧张。

别的不说，只需看看他的落脚点：不回北平，也不到宛平，而是抵达天津。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想法很多，心情很复杂。

有些人说，宋军座到天津是对的，这样可以拉开距离，从稍远的地方看他日想夜牵的卢沟桥会看得更清楚，更客观些。

其实，并非如此……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县休养。

事变发生的当天，第二天，冀察当局机关里因为他不在着实忙乱了一阵了。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秦德纯等都分别拍去急电到乐陵，报告了事变的详细情况。从外表看他很坦然地细读着每一封电文，可谁会想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啊！

开枪？事变？

他放下一封又一封电报，脸上爬满了惊讶的问号。他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才离开北平几天嘛，日本人就翻脸不认人？开枪。他们想干什么呀？

随之，军座便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有一种仿佛天要塌下来的恐慌罩在他心头。

惊恐并不能解释眼前已经发生的事变。

他独坐家中静下心来细细地想着前前后后的一切……

其实这枪声的响起实在是情理之中。不是吗？日军在卢沟桥地区胡搅蛮缠加上胡作非为已经很有些日子了，他们就是想闹事，要把水搅浑，让你白天看不见太阳，夜晚瞅不到月亮；让你干活没有心劲，睡觉不敢熄灯……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永定河上那座桥吞并掉，还有桥头的那座城。

军座想起了一件往事：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打头年年底以来，日军想控制卢沟桥这个咽喉的贪欲越来越强烈了。眼看着桥得不到手就处处找岔子，挑起事端。一天，日军的一个士兵从中国驻宛平地区某部穿过，战士们按规定进行盘查，这本来是属于中国军队履行自己的一般职责，绝没有其它什么意思。谁料，日军不干了，竟然开了部队将中国驻军的一个连包围了。中国军人也不是吃素的，又把日军反包围了。双方枪口对枪口地对峙着，见个火星就会触发战争。这件事通报给了宋哲元，他立即派张自忠前往现场与日军交涉。日军的一个参谋竟然威胁张自忠将军说：“眼下形势严重，马上就要开火了，你赶快制止你的部队！”张自忠顺着对方和话回敬道：“国家养兵，原为打仗！”敌人从张将军镇静沉着的气度上看出不会讨到好果子吃，便退兵了。

此刻，宋哲元在远离卢沟桥的故乡回味着这件他在当时并不认为是件大事的小插曲，还真咀嚼出了新的味道：日军那颗要蜚人的蝎子心早就安上了。他们一有机会就伸出来害人。这不，开枪了，向卢沟桥开枪

了！

这位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冀察全境的军政首脑人物的心被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深深地占据了。这个时候，政务委员会肯定有忙不完的事情，许多工作都需要他拿主意，拍板。可是，偏偏他离开了北平……

他自己开始谴责自己，逃兵！

是的，会有人这么骂他的。平时他总是教育部属，军人嘛，枪声就是命令。要永远奔着枪声去。

随后，他马上又想：无稽之谈。怎么会是逃兵呢？我离开北平时卢沟桥还平静得几乎看不到要发生这么大事变的迹象。一切出乎意料的事都出现在我到山东乐陵后嘛。再说，这些天来我闲下过吗？天天都有一大堆请示工作的电文要我处理。谋事靠大家，主事在一人。你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得承担着你那份职责。

这时，又有一份北平来电被秘书送到了他手头。是冯治安报告前线战况的通报。

他立即电令冯治安：“扑灭当前之敌。”当然，他绝对不会忘记在电令中要加上这样的叮嘱：必须镇定处之，相机行事，以挽危局。

是的，枪声一响不管你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意承认，它标志着局势已经转向复杂化了。如果我们不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这枪声蔓延，那么局面就会变得难以收拾。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谈判，双方都做些让步。

军座的心！善良、还是迷茫？

日军已经从打开刺刀的枪口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我们的士兵都倒在了血泊中，他还在乞求和平！

宋哲元肯定还在一种天国式的梦幻里生活着。尽管他天天都批阅文件，夜夜都询问前线变化。在他给北平来的每一份有关抗战的电文作批示时，嘴里照例要咬出这样一句问话：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不相信日军会在卢沟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他不相信 29 军会被日军吃掉。

有一天夜里，当他浑身大汗淋漓地淌着虚汗还在念念有词地说着“这不可能”时，人们终于明白军座真的病了，他是在说糊话呢！说来他这病有点怪，不发烧也不见发冷，额头上只是浸着豆粒似的汗珠，一条毛巾都被擦得湿淋淋的。家人和随从人员都着急起来，慌手慌脚地张罗着请名医给他作治疗。他却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这回人们听清楚了，他是说自己不可能被这点小病撩倒。他是一条山东大汉呀！

宋哲元肯定不是个单色体，他是在极度的矛盾中度日。再加上这病，使他觉得度日如度年。

他心在卢沟桥前线也惦着南京政府。一头是操心，另一头是担心。或者说操心与担心交织在一起，使他很不放心。29 军的军长难当啊！

人呀，当一颗心被割切分挂在好几处时，他就会感觉不到自己灵魂的存在，因而也就失去了支撑力，依赖自己吧，自己是一片飘落的叶子。依赖别人吧，别人会吞没自己……

这时，宋哲元在无奈之中从于陵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

“华北士兵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职决尊钧座‘不丧权，不夫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总裁没有回电。

宋哲元的心又悬空了一截，是不是他嫌我躲在山东清闲，动了肝火，生气了？不会的，如若真是这样，总裁会来电催着让我返平的。没有电文，就是他同意我的意见。

宋哲元的心又从那悬空的地方落下了一截。坦然。

这种心态只维持了极短的一瞬间，很快他就把自己的猜测推倒了，而在琢磨：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难以理解我的这次“逃脱”，华北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国家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你宋某人怎么就可以泰然处之地呆在老家不挪窝呢？

华北大地少了主事人，沉重的天幕因而随时都会崩塌似的。

这个世界还是少不了他的。

他不是漂泊，而是远航。

当时秦德纯是冀察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不在，委托他包揽一切大权。他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支撑华北这块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现在似乎眼看说要落架倒塌的天下。残局应该由制造残局的人来收拾。谁是这个残局的制造者？不知道。反正不是他秦德纯，起码他不是主谋。

他不是推卸责任，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姓秦的绝对不当溜之大吉的逃兵，那多可耻！该他承担的那份责任他会义无反顾地放在肩上，再加一码也无怨言。打听打听吧，姓秦的是那号走边溜号的“精明”人吗？

这时，秦德纯不由得想起了这大半年他在夹缝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独当一面的日子，那是兢兢业业，凄凄惶惶的半年呀 1937 年 2 月上旬的某日，宋哲元突然来到秦德纯的办公室，说：

“德纯，我想和你谈点事。”

秦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望着军长，他能感觉到，军长有重要话要说。

宋：“眼下日本提出的这种种无理要求，无一不关系到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可是我们越是不接受，日方就越是无理取闹，滋扰不休，这使我痛苦万分。你也看出来，日方每次提出要求总是要我与他们交涉，如是派个人代替我去他们又不痛快。似乎我成了他们交涉的对象了。唉！”

军长诉完这番苦之后，接着便讲了自己的一个打算。这打算着实使秦德纯吃了一惊。

宋：“所以，我有个想法，准备休几个月假，回山东乐陵原籍，暂时离开平津。”

秦：“离开平津？那么北平、华北……”

“这里由你负责与日军周旋，这样尚有伸缩的余地，我相信你会有适当应付的办法。”

秦不同意，说：“我们与日本人交涉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而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赞成你离开北平，我也无法承担这份责任。”

宋哲元见秦的态度十分坚决，且带着几分激动，便顺水推舟地说：“其实回老家也无什么大事，只是想给先父修一下墓。”

宋哲元回山东的打算就这样搁置。

秦德纯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事情隔了半月，一天宋

又找到他，几乎是以通知的口气告诉他：

“我还是决定回原籍，平津的事情你就负责啦。”

宋显得很烦躁，看得出心情很恶劣。也难怪，2月20日以后，日军频繁地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双方的交涉有时一天就有二三次。他实在难以承受这份压力。

离开平津前夕，宋哲元再次对秦德纯作了这样的嘱咐：

“对日方的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拒绝。”

不接受，不拒绝，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原则。不接受，那就等于拒绝了；不拒绝，也就等于接受了。宋军座真给秦德纯出了一道太难太难的难题！

秦德纯像小脚女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在宋哲元给他铺设的坎坎坷坷的道路上。几多艰难，几多谨慎，几多屈辱！他平均每天都要接洽最少一次到两次日方的来访，有外交官、武官、特务机关人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等等。他虽有满腹担忧，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日本人竭尽离间分化的手段，将29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秦被划为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攻讦诋毁、恐吓威胁。秦只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不使交涉陷于困难之中。

秦整日惶惶恐恐，唯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延误了大事。宋军座远在老家，请示求教有诸多不便，他便几次电陈南京，请示机宜。南京复电：要在不丧权不辱国的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

五、六月间，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已极度紧张，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秦德纯的心天天都窜至嗓子眼。

7月7日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20余人，报告了紧张的局势，诸先生均开诚布公地发表了应付局面的意见。谁料，散会后不到两个小时，卢沟桥便响起了枪声……

眼下，事变发生已三四天了，局势复杂且不断恶化，他深感自己虽竭尽全力也难以应付，便更希望宋哲元能返平处理大事，主持一切。

请他返平的电报拍去了，宋却没有回来。

又一份电报拍去，仍然没有音讯……

秦德纯决定派人去“搬请”。

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他想到了一个人：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此公与宋平日来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话说轻说重，宋都不会在意。再说，此人就是要把宋哲元说得在乐陵坐不住才行呢！

邓哲熙很痛快地答应了。他到了乐陵。

陪邓同行的还有赵登禹和张克侠。

宋哲元对从前线来的人格外热情，他急于知道宛平和卢沟桥的一切，问这问那没个完。邓、赵、张便详细地给他汇报了前线敌我双方的情况。

宋听后，略有思索，之后说：

“我看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把双方的争端解决在局部范围内仍是有可能的。”

邓哲熙不同意军座的看法，马上说：

“会不会发动全面战争，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一直是抱着和解的态度处理这场争端，也做了让步，可你让一步，人家进两步，这时候还讲局部范围，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张克侠马上说：“现在看来我们的善良愿望已经被现实碰得支离破碎了，如果一条道走到黑，后果不堪设想。”

赵登禹也说：“这两天日军在宛平周围又增加了不少兵力，气氛很紧张了，我们也不得不在布置兵力，准备迎战了。”

宋哲元对大家站在他对立面说话并不在意，也不反驳，他继续问着感兴趣的问题。

“对啦，中日双方的谈判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进展谈不上了，日方毫无诚意，尽扯皮，耍阴谋，我们动身来这儿的那天谈判又不欢而散了。”邓哲熙回答说。

宋哲元叹了口气，说：“拖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倒是日本人在拖延中赢得了时间。”

接下来，宋又扯了些别的事情。

邓、赵、张三位都不愿让时间在这种不咸不淡的谈话中消磨掉，邓哲熙便扭转了话题，直切主题陈述了他们这次来齐鲁的目的：

“自从您离开北平后，许多事情都处在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大家都希望您回去主持工作。确实，在这非同寻常的时期，没有您坐镇北平是不行的。”

宋哲元仍然像没有听见邓的话似的，仍旧顺着他刚才的话题问道：

“我们和日方谈判的都是哪些人？”

“齐燮元、张允荣，够他们忙的了。”

“张自忠没有参加？”

“他病了，齐、张两人就是他点名要来代表他去谈判的。他躺在床上做场外指导。”

宋哲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屋里静了下来，谁也不去打破这自从见到宋军座后难得的片刻宁静。

院子里树杈上鸟儿的喳喳声很脆，悠长。

宋哲元终于把话头扯到了正题上：

“德纯催我回平的电报我收到了，你们这次来也是他的意思吧？”

“他当然希望您回去。但是并非是他一人有这个愿望，张自忠、冯治安二位师长都给我们说过，希望我们无论如何把您请回北平。”邓哲熙说，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因为冰面有所融动。

宋：“还用请吗？让我回去当军长、当主任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

大家都笑了。一直板结的气氛终于变得轻松了。

宋：“你们看我何时回去为好？”

邓：“在您方便的时候，越快越好。”

“那好，今天咱们就启程。”

邓哲熙忙说：“稍稍做些准备，明天动身也不晚。”

宋哲元答应了。

这当儿，南京方面来了两封电报，都紧催宋哲元离开山东返回前线。

第一封是蒋介石的急电，他令宋速到保定指挥部队。第二封是何应钦的密电：“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布遍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

离开山东返回平津这是肯定无疑了，但是地不打算去保定。从山东到保定，总是躲着前线不去，别人会说他是胆小鬼，临阵脱逃。

于是，他给南京复电：

“因兵力大部在天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

宋哲元弃去保定而赴津还有一层意思，这就是：在天津他与日方可以直接交涉，方能谋求“局部解决”的办法。

宋哲元对谈判特有兴趣。也许他有一个起码在短时间内不改的主意：乞求和平靠谈判呀！

就这样，7月11日，宋哲元偕同邓哲熙等人到了天津。

驻津的军地领导人迎接宋军长归来，人数既不多也不少，态度既不热也不冷。宋刚一进宾馆好些迎接的人就撤退，这样的战乱年代，谁家没有一摊子急着要办的事处理！

宋哲元留给天津人最深的直表的印象是瘦了，也黑了。正因为黑，更显其瘦。大家觉得他的精神状况也不佳，走路没精打彩，缺少山东汉子素有的虎气，仿佛被人抽去了一根筋似的提不起精神。可能是病拖的吧，不，也许是熬愁的！

他住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迎接他的秦德纯和张自忠留下来，说是唠嗑儿，其实是了解谈判的情况。这是他最关心的事。

这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宾馆里很静，大部分窗口的灯都灭了。夜虫一声接一声地鸣啼着，月儿也很明，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宋哲元似乎感受不到这些美景，他显得疲惫地往沙发上一仰靠，说：“怎么样，谈谈情况！”

心照不宣，听者都明白这“情况”指的是什么。

张自忠有点抑制不往心头的兴奋，抢先说话：

“成了！”他这人有习惯，高兴的事有意吐半句，吊你胃口。这时他望了宋哲元一眼，宋一下子坐起，他才接着说了下去。“今天晚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和日方签定了三项停战协定。”

“哪三项内容？”宋关切而焦急地问。

张自忠逐一说了一遍。根本不用看“协定”，他背熟了。

宋哲元反复地咀嚼着日军的三条要求好像在嚼块槟榔：

“第一，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可以做到。第二，由保安队维持宛平城的治安，29军撤出。这一条其实我们已经做了。第三……”

不知何故，在念叨这些等条款款时，宋军座脸上的表情一直是木木的，没有张自忠想象中的那种喜色，直到默诵完了，他才又往沙发上一仰靠，说了一句话：

“还行！”

随之长吁一口气，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站在一旁一直惴惴不安的秦德纯马上明白了：军座对他们的努力是

满意的。他便不由得有了几分得意，对宋说道：

“日方一再强调要把这次事变地方化，就地解决。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宋不以为然地反问一句：“愿望？愿望值几个钱？我要的是他们的行动！日本就会只说大话不兑现。”

秦不再言声了。行动？是的，日军太不够意思了，他们总是谈归谈，干归干。每次谈得好好的，就说撤军吧，我们撤了，他不但不撤，还增兵。你抗议吧，他还尽是理由……

张自忠见宋哲元一提让日军兑现纸上诺言的事，秦不吭声了，便主动出来圆场，解围，说：

“日本国内的‘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斗争得蛮激烈，据说‘不扩大派’占了上风。这次停战协定的签定也体现了他们的‘不扩大’方针……”

宋哲元打断了张自忠的话。

“你信那个吗？什么扩大不扩大派，那是他们内部一派咬一派的专有名词，侵略中国，他们都是一个派，要不，为什么把他们的部队开到了中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那一套鬼话，当然，现在能签定停战协定，这毕竟是好事。不能麻痹，还是要看他们的行动。”

接下来，宋哲元询问了本军的战备工作以及在卢沟桥附近的部署情况，他很满意。末了，他再次重述了自己的一贯思想：

“总之，我们欢迎协定的签定，但是不能高枕无忧。德纯、自忠，你们对驻卢沟桥的部队包括驻在桥附近的部队，要进行一次教育，要大家忠诚守国，绝不辱国……”

秦、张满口答应。

之后，他们便研究起了如何落实“协定”中所提出的三项内容……

夜深了。

有雨飘来，窗子关得紧紧。雨水只好顺着窗棂滑下。屋子里一阵凉意。

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却不觉着疲倦。他们兴致勃勃的、一厢情愿地杜撰着卢沟桥的和平，华北的和平……到了兴奋处，还有朗笑传出。

远处，夜色罩着的山峦，一排叠一排，像不规则的海浪。

次日，宋哲元仍然兴致未尽，公开发表谈话，对张自忠等人与日本所签定的停战协定予以接受。他说：

“卢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战事不致于再起了。”

满心的欢愉写在军长的脸上，仿佛枪声硝烟已经永远的从卢沟桥头消失，和平真的降临在这里。他抹了抹刚刚剃过的光脑壳，好像在挠痒痒，接着说下去：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吃。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力吾人所能意料。”……

一向讲话不很流畅的宋哲元，今日突然变得满嘴流畅，词语丰盈。

他在倾泻一腔激情！

宋哲元曾经是“长城抗战英雄”，他的名字留在了那一块块民族基石的青砖上。现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他仍然没有失去“抗战英雄”的崇高威望。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企盼着他回来？要他回来像当年鏖战在长城线上一样，带领我们不屈的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只是，今天听了他这番自做多情的为国人描绘的这付太平盛世的讲话后，更多人向他投去了疑惑的目光。毕竟卢沟桥的枪声响得太紧太密，因而也就太隐蔽，宋军长能不能有穿透这枪声的眼力，而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呢？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宋哲元发表“和平演说”的头一天，日本政府已经公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声明。

宋哲元进了屋，摔上了门……

7月雨浇醉了华北平原，一片郁葱葱的高粱苗覆盖着干渴得冒烟的土地。土地吸收水分的吱吱声令人解馋。

积聚的水珠儿卧在高粱叶的小槽里，叶儿颤栗着，却舍不得将水珠洒掉。

雨季，承受不了这压力。

枪声，穿透了雨帘。一个少女在雨中走，没有撑伞……

二十

森林没有背影。

云彩遮不住阳光。

这些日子，日本东京的天气因为阵阵海风反而变得比北平还燥热，沉闷。

海滨的游泳人比往年少了许多。海水寂寞地漫上了滩。

错位……

内阁会议举行之前，依例要先召开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会议。

1937年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这次五相会议就是一个议题：就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关于增兵中国华北的方案统一认识。

读者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这时候，在北平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正兴致勃勃地追到南苑机场见了已经登机准备起飞的日军桥本群参谋长，告诉他：中日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

我们将这个几乎与日本五相会议同时发生的镜头“定格”在这里，两相对比，不仅能看到日本帝国那虚假的诚意，更可以看到他们的奸诈和卑劣。

刽子手在行凶之前几乎无一例外的脸上要挂着狰狞的笑

五相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陆相杉山元的态度十分强硬，他完全可以坐着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站起来了，且手舞足蹈，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

“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我们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迅速派往中国华北。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这儿，他示意让参谋本部的人宣读了增兵华北的那个方案：

从关东军抽调二十旅团；

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

从国内抽调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

海相对杉山元的意见投了反对票。他也站了起来质问：“动员这么多的部队进入华北，如果做了动员，没有必要派兵怎么办？”

杉山元回答说，“这，你可以放心，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事情。”

首相和外相也认为海相的看法不无道理。

杉山元等人经过杜撰、扩大，又提出一个问题：“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在肆意地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侨民。”

为了证实自己的谬论，他们竟然拿出了血淋淋的例证。

正是这一依据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参谋本部的出兵方案得以通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红口白牙地说过“只要我活着就别想有一兵进入中国”这番豪言壮语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同意向中国派遣援军的原因。就连不久前还保证过维护国际道义的首相近卫在这次会议上也同意了向另一国大量出兵。但是，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透露说：“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战斗的军队调动，近卫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点头了。”

的确，当时通过的出兵方案是有这样的所谓制约条件的：必要时实行派兵。但应只限于保护侨民和中国驻屯军的自卫安全的必要时才实行动员；动员国内部队只能理解是当前准备性的打算。

会上，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这位长官还有个建议：将向华北“出兵”改为“派兵”，也被会议采纳。

绝不仅仅是几个字的改动，它标志着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升级的缺口一旦打开。很快就呈现着蔓延、泛滥之势，日本帝国一天一个态势地向全面侵华战争发展。

下面，我们用时间排队来透视日寇是怎样搞“战争升级”的7月11日15时20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获得通过，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

7月11日16时，首相近卫、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和陆相杉山元，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天皇批准了他们的奏请；

7月11日17时15分，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参见天皇，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得到批准；

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竭尽全力为他们的武装侵略行为进行无耻的辩护，声称。

“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我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29军虽

曾尽力和平解决，但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其第一线的兵力……。他们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谈判……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对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7月11日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载仁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五十六号”命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所辖的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空军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讯、汽车等部队各一部去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并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于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

7月11日19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五十七号”命令。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7月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士和新闻界代表开会，他以按捺不住的狂热口吻宣讲了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决议，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

在此，不能不提到近卫首相，他在极短的时间里以两副面孔出现，先后作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两个决定。起初他坚决反对给华北派兵，眼下他竟然一反常态成了派兵华北的强硬派。这只能说明他对发动战争早就有充分准备和决心，是他用自己无法抹掉的实际行动撕下了蒙在他脸上的遮羞布。

7月11日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准备命令，海、陆、空各军种都紧急动员起来了。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协商后，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其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对于作战任务，“协定”中规定：平津地区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由海军为主担任警戒。在上海、青岛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作战。

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在华北作战，空军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作战，空军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3个师团（最少2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华北平原上，青纱帐在灼人热风里碰碰磕磕地唱着歌。

卢沟桥边，有人用泡沫堆砌起来的和平鸽正悄然地破裂……

雨季未过，聚积在高粱叶槽里的雨水越来越多，沉甸甸的。叶儿在颤栗，它不是承受不了这超载的负荷，而是在向人们昭示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冲击、碰撞……

日本国里，到处被一派杀气腾腾的气氛所笼罩。

原先的所谓对卢沟桥事件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的稳健派的论调一时间几乎绝声，打开东京每天出版的报纸，覆盖版面的基本上全是一个腔调：“以强硬的态度面对中国”，“中国军队又在卢沟桥非法射击”……一股空前的侵华狂潮已经在日本国内一日胜似一日的掀了起来。

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化，告诉人们这是无法避免的了：卢沟桥事变终于要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了！

宇宙不会在嘈杂声中毁灭。

一切事物都在按照合乎自己本性的规律在运转。

没有想到吧，日本军界、政界高层集团里，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反对政府发动这场战争。

何人？

山本五十六。

二十一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帝国海军最著名的战将之一，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法西斯疯狂向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他在日本海军省担任次官。在日军内部是否要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问题上，他站在“不扩大派”一边。

山本五十六对他的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

“陆军中的这些混蛋们，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

山本没有喝酒的嗜好，但非常喜欢喝咖啡和抽烟，尤其对抽烟很讲究。在他宣布戒烟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将在英国时买的上等雪茄香烟送了人。

好像要故意考验山本戒烟的决心似的，这时候他的同乡好友、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回国，特地给山本带回一些英国的名牌雪茄，他说：

“老朋友，上等货，保证你会喜欢！”

山本很认真地谢绝了，说：

“请你替我保管吧，等这次事件过去后，我一定抽。”

“你是说中国的卢沟桥事件？它惹得你动这么大的怒气！”

“这帮混蛋们根本不懂得战争，他们只是想过过瘾而松平恒雄果然把这些雪茄保管起来了。他等着这件事情过去后再拿出来给山本。当然，他更了解山本的脾气：对中国的这一仗如果日本败了，他也是不会开戒抽烟的。”

人们会感到山本太古怪，他为什么舍出如此大的决心“反对”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这除了他对陆军惯有的反感情绪外，还有更深的的一个原因：当时日本正在“满洲”进行以对付美国和苏联为目标的5年战备计划。山本和“不扩大派”认为，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美国和苏联。因此他们不主张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中，而给美苏可乘之机。这样，“5年计划”就有泡汤的可能。

如果谁以为山本五十六是对中国人民发善心，因而放弃对中国的侵

略，那你就太善良了。这个曾经指挥着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整个西太平洋，骄横不可一世的大军阀，同样把中国视为他猎取和征服的目标。只是与一般的法西斯战贩相比，在于他有更多的计谋和理智，因而他就更懂得如何更好的侵略别国。

在关于“戒烟”的事情上，山本还悦了这样一句话：“蒋介石不认输，我就不再吸烟”。

他后来的行动给他这句话作了注释，说明他主张一举击垮中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中国华北心腹要地。日本陆军的这一“成功”，强烈地刺激了包括山本在内的海军战贩们的野心，也给了其动力。他们意识到不管你承认与否，其实日本已经全面卷入了对中国的战争，这时候海军不推波助澜地发动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要想在短时期内击败中国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日本很快在中国取胜了，那是陆军的功劳，没有海军的份。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日本海军给帝国的决策者献策，建议应取消以往以“讨伐第29军”为第一目的、“惩罚中国”为第二目的方针，把“惩罚中国”作为作战的唯一的目的地。他们叫嚣集中兵力在上海会战，在中国的要害腹地给予猛力一击，“置中国以死地”，尽早结束中国战争。

这时，作为海军次长的山本五十六早把“戒烟”的事置之脑后，他开始时刻关注中国战局的发展。

于是，便有了由海军直接发动的淞沪之战。此战历经三个月，中国的几十万大军溃不成军，使上海市区陷于敌手。

在整个日本对华战争的初期，山本为日本顺利增兵做了积极的大量工作，他调动海军航空兵，支援陆军，在前线进行俯冲轰炸，对中国内陆城市进行远距离轰炸。

山本的凶残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戒烟是绝对的骗人术。

当松平恒雄在山本积极参加了对中国的作战后，拿出了为他保管的雪茄时，山本说：“你落后了，我已经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吸烟了。”

山本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拴在日本帝国的战车上，不可能有一个站在帝国对立面的山本五十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亚太、称霸世界充当了罪恶的急先锋。

我们在此剖析山本五十六的灵魂与行动，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国内的所谓“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其实质是一个派：侵吞中国，击垮中国。

中国抗战胜利前夕，山本在南太平洋布干维尔岛上空一命呜呼，魂飘大海。

人总是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的“黑匣子”奋力摔出，一生的谜也就随之解开。

二十二

毫无疑问田代皖一郎中将是酝酿卢沟桥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但是，他没有听见卢沟桥的枪声。当时他病了，心脏瓣膜出了毛病，情况非常不妙，住了院。对于他来说，这是终身的遗憾。刽子手离开枪声那是非

常寂寞的。

在日军刺刀的戮杀中，卢沟桥的事态一天天扩大。田代皖一郎的病情也一日比一日恶化，他报了病危。

这位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病得绝对不是时候。太平洋帝国的这场侵华战争需要他，他也需要在这场灭绝人性战争中作充分的淋漓尽致的表演。现在呢，两厢失望。据说，田代皖一郎躺在病床上念念不忘给卢沟桥派兵的事。

战争的恶棍未圆自己的梦，只有让他的接班人去续梦了。香月清司中将走马上任。

这位继任者就职的日子很可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7月11日。

这一天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那是清晨四点半钟，往日的这时，他肯定还在酣睡，谁晓得这天他起床了，且已经做完了洗漱的一套程序。电话铃响了，很急促，他好像意识到有什么出乎寻常的重要事情，在抓听筒时手有些颤抖。是人事局局长的电话。

“香月老兄，应该先向你祝贺。你已经成为中国驻军的第23任司令官了，今天就到达天津上任。”

对于就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并不太感突然，田代皖一郎病重住院后政府有关头目曾经打过招呼，有意让他去接任。使他觉得突然的是今天就去天津，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我可是连换洗的裤头都没有准备呀，今天就到天津恐怕来不及。”他幽默地开着玩笑，也许他很高兴。

“你不可能不知道政府今日就给华北派兵一事有重大举措要公布。这个关键时刻驻屯军不能没有首脑。什么准备都不能做，设法弄一张去中国的飞机票就行了。记住，是马上！”“是，今天就去上任！”完全是服从命令的军人口气。就这样，日本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从这一刻起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

天一亮，他就开始奔忙了。先是到陆相官邸见了陆相，讨到了指示；之后，又来到参谋总部见了参谋总长，听取其训诫。他们在谈话后几乎都要这样说：今天就飞向中国。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对帝国来说是多么关键的时刻。

但是，11日香月并没有到达天津。天不作美，机票到手后，气候骤变，能见度低，无法起飞。也巧，飞机这时出了意外故障，需要修理。

他不得不在东京滞留一夜。

当晚，他听到了政府发表的向华北派兵的声明。新任司令官的热血沸腾了，一股股热浪直冲脑门，他跃跃欲试，睡意全无，索性坐起来等着天亮。这个声明他应该在中国听到才对。司令官的心飞走了，不是到了田代皖一郎的病榻前，而是到了卢沟桥前线，那儿枪声被掩埋在弥漫的硝烟里……

12日，香月从东京飞往天津。

同行的还有新派到中国驻屯军的参谋堀毛炮兵中佐、桥本炮兵中佐、营波步兵中佐。这伙按捺不住狂心的好战者在飞机上就讨论起了如何对华北进行全面战争的问题，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对“伤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必须尽早地进行惩罚性的歼灭。

飞机在汉城小停，香月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会面，征求

小矶对自己开展工作的意见，小矶的赠言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办法是用强硬的态度摧垮其精神支柱。香月问道：“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小矶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说：“让他们永远记住自己是东亚病夫。”香月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完全明白。

12日11时，天津上空飞机轰鸣。香月在四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飞抵天津。

这时，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和参谋田中隆吉、迁政信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给香月带来的嘱咐是：对于中国除了征服还是征服。

香月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的方针就两个字：“强硬！”必须达到的目的是：“坚决严惩暴虐的中国人。”

后来，若干年后香月这样回忆了他这次走马上任时的思想活动：“在离开东京前，我认为我自己在要扩大的考虑之中，作为军队，即使进行交涉，也必须考虑作战，作战制胜是第一位的。”

香月是领会帝国意图的忠实信徒，他在跑步进行战争准备。

到天津的当天下午3时，他就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的幕僚会议，讨论从此刻开始的战争行动计划。就在开会之前，他单独听取了桥本群的汇报，对卢沟桥的战况已经有了基本的掌握。在这个会议上，香月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对华北作战命令：“全军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如何适应，就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与会者从各自管辖的范围出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接到这个命令后，仿佛得到了腾空飞翔的翅膀，完全是一付渴盼已久的得意神情，他说：“过去的交涉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军事作战方面来。”他狂妄地建议：今晚就袭击卢沟桥。

幕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也许由于与会者野心太大，胃口贪婪，讨论到夜半，也未形成一致意见。直到次日凌晨才做出了《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对今后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

13日天刚放亮，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案头就放着用紧急电报发来的关于这次幕僚会议的情况报告。

“报告”中规定了进入华北各日军的位置：

——军仍以公正态度要求冀察方面实行此次协定，为此，如有必要可能行使兵力。日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20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主要部队的集结位置是：河边旅团主力在丰台通县间，其中北平城内和天津步兵各一个大队，并以步兵两个中队和一个小队警备北宁铁路。独立混成第11旅团位于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通县。航空队位于天津和通县。第20师团位于天津。

“报告”中提出了对29军各部队的治服办法：

——如认为第37师没有诚意，即要求其退到河北省南部地区，若其不同意，即行使武力。如29军的其他部队和37师协同行动时，则使其一并撤退。

“报告”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

——（一）彻底执行镇压共产党的政策。（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

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

如不答应如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 29 军撤出冀察。

“报告”部署了作战的具体步骤：

——待关东军、朝鲜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在 7 月 20 日前后完成作战部署；保证随时可以开始战斗。作战一开始，先以主力攻占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预计未来根据形势，军可能进入德州、石家庄一线。如确认中央军北上，在要求其撤出河北之同时，准备与之作战。军在作战时以一部兵力进入八达岭附近，阻止来自平绥线方面之敌，以有利于军的主力作战。

这个“报告”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很完整具体的一个作战计划，以后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大体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

香月清司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承认：这样一来，战争一定会扩大，其结果要变成全面的战争。

7 月的北平之夜，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在星月下颤栗。

黑色的地平线无始无终。

日军很快就把作战部署变为行动。

7 月 12 日，10 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西开，至傍晚已有五个列车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 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向北平运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仍未依约撤退。

第四章

庐山别墅区不消失的电波·何应钦受命主持抗日全盘工作·张克侠寻机倾吐心声·香月清司设圈套·日本政府发出侵华的最后通牒·宋哲元说：我不是宋哲元·毛泽东称赞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瓜田里的贼兵·宋哲元至死也不放弃“和平梦”·日军炮兵班长的忏悔·范长江站在卢沟桥上·南京政府忍痛割“尾巴”·廊坊失守·佟麟阁、赵登禹以身殉国

—

宙宇似的庐山枯岭海慧寺别墅寂寞无声地躺在徐徐的山风里。从别墅里伸出来的小路上，有几只山雀在悠闲地挪步觅食，就连警卫士兵走来，它们也不怯生，依旧忙着吃食，它们饿极了。庐山别墅区在最热的季节整个气氛就一个字：静。

当然，别墅里面就不定然了。

蒋介石仰卧在躺椅上，双目微闭，嘴角轻抹着一缕不易觉察的愁云。他在沉思什么……

这已经是卢沟桥事变的第4天了。蒋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裕仁天皇抛到中国的这只闷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毒药？良药？当然他相信不会是良药，但真要他断然结论这个岛国投来的就是致于中国以死地的毒药，他看还不好这么武断。毒药也是分等次的，能把你毒得昏迷不醒，也能把你毒得半死不活，以至毒得一命呜呼。蒋某人再糊涂也不会相信日寇能够发善心，给中国送来友谊，可要让他横下一条心去和日军决一死战，他似乎还缺少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决心。

矛盾的心态加深了他对日寇的气恨。从仰身躺变成侧卧，双腿曲卷起来，眼仍然没有睁开。没有头绪的沉思使他非常烦恼。

天气太热，闷得心慌，他让服务员打开了窗子，顺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芭蕉扇摇起来，有气无力地摇着，摇着……仿佛要把不属于他的所有思绪一概摇走。

他的眼睛始终未睁。

陈布雷悄悄地走进来。他手里拿着文件夹，在蒋介石身旁止步，打量着总裁。当他判断他确实没睡时，又往前走了一步准备说话。没想到蒋介石抢先他一步开了口：

“布雷，有事吗？”

蒋闭着眼从走路、动作的声响中就能辨出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也是一种本事。

陈布雷忙递上一份电报，说：

“宋哲元发来的，刚刚收到。”

蒋介石忙扔掉芭蕉扇，接过电报看起来，显得有点急不可待。刚搭眼一看，他的眉毛就皱了起来……

宋哲元给蒋介石报告了目前与日军达成“停战协定”一事，逐一列出了所答应的日方几项要求：同意向日军道歉，并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宛平城内和桥头不驻中国军队；取缔抗日团体。等等。

蒋介石是按捺着时刻都会爆发的怒火看完电报的，他将电报向桌子上一扔，随手抓起芭蕉扇摇起来。说：

“这个宋哲元简直昏了头，准让他签订和约的？出卖国家，他宋哲元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答应了！布雷，请你马上通知日本驻华大使，任何和约，未经中央核准者，一律无效！”

蒋介石抗日的最后决心虽然一直未下定，但是从事变一开始甚至可以说从日寇的铁蹄一踏进中国的领土起，他就明白一条：任何时候对日寇都不可失去警惕性的。为此，在事变一发生时他就特地给宋哲元发了那份要他“固守勿退”的电报。现在看来，宋哲元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行事，起码是领会不深，贯彻不力。

这仅仅是蒋介石的推断而已，其实，宋哲元有他自己的思路 and 心迹。对于蒋的电报也许他领会得很透，不是不办，而是时候未到；也许他压根儿就把那份来电当成一张废纸，不屑一顾。总之，蒋眼里的宋，或宋眼里的蒋，都不是随意捏揉的玩物。

看到自己的电报像废纸一样被宋抛之，蒋介石很恼火，巴不得将宋哲元召唤到眼前，责问一通。转而，他又一想，不妥。火气再大也难以把宋哲元已经放进日军设置的河道里的船扳回来，现在急需要做的是设法让他立马刹车，不再前行，于是他把秘书叫来，说：

“布雷，马上给宋哲元回电！”

他开始口述电文，陈布雷记录：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1.28）之战，本于开战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使已受欺。”

电报发出后，蒋介石沉重的思想包袱并没有减轻，从某个意义上讲，内心深处的忧虑又增加了一层，和约已签，自己又去责难宋哲元，会有什么好结果吗？说不定狼进了屋不消说，还给自己面前垒起了一道高墙，求人解救的道被堵死了。

蒋某人什么时候遇到过如此多的矛盾？他的心确实实一刻也无法安静下来。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却又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

“布雷！布雷！”

刚刚发报归来的秘书又被蒋唤到身边曰：

“你通告他们赶快到我这儿来开会。”

“都是哪些人？”陈问。

蒋点了一串名字。

当日下午，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相聚在庐山这栋豪华的别墅里，协商对策。会开得很短，短得有些匆忙，但极为重要。蒋介石的主持词短到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说：

“卢沟桥地区的局势严峻得不容我们有丝毫的疏忽，请各位来就是要协商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循的对策。”

你一句，我一句，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依据，但是谁都没有超越出蒋介石的思考范围，他们都能揣摩到蒋的心里去。所以很快就确定下了这样一个方针：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蒋介石说：“基于这个方针，我们应扩大作战的动员范围，做些准备。”

为此，他签发了以下几个命令：

命令驻防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国民党军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线集结；

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段的防守；

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各汽船公司将船只回航到指定地点备用；

命令在南昌的中央军飞机 30 架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命令孙连仲所部和庞炳勋之第 83 师集中在保定，准备在永定河与沧县至保定线作战。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如果以为蒋介石有了这“应付之方”就万事大吉了，那就大错特错。他最担心的还是卢沟桥前线，具体他说就是宋哲元，这老兄脑子里缺根弦，必须时时提醒点他。这样，就有了这一天蒋发给宋的又一份电报，电文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们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券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蒋介石在电报的最后再次令宋哲元移至保定，免受日本人包围和迫害。

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还让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会晤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久郎和副武官大城户。没想到，日高先发制人，说：

“我们刚刚奉了外务省命令，正要前往中方外交部会晤阁下，没料到你们是捷足先登了。”

王宠惠说：“既然如此，就请阁下现在就把准备好的话都说出来。”

日高：“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中央军及空军或已出动或准备出动一事深为忧虑。但是忧虑不等于惧怕，我们已抱最大决心，以谋应付！”

王宠惠：“不，应该反省的正是日方。你们一面声明所谓不扩大的方针，关东军的兵车一面络绎不绝地进入山海关，言行不一，蓄谋着扩大事态。”

日高无话可说了。

王宠惠接着提出了建议：“如果我们都有诚意不愿事情复杂起来，应该立刻按以下两种方法办：（一）双方出动的部队各回原防；（二）双方立即停止调兵。”

大城户非常果断地对王宠惠的建议予以否决，他说：

“如按照部长之意去做，反而会使事态恶化。你所说的将出动的部

队撤回原防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实为不可能之事。本人是军人，深知军中的事。再说目前日本政府在华北的军事部署，是为防备万一之计。所以，部长所提的事难予同意。”

外交官员的会晤就这样“搁浅”

蒋介石发怒了，一拍桌子，说：

“你不仁我也不义。我们的军令从现在起就变为行动，部队按原计划出发！”

于是，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北上，增援平津地区的第29军……

二

又是一个深夜。又是那位住在永定河岸上的老人。他来到河道上，跪下，面向桥头，祈祷起来……

石狮们不会不动容的。在老人的心目中，那一个个有生命有灵气的活物。它们如果躲过这场刽子手发动的战争硝烟，会摇头摆尾地从石桥上走出来，扑进卢沟桥的衣人家里，人们把它们奉养起来，它们为人间消灾免难。

可是，石狮们的命运里遇到了黑烟，谁知道它们能不能顺当地走过这场战争？

老人很虔诚地祈祷着……

远处，有枪声。很遥远，好像在地球那边。老人却觉得自己的心似乎被射穿了不由得浑身一抖擞……

夜，卢沟桥又恢复了它惯有的宁静。

双膝跪地的老人在无声地流泪。

不甘心倒塌的命运。

不情愿截断的小路。

不会扭曲的目光。

一道黑色的闪电，扑向天外的大外，老人的心随之颤栗着。

三

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于7月10日从四川飞返南京。主持抗日的全盘工作。

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他往在遥远的庐山，一切都遥控指挥，总不是个办法。一个电令把何应钦调回了南京。

何应钦感到担子很重，在这样一个各类矛盾交错出现，弄不好就会人仰马翻的不同寻常的关键时刻，让他鞍前马后地来应付这种很棘手的局面，绝对不是个好差事。但是，他不能推卸。国家遇难，总裁信任他，他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变成一根柱子，去支撑说不尽什么时候就会倒塌下来的天。

他就是以这种虔诚接受了落在肩头的重担。回到南京政府在自己那已经变得有些冷凉的椅子上坐下后，何应钦首先进行的工作不是去了解掌握情况，而是逢人就急于表白自己的诚心、决心，他说，“只要总裁这棵大树不倒，中国的天就不会塌下来。我们大家都是小草，借了他的

光才得以在大树下茁壮成长，所以，我们有责任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协助大树，使它支撑得更牢靠，更持久。”

这是矛盾百出的、逻辑十分混乱的一番话，既相信大树足以支撑天下的能耐，又要大家协助官使其支撑得持久些。其中的虚伪和矫饰，思想他在前不久的西安事变中那种幸灾乐祸的表现，也许就不足为怪了。

人往往在公开宣称自己不惧怕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最害怕什么。“心怯嘴硬”，这四个字总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一点是不须怀疑的：何应钦竭尽全力在完成蒋介石赋予自己的关于主持抗日工作的任务。

11日晚9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官邸召开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件事：

战车防御炮和高射炮部队的编成与使用问题；

弹药、粮秣的准备与储存问题；

在太原设立航空模拟的决定；

部分部队调动事宜；

等等。

作为第一次亮相的全盘主持抗日工作的领导，何应钦自然不可能不讲话，不过，不是“就职演说”，仅仅是再一次虚张声势地表白他对蒋介石的赤诚。他说：

“总裁相信我们，才把这副重担放在我们肩上。我们要齐心协力做好每一件应该做的工作，让他在庐山安心休养。当然喽，他是不可能休养的，据我所知，他在山上每天亲手处理的事情绝不比在南京时少。今天这算是第一次开会，有些更具体，也是更复杂的问题，我们留在下次会议再商讨。本人能耐不大，还望大家多献策，多指教，我在工作中少走些弯路，少出些闪失，抗日工作就会更上一层楼。拜托各位了。”

抗日工作“上楼”？咋个“上”法，什么叫“上楼”，他没说。想来他也难说清楚。

当晚，何应钦把开会情况向庐山作了汇报。蒋介石有什么指示无法得知，但是，次日召开的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是按蒋介石的意见开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此次会议决定的几件事更紧迫因而也就更重要了：

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任务是宣传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主张；

如果宋哲元因环境所迫要求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日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需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

如果29军需要子弹、武器和其它援助时，中央可以源源补充。

……

这样，宋哲元就成为南京政府所关注的焦点人物了。他们寄希望于他，又总是担心他们会使他们失望。蒋介石最担忧的是宋哲元能否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理解他的思想。

宋哲元呢？既然敢和蒋介石耍腔调，就更不会把姓何的当回事了。他仍然没有将脚板稳稳实地踏在自己瞅准的一条路上，还在摇摇晃晃

地走着钢丝，对日军不亲不和，对蒋介石不推不靠。最使国人揪心、忧虑的是，说不准某时某刻他收起已经打开了的刺刀，将那些垂涎三尺的狼狗放进来。

他会这样吗？

还没人敢下结论，宋哲元就能有意于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大逆不道之事。就怕他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引狼入室。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从乐陵回到天津的第二天，宋哲元就交给了张自忠、邓哲熙一个任务：

“从今以后，香月也是这块地盘上的一个头面人物了，你们去看看他。”

他并没讲明是哪块地盘，也没说清怎么个看法。但张、邓二位马上就明白了。军座是要他们去“摸底”，去蹚路。这任务太艰巨也来得太突然，他俩不敢、也不愿意揽在肩。两人谁都不吭声，假装没听懂、没听见。

屋子里气氛很不自然，寂静中透着紧张。

完全可以理解此刻张、邓两人的心情。想想吧，香月比田代皖一郎是刚还是柔？是一只狼还是一只比狼更狠的狼？他们心中一概没数呀！他们不怕吃闭门羹，他不见转身回来就是。最怕的是碰得头青面肿，那样就不仅仅是他俩的难堪了，连宋军座脸上也无光了。

可是，宋哲元显然缺少对张、邓两位设身处地的着想，他又很严肃地重述了一遍他的话：

“你们安排个时间去看看香月。”

张自忠再不能装聋卖傻了，他试探着递上一句话：

“初见香月，军座是否考虑一下，谁去合适，规格不能低。”

宋哲元忙说：“你们先去探探，随后我再去见他。”

宋的一句话又把张自忠的后路给堵死了。

双方明明在游戏或者说在猜谜。该去的不想去，不该去的自然想溜号，最后的结局是：张、邓来到了香月的官邸。

这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小洋楼，一圈槐树的浓荫将窗口遮掩得严严实实。

香月坐在窗前的桌旁，似乎在沉思什么疑难问题，他并没有起身迎接客人，只是冷冷地笑了笑，就算和张、邓打了招呼。

这时他的高级参谋和知鹰二走了进来，很傲慢地说：

“二位有何高见，请尽管说来，司令官委托我全权处理。”

张自忠欠身忙说道：“当前华北的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军长让我们前来与司令官协商缓解的办法。”

张自忠说到这里，特地望了望坐在旁边仍然沉思的香月，他这话是说给香月听的，希望香月听了能有个反应。谁知，香月连眼皮也没抬，根本不搭理这位客人的话。

倒是和知开了腔，说的却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翻开你们的历史看看，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

对于这种无知的狂言，张、邓二位听了直发笑，真想回击一下这个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洋鬼子，让他先好好学学历史再来说大话。可是，细细地一思，他们马上就回味出了这句话的味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

在拐弯抹角地告诉我们，华北局势紧张是因为中国在北平驻了军队。笑话，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日本军队再开进去，天下就太平了？

张自忠本来还想回敬几句什么，但是一见香月已经不耐烦地站起来准备要走的样子，只得把快出唇的话又咽了回去。

“摸底”没有所得，败兴而归。

宋哲元心里原有的那点底数因为这次不得要领的“摸底”而变得更飘渺了。他有几分恼火，说出口的恼火。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事，干吗要小心地看洋人的眼色？活得太累！

他在屋里气势汹汹地踱着步。好吃力，好像在攀登一座他压根儿就不想上去的山，却被人逼着，由不得他。

电话铃又响了，南京长途。

随员告诉他是何应钦找他讲话。他没好气地说：“让张克侠去接。”

张克侠不太情愿地走了过来。

听筒里传来了何应钦急促的声音：

“克侠参谋长，你请军座接电话，我有急事，很重要的急事！”

坐在旁边的宋哲元直摆手，显然他听见了话筒里传来的声张克侠马上随机应变地说：“他刚出去办点事，我会把你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他的。”

何应钦说：“我们接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日本已经颁布了全国动员令，他们侵略中国的这一步棋现在成了定局，我们不对付他们就要吃大亏。鉴于这个情况，请宋军长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张克侠：“我一定转达！”

何应钦：“丝毫耽误不得，放下电话就去找他。”

其实，这时宋哲元已经悄不声地站在了电话机旁，见张克侠放下了话机，说：

“我全听见了，你不必再给我重述了！”

“可是，这确实是急事，大事，咱们总得有应急的措施啊！”

“措施？你说该有什么措施！”

张克侠见宋哲元在装糊涂，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怒气，便不由分说地将刚才何应钦在电话上讲的话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陈述了一遍。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让宋哲元知道南京政府对宋的要求，那就是自己犯了大错。讲完后，他特别加重语气地说了一句：

“准备作战！这是南京的指示，要我们准备作战！”

宋哲元仍然陷在他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五里雾里，用怀疑的口气反问张克侠：

“难道他们不执行‘秦——松协议’了吗？”

张克侠忙说：“我们和日本签订的协定还少吗？他们遵守过几次？这些人面兽心的刽子手在他们拿着大刀逼着别人和谈、停战的时候，早就用刀尖把‘协定’戳得千疮百孔了！”

宋哲元不语。

张克侠知道宋还在犹豫，就进一步说出了埋在自己心底的一席早就想倾泻却一直没有机会与宋说的话：

“现在真正到了民族存亡的关头，日军逼着我们战斗，民众呼唤我们战斗，我们的良心谴责我们战斗，不战将成为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按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

部队来到之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

宋哲元听得很认真，可以看出张克侠的每句话都沉了他的心理。这样的道理，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很少听见人讲过，灌满的他脑子的尽是谈判、和解；和解、谈判。……

张克侠继续讲了下去：

“不是我们不和、不谈，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打我们了，我们不还手，人家会打得更狠，更惨。还击，我们则有可能取胜，消极等待，就惨败无疑。”

宋哲元心有所动，他说：“好吧，言之有理，我听你的，你给我写个作战计划。”

张克侠便迅速地去拟定作战计划去了。

这时，另外一部分人围上了宋哲元，他们就是亲日分子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等，这些人七嘴八舌地对宋哲元说：

“军长，现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和不和就在你一句话了，蒋总裁‘不挑战，必抗战’的方针，依我们之见，其核心是‘不挑战’。和是大局，和是人心。”

宋哲元听罢直点头，他觉得这些人的话也有道理。

糊涂。他不是装糊涂，而是的确不知道在怎么办……

也许有一个情况宋哲元不知道，这些汉奸的“劝告词”在事先都与日本特务秘密商定过。眼下，日本需要谈判，需要拖时间。因为他们的援军还未到。

四

国民党中央军继续向平津地区靠近。

飞扬的尘土卷着行进的队伍。

战车，炮群，骑兵……

五

中央军的动向牵动了日本国的注意，他们不仅仅是关注，而是认真地对待。

7月13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暂缓国内师团的动员，仍然坚持“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

同一天，日本陆军中央在《处理华北事件的方针》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他们要“退”了。

这自然是表面现象。

日本军当局的这一决定，显然是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缺乏派兵借口，担心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

二是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尚未到达华北，担心中国军队北上，使驻屯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他们肯定是要跑向战争的。需要考虑的、或者说需要调整的是开跑的时间定在何时为好，开跑后的步伐是慢一点好还是快一点为好。选择

时机不等于犹豫，更不是改变初衷。

日本政府在做出了“退”的决定后，准备侵略中国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下。

敌人设套子，不奇怪，就像狼的本性要吃人一样毋须去追究这是为什么；问题是偏偏有人不懂这个常识，把敌人的套子当成睡袋，毫无设防地钻了进去要高枕无忧。

宋哲元一贯乞求和平的思想有了土壤，他自认为这是一块沃土，便把精心培育的新芽栽了进去。

宋哲元提出：“既然日本退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让。”怎么让？他自然有主意。

这时，有人提醒宋哲元：日本人是在实施并吞中国的缓兵之计。披着羊皮的狼容易迷惑人，我们可不要上当。

宋哲元回答：狼披上了羊皮，这说明它还有做羊的愿望，我们为何不让它变成羊呢？

他企求和平的决心是别人无法撼动的。

7月13日，也就是日本决定了要“退”之后，宋哲元决然地下了一道命令：

从14日起

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

解除北平戒严；

释放被捕日人；

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是“善良”的，他唯恐日本人了解他的一番好意。

人家不领情这岂不是自做多情吗？于是，他特地把自己签发的这命令通报给日军。

日军是如何回赠宋哲元的“善良”心肠的呢？

香月清司看了来的“命令”后，脸上木木的，没有任何表情。眼睛只是盯着一个地方在沉思，好像在打捞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最后，他对他的左右随从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宋哲元还欠着我们一笔债，那个七条他并没有接受。现在，他是想用这个命令来代替七条，大大的狡猾！”

香月所说的：“七条”，就是他在幕僚会上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的七条要求。条件太苛刻，当时宋哲元难以接受，一直拖着。

这时，香月见宋哲元送来了“秋波”，便得寸进尺的提出：必须接受七条，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日方代表带着香月的“圣旨”来见宋哲元。

宋哲元的额上沁出了汗珠，他好紧张，好为难。答应吧，别人会骂他丧权辱国；不答应吧，日军会像抵死一只跳蚤一样企图抵死他……索性，依了吧，于是，他心一横，牙一咬，说：

“七条我可以接受。不过……”

日方看出宋哲元有难言之苦，便马上问：“宋委员还有什么要求，请尽管讲。”

宋：“我希望延缓执行。”

日方代表：“你的意思是有些事情双方还要商议？”

宋：“对，就是这个意思。”

随后，宋派出了代表，日军也派出了代表。谈判——宋哲元特地叮咛是“协商”。看来他现在很怕提到“谈判”，这两个魔鬼似的字不给他吉利。

“协商”蛮顺利，很快就取得了以下的结果：

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组织；

处罚卢沟桥中国驻军的营长；

北平城防由第38师担任；

由中方代表秦德纯向日军道歉。

宋哲元该满意了！原先日方：一直坚持要他道歉，现在有了秦德纯这只替罪羊，他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脸面会遭到日本人的耻笑甚至侮辱。当然，他也有几分愧意，秦德纯毕竟是个在北平地面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让他替自己去受辱，总是于心不忍的。

宋哲元不以为自己是向日军让步，他觉得他所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与日军的交涉中又有利有节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日寇的野蹄明明又残忍地践踏了一番中国的民心，宋哲元却认为日军是深明大义地“退让”着。

无论如何不能把天狗吞吃月亮描绘成一幅充满诗意的油画。

六

一方退让，另一方逼近

7月15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制定了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近期、远期目标十分清楚：

第一期：迅速用武力讨伐第29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

第二期：预计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待增加兵力之后再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军决战。

“作战计划”详细地部署了日军的行动：

“在7月20日前，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一部在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第20师团在天津、唐山、山海关地区展开……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郊的第37师，根据情况对南苑的第38师一并攻击。以第20师团随即将132师击溃。在陆军攻击之前，先以空军航空部队主力对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和南苑进行空中攻击，尔后协助地面作战，并随时迎击中国空军的作战。”

就在这份完整的“作战计划”诞生的时候，受命参战的日军正长驱直入地向目的地直逼：

已进入华北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由原驻地向着作战前沿阵地行动中。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酒井镐次少将指挥下，于11日夜从东北公主岭出发，13日到达承德，经古北口16日到达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铃木重康中将指挥下，正日夜兼程地向高而营集中；第20师团于11日紧急动员，16日由朝鲜出发，向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前进；驻屯军旅团步兵第一联队主力位于丰台，其余在通县和北平；步兵第二联队主力、炮兵联队主力和骑兵团、工兵团，预计在18日可到达通县集结。

日军在拼尽心力把他们的“作战计划”变为实际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军队的行动会对他们造成的障碍。陆相杉山元有个规划：7月19日之前驻屯军可做好作战准备。用他的狂言说就是“万事俱备，只待进攻”。为此，他的策略是：一面与中国交涉，拖时间，一面又必须把这种交涉变为有限的交涉。这就是说：我既要拖住你，不能让你向我开枪，又要牵着你，随时都能向你射击。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多数人急于发动战争，狂人杉山元自然是挑头者。杉山元和第一部长石原交换意见后，提出了与中国政府“有限期谈判”的要求。这时，石原再也不坚持自己“不扩大”的意见了。

17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首相因病未到会。会上，杉山元代表陆军中央部提出和中国政府进行“有限期谈判”，及其具体意见。对此，外相、海相和藏相持反对意见。杉山元坚持自己的主张坚定不改。经过争论后，通过了杉山的提案，杉山元还提出了预定在19日动员国内30师团进入华北的意见，也获得会议通过。

经过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陆军中央部的有限期交涉内容及要求是：

一、规定7月19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1）要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责任者，罢免第37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主山附近的的中国军队；（4）7月11日的停战协定改由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29军。因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到来时所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

三、在期限满了以后，即使中国方面履行我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第29军退出永定河东岸地区。

四、本帝国一贯期望把局面局限于华北，并求得就地解决的意图。因此，向南京政府提出：如果中央军恢复匪状，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妨碍就地解决。

这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通牒。

也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大城户三治大佐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提出通告：“中国中央军如果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的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完全由中国方面承担。”

还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强词夺理地宣称，在华北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日军受到“威胁”。因此，日本增兵华北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华北是“扩大事态”。日高通告国民党政府：（1）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和行动；不得妨碍在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于7月19日答复。

又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29军提出了限期要求，限定7月19日前答复驻屯在13日决定的七项要求。

7月的黑色，黑色的7月！

七

宋哲元惴惴不安的心境一直没有得到抑制，而且在一天天加剧。给

人的感觉是，华北地盘上的大大小小事情全揽到了他的怀里，每一件事都难为着他，熬煎着他，使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是决策者，涉及到对日交涉的事，必须他拍板。不能没有宋哲元，华北的天地需要他撑着。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人们确实都这么认为。

宋哲元难当呀！

这不，眼下日军提出要他答复七项要求，要他向日军道歉。说实话，让他痛痛快快地答应日军的这七条，他没这个胆量。至于要他去赔礼道歉，这并不是太难的事，不就是低一下脑袋，说几句谴责自己的话吗？这好办，能做到。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全局，宋哲元不会在乎个人受辱。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宋哲元毕竟不是在地里锄苞谷苗的庄稼人，我是29军的军座，是坐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头把交椅上的首脑人物，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宋哲元不是宋哲元。这话不好理解？其实真真切切就是那么回事。宋哲元就不是宋哲元嘛……

他在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罢，就这么一回，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求个和平……。”

他就这样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宋哲元找张自忠请求；老弟呀，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张忙说：我听你的。

不必研究目的和办法，这些日方会都作为现成“礼物”放在了那里，现在所缺的是拿着这些“礼物”怎么送到目的地。路线也不必自己选择，日方都清清楚楚地指给了你。

宋哲元说：“今晚休就答复桥本群，我们大体上承认他们的七项要求，该办什么手续，全由你主办就是了。”

张自忠不能不接受这个重托，但是，他也不能不提醒军座一个问题：

“日军给我们的最后限期是7月19日，今天才是17日，就是说还允许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事情。”

宋哲元：“不必等到最后的日子了，这档子事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压在心上总是个沉重的石头，把它早早揭去了，就可以轻松地干点事。”

张自忠不语。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接下来，宋哲元就该和张自忠谈谈如何向日方道歉的事；他说：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特别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要找你谈谈，你是我信得过的人。”

这话极是，张自忠承认。不过，今天这事让他作难，不要说对于道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更无法代替军座去道歉。道歉也是有个规格的。

显然，宋哲元猜到了张自忠的心事，便一语道破地说：

“我没有让你替我履行这件事的意思，而是想请你谈谈，我何时去道歉，怎么个去法，这些你总该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这么一说，张自忠倒真想起了一件事，便给军座献策道。

“昨天田代皖一郎病逝，日方已决定18日为他举行葬礼，按惯例这葬礼是非去不可的，就乘这个机会你去见见香月，该说的话说出来，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宋哲元高兴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就这么办！”

他终于长长地吁了口气。

高天上，一排小鸟斜着翅膀飞往极远……

宋哲元与香月清司的会面具有三重意义：

为田代送葬；

向日方道歉；

拜见香月。

应该说，香月的态度还算热情。他的傲慢在这之前已经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鹰二在张自忠面前抖完，现在该他出来圆场做好人了。对宋哲元的来到，香月是这样理解的：这是没说道歉词句的道歉。所以，他很欢迎，说：

“很荣幸见到宋将军，中日两国一水之隔，本该是朋友嘛。我来到华北任职，人生地不熟，离开宋将军关照我是寸步难行。”

香月说着拿眼睛的余光斜视一下宋哲元，他很想知道宋对自己的话有何反应。

宋哲元极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觉得两只手放在哪儿也不合适，便举起双手互相搓了搓，说：

“阁下太客气了，我们的关照谈不上，倒是要请贵军高抬贵手，我想阁下对贵军在华北的作为不会不了解吧，民众积怨太深，我们虽然做了许多解释，也……。”

香月忙打断了宋的话，他极不情愿宋在这时候讲这些事，说：

“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让变为昨天的历史，相信我们还会有美好而愉快的合作的！”

宋连连说：“是的！是的！”

香月该露杀机了。时机一到，他就威胁宋哲元说：

“陆军省已经来电催问贵国限期答复日方七条要求的事了，至今未见贵军的正式答复，不能不令人焦急。当然，我的焦虑肯定是解救不了宋将军，一旦限期一到，后果就难收拾了！”接下来他便把免除冯治安师长职务、中国军队撤出八主山附近等七条要求又喋喋不休地重述了一遍，话语里充溢着要挟和火药味。

宋哲元说：“这些条件我们原则上都接受，只要和平有望，中方是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

香月说：“好，人都说将军是个痛快人，今天我领教了。和平有望，这话说得好！中方接受七条，和平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宋哲元的激情在拜见香月时被鼓荡得心花怒放，他真恨不能变作一只喜鸟，将自己与香月的谈话通报给更多的国人。

他自以为满载而归，红扑扑的脸膛像喝足酒一样滋润，逢人就说：

“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卢沟桥争端已无问题！”

长长的黑夜还夫过去，幽幽的暗影又要来临。

参加完葬礼的第二天，宋哲元乘专车从北宁线离津赴平。香月赶来送行，劝他：

“宋将军，你别去北平，到别的地方落脚或索性就呆在天津也好。”

宋哲元并没有细想香月的劝阻是什么意思，香月也没有说明他为啥要操这个闲心。也许说者和听者都把这当成了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宋哲元对香月说：

“我必须到北平去一趟，好督促部属们遵守协定。总不能我们在这里讲得好好的，下面各行其事嘛，”

香月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

列车随着震耳的铿锵声稳稳地西行。

一阵刀尖在玻璃板上划过的刺破耳膜的怪叫声从荒原上响起，列车猛地一栽，停在了杨村西侧的大桥边。

什么事？宋哲元问，他的心加剧了搏动。

随员报告他：桥下出现了地雷。

宋哲元的脸色瞬时变得苍白。

幸亏都是些没有安装引信的地雷，使宋哲元免于灾难。

后来弄清了，这是日本人搞的鬼，只不过掏钱雇来埋地雷的人都是中国老百姓，他们有意胡弄日本人，没有安装引信。

宋哲元暮地想到了离开天津时香月的劝阻，真不知该感谢他还是恨他。

列车驶过杨村大桥以后，宋哲元仍吓得不住地擦额头的汗珠。

接着又发出了一起绑架事件，那是冲着张克侠的。

日寇收买了张克侠的司机张林阁。没有什么奇怪的，当他看到日本人的怀抱就是他最终的舒适的人生摇篮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背叛了自己跟随多年的主人。日军早已知道张克侠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要谋杀他。张林阁心甘情愿地当了凶手。

这天夜里，张林阁，还有另外 3 个日本浪人，按照日寇的指使，携带匕首、绳索，穿街过巷，来到张克侠所住的东四 7 条 8 号。张林阁是活地图，他不仅知道张克侠的家以及从什么地方越墙最隐蔽最安全，而且还知道张克侠身边没有警卫，张的家里除了他的太太就是两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娃儿。家贼难防嘛！

在翻墙进院之前，张林阁再次给 3 个浪人壮胆，说：“什么也不用怕。进去踏开门就能抓住张克侠。”

一个张克侠可以从日寇手里换得白花花的银元一大堆，张林阁早就馋得流口水了！

可是张林阁和几个浪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翻墙入院后，就被一个壮汉发现，这汉子身强力壮，精通武术，他立即与 4 个歹徒展开了拼斗，一个浪人被打伤，躺在地上直抽筋。另外 3 个歹徒见势不妙，七撞八碰地拉开大门，匆匆逃却。

这个壮汉叫路明，是传令班的班长。

原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对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展开了强烈的攻势，时不时有党员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张克侠与党组织之间联络人的中共北方局联络部长萧明便建议张克侠加强警卫，以防日寇的暗害。张克侠接受了这个建议，便抽调传令班班长路明住进了自己的小院内。他的家里从此有了警卫员。

张林阁跳进张家住宅杀人的事很快就在北平风传开来了。正义的民众都在谴责日军的卑鄙、阴险行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地雷炸桥、入院杀人，他们就是要加害坚持抗日的 29 军的高级将领。

地雷没有炸着宋哲元，宋长叹一声：万幸！

歹徒没有杀掉张克侠，宋又是长叹一声：万幸！

这两个“万幸”加在一起，也没有把这位军座惊醒，他仍然对“和平谈判”抱着希望，他仍然忙忙碌碌地与日军交涉。

就在他进行一系列的“和平使者”的工作时，当然不可能不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北平的气氛与天津迥然不同，卢沟桥前线两军在对峙；北平城在戒严；所有的部队都在备弹药、挖工事准备作战；市民们出出进进表现了极度的不安静……

宋哲元心理很乱，情绪很躁，身体很累，他对随员说：“把门窗都给我关上，我要睡觉！”

八

蒋介石把办公室搬上了庐山，把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公务带进了别墅。

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蒋总裁无暇疗养。

夫人宋美龄坐在丈夫对面感叹道：

“这是休息吗？不是！政府任何一件本来该你知道并要你最后定夺的事情，现在并不因为你上了庐山就越过你。想想看，这些日子里，接二连三追上庐山要你决策的事，你推卸过一回吗？”

夫人不是发牢骚，而是心疼丈夫。他确实太劳累了。

对于夫人的这番感言，蒋介石听见了，但没有理会。稍停，他只是说：

“该我拿主意的事，我原本就不该推卸，也不敢推卸呀！这，不难，我能做到。困难的是，我在拍板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胆小了，多疑了，前怕狼后怕虎，好像脚下的每块地上都埋有地雷。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夫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着丈夫。但是，很快她就笑了，说：

“倭寇入侵，国难当头，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这国人人都知道，我看得更清楚。大家不会亏待你这份珍贵的责任感，起码会把你对中华民族的这份良心牢记不忘的。”

蒋介石忙摇了摇头，并伸出手摆摆，说：“个人的名利荣辱我不图，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安然无恙地走过这个危难岁月，我比什么都知足。好啦，咱们不谈这些了，我还要批阅会文，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侍从扶宋走下。

蒋介石坐在桌前批阅一份他已经看过的文件。那如椽的大笔在他手里迟迟不敢落下，写不出他早就考虑成熟了的批示。无奈，最后他只好划了一个不很圆的圆圈。

这个夏天他在庐山，心也沉重，脑也沉重，手也沉重……

时间就是这样沉重的过着。

这时陈布雷送来了日本政府提出的那个限期交涉、最后通牒式电文，蒋介石接过立即读了起来……

这似乎是一份读不完，咬不碎的电文，他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但是，他没叹息。日本人提出的这些苛刻的条款实在是欺人太盛。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看了一条，就气恼得不想再读下面的一条，可是他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看下去……

一分电文，他读了起码有一个小时，读出的味儿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他的脑子里满了需要思考的问题，都是一些烫手的、必需立

即决策的火烧眉毛的事。他深感脑汁之不够用，局势太乱，他无法在静态中去处理事情。他需要帮手，不是要人家为他分担忧愁，而是请他们听听他的一些想法。这个世界太嘈杂，但他又不能独处，只有身边真正坐着一位知己者时，他的心似乎才可以宁静下来。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陈布雷。

陈布雷从 1927 年在南昌见蒋介石开始到 1948 年自杀“殉主”，跟随蒋介石 22 年，他抱着蒋、蒋搂着他经历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期间，蒋介石的重要讲话、文章大多出于他之手。可以说在蒋介石的所有秘书中，陈布雷包揽了蒋介石政治舞台上的全部重头戏。不可否认，“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贯串他的一生，但他也有激进、革命、爱国救国的一腔热血。

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写的“名篇”，大多诞生于抗战之后。其中以《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以及眼下即将出台的《庐山谈话》和这之后发表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最为著名。尤其是《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曾与张子纓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一起被时人称为抗战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联璧”。

眼下，蒋介石和陈布雷都不可能明晰地知道这次“庐山谈话”会产生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更无法预测一年后的“告全国军民书”会被国人高度称颂。但是，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都必须肯定，此刻两人策谋、对话，那是为即将诞生的“名篇”铺砌着垫脚石，是在给一道算式的分子加大着含量。

蒋示意陈在他的对面坐下。之后，他摇晃着手中的电文，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处处积虑地谋算我们，难道我们就甘心做瓮中鳖？”

陈布雷立即预感到总统今日会有重大决策出台，心头便不由得产生几分兴奋，说：

“就在我们力求和平之时，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连世界舆论也震惊异常。日寇天天都在逼着我们抗战。”

蒋介石：“近日以来，我常常有一种事态恶化的不祥征兆，恶梦夜夜不断，不仅仅是个卢沟桥，这座桥以及桥头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为何不可能变为沈阳？南京又为何不可能变为北平？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卢沟桥事件的推演，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陈布雷：“日军一面搞谈判，一面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他们要干什么，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的准备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蒋介石：“布雷，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极好，现在是日本人逼着我们抗战，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要真刀真枪地拼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作着记录。

蒋介石将手中那份电文递给陈布雷，说：“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问题谈一次话，你先拟个稿子，我们刚才谈话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当然是越快越好。应该说这个谈话很重要，它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动员军民奋起抗日的谈话，要看出政府和我个人的决

心。好，就这样，现在你就去写，晚上我要看初稿，咱们再一起会议一次。”

陈布雷愉快地答应了。他将倾注全部身心去写这篇讲话。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都会在这时候为抗日出力的。

整个庐山静极了，仿佛只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犹如蚕吃桑叶似地在响动着，那是陈布雷在奋笔疾书……

7月17日，庐山正在召开100多人的谈话会。与会者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联名邀请的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新闻界知名人士等。他们就当时对日外交关系问题及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称之为共同谈话会。16日举行了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谈话会上发表的，后来被国人称之为《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我们从1976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革命文献》第69辑中，引来了全文：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部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来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敲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或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察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是国民党政府自“9·18”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

毛泽东主席在这4天后所著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指出：“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毛泽东还把蒋介石的谈话和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向全

国发表的抗战宣言并列起来，称：“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这次谈话的评价。

还有一个外国人——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谈到了他当时对蒋先生的印象：

“他是一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要说蒋介石没有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那是不现实的。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最终能抗战，而不投降，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人们高兴地看到，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还亲率张冲、邵力子与应邀前来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很诚恳，富有成效。

也是这一天，国民党炮兵第7团开到保定，商震部一个师奉命星夜进驻石家庄。

只有敌人才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这时候每一个中国士兵握着打开了刺刀的枪都会这么想。

19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日本提出的有限期交涉问题，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这一天是限期的最后一天。照会如下：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求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维持。现在我国政府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协商，俾得适当之解决。

像蒋介石的声明一样，国民党政府的照会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事态的阴谋，重申了中国所采取的不得已的、也是必须付诸行动的自卫立场。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从中日双方的刺刀尖上下时地冒出信号。

枪膛里的弹丸静悄悄地窥视着对方的死亡旅程。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发表了“谈话”的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已写，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他把生与死都放在了世纪的天平上，不仅仅是为了秤出自己的价值，而是要显示一种尊严。

他夜不能寝，当窗站立，谛听夏声，体验人生。

远方，三叠泉的流水声徐徐传来……

九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军用枪炮声欢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河边正三在蒋介石谈话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谈话的内容，他似乎连想也没想就说：

“好嘛，让他知道一下自己招来的后果是什么滋味。进攻！”

他肯定是用牙齿咬出了“进攻”两字，要不为什么那么生硬、恶狠。

19日，日军再次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部队发动炮火袭击，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中国军队还击。

双方的交锋持续了近4个小时，都有惨重的伤亡。

正午时分，枪声、炮声渐渐停息。

毒阳喷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着田野。本来并不干渴的庄稼地经过这些天多次的战争扫荡像烧焦了似的显得疲惫，贫瘠。

燃烧的村庄仍在冒着硝烟。

庄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里悄悄地繁衍着。

田头、地角、坟地……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二尸体。

蝉也学会了沉默，泥团似地呆趴在树杆上。

失血的田野！

沉重的土地！

这时，一伙日军兵从被炮弹削掉了一个角的堡里跑出来，饿狼似的扑进了河滩里的西瓜地……

这片西瓜地足足有3亩。日本兵渴极了，七手八脚地摘扯着西瓜在膝盖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着；生的，甩掉，继续去摘……

满地的日本兵，满地的西瓜皮，满地的磕碎了的还未熟透的破瓜……

吃饱了，喝足了，鬼子们开始丧尽天良地做坏事，他们用刺刀把地里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烂，将瓜蔓撕拽得滚了一地。然后，放一把火，烧着瓜地……

河滩上，一位老者挑着一担水艰难地举步移动。一个鬼子举起枪瞄准老人，扣动了扳机，老人应声倒下……

一队中国士兵从河上游追击而来，对行凶做恶的日本兵进行射击。

瓜田里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尸体。

燃烧的瓜蔓冒着湿漉漉的烈烟。

田野又归于死寂……

正是在这种浓浓硝烟的掩护下，日军按既定方针长驱直入地向华北推进——

19日，奉命增援华北的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元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开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结于唐山、山海关；

20日，关东军独立第11旅团主力达到高丽营待命。

至此，日军第1批增援兵力全部进入华北。

华北危在旦夕。

永定河畔，农人们在田里用钝镰刀割着熟透了的谷子，那一阵阵缓慢的声音像叹息一样沉重。

一阵暴风雨把农人们打散。

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从 20 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自由”行动？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为什么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

20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

“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当此时机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

紧接着，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并把在南满洲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管辖下。同时，着手准备进行国内师团的动员，将以前应急动员的第 20 师团纳入本动员，还要进行属于这次动员的有关部队的动员，并把这些部队派往华北。”

天气预报说，卢沟桥地区一连三天都有暴雨。

雷声已经从路的尽头传来……

人的灵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为多余的宣言，多余的态度。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说：

“我错了吗？我成为罪人了吗？打心里说，我是想给国人争来一个和平的没有贼兵的天下，让大人和娃娃都在闻不到硝烟的环境里过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想，不这样做？”

坐在他对面听他发泄的是秦德纯、张自忠、张克侠等。他们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十分的不耐烦，但可以看出内心已经是按捺不住的无奈了。有什么意义呢？日军已经把华北推进战争的深渊了，还在愚蠢地为自己辩解、表白。

宋哲元确实走得很远了。也许他钟爱和平，可和平之神却远他而去；也许他是为了民众，可民众却谴责他的无情。

最可怕的是，他还在继续远去，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民众“着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师椅上，给秦德纯和二张发泄心头怨气的时候，没有一点要收敛自己主张和行动的意思。他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而且继续在挑起事端的事实，断然决定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诚意”。

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记下这个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军正炮火连天地进攻中国卢沟桥前线的军队。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师椅上，说：“我想了好久，我们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项要求，就应该拿个姿态出来，免得让人家又说我们一方面在搞就地停战协定，一方面又在调兵遣将。当然喽，该调动的部队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主办，我是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我们有力争和平解决事端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关于撤退的问题，关于部队换防的问题，还有增援部队是不是都要一窝蜂似地往前涌的问题……”

他列举的这事情无一不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见，只是通报情况，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感到突然，无所适从。

他说：“你们不用表态了，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做法，或者说不完全同意。没关系，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对者很可能不会少。昨天我跟德纯交换意见时，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这还不是等于投了反对票吗？我是这样想的，我问心无愧，我出于公心，我是冒着风险来进行一件许多人摇头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检验我的作为，事实会验证我的行动。我今天把这些心里话掏出来，当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谅解以至支持。……”

下面他还讲了些什么，谁也没有往下听了，因为他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想干些什么事情大家也明白了。

最后，谁也没说话，都默默地走了。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孤独一人。

他表现了出奇的干脆利落，就是在19日这一大，把他考虑再三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的、向日军表示中方和平诚意的措施亮出台：

（一）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

数日的北平城门；

- (二) 命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
- (三) 搁置 29 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
- (四) 向城外增兵的军队开始部分撤退；
- (五) 电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仲等部队停止前进；
- (六) 将“秦——松协定”报请南京政府核议；
- (七) 命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

难道他不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退让换来的是敌人的进攻，幻想描绘出来的是水中明月。

不，他明白，非常明白！

于是，便有了 20 日那个企图把人们的嘴堵住、不叫大家对他在关键时刻的退让说三道四、显得苍白无力的“安民布告”：

“本委员长请假返籍，不幸在本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实系局部冲突。本委员长素以爱护和平为宗旨，以国家为前提，合法合理原则处理一切，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唯恐各界同胞误听谣言，多所疑虑，为此布告，一体周知，各宜镇静，照常安乐，此系国家大事，不可听信谣言，妄加疑虑，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语言的苍白无力反映了他行动的低下廉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任何高级辩护人也难以使他的人格与形象圆满起来。当他预感到从日寇那里难以乞求到他想要的东西时，回过头来又想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宽恕。民众只能用“嗤之以鼻”四个字回答他。

宋哲元是在经过无数次碰壁之后才似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日本人面前一味地退让，要比进攻难得多！因为前进的路是无止境的而退到一定的时候就无路可退了，身后是万丈悬崖。

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也要坚持退下去。当然他不承认这是退，却把它加以美化，称之为：“以退为守”。中国方框汉字词语丰富，有人用它做游戏还真可以玩出许多“超拔”的花样来。

在 29 军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宋哲元的“以退为守”的对策，而主张要“以攻为守”。自然，支持宋哲元的也有。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很是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的态度就是关键的一票了，不管他倒向哪一边，那一边就胜券在握，即使是少数人，也是胜利者。

按一般的常规，他是会站在“以退为守”这一边的。因为这个词的发明者是他。

谁知，他就是不表态，静坐一旁，一言不发，任其双方打嘴仗，辩论不息。真有意思，好像这场由他引起的争论与他一丝关系也没有。

如果再这样无动于衷地静坐下去，连他自己也觉得无聊至极，于是他站起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看，索性咱们不攻也不退，就以守为守吧！”

哄堂大笑！

不，不应该笑。所有的人都应当抱头痛哭。

笑声未止，当天下午 3 时，日军就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和长辛店。

宋哲元的布告还贴在墙上，那上面赫然写着：

“……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

这些字是宋哲元用心刀刻上去的，它不会随风而逝……

十一

进攻卢沟桥前线中国军队的日军给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夺取宛平城。

“夺取？太好听了。最好是摧毁它！总之，要早一天把宛平从中国军队手里夺过来！”

河边在讲这些话时，两边的帮鼓起了包，那是仇恨。

宛平东门的城楼是日军关注的敏感区。

这儿是个制高点，是了望台。沙岗上日军的一切活动都可以从这儿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士兵天天在城楼上观望包括沙岗在内的城外所有日军营地的动向。

鬼子很会算计，他们从各个位置上悄不声的把炮击目标集中在了东门城楼。

守城的中国军队却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制高点会成为敌人眼里的很显露的攻击目标，只是毫无顾忌地观察敌人的活动。我们所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应该包括这样的判断：当你找到消灭敌人的最佳地形时，也许恰恰给敌人送去了一个消灭自己的最佳地形。

日军很得意自己的发现，便不失时机地下达了射击命令，东城楼首当其冲被击中。很快整个宛平城几乎成了瓦砾场。

日军是怎样炮击东门城楼的？又是怎样攻下宛平城的？

再现当年的真实情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站在日军的视角上再现攻击战斗的场面就更困难了。有幸的是，在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王大军专程去日本采访了当年参加袭击宛平城的原日军炮兵的一位班长，这位班长比较详细地回忆了那场攻城战争的始末，非常有参考价值。这篇通讯是用炮兵班长的口述写成的。如下：

“请看，这就是我打的弹痕。”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几张彩色照片递了过来。

彩照上是北京城南的宛平城墙，一张是一个有几个脸盆大的炮弹坑，一张是被炮弹轰的缺口，还有一张是宛平城边我国政府立的保护文物的石刻碑文，最后一句话是：“至今城墙上还留有日军的弹痕。”

他叫绢村初雄，日本静冈县榛原郡相良町前议长，现任町议员。在卢沟桥事变 50 周年到来之际，他在町政府会客室，接待了从东京来访的新华社记者。

绢村今年 73 岁，黝黑的脸膛，谢了顶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种过茶田，后来做了茶业工会负责人、町议会议员、副议长、议长。

“我是 1936 年（2.26）事件发生后随部队被派到天津附近的东局子驻扎的。第二年发生了‘七·七’事变”。绢村在记者说明来意后，讲起了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历史。

“‘七·七’事变是步兵方面发生的事，详情我们炮兵不得而知。事变两周后的7月21日，我们炮兵团四连被调到丰台、西五里店一带摆开了阵势。我们一班（对，我是一班长）在西五里店把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墙。下午2时许，我接到试轰命令。我们使的是一门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这试轰的一炮打在城墙上，留下了照片上那个弹痕。”

“等一齐炮轰的命令下达后，我们把城墙打开了一个豁口。当时城内军队抵抗得很厉害，日军步兵未能从这里攻进城去。后来，我们被调到离城东门只有800米左右的一文字山。上边命令我班向中国军队进行惩罚性炮击，但只允许发14发炮弹。我们头两炮击毁了东门城楼，余下12炮击毁了城东南角楼，这样使日本军队攻占了宛平城。我因有功，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六级）。”

绢村说：“我感到日中全面战争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在中国打了7年仗，许多中国军民死于我们的炮火之下。战后，我像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抬不起头来，对这段历史更是讳莫如深，担心暴露后会受到惩罚。”

“为了赎罪，自12年前起，我便年年参加给在日本死去的中国劳工扫墓慰灵活动。6年前，在滨松市日中友协会长乾善吉开导下，我向同来参加扫墓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坦白了自己的这段历史。中国方面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发动战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身上，遂使我放了心。以后，我也参加了日中友好运动，3次访问了中国，并且到宛平城前凭吊了死去的中国军民。”

绢村在结束谈话时说：“回顾过去，我认识到了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绝不能为了本国利益而去牺牲他国利益。强盗的勾当是干不得的！”

历史是不会原谅绢村初雄的，永远不会。因为他的罪恶太深重了。

但是，当中国人今天看到了他这痛心的忏悔时，又对他产生了怜悯、同情之心。像死在他炮口下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是个受害者。他当年在打死无辜的中国军民的同时，他自己的本来作为人的灵魂也洞穿了。灵魂死了的人，只剩下一个空壳。

不少人都到宛平城去看过城墙上那个弹坑，每次站在那里时，人们的脚步都沉重得无法移动。怨恨涌满心头乃至每个细胞。

今天，读了绢村初雄的忏悔，我们倒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应该感谢绢村。因为他给中国人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岁月抹不掉的罪恶的见证。让我们的记述继续回到当年宛平城那场战斗中去……

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的步兵、骑兵和坦克、铁甲战车，几度对宛平城猛冲猛攻。他们死了心要夺取宛平。

吉星文团长率领官兵顽强守城，寸土不让。

他的耳畔不时地飞过流弹的呼啸声，身边总有炮弹在爆炸。顾不得许多了，他只有一个撼不动的想法：“宛平城不能从我手里失守！”

突然，他感到鬓角一阵麻痛，用手一摸，血！他知道负伤了。不会

很重，脑子还很清醒嘛。他用手在伤口处摁摁，继续指挥部队回击敌人。

血从额角淌下来，滴在了地上。

他不感到痛，只觉得头木木的，热热的。

不久头部一阵剧烈的晃动，又负伤了，他能感觉得出有两处伤情。

这回较重，他去摸伤口，热乎乎的血把整个手都模糊了，脑子仍然清醒着。

他喊着卫生员的名字。卫生员马上跑上来给他包扎伤口……

吉星文只有 29 岁，血气方刚，威武英俊。不是么，瞧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穿一身灰布军装，腰束小皮带，绑腿，显得威风凛凛。此刻，卫生员给他从头顶到颈项都缠上了绷带，越发显示出这是一个压不垮的钢铁军官。

他又冲上去指挥作战了。卫生员急了，说：

“团长，你是头部负伤，需要认真对待，你应该想到如不及时医治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当然想到了，但是我更应该想到的是这时候，一个正在激战中的团长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己的指挥员。”

卫生员无话可说了。

他就这样带着伤情又冲上去了。

敌人的进攻一次次被他们打退。

但是，吉星文没有带着团队继续追歼敌人。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许出击，只能死守。

他们不得不很痛苦地放弃了进攻。

日军最终占领了卢沟桥。

即使如此，吉星文也成了抗日英雄，他的名字上了报纸，被人们到处传颂着。

北平各学校和民先队把学生组织起来带着慰劳信和西瓜，来到卢沟桥前线慰问吉星文和他的团队。头上包着纱布的吉团长拄着一根白色粗棍，接见学生，他对大家说：

“同学们到卢沟桥来慰问，不敢当。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杀上门来，我们只有全力抵抗，一定要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丧失。”他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感触颇多。“你们知道吗？这次卢沟桥战斗，我们只是挨打，人家打我们的时候多，我们还击的时候太少。我至今也不改变自己这个看法，只要长官给我‘相机处理’四个字的命令，我立刻率兵把丰台拿下。如果 3 个小时拿不下来，请杀我的头。总之，我们是抱定了这样的决心：‘城亡身亡，城存俱存。’日军休想花极小的代价，而收极大的收获。”

一个流血的指挥员在倾诉，在控诉！

就在吉星文给同学们讲话的当儿，士兵们已搬来好些西瓜，他们拔出挂在背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嚓嚓几刀，切成多片，招待学生。学生们这才看到院子里西瓜皮堆积如山，便知道慰劳者已经来过很多人。

夏日清爽的风，打湿了士兵的睫毛。

我们在前面写了著名记者斯诺眼中的卢沟桥战场，他是外国人，他的超脱，他的特殊身分，他的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他的认识和结论；现在，我们要把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卢沟桥战地采访后写的通讯展示出来，让人们的思绪和情感重新坠入到 50 多年前的那个真实的环境中去。

这个记者就是范长江，他的脚板与他的新闻作品同等齐名，他跑了许多地方，写了许多新闻名篇。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就立即赶赴前线，到了北平、丰台、宛平、卢沟桥、长辛店……。这篇《卢沟桥畔》就是他在炮火中用脚板写出来的，发表在 1937 年 7 月 23 日天津的《大公报》上。这篇通讯除了记载着作者对当时卢沟桥战场所见所闻外，还有所议，使它有了灵魂，更增添了火药味，把它称之为政论性通讯更确切些。

新闻记者的敏锐和使命感在范长江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卢沟桥战地跋涉时脑子里装上了颇多的问号，这些都在《卢沟桥畔》中反映出来了。今天读这篇通讯正是这些问号引起人们思索更多的问题，因而也就明白了更多的事情。

他写了中国军队一再被日军欺骗的事实，揭示了受骗就是软弱，软弱就会丧失国家生存地本质问题。他呼喊着重，“理从哪儿谈起”——

中国对外一次又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地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冲突。

去年我们军队饮泣退出我平汉、北宁、平绥三路联络要点的丰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汉路咽喉的卢沟桥，又发生重大事件。这真是“理从哪儿说起”？

日军于七月七日夜，攻击我卢沟桥。卢沟石桥乃以东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桥之北，有平汉铁桥平行而立，石桥之东，紧接宛平县城。那时城内仅有二十九军一营，负看守两桥之责。日军七日夜，进入铁桥东端，我军一面奉命守桥，一面奉命对于日军非待其开枪不得还击。这太难实行的双重命令，使宁护卢沟桥的我军，眼看着人家在城周活动，不能出击，现在已黑夜袭到铁桥上来，当然要打了。然而双重命令逼迫下的军队，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开枪。但当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潜过河西的部队，与他们河东的部队东西夹击，我们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卢沟桥便为他们所占据了。

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驻的是吉星文团。他看桥一失守，怒不可当，他负着守护北方与本部各省联络的唯一咽喉的责任，主观上上级给他的命令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客观上这个桥太重要了，全国国民的热望，乃至今后北方对大局所关的严重性，都不容这座桥为人所占有。他本于国民义愤，本于军人卫国的天职，率领他部下悲愤痛哭的官兵，决定前进。八日夜，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雪亮的大刀从皮鞘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安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

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来交涉好的双方于上午九时同时撤兵，由石友三12所统率的冀北保安队三百人开入宛平接防。卢沟桥之本身，无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护的根据，九日令保安队三百人入城，即等于将关系重大之卢沟桥交于三百保安队之手。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忍受令我们无罪的军队含泪撤退。谁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轰击数十炮。同时由北平开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队，又被阻击于五里店，颇有死伤，强求只准保安队五十名通过入宛平城，而只准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队所带之机关枪。宛平方面终日不见保安队来，而我军已撤，城外之日军，人数虽略向后移，城东军事要地之“沙岗”，仍在日军手中。阻挡一日后，经北平再向天津日军当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队入城，不准带机关枪。

日军旋又进至宛平城外，其后援兵源源而来。丰台的中国人眼看着以中国的铁道，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人家准备好了，当然再攻，再攻没有攻下，又讲撤兵，又说好十二日双方同时撤兵，谁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们一顿。

这回他们派了些监视撤兵委员，拿着地图到我们宛平城里，公开的把他们炮兵射击目标定好，把我们的县府、公安局、团部、营部、连部、炮兵阵地等，完全调查好了。于是他们的炮兵就一炮不乱的，打在我们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骗以后，中间不断冲突，情势紧张。日本国内宣称动员四十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关东军从我们的北平路源源而来，这些行动，当然刺激中国的人民，全国人心随着紧张起来。记者从上海经郑州转徐州，再看看归德、开封，又看看石家庄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无处不是蓬勃的生气，无处不是显示国运的好转，军民万众一心，单等机会捐躯以卫祖国。

后来接到消息，双方又决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为这回也许可靠了，谁知二十日午夜一时许，日军对我军宛平小小城池，开始八日事变以来空前的猛烈炮击，如雨的炮弹一颗颗精确地落在宛平的军民头上。各式各样破坏和杀伤力量，把宛平城里的军民打得血肉横飞，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个小时的集中炮轰，弹烟与尘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雾之城。城里已准备撤退的军队和毫无抵抗的民众，被这几百颗炮弹打得糊涂了，到底怎样一回事呢？

这还不算，炮声停止了二小时，有人去问日方，据答又是“掩护退却”。这当然没有事了。然而九时后密集的炮弹又来了，仍集中到宛平城，东门楼打平了，东北城角打塌了，骑兵步兵坦克都来冲锋了。我们始终守城未出，你要退却还来冲什么锋呢？这是尤为难解的。九时以后的炮攻，竟向卢沟桥后方

长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弹落在长辛店的平汉机车厂附近，那是我们北方重要的铁道工厂！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号。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已纷向卢沟桥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们在大井村遇到日本军官，他说，“等中国军队撤了几天，我们再看看！”

范长江说 29 军官兵的忠勇值得中华民族万世讴歌和景仰，他们是以他们的血肉抗击侵略者。可是，这些浴血战斗的官兵是在怎样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列仗的呢——

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去，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就自杀了。可惜他自杀得太早，知道的事情还不多。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就不是寻常的事情了。

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忠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敌人大炮把他们牺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样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线上。刚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个哨兵会很快地挺身而出。敌我前线相距不到半里，我们的官兵毫无畏惧地在火线上谈笑，有人劝他们小心，他们反而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明我们的官兵乐观的精神。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地讴歌和景仰。

然而，我们进一步看看卢沟桥抗战中的实况，我们就不自安了。

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并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我们没有救护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出救护工作。此等人既没有专门救护知识，又没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兵，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作救护工作，否

则伤员们更加无人问了。

不但对于死伤救护，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作战上枪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给。在卢沟桥正面的，始终是吉星文一团，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我们不曾作应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县第六区，即长辛店所在区，民众对战事之负担，异常艰巨。对方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组织，而我则全恃地方之毛驴民夫大车以供往还。我方以始终一团的疲惫之师，当彼全军之锐，官兵日渐耗损，城内物质破坏日多，敌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补充完全恃未死战士的勇敢精神，后方之接济，则恃有限民力之勉强支持。

此次冲突，日方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为丰台，为天津，为沈阳，为高丽，为其本国；而迄今日止，我们之后方为宛平县之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无粮，问之地方；军队无盐，问之地方；军队修战壕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燃料，问之地方；军队运输，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抬伤兵，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修路，要民夫，要石匠，问之地方；军队送饭，要民夫，问之地方；军队要大车，问之地方；军队要人力车，问之地方。我们对前线之供应，很不周到，致使诸将士分心于事务，减低作战能力。

地方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此次在长辛店一带充分表现。民夫多日夜工作，既无报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处。我们要追问者，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

他写到了过着苦日子的民夫们对战争的无私支援，他们把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毛驴，贡献出来为国家服务。他们说得多朴实、多好：“这回国家的事，不比往常”——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的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

有许多赶毛驴为生活的苦力，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毛驴既然是无代价的为国服务，他们“从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凭借，父母妻子皆开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愿作乞丐者，则采树叶及野菜为生，而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脚夫在长辛店拍其空缩之腹，笑谓记者，这几天来都没有吃饱了。然而，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有一次管理他们的警士有疑惑他们逃跑的意思，他们愤愤不平说：“您放心！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不用说现在不会跑，就是咱们回家以后，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

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农，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和一个毛驴，他被征到前方服务，日夜搬运，肩上肿了，腿也酸了，几天还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两个孩子不能自主，小毛驴也无人照料，有一天他乘着送饭到前方的机会，在回来时候，

绕道十余里，回家看望一趟，然后赶紧回到民夫本部来，管理警士认为他私自潜逃，罚他十天继续工作，他对我说：“作十天倒也没有什么，要说打外国的时候说我潜逃，我真有点不服气！”

长辛店卢沟桥这样地方，完全以交通过道的资格维持车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战争以后交通断绝，若干人之生活立刻失其来源，小商人，脚夫，人力车夫，乃至赶驴的苦力，平日本无富裕的盈余，今受外敌影响，生机断绝，而他们尚不能不作战争中军事运输等负担，其痛苦当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我曾问他们以此下去，如何支持，他们的答复是：“我们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关去，我们就可以再安心的过活！”所以民众对外抗战牺牲是以有希望为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们是欢迎攻击的战争，在短期中他们是可以无条件忍受的。

我在长辛店看到军队下令给宛平县政府，限他们三日之内，要修整一条两丈宽的公路，其中并有开石山工程，宛平县的属区，在永定河西岸的，只是全县面积的一部分，县长兼专员王冷斋先生已经累得生病，秘书长洪大中先生也刚从炮火灰下爬出来，他们人力财力太有限，而且开石山是需要技术指导和技术工人，也不是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确乎军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线军队是没有不靠地方，县长为难，也是实情，只是全军对外抗战，这些事也没有人管。

范长江最后写到了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日军打了那么多的枪弹，可是没有一颗落在卢沟桥上，石桥无大伤……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军数次如此猛烈炮击宛平城，而却未曾以一弹加于卢沟铁桥上，石桥亦无大伤。此中有极大之道理，万不可忽过。日军七日夺得卢沟铁桥，八日夜在相当牺牲下再入我军手中，论感情，日军对守桥军队痛恨已极，如志在单纯消灭吉团，则吉团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后方交通与接济，全由桥上而来，日军如能将桥破坏，吉团之粮食弹药皆无来源，不战亦且不能持久。乃日军计不出此，惟集中炮火，打入城中，其意盖对北方根本认为已早有把握，只是希望能赶走强硬无援之吉团，此永定河上之两大交通要道，日军尚须珍惜为已有也。

平汉北段战争，论地势关系之重要，首推卢沟桥，有卢沟桥则尚可与丰台平分险要，而平绥路尚不致成为死路。卢沟一失，则人家整个控制平津险要，以平津间铁路为纽带，以北宁为后方，以优美的内线作战方式，以对付我津浦平汉之军队，可以收集中运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绥路之被囊括，尤其在无可逃避之中。而守卢沟桥，如对北方之敌言，当守宛平城东北二三里之沙岗高地，该地控平汉与北宁之接口，此为平保公路所必经。“七·七”事件后，日军占有其地，且著手构筑工事，至今未停，沙岗不守，宛平城亦不过如聊胜于无之地势，

如并宛平城而放弃之，则北方内线作战之优良形势已成，今后再欲争回该地，恐非有重大之牺牲，不能达到目的了。

像斯诺一样，范长江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站在卢沟桥上，古人、今人和未来的人，都对他投去敬仰的目光。

寒冷的记忆不会结冰，它能使我们的胸腔发热，使头脑更为清醒！

十三

对于宋哲元送来的“秋波”日军一律采取断然不理不睬的极其冷漠的态度。他们的野心很大，很贪，巴不得一夜间实现侵吞华北的罪恶目的。

平津的局势不可遏制地趋向恶化……

印着太阳旗的飞机投入华北上空。7月21日飞机结队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示威。同一时间，大批日军抵达丰台。

22日，日军飞机50架飞抵天津。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被秘密地输送到华北。

也是在22日这一天，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日本政府报告：已命令部队完成在宛平地区作战的准备，并进入有利地形。

这时候，南京国民党中央获得准确情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尚有日军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驻天津的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往丰台运送军火；此时，集结于平津的总兵力已达6万人以上。其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用物资，蒋介石从庐山匆匆赶回南京。庐山别墅里的藤椅上还留下了那把芭蕉扇，他确实走得太匆忙了。

从机场到他官府这一段路，他来回往返的次数记不得有多少回了，唯有今天他感到太漫长。局势急剧恶化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是当构想中的描述变成事实时，他仍然觉得突然，措手不及，以至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后，他还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

一连两天，蒋介石每天都要几次电促宋哲元让其报告与日军谈判的进展情况。这个宋哲元，火势都蔓延到屁股底下了，他怎么就不着急呢？蒋介石很迷惑。

宋哲元有自己的一本帐，心里堵着一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气；你在庐山的谈话不是蛮慷慨激昂吗？我们哪有你站得高看得远！华北前线情况复杂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人你当了，两头受气的是我宋哲元……

他坐在自己的屋里生闷气，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棘手的事情。

正好，南京又一次来电促他报告与日军谈判达成的协议与落实情况，他顺水推舟，忘掉了心中的烦恼，回电蒋介石、何应钦：

因双方屡次冲突，报告迟至今日。中日协议的内容为：（一）29军代表对于日本军队表示遗憾之意并对责任者处分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事件。（二）中国军为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易于惹起事端，不驻兵于卢沟桥城郊及回龙庙，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三）此事件认为多胚胎于所谓

蓝衣社、共产党、其它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示，故此将来对之求讲对策，并且须彻底取缔。

蒋介石阅罢电文，沉思良久，似有新的想法产生。他指示陈布雷：明日开会。

23日，蒋介石召集军政负责人开会，讨论宋哲元电报中显示的在平、津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会开得还算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会后，蒋介石立即电复宋哲元：

（一）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以批准，表示共同负责。（二）如果尚未签字，中央有两点意见补充：甲、第37师撤离宛平县应为暂时性的；乙、对于共产党的镇压及其它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

不能说蒋介石就完全批准了冀察当局与日军达成的协议，因为毕竟还留了个“尾巴”。

国民党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加紧作战准备。

第10师、83师开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一带集中；

第25师、17师开抵石家庄集中；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要求29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23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宣布了“惩治汉奸法”；准备设置“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派出大员去石家庄主持工事构筑。

随着战争的逼近，空气也变得干燥起来，仿佛划根火柴满世界“嘭”一声都会起爆。

蒋介石并没有“退坡”的意思，他唱出的高调仍在加码，加力。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满脑子算计着的“铁腕人物”，在这一片“备战”的杀声里，他对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最后一次“回旋之想”：23日军政大会之后，他在私下对大员们透露，宋哲元的对日妥协并没有超出他们自己期望的界限。于是，他追认了冀察当局11日同日本签订的“秦一松协定”。

至此，南京政府在对待宋哲元对日态度上保留的那点“尾巴”彻底割掉了。

蒋介石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他退了这一小步、日军却进了数十里。

24日，他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不料日方的答复强硬且带几分嘲讽：

“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蒋介石听了，一惊，不知是懂了，还是有所醒悟？

十四

发表《庐山谈话》的那个蒋介石还在吗？

当战争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的梦幻时，蒋介石曾振振有词地、甚至是拍着胸部说过这样的话：“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去迎击日寇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那阵子，战争好像牵在他手中的一只风筝，他

把线儿拽得紧紧的，分明是不要它远走高飞以至飞得无踪无影。可它还是越飞越高，越远。战争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由他牵着，却离开他远远的。

没想到，突然卷来一阵回头风，牵线断了，风筝被折卷回来，落到他身边。他的心好一阵子抽缩。可望不可及的战争终于一天紧似一天的敲响了蒋总统的大门。蒋介石惶惶然了。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但是眼前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不认真对待。还是让战争远离人们为好，双手把它能推掉就坚决不搂抱它。更何况日方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愿望。别听他们说什么现在只剩下了“军人对军人的交涉”，昨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不是还给外交部王宠惠递交了“备忘录”，责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对29军与日方的谈判吗？”

谈判的路并没有堵死，如果说堵死，那是我们的责任，日方的门是开着的。

蒋介石不仅在说浑话，而且在办浑事，他又为谈判的事忙乎起来了。这回他走的是一种全新的路，他热切的希图通过第三国的调停，能使中日两国和好。

这是他坚持不改的决心：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放弃努力。

他第一个接见的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蒋介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希望英国当“月下佬”，为中日调解。

许阁森的答复也很干脆，说，英同政府实在难以挑起此重任，调解甚为困难。原因是现在日方根本无意接受调解，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

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眼下中日的局势，像箭在弦上，发生战争将是随时的事。我觉得只有英、美两国从中设法调和或许可以有和缓的可能。中日不起战火。东亚和平亦可维持。请许大使将我的意见转告贵国政府。

许阁森答应了。

这是7月21日的事。

时隔3天，许阁森晋见蒋介石，转告蒋介石：“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和特使孔祥熙已经与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晤谈过了。”

蒋介石：“晤见一事我已知道，我关心的是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做过调解，日方态度如何？”

许阁森说：“我国政府已经告诉日本，要他们全力节制在中国的行动，明白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不可估计错误，惹来难以收场的麻烦。”

蒋介石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之间的协议可以同意，这实际上已经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果还要提出什么其它条件，中国必然会拒绝。因为我们的限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蒋介石见许阁森只听无语，便再次亮出了自己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现在唯有英、美两国通过努力，方可调解中日争端，以免发生战祸。”

许阁森的脸上完全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情。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他接见的第二个人是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詹森老谋深算，一出场就是一副不干预的公允神态，

他先发制人，对蒋介石说：

“敝国愿意为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尽力，蒋公有何吩咐尽管道来，我洗耳恭听。”

蒋介石显得有些的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讲了自己的恳愿。求人时是矮子嘛，他说：

“按照中日双方的协议，我方已于7月21日起开始撤军，可是日本方面至24日仍在积极准备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是以最大的容忍对待日方的；他们多次要求卢沟桥事变由当地解决，我方已同意；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的三点均给予批准；凡此种种，我们都是为了求得和平。如果日方还要得寸进尺地提出其它要求威胁我们，我们自然不会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迎战。”

詹森又说了一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我国政府密切关注着日方的态度。”

蒋介石最后以恳求的口气对美国提出要求：

“贵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于此次日本挑起的卢沟桥事件肩负着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所以从道义上讲亦有协助制止日本扩军备战的义务。”

詹森表现了虚伪的热情，连连称道：“一定！一定协力调解。”他就是不谈具体办法，不涉及实质性问题。

蒋介石没有因为英、美两国的冷漠而放弃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在接见了詹森的第二天，即7月26日，他又和德驻华大使陶曼会晤，这是他接见的第三位外国大使。

在这之前，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已和陶德曼有过会面，当时陶德曼讲了以下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已经声明过，不愿意看到第二国干预卢沟桥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敝国出面调解，只能讨得没趣。二是政府曾接东京敝国大使电报，称日本政府对此次卢沟桥事件亦不甚清楚，乃是少数军人欲借此生事。因此，从事变发生至今，日本政府已全为军人所控制了。

蒋介石对王宠惠与陶德曼的会晤无效果很不满意，就以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被人家搪塞过去，不是太有点无能了么？他今天再次会晤陶德曼，就是想从这块板结地上开出一条通道。

陶德曼的圆滑和世故与詹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不过把头天给王宠惠说过的话像嚼剩馒头干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他说：

“敝国现在虽然与贵国无其它政治关系，但是仅从维持两国商业利益出发，也极希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争端。为此，我们会视机而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

此番官腔说得蒋介石高兴不起来。

送走陶德曼，蒋先生又接见了西方第四个外交官——法国驻华大使齐雅。

齐雅是最善解人意的友人了，可是细一琢磨，他的“善意”又能值几何？他对蒋介石说：

“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过百年战争，当时英国伸其势力于欧洲大陆，神气得很，以为敝国将永远会被它征服。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最后还是缩回了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

得势，以为可以征服贵国，我以为日本想错了。战争的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小岛。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以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和平前途实未可乐观！”

蒋介石也感叹道：“日本的形势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蒋也叹息，齐也叹息，两人谁都无有改变局势的良策与能力！叹息复叹息。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第三国所抱的调解之希望彻底破灭了。

别无选择。

国民党政府面前唯一出路就是对日实行坚决的抵抗。金陵城外，处长江的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十五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一同到进德社去访问宋哲元，关于口头约定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毕。宋回答尚未订出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时间，则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本来我们是为了迅速消除目前的危急形势前去商议时间问题的，原以为双方的差距不过是最近一两天的问题，不料回答却说要在一个月之后，这已经出于我们的意外了，再听其理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宋回答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到稍微凉爽一些再办。’我们对于宋哲元这种漠不关心时局的态度，毋宁说倒是吓了一跳。”

宋哲元在已经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后，为什么还迟迟不撤出城内的增援部队，今井武夫探测到的“天气太热”显然是肤浅的答案，我们暂且不提。倒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今井武夫们移祸于人的虚伪姿态太有些欲盖弥彰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侵略中国的根源归结于中方的“违约”、“挑衅”。实际情况是，就在今井武夫们去宋哲元的任所进德社访问之前，日军的大批部队已经开进了华北，使平、津地区呈现着一派大军压境的阴森森的形势。几乎在他们会见宋哲元的同一时间发生了廊坊事件以及由这个事件延续而来的广安门事件，这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有计划的挑衅行为，它为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了新的借口和时机，狡猾的今井武夫就是不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

廊坊当时是安次县的一个小镇，北宁铁路从小镇中间穿过。这一地区驻着 29 军第 38 师第 113 旅第 226 团的部队，是个兵城。

小镇大多是平顶房，没有大的建筑物，仅有当年德军占领时建起的两幢西式楼房。街面上有些中小型商业和摊贩，多半在路南。路北有三

四条窄短的道路，零零星星散布着饭店、客栈什么的。在这个小镇上最惹人注目也最能抖威风的还要算驻军和安次县公安分局了。

从军事位置上来说，廊坊是个必争的要地。敌人为了攻陷北平，非把廊坊这个钉子拔掉不可。随着卢沟桥前线的战局日益紧张，日军来到廊坊侦察地形、了解情报的次数也频繁起来。他们为攻占廊坊找借口，作准备。

卢沟桥事变前后，上级给廊坊驻军的命令就四个字：“备战避战。”再明显不过了；要他们准备打仗，却不要他们真的去打仗。

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往卢沟桥战场，去打我们的友军，战士们的心里有多着急！

指战员们多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

一天，驻在公路边沿的某营五连连长杜巍然给团长崔振伦打电话请示批准他们打敌人。他带着满腔的火气，说：

“团长，请你另找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几天来敌人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们早就咽不下这口气了，弄不好就要打起来。如果真的把敌人揍一顿，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备战避战’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都得遵守呀！”

五连长想了个点子，他说：“如果不让我们明着打敌人，那就允许我们改装成土匪，离开军营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事我也不能答复你，请示以后再说吧！”

崔团长层层请示，没有得到批准。

最使崔团长感到难堪和气愤的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天，鬼子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小镇中间的泥坑里，走不动了。杜连长心想：按上级的规定对鬼子和车都不能打，可是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了就难免不出事。怎么办呢？

他请示团里，团里又请示旅里，最后又请示到师里，师里的一位副师长竟然作了这样的指示：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杜连长想。把这个指示传达吧，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谁能担当得起？杜连长正在左右为难时，幸亏敌人的汽车已经走了，为他解了围。

事后，崔团长才知道公路上的那个陷坑就是五连有意设置的。他既高兴又后怕，但更多的是担心。他怕这个连队以后会闹出事来，不好向上级交待，就把他们调走了。

随着日军在平、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廊坊越来越成了必争之地。

7月25日下午，日军一列兵车开到廊坊，车上运载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兵力和通信队的一部，他们说来廊坊是“修理电线”。38师师部当即通知226团对此敌严加注意，具体指示是：“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崔振伦团长派安次县驻在面坊的公安分局局长带着翻译与日军接触，提出了我方对他们的要求。日军一面应付，一面又提出：“光在站内活动，怎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呢？”他们要求与驻

军旅长接谈。旅长刘振三便派一名上尉参谋为代表和日军交涉，日军坚持要旅长亲自来谈。刘旅长又派第 226 团中校团副杨某再去交涉。这回双方进行了谈判。日军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中方人员合影留念，而且让杨团副站在中间。杨团副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坊，以免发生误会。”敌人要求出站宿营，杨团副说：“此地有驻军，你们绝对不能在这里宿营，还是赶快离开为好。”就这样反复争执，终无结果。

我方代表回来后，敌人就行动起来。他们先以主力部队占领了车站，剩下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 30—50 人左右，全副武装，带着工具，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作战工事。

崔团长把这一情况逐级报告到师里，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

太滑稽了！敌人不但出了站，而且开始修工事了，师里还是那套指示。无奈，崔团长又派公安局局长与日军交涉，要求日军停止修工事，马上离开廊坊，否则发生冲突由日军负责。日军不仅不理这个茬，还十分强硬地提出要求，叫驻军让出营房，给他们来驻扎。

团里又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师部，师里那位副师长说：“我们的营房不能让出来。”团长问：“如果敌人硬要进营房怎么办？”副师长说：“挡住敌人。”

“如何挡住？”“那我不管。总之，驻地不能让出去，也不能先开火。”

这种软弱的让步，肯定给敌人壮了胆，他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而且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着攻击我军驻地的准备。瞧，重机枪架起来了，小口径炮也仰起了头……

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晚 11 时许，驻军第 3 营第 9 连向日军的工事开了火。日军立即还击，机枪声，炸弹的爆炸声，再加上喊杀声，把廊坊镇几乎要抬起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因为敌人遭到的是突然袭击，再加上他们准备不充分，所以伤亡惨重。但是，敌人没撤走，仍然占领着车站的各种建筑物。

廊坊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它没有经过师里的批准，是指战员们自做主张还击来犯的敌人的。

战斗打响后，崔团长马上来到 9 连阵地，他很担心这次开火会招惹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是他不想责备连队的官兵，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作为一团之长是应该知道这些的。9 连宋连长见了团长，神情很不自然，带着几分不安对团长说：“这次开火是俺们连一个叫王春山的列兵干的，他自己集合了 5 挺轻机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崔团长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编出来的故事，没有连长的允许，一个列兵怎么能够集合 5 挺机枪呢？肯定是宋连长怕担负没有命令私自开火的罪名，才抬出了这个列兵当替罪羊。团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指战员们打鬼子、反侵略竟然也缩手缩脚，怕问罪！于是，他安慰宋连长说：

“敌人打了咱，咱当然也要打敌人嘛！”

后来，师里也没有追查这件事，事情就那么过去了。

但是，受到袭击的日军并没有罢休。于当晚 13 时，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命令第 20 师团第 27 联队，在鲤登大佐的指挥下，增援廊坊日军

作战。26日凌晨3时半，香月清司又命令20师团将驻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部队按秩序向前方移动。此外，他还命令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该地区的战斗。

29军第226团，也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准备迎击敌人。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他们在飞机的支援下立即向守军发起攻击。226团第3营与敌人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撤退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

事情还没有完……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认为自己实现宏图、大显身手的时机已到，便乘机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此时是7月26日11时。

当天，参谋本部就接到香月的申请报告，立即给驻屯军发出以下的通知或命令：

参谋本部第一部通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

“要坚决予以讨代，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

接着又下达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废除临命第400号，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

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个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命令上明确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不得已时，行使武力，根据如下精神使用飞行队：（一）以密切配合地上作战为宗旨；（二）进行对地面攻击或轰炸时关于目标的选定及其它，要考虑到国际关系。”

26日下午，驻屯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松井特务机关长等三人前往进德社会见宋哲元，递交日军的通牒，由秦德纯和张维藩代收。

通牒全文如下：

昨天25日夜，我军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遭到贵军的不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之冲突，不胜遗憾之至。

追究惹起上述事态之原因，不得不归究于贵军对于和我军签订的协定事项缺乏执行的诚意，依然不改挑衅的行径。

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

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为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此致

第29军军长宋哲元阁下

日本军司令陆军中将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事情仍然没有完。

日军向29军送去最后通牒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之时，奉香月清司之命驻屯军第2联第2大队乘火车到了北平，他们在丰台车站换乘车队车辆开往城里。

在广安门，这批汽车上的日军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守城部队的盘查。

日军谎称他们是日本总领事馆卫队，刚从野外演习归来。守城部队当即识破谎言，关闭城门，拒绝日军进城。城外日军准备开车强行入城。

宋哲元得到此讯后即令守军备战，迎战敌人。守城官兵得令后士气大振，这是他们多少天来得到的第一个向敌人出击的战令。战士们将城门慢慢开启，诱敌进城。向来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日军，以为他们又一次赢得了中国守军的妥协，便无任何顾忌地进城而来。当敌人车队一半进入城门后，守军出其不意地向敌人车队猛烈开火，两军发生战斗。这时正在城门楼上的38师日本顾问樱井立即制止守军射击。守军异常气愤，即向樱井开枪。樱井急忙跳城而逃，其随员当场被击毙。此刻，城上城下激战正酣。中国守军居高临下位置有利，火力猛烈，日军顿时陷入混乱。

晚10时许，战斗停了下来。日军一部分已入城，被袭击得七零八落，另一部分被阻于城外，损失也很惨重。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高粱地里，27日晨按照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至丰台。

香月清司愤怒了。

他27日中午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这时，驻屯军向他反映北平城内日本侨民尚未按预定计划完全撤出，他便把进攻时间推迟到28日。

但是，局部的进攻已经在27日拉开了战幕。

这天清晨3时，日军突然向驻扎在通县和团河的中国军队袭击，双方激战到上午11时，中国军队难抵日军的凌厉进攻、突围撤退。通县、团河失守。

宋哲元无路可退了。

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奋起抗日。

26日他两次电报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日军向29军发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危急局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介石27日晨回复宋哲元：

“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作者注）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

27日深夜，在日军向南苑、北苑发起进攻的炮火声中，宋哲元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随后，他向全国各界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

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城、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仅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修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所企禱。”

宋哲元的心不可能不再惶惶，但他毕竟打开了心窗，让早该吐露的话语飞上云端，向远方飞翔。

在发表通电的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令冯治安为城防司令，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

也是在这个不安宁却撩拨每一个中国士兵之心的夜晚，宋哲元还派冀察政务委员会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督师北上，协同 29 军作战。

十六

29军在卢沟桥战场上牺牲的将士是数以百计的，但是有两名将军的英名国人深记不忘。他们就是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二将军是抗日战争初期最早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将领，他们大节凛然，以血肉之躯捍国为民，是两座永放光辉的丰碑。

他们都是在北平大红门殉国的。时间是1937年7月28日……

7月27日，宋哲元下达了两个命令：

让29军军部从南苑迁入北平城内；同时调正在河北任丘守防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地区指挥官。

南苑已处在了日军的重兵包围下，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驻扎南苑的中国守兵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9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5000余人。

毫无疑问，赵登禹肩上的责任是很艰巨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深知守住南苑阵地之艰难，便没有随军部进城，留了下来。在这之前，南苑驻军是由他和冯治安师长指挥的。

佟、赵决心死守南苑不放。激战前夕，他俩互诉心声。

佟：“敌人既然找上门来捣乱，那我们就和它拼个死活。这是不能含糊的！”

赵：“不要看敌人气势汹汹的像只恶虎，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它打得落花流水了？这一回，它同样占不了便宜。”

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30余架飞机，向南苑发起了猛烈进攻，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当日军行至我军阵地前200米处时，他率领部队挥舞大刀，向敌人冲杀。敌人被这犹如从天而降的闪着寒光的大刀林吓得魂飞魄散，节节败退。我军紧追不放。

这时，日军用猛烈的炮火阻击赵部的追击。为避免官兵无谓的牺牲，赵登禹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赵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会趁我军停止追击之际大耍威风，反追而来。他便急令预备队增援，之后，他则一手握着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向前冲杀。官兵们见师长如此英勇，大受鼓舞，就又振作起来，一鼓作气，将敌人驱退了一里多路，敌人伤亡不小，尸体暴晒路野。

果然日军败而不死，他们的炮火再次向赵部猛轰。南苑一带全是无遮无挡的平川地，无险可守，赵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不少官兵受伤甚至战亡。不得已赵登禹率部队退回原地。

就在赵部撤退的路上，敌机猛烈地轰炸扫射。赵见部队已无退路可走，便又带领所部向日军进攻，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赵部只得且战且退，伤亡较大。

不到六个小时，南苑的大部分地盘就落入日军手中。

宋哲元下令让赵部撤退北平城内。

这阵子，佟麟阁在指挥所里正心急如火地等待着赵登禹的消息，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使他无法统一指挥。焦急之中，军部传令兵报告：军部已下令让南苑各部队立即撤回城内，日军在大红门一带追击后撤的我军。

佟麟阁立刻率兵到大红门附近去指挥掩护后撤的部队。

大红门是一片闹闹嚷嚷兵的世界，撤退的各部队没有统一的安排，无人指挥，无人掩护，秩序混乱。佟指挥自己的卫队首先阻止这种毫无秩序的后撤，随即命令：不论是哪个部队的士兵现在都统一编组，凡是军官就出来指挥。兵们见到了自己的副军长，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了数，便静下来，按照佟的命令，很快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沿着大红门至红庙之间的一条便道撤退。

佟麟阁仍留在大红门，他在一个小土山上设置了望哨，一面观察部队的后撤情况，一面监视敌人的动向，中午一时许，部队已经撤退完了，他才和几个随从卫兵一起向北平城撤去。

途中，他们与一股日军遭遇，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对射中，佟麟阁腿部中弹，流血不止。部属劝他稍退裹伤，他拒绝了部属的要求，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佟继续指挥大家转移。此时，日军的飞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他的头部被击中，当时倒下，壮烈殉国，时年45岁。

赵登禹领部队继续向城内行进，当他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外，埋伏在两侧的日军突然用机枪扫射起来，他来不及反击，身中5弹，倒在农田中。稍停，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份，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得惊慌，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别的心事了，”说罢，他便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佟麟阁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冒着炮火的危险到永定门外，将他的遗体运回北平城里。当时人们看到，佟将军的左小臂被炸没了，头、胸、背部满是弹痕和血迹，将军的儿子和女儿流着眼泪用棉花为父亲擦去满脸的血。谁料，次日北平就被日军占领，鬼子四处搜捕，佟将军的灵柩无法安葬。当时，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中有一老和尚，敬慕佟将军为国牺牲的行动，收留了将军的灵柩，悄悄安置在寺中，保守秘密8年，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佟麟阁的灵柩被安葬在他曾生活过的地方——北京香山南麓的山坡上。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北京西城的一条马路被命名为“佟麟阁路”。

赵登禹殉职后，北平红十字会将他遗体就地掩埋。抗战胜利了，何基沣回到北平，将赵将军和29军抗日阵亡的将士忠骸移到卢沟桥畔，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

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奖令，追赠佟、赵两将军为陆军上将，生平事绩，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原文如下：

“陆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陆军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前于北伐剿匪及喜峰口诸役，均能克敌致胜，懋著勋猷。此次在平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佟麟阁、赵登禹均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议恤，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

毛泽东对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 1938 年 3 月 12 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 13 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领大会上的演说中说：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怀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丹桂、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十七

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汉奸殷汝耕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要把这个偏离北平的地方经营成日军的避风港。难怪人称他是鬼子的保镖。

尽管有殷汝耕保驾，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仍然心虚得要命，他总是担心有一于 29 军会进攻通州，自己命丧黄泉。一日，细木繁特地把驻守通州的冀东保安队两位首领张庆余、张砚田召来，商讨防守事宜。当他忧心忡忡地道出自己的担心之后，二张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向细木繁保证说：

“我们有信心配合皇军打垮 29 军，请长官放心，通州不会成为 29 军的天下。”

细木繁眉毛上挂满了笑，他就爱听这样的话。他赞扬二张：“你们是大大的好人，皇军的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随后，细木繁又问起二张还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张庆余便顺坡爬竿，提出了一个要求：

“目前保安队兵力很分散，驻守在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这么长的战线战守均无把握，依我之见，把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在通州待命，这样通州就变成铜墙铁城，谁也攻不破它。”

细木繁对二张的“忠心”深信不疑，当即批了他们所请。

很快，散居在各地的保安队便集中在了通州。细木繁又给他们配发了三八式机枪若干及大量的弹药、服装、现款。数日后，往在外地的一些日侨也集中到了通州。日军确实把冀东保安队当成了“自己人”。其实，细木繁完全是自做多情，张庆余和张砚田根本和他不是一条心，他俩做梦都谋算着如何把殷汝耕和日军干掉……

冀东保安队就是原来的河北特警总队，1935 年 5 月奉于学忠之命，

进入冀东。后来，于学忠率 51 军调往西北，因总队系地方武装，没有与外军同行。于学忠在离开河北之前，曾秘密召见二张囑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四十月后，冀东伪政权出宠，保安队便归伪政权统辖。二张成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自觉脸上无光。全国上下都在切齿痛斥殷汝耕卖国投降的恶劣行径，张庆余的儿子深觉先父在伪政权中做事是奇耻大辱，便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张庆余与张砚田处在众叛亲离的尴尬之中，迫于形势，又不便轻举，只得忍辱于心底。张庆余曾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宋哲元出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从旁侧得知二张的心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特将二张约请到天津旧英租界地 17 号路宋宅秘密会晤。宋对他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说明，请你们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立场坚定，不再动摇。”之后，宋哲元令肖振瀛给二张各一万元。从此，保安队与 29 军一直保持秘密往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29 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一触即发。二张瞅着时机，随时准备揭竿起义，向通州的日寇发起攻击……

现在，通州汇集着一万多名保安队员，张庆余等一面调动、部署队伍，一面暗中对自己的骨干分子进行动员，做好准备起义的工作。

7 月 28 日夜里十二时，二张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随之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冲进冀东伪政府，生擒了大汉奸殷汝耕。与此同时，另一部分队伍前往西仓的日本兵营，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细木繁带领数十名特务抗拒，并威胁冲他而来的保安队官兵：“你们下要算计错了，皇军一到，每一个捣乱的人都别想活命。”保安队的官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鬼话，当即向细木繁开枪，他当场被击毙。保安队占领了特务机关。

西仓的日军兵营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保安队久攻不下。这里集中着日军三百余人，还有宪兵、特警和日侨。此时已是 29 日凌晨，张庆余心急如焚，他决定用火攻拿下西仓。于是，他下令点燃了兵营附近的一个汽油库，霎时火势冲天，浓烟四起，日兵在里面嚎陶怪叫，绝大多数被保安队歼灭在烈火中。

日军的报复是凶残的。

29 日上午 12 时，日军 24 架轰炸机开始扫射保安队，从中午直到黄昏，轮番轰炸，七个小时不停。整个通州成了一片火海，无任何防空设备的保安队伤亡极大，不少人脱去军装，弃城逃离。通州城里的保安队越战越少，越战越乱。连张砚田也逃走了。

这时，日寇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开了上来。

天快黑了，张庆余毅然决定放弃通州，投奔 29 军。夜幕中，保安队兵分两路向北平撤退，行至城下，方知 29 军已撤向保定。张庆余只得率领队伍通过北郊向门头沟转移。

日军的追击与堵截一直没有停止。

在安定门以西，保安队与日军铃木旅团遭遇，敌人的数十辆装甲车凶狠地向保安队开去，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正是在这场混乱的交战中，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冲散，这个汉奸乘机逃走。他什么也不顾了，绊绊坷坷地一口气跑到永定门外后才收慢了脚步，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第二天直接给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救，今井武夫通知汉奸、公安局长潘毓桂开启诚门，派日本使馆武官把殷汝耕带进城保护起来。

后来，保安队化整为零，分散为 120 个小组，趁着夜色分批突围，奔赴保定。到保定时只剩下了 4000 多人。宋哲元握着张庆余的手叹息不止：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猝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

就在冀东保安队反政的同一时间里，驻守天津的 29 军和天津保安队，也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响了天津保卫战。

7 月下旬，天津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一到也没有停止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领北平，扼住平汉、平绥铁路，然后再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兵力夹击天津驻军——29 军的 38 师。现在他们要把这种愿望迅速变为现实：日军已经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占领了塘沽码头和天津火车站；并从 26 日开始修筑以车站到东局子兵营长达 10 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了步兵、炮兵外，至 28 日下午已有 160 余架飞机停在机场；不分昼夜地进行占领天津的战术演习……

大战迫在眉睫。38 师已经与北平失去了联系。27 日，李文田副师长召集中国驻天津的所有军队首领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毅然决定：主动出击日军，在攻其不备的制敌中力争取胜。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

天津抗战的枪声于 28 日凌晨在濛濛的朝霞中打响。

初战告捷。宁殿武队长率领的保安一中队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 400 余人多次的死拼硬抗，夺取了东站；偷袭天津总站的战斗也很顺利。随之，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相比之下，攻占东局子机场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深夜，官兵们每人携带一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大汗淋漓地冲进了机场。睡在飞机底下的日军飞行员被枪声惊醒后立即发动飞机，准备逃跑。官兵们将汽油泼到飞机上，准备点燃。谁知汗湿了的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只有一架飞机点着了。战士们便用手撕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去引火，这样，有十多架飞机被烧着了。没有着火的飞机起飞后在机场上空乱窜，像无头的苍蝇。守卫机场的日军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根本不敢露面。

处于闹市中心的海光寺驻着日军一个联队，有坚固的工事，还有十几门炮，是个很难啃的碉堡。38 师手枪团团团长祁光远率领本团兵力，在保安三中队的配合下，前仆后继，几经冲锋，也未拿下。后来，鬼子龟缩在墙高垒固的兵营内，敌我双方僵持起来。天一亮，日军就出动 9 架飞机向中国军队扫射。双方几进几退后，我军从海光寺外围撤离。海光寺虽未攻占，但伤了敌人元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28 日凌晨 3 时许，盘踞塘沽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配置于海河堤岸的数十门大炮，突然向大沽口开火，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及驻守

大沽的 29 军某部。随后，敌登陆舰十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使日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天津驻军打击日军的枪炮声以及取得的胜利，给天津人民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希望。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冲出家门，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慰问 29 军和保安队。有的送去茶水、西瓜、饭菜以及手巾、鞋袜；市内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几乎全部出动给中国军队运送弹药或食品；巡捕们也主动拉开设在路口的拒马，让部队和汽车通过。不少群众在支援部队的火线上流血负伤，甚至壮烈牺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9 日攻占公大第七厂的那场战斗。

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 1936 年秋天被日商吞并，易名为公大第七厂。日本人侵吞“新纺”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些侵略中国的战争魔王首先考虑的是军事。“七七”事变后，果然这里成了日本的军事基地，他们的许多枪支弹药以至军队都在这儿集散。工人们受不了这种欺辱，他们盼着中国军队进入天津，赶走洋鬼子。有的工人偷偷与附近的 29 军联系，反映情况，倾诉希望。后来，便有数名官兵化装成泥瓦工多次混进厂内侦察情况，作好夺厂战斗的准备。29 日的天津之战中，一百多名保安队员从事先侦察好的厂西墙缺口处冲进厂来，然后分成三路进攻：第一路抢占全厂制高点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打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战士们整整一天没吃饭，弹药也剩下不多了，可大家的拼杀勇气依然不减。

日军大规模的反扑也是从 29 日下午开始的。

香月清司责令 20 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堤支队转向天津。下午二时许，日军开始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的电话总局、车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

38 师和保安队伤亡惨重，极需增援！

情况越来越恶化，孤军作战的天津守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这时候，南京政府对天津的战局持什么态度呢？

27 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蒋没有答应；29 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结果电报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李文田和刘家鸾实在无法支撑眼下的战局，便在 29 日下午决定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

次日，天津沦陷。在这之前的头一天，北平已经失守。

张自忠大概没有想到 29 军这个七零八落的摊子，还有华北这片被日寇和汉奸糟践得千疮百孔的天下，最后轮到他来收拾。不是拖卸责任，这个残局他实在无法修补，无法改变。

但是，最终他还是挑起了这付他难以胜任的重担。那是 7 月 28 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宋对与会者说：敌人集中兵力打上门来，蒋介石不让还击；现在，敌人进一步逼着我和 37 师全

部撤离北平。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到了那里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

宋哲元当时并没有说出谁是留在北平的合适人选。不过，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这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在张自忠身上打着主意。果然，就在这天下午，宋哲元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张自忠接过手谕，心中激动与气愤交加，他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有千言万语难以说清，他和张自忠相对而泣，久久不语。临别前，张自忠沉痛万分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当晚，宋、冯、秦等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

平津地面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张自忠。

29日凌晨，29军全军撤离北平。天亮以后，北平街头静悄悄的。转瞬，人声鼎沸，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29军竟消失得无踪无影。街头处处可见代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大意是说中日战局发展，29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产，不要惊慌自忧。

北平已经沦陷，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何谈人心安定？

一只受伤的军犬从西单牌楼下慌慌逃过。

张自忠不断接到令人心碎而又气愤的消息：有人不战自退；还有人当了无耻之徒，投降了日军；最后，北平城仅留下一个保安旅，也被迫缴械……

他悲愤得五脏剧疼，几乎晕倒。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

三天后，他化装成学者，住进了东城区礼士胡同美国侨民福开森家中。

就在这当儿，张的旧部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派人辗转送到北平，希望他早日回军，率部抗日。张南下心切，便着手准备奔赴前线之事。

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着工装出门，坐在美国商人的汽车内，出朝阳门，过通县，到达天津。

9月10日拂晓，他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十八

枪声，炮声，从远方的天际掠过。

它留在天空的沟壑比地上的更多更深。

那是敌人在召唤我们去抗日，去战斗。

梦的碎片在飞，血肉的粉沫在溅。

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在卢沟桥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就这样从这里点燃起来了！

一声炮弹的轰鸣，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坑。

卢沟桥上的一只石狮随着一声枪响栽下，它不会消失。大地是它的

母亲，她会紧紧地搂抱着它。

一只倒下的石狮，一座愤怒的石碑。它身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强盗的罪恶，还有中国军人的辉煌。

1937年7月，这个多雨的季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7年7月，这个中华儿女的心先热起来的日子，众多的中国人背起最后的希望，从遥远的道路上走来。

枪声伴着沉重的、创世纪的脚步……

1994年1月至1994年6月于望柳庄

1995年3月19日改于北京北苑

